

# 傳播研究與實踐

第2卷 第1期 2012年1月

## 專題論文／論壇

反國光石化的社會實踐：談環境保護的公民／蔡嘉陽

媒體的民主練習曲／胡慕情

網路社會動員的繼往開來：反國光石化運動的社會科技基礎和行動策略演化／陳順孝

文化行動的可能：以四大蚵報為例／蔡培慧

反國光石化運動的「公民」展演／何明修

## 研究論文

國際移工／民傳播權的在地思考／陳春富

從媒材轉換談動畫新聞對傳統新聞產製與標準之影響：以《動新聞》為例／江靜之

電視政論與政／媒互動實踐初探／唐士哲

讀者賞析小說之審美視域與美感反應：以《*紅燭*》之閱讀歷程為例／賴玉釵

## 典籍再現

*The Oldness of New Media* / Peters, John Durham

言詮與我群：評介《話語的摸索與尋繹：傳播觀念史》／夏春祥

最接近又最遙遠的距離：評介約翰·杜罕·彼德斯《交流的無奈：傳播的思想史》  
／張約翰

從愛慾與身體出發：在《交流的無奈》中探尋傳播本質／陳柏程

# 反國光石化的社會實踐：談環境保護的公民<sup>\*</sup>

## The Social Practice of the Anti-Kuokuang Petrochemical Movement: The Citize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蔡嘉陽<sup>\*\*，1</sup>

Tsai, Chia-Yang

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副理事長

Vice-Chairman, Taiw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nion, Changhua, Taiwan

### 壹、緣起

反國光石化這個議題，在 2011 年 4 月 22 號「世界地球日」那天，親獲馬英九總統宣布終止這項在彰化的開發案。約莫兩年半的環保奮鬥在那一刻產生一個戲劇性的大翻盤，成為一個非常奇特的非典型環保運動。

不是每一個成功的環境運動或社會運動，都可以用同樣的手法去複製，那得看每個運動的特性，還有它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是在哪裡。以反國光石化運動為例，前後大概兩年半不到三年的時間裡，該運動具體顯現出環境保護議題透過公民意識的崛起，確實有別於一般傳統的環保運動。

環境運動的本質是什麼？然後反國光石化的策略，跟我們當時開始在策動這個反國光石化的一個心路歷程，然後跟大家分析一下，反國光石化成功的原因，然後再看其實是公民意識的崛起。看起來表面是馬英九總統一個人的意志去宣布停建，但是其實背後有我們的另一個力量在裡面。

從客觀的現象來看，基本上，「沒有環境的問題，只有人的腦袋的問題」。那是因為不同的人在看待一件事情，每個人的思考模式都不一樣，所以結果自然

---

\* 本篇文稿來自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所辦的演講，演講時間為 2011 年 12 月 8 日；期刊版本由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生侯剛本根據演講內容整理而成。

\*\* E-mail: cytsai2@pu.edu.tw; Waders.taiwan@gmail.com; tepu.cd@msa.hinet.net

1 蔡嘉陽是英國杜蘭大學鳥類生態學博士，曾任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理事長。

也就不一樣。這樣的思考模式大致分成兩大類，一類是科學家，另一類是工程師。科學家是在問題的前端發生之前避免問題的發生，工程師則是問題發生之後再來想辦法解決。所以其實沒有環境問題，只有人的腦袋看誰有問題。

論到環保運動三個層次，我個人認為第一個層次，就是過去我們所看到一個比較表層的環保抗爭，「污染不要在我家後院」。第二個層次是「尊重土地倫理，捍衛環境正義」。第三個層次應該是「追求永續發展」。然而，環境運動不是讓各位去過原始人生活，而是環保運動應該必須考慮到永續的發展，我追求永續發展不是讓環保和經濟對立，而是要環保做得更好，給人民一個更永續性、更健康的未來。所以永續發展的定義就是滿足當代人的需求，不會掠奪下一代人滿足需求的權利。

## 貳、興建國光石化廠對白海豚生態的迫害

大家一直在認為環保跟經濟發展是相衝突的，其實並不是這樣。畢竟以臺灣一千三百多公里的海岸線，彰化這一段就生態和環境來說，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潮間帶。這樣的泥灘地就好像是一個天然的海綿，天然的消波塊，把浪的力量給吸收掉，有些人覺得這種泥灘地不開發很可惜，所以我們要填海造陸變成工業區，於是抽沙填海造陸變成今天的彰濱工業區。不過，利用這片溼地去填海造陸填掉，是非常不聰明的，因為我們冒了一個海嘯來時沒有溼地潮間帶的極大風險。如今我們已經把北彰化這片泥灘地改建為彰濱工業區，顯然南彰化就應該更保留下來。於是，爭取反國光石化絕對不是彰化地方的案子，一定要結合全國的力量，把反國光石化變成一個全國性的議題，讓各界的人都知道。

另外，關於生態的議題，就是白海豚。白海豚又叫媽祖魚，為什麼叫媽祖魚？是因為冬天的時候比較不容易看到白海豚，直到臺灣的農曆 3 月 4 月的時候東北季風停了，風平浪靜，白海豚出現特別容易被看到，因為海平面上比較沒有碎波浪，所以白海豚出現很容易被發現。由於媽祖生日是 3 月 23 號，大家也就認為媽祖生日前後特別容易看到白海豚，覺得這群白海豚是來幫媽祖祝壽的，所以白海豚又叫做媽祖魚。牠的分佈只有在中臺灣，從苗栗到嘉義這一帶，大概是 200 公里左右。牠的壽命大概可以活 30 歲到 40 歲，但繁殖率不高，現在臺灣估計大概只剩 78 隻，數量越來越少，科學界 2002 年才確定臺灣有白海豚，當時估計大概有 120 隻，然而現在的數量卻是逐年在持續下降。

雖然不只臺灣有白海豚，廈門和香港也有白海豚，但在比對這些白海豚的基因才知，臺灣的白海豚是世界上稀有的獨立種群。因此，當白海豚的棲息生態正好便是建設國光石化的預定地時，以至於白海豚立即將面臨五大威脅。首先第一大威脅就是填海造路構成棲地的破壞與消失，第二個威脅是環境（空氣、水域等）污染，第三個則是當地的淡水減少，可能引發海水鹽度增加，因為河口區就是陸地的淡水跟海水交會的環境，這也就是為什麼河口的生態會如此豐富的主因，如果淡水減少，連帶河口生態系就會受到改變。第四個威脅就是水下的噪音，因為水下噪音太多，會影響白海豚的聽覺，因為牠們是依靠聲納搜尋魚群覓食。最後就是漁民的誤捕。

因此，捍衛國際重視瀕臨絕種物種白海豚生態環境，成為反國光石化另一個重要的基點。畢竟這群臺灣獨有的白海豚，從苗栗到嘉義臺南這一段海岸，大概200公里的範圍，但是國光石化要填海造陸填掉中彰化這一段，如果白海豚因為國光石化開發，阻斷其從苗栗到臺南嘉義這段活動路線的話，截成一半便會同樣減低交配與覓食的機會。荒謬的是，當時的國光石化團隊竟然在環保署環評會提出訓練「白海豚轉彎」的策略，透過行為訓練引導白海豚穿越彰化海域，並在堤岸設置移動式食物誘導設施。當時這個策略沒有一個人認為是可行的，全世界也沒有成功的案例，只是因為為了國光石化的開發，想出這種意想天開的對策實在荒謬。

## 參、環境破壞所帶來龐大的負面社會成本

從國光石化的案例，得知過去有很多財團賺很多錢，是因為外部成本沒有內部化，以致於這些大量的環境成本與社會成本，全都是人民在共同承擔。於是這次捍衛反國光石化這樣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也就是我們去計算外部的成本，就是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陳吉仲老師，算出了這樣一個社會外部成本若要全由國光石化去承擔，使得這在整個環評會過程中，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素。也就是說，國光石化一年的淨效益有529億，可是他的社會成本至少超過539億。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賠錢的生意沒人做。因此，「外部成本內部化」成為止住國光石化開發案繼續的一個重要關鍵點。

由於國光石化對環境保護方面跟經濟發展，其實一點幫助都沒有。一來，溼地填海造陸影響稀有動物白海豚的生態；再者，臺灣的米倉會因為水資源的流失而減產。第三，健康風險會增加，是因為污染增加的緣故。第四，自然災害增加，

因為河口的淤積造成以後防洪排水都會出問題。第五貧富差距會增加，因為所有的錢都被財團賺走，但是社會與環境成本卻是遺留給全民在承擔。第六，國光石化年賺 529 億賠償 539 億，並不是一個符合永續發展的開發案，所以這個開發案對於臺灣的永續發展，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 肆、社會行動力：公民意識的強大力量

由於白海豚又叫媽祖魚，於是今年（2011 年）配合大甲媽祖遶境，我們也做了一個白海豚的花車，且看大甲媽祖的鑾轎在前面，白海豚的花車隨之跟在後面，然後沿路發 DM 告訴所有媽祖的信徒，大家也要一起保護媽祖魚，藉由這個機會把環保的課程擴及到宗教界吸引很多人關注。除此之外，我們還為白海豚的議題舉辦路跑賽，連外國人也來跑，大家在海堤上跑，一起感受在這邊跑步是這麼舒服，乾淨的一個海岸空間，如果到時候開發破壞掉，這個海岸就消失了。另外，我們也舉辦了很多體驗性活動，直接帶大家下到海裡體驗現剝的牡蠣生吃，還有現烤螃蟹大家一起享用，讓大家知道這片土地是我們要捍衛的臺灣糧倉漁米之鄉。

除了這些，我們更為守護這片土地推出環境信託，提倡環境資源是公共財，然而政府竟然要賣斷這個海岸給財團，所以我們認為這是不能夠被壟斷、被政府跟財團壟斷，更不能被破壞。所以環境信託其實就是一個公民社會的指標，因為我們認為保護環境是政府該做的，而今政府卻帶頭要賣溼地、破壞溼地滅絕白海豚，這顯然是政府失靈的指標。推出這個環境信託，不只是宣言這個地方是臺灣重要的糧倉，更是白海豚重要的棲息地，如果讓國光石化開發掉，臺灣就損失了這樣一個珍貴的環境資源與公共資產。所以我們鼓勵大家一起把這一塊溼地給買下來，既然政府要賣，那我們人民為什麼不能夠買？那既然要賣給財團，人民也可以聚集力量大家一起把這塊土地買回來。為此，我們在網路上大概用 3 個月的時間，累積 50,000 人的力量，用網路登錄買下這塊溼地。這個點子是源自我們去參觀日本時，日本第一個環境信託就是龍貓基金會，他們買下宮崎駿筆下的這座龍貓森林，因為這個地方是接近早稻田大學跟西武球場，所以是片很熱賣的住宅區。但是如果一旦開發這些山坡地把它賣掉實在可惜，於是為了保存這片森林，日本人民就成立一個龍貓基金會，去跟全國日本小朋友去募款；他們花了 20 年先後買了 12 塊地。

日本人做得到，臺灣人一定也做得到。我們的策略打算先買下白海豚的航道，讓國光石化的開發案在土地上因著被切割而產生困難，後續我們在網路上用

一平方公尺 119 塊錢，比國有財產局公告賣給國光石化是一平方公尺 100 塊錢的價格還高，同時 119 又有緊急救援的意思，這是運動的策略。另外，學者投書、國語日報頭版頭條報導小朋友上街頭搶救白海豚，都是後續撼動反國光石化的社會力量。還有，這次的社會運動，我們也結合了大學生的創意，剪接了一部仿阿凡達的影片，運用文化創意的方式來吸引大家對這個環保運動的關注。

由於環評會議一直是一個決戰的場所，所以環評委員的遴選就變成了兵家必爭之地，站在環保署的立場，當然是找聽話的委員來當環評委員，而不是找像蔡嘉陽（我）這樣的人來這邊搗蛋，所以這些找來的人也未必真的想為環境把關。除了這些，我們也辦了一些請小朋友寄明信片給馬總統的活動，讓小朋友來告訴總統，連小孩子都知道要保護環境，為什麼你們這些大人都不願意去珍惜我們的水資源，做為一種環境保護的訴求。除了小學生之外，中學生也參加了反國光石化的連署活動。像是彰化高中、彰化女中兩所學校就有 2,646 位的學生，連署反對國光石化。除此以外，來自各地的大學生也是熱血的反國光石化青年，20 幾所的大專院校學生，運用各種文創與公民媒體做為連署與反對的手段，光看這些學生們跳出來一致反對這個開發案，顯然國光石化真是必敗無疑。

當環保署第 4 次召開專案小組會議時，我們徹夜守夜在那邊，因為我們擔心這是最後一次的審查，畢竟一般的環評會只開 3 次，第 3 次專案小組的時候，大概沒有做什麼結論。國光石化又開了第 4 次，那時候開的是縮小規模的方案，本來這個開發案是 4,000 公頃，後來縮小規模變成一千九百多公頃，可是我們都很擔心他那天這個提案會過關。於是當時大家都守在那邊，這是發生在今年（2011 年）1 月 27 號的第 4 次專案小組，看環保人士都在外面集結聲援反國光石化案，其實這也給了環評委員很大的壓力，因為這就是一種社會的壓力。

有趣的是，我們因為推動反國光石化的社會運動，竟然還意外地拿到了行政院頒發的永續發展獎。本來我不想去領獎的，後來我問主辦單位得獎者能不能發表得獎感言時，於是我便找到一個機會可以訓誡那些政府官員。領獎當天我還穿著一個清大學生為我設計的一件「反國光石化」的 t-shirt。於是在場所有的人都沒有給我好臉色看，拍照的時候這些官員還故意擺一副臭臉。話說那天全場都穿著黑西裝，只有我穿「反國光石化」的黃色 t-shirt 非常顯眼，現在回頭想想：當初行政院長吳敦義帶頭支持興建國光石化，認為「白海豚會轉彎」的人；最後竟然頒獎給一個自始至終反對國光石化，堅決認為「白海豚不會轉彎」的人；由此可見，白海豚是不會轉彎的。

## 伍、天時、地利、人和：意想不到的關鍵轉折

好，我們去年（2010年）4月22號（世界地球日）去見馬英九總統，馬總統每年世界地球日都會接見環保團體代表，那次去我們送給馬總統一個白海豚的玻璃藝術品，然後告訴馬總統臺灣僅存不到80隻快要瀕臨絕種的白海豚，藉此尋求總統支持我們在推動的環境信託計劃，總統認為很好，但是總統卻沒有想到，推動環境信託的另一面，就是在反對國光石化的興建。當然，後來我們的新聞稿就發佈，馬總統支持我們環境信託的計劃，只可惜認股書馬總統沒有填，要是他當時填了，那國光石化早在去年（2010年）就可以不用蓋了。

到了今年，整個事件的轉折更是充滿關鍵，尤其從今年（2011年）3月24號到4月22號，這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發生了「國光石化會轉彎」的離奇轉折。主要原因是因為在總統的臉書粉絲頁上，有個荒野保護協會的錢醫師，他是彰化基督教醫院的醫師，他公然在馬總統的臉書上一直留言，罵馬英九總統是腦殘笨蛋。然後總統府發言人羅智強覺得一個醫生如此出言不遜實在不當，於是他就把錢醫師約出來在臺北開會，錢醫生就把我們反國光石化的一些文宣、資料交給羅智強。

羅智強看了以後覺得環保人士說的都是言之有理，只是為何當時的總統府和經濟部環保署送過來的資料，怎麼和環保人士講的是不一樣的東西？由於府方也很重視這件事情，於是就幫我們再安排跟幾個幕僚見面。到了3月28號我們就正式的跟總統府的幕僚會晤，他們看了很多資料，覺得環保人士說的真是言之有物。當時我們希望能夠請府方將這份資料送進去給總統府的副秘書長高朗，因為高朗是馬總統的頭號幕僚，如果這份資料能夠影響高朗，就有可能影響到馬總統的決策。那時我們如此殷切想見總統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總統有決策權。

所以從3月28號他們就馬上安排3月30號晚上再進總統府和高副秘書長碰面，那天晚上7點半進去總統府，剛好幕僚說總統8點會來，因為馬總統很重視這件事情，所以他希望聽我們直接和他對話。從晚上8點到9點40分將近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裡。馬總統一直認真地做筆記，然後一直頻頻點頭。那晚總統聽了我們很多論及關於健康的、水資源的、溼地的，還有這些社會成本等等……；我們當時用了一個詞讓總統很驚訝，我們說興建國光石化分明就是「流血輸出」，這句話深深地烙印在總統的心裡。

到了4月3號，馬總統去參加彰化醫界聯盟辦的「萬人反國光石化」餐會，這原是民進黨的場子，當時是要辦給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的，可惜那天因為馬總統沒有簽連署，主持人嗆馬總統沒有LP把他轟下臺，使得當天新聞失焦搞成總統被羞辱的何況。但是到了4月4號馬總統為什麼又會來溼地，本來總統是不會來的，因為考量到現場國家危安的層面太廣，但是因為馬總統重視這件事情，同一個地方總統排了兩天的行程，這在府方是很少見的情況。結果到了4月21與22日召開第5次環評專案小組，那天馬總統立刻召開記者會，宣布中油公股不支持在彰化的開發案；從3月24號一直到4月22號，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整個國光石化開發案翻盤。剛好那天（4月22號）又是世界地球日，這個時間點真的是對我們（環保人士）太有意義了。所以我認為，「反國光石化」一整個就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

為什麼天時，是因為4月22號民國100年的世界地球日，遭逢國光石化第五次的環評小組專案小組決定是否開發國光石化。如果那天做出有條件通過，等於是送給臺灣民國100年一個污染的大禮，試問情何以堪？但是後來宣布不蓋，這個時間點對我們而言非常的有利。至於地利，總統都去過溼地了，反而環評委員在審查時都沒有去過溼地，總統去了很感動，所以地理條件上這對環保人士是非常有幫助的。

而講到人和，這是最重要的。為什麼？因為今天看起來表面上是馬英九總統一個人宣布終結國光石化，但是總統幕僚有透露一個消息給我們，因為行政院研考會有做過民調，支持開發國光石化的只有佔26%而已，反對國光石化佔51%。所以今天總統為什麼要這樣宣布？如果說我們過去沒有在很多場合去推動環境信託和大小型的遊行，論述所有關於國光石化這些負面的社會影響，進而說服廣大人民的支持。因為這個民調不是只做彰化跟雲林，它是做全臺灣的。如果今天做出來民調是反過來，支持國光石化的佔51%，反對國光石化只佔26%，我想馬總統雖然對溼地很感動，但是他可能還是要含淚宣布繼續興建國光石化。因為一切只是為了順應民意。

所以人和最重要，這也正是我們的論述和行動引起社會的反思和討論，以致當大家認同並接受我們的說法，也願意一起來保護這塊溼地時，這個聲音最後才能讓馬總統聽到，讓決策的人知道：國光石化確實是有它重新調整的必要性。否則如果我們沒有親自去見過馬總統的話，當他說他不知道時，我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不知道，還是假的不知道。然而，經過這一次的造訪，至少我們可以知道說，馬總統是被很多小人給包圍住了！也正是因為經濟部環保署都跟他講，沒

有國光石化臺灣的石化產業會完蛋，甚至環保署的人還跟他說「白海豚會轉彎，可以訓練沒問題」。這些和我們去面見總統，跟總統講的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你可以看到兩邊的聲音，如果決策者沒有聽到，只聽見某一部分的聲音，那樣其實是非常的危險。

## 陸、未來願景（代結論）

回首一路走來，整個反國光石化的團體，一開始從環保團體到幾個核心團體慢慢地向外擴散，漸漸得到藝文界的連署、醫學界的連署，然後是學者、學生；整個連署的效應就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到最後整個社會的力量才真正展現出來。所以說，反對國光石化並不是由一個精神領袖在發號司令指揮大家，而是當時各路英雄豪傑各自從各自的角度，運用不同的策略去進行論述，而最後的結果與目的，都是一致地反對國光石化的興建。所以我們很希望樂見大城彰化沒有國光石化之後，從此可以有更好更多的發展，因為沒有國光石化的我們，依然可以給這個地方帶來願景。

## 媒體的民主練習曲 Democracy Etude for the Media

胡慕情\*

Hu, Daphne

公共電視記者

Journalist,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Foundation, Taipei, Taiwan

反國光石化，堪稱近年除了樂生保留以外，捲動最多階層參與的社會運動。今年 4 月地球日，由總統馬英九親自宣佈「國光石化不在彰化大城興建」，為爭議多時的國光石化開發案，暫時劃下休止符。由總統親自宣示，凸顯議題爭議的普及性，普及的推手，當然是媒體。其中主流媒體大力關注，功不可沒。

然而，綜觀整場反對運動，主流媒體的介入，已屬於運動的中、後階段，運動的推進，不可能憑空而來。非主流媒體、新興媒體以及社群媒體，即扮演著運動裡，重要的承先啓後角色。

以下，將透過反國光石化運動的時間序及媒體介入，分析運動與媒介的互動。

### 壹、缺乏脈絡的惡性循環

環境議題牽涉層面廣泛，又與政治、經濟力量息息相關，理應成為媒體關注焦點。然而開發案需要經過環評程序，期間又必須進行各項環境衝擊的討論，從提出到定案，往往耗時冗長；這對競爭激烈的主流媒體（包括平面報紙與電視）而言，難以搶到版面。在現今記者必須身兼多線的情況下，環境議題往往只有開發案冒出、有重大衝突以及作成決議，才有主流媒體的關注。主流媒體甚至有此一說：被懲罰的記者才會被派去跑環保。由此可知，環境議題要受到普遍關注，有相當難度。

---

\* Email: [muhchyng@gmail.com](mailto:muhchyng@gmail.com)

其次，主流媒體零星、點狀的報導方式，對於經常被冠上「經濟與環保對立」的環境運動來說，往往無法產生正面力量。經濟，普遍被社會認知為開發單位或政府機關提出的產值與就業機會；環境則只被認知為生態或污染。事實上，環境與經濟都應有更寬廣的解釋，如社會衝擊（如開發後對原倚賴開發地生存的居民的生活衝擊），或成本分析。在這些問題都沒有釐清的情況下，環境與經濟的對立，實際上是虛空而無立基點的。

綜上所述，環境運動在初始發跡，會因為主流媒體點狀而零星的關注，無法獲得社會普遍認知；其次，又會因為缺乏脈絡而無法對議題全面瞭解，進一步對議題冷感，或依既定偏見選擇；長久下來，環境運動只變成是「少數人」、「圈內人」的事。

## 貳、非主流媒體堅守第四權

國光石化（八輕）早從 1990 年代就喊出開發口號，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宣稱八輕是為取代 2015 年三輕、四輕和五輕遷廠所需。但石化業在高雄製造的土壤、地下水與空氣污染歷歷在目，使得八輕歷經 17 年，遭到桃園觀音、嘉義鰲鼓、高雄大林蒲以及屏東蘭州農場的民眾拒絕。

2005 年，全球暖化議題日趨嚴重，行政院永續會決議八輕案應該進行政策環評；但直到八輕 2007 年在雲林提出開發計畫，政策環評還沒有出爐。2007 年，因六輕興建後、農漁業大受影響的養殖業者起身反抗；當時的環評委員多半出身環保團體，經專業評估八輕興建後對環境的衝擊，也抱持不同意開發的態度。行政院卻透過媒體表示，國光石化等高耗能開發案應該盡速通過環評，並譴責環評委員是「開發的絆腳石」。

從這一階段可以看出，石化業從 1950 年代發展至今，已經面臨需要全面檢討的時刻；不僅如此，2007 年除了國光石化案，臺塑也打算在臺西投資大煉鋼廠，兩種傳統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的同時建置，更凸顯了空污、水資源分配甚至海岸消失的問題。然而大部分媒體在處理這兩宗爭議性環境案件時，依然只將其視為單一環境個案。雖有報導露出，但也只強調其開發遭受抗爭、環評委員的反抗等內容。

不同於主流媒體，非主流媒體沒有經濟因素的壓迫，得以在適當的時間點進行全盤式的體檢。2007 年，仍在臺灣《立報》服務，也是我從教育轉戰環保緣的分水嶺，臺塑大煉鋼廠是第一宗採訪的環境大案。當時一連做了系列專題，分

別從高耗能、高污染工業引進至雲林臺西後的衝擊、經濟效益評估、水資源分配以及另類發展想像四個面向進行分析報導，其中針對空氣污染，特別提出了當時媒體普遍未曾關注的懸浮微粒（PM2.5）。

之後，國光石化轉戰大城，《立報》也規劃了系列報導，除了空污，也從水污、水資源、溼地保育、白海豚以及另一種發展的想像進行分析。這些，全是日後反國光石化的各領域戰場。

PM2.5 是反國光石化非常重要的關鍵點，《商業週刊》在 2010 年 6 月，以封面故事的方式，針對 PM2.5 進行大篇幅報導，指出國光石化一旦興建，其製造的 PM2.5 將導致全臺民眾平均壽命減少 23 天。當時在《立報》所刊載的內容，和《商業週刊》差別不大，也指出臺灣在缺乏管制下不斷開發大量製造空污的產業問題。但《立報》閱聽眾遠比《商業週刊》少，當時無法引起民眾迴響，對政府及開發單位產生壓力。

這樣的結果，是非主流媒體的困境，但並非對運動毫無助益。舉例來說，該篇報導露出後，環保署立即做了回應，表示已開始針對懸浮微粒進行管制研究。也就是說，非主流媒體對反對運動的「短期效應」貢獻不如主流媒體，但對環境運動最終要達到的境地，甚至是媒體本責，監督政府的部分，確實有顯著影響。

## 參、環境戰爭的後勤補給

除了對政府製造壓力，非主流媒體在運動初期，針對議題微小進度進行的詳細報導，能提供運動團體傳播訊息，擴展運動的可能性。

環保署的資訊公開，雖然已屬各部會中做得最好的單位，但資訊的公開程度，仍有分別。有些會議，屬於記者「完全不能聽」的秘密會議；有些會議，則屬媒體記者可旁聽、公民團體不能參與的部分。換言之，有些資訊只在「記者能聽取」的場合出現，這些紀錄，也能成為公民團體的武器。

此外，主流媒體的報導，雖然都會上網公開，但通常在運動告一段落，甚至運動還沒完結，就撤掉報導；相反的，非主流媒體通常會完整保留所有資訊，在一般民眾愈來愈習慣使用網路收集資料的情況下，運動結束後，非主流媒體所保留的資訊，可擴大散播，進一步成為研究者、教育者的工具，補充主流媒體在「教育」這一環節上的不足。

以商周針對 PM2.5 進行的報導為例，當國光石化結案之後，PM2.5 的議題，彷彿就消失了。直到最近因為總統大選，公民團體進一步追問 PM2.5 的管制、加

上學者提出中國沙塵暴來襲，會讓臺北空氣中 PM2.5 含量，從每立方公尺 30 微克提升到 40 至 50 微克、導致死亡風險升高 2.5%，PM2.5 議題，才又重新受到重視。

舉 PM2.5 為例，是因為重大開發案所牽扯的層面，絕對不只單一項目。以國光石化為例，囊括了空氣污染、水資源分配、經濟效益、海岸變遷、動物保護等等。每一項議題，都和公眾相關。臺灣從一輕發展到六輕，付出了許多代價，這是國光石化，可以拉抬成為全國議題的重要理由。而也因為它的光芒耀眼，這宗案件，最後是在總統馬英九的宣示下，宣告停止。

政策宣示停建以後的媒體反應，顯示政治力阻斷了公共議題的討論空間。也暗示著：除非臺灣某一項產業，像石化業一樣吞噬臺灣太多資源，否則，不會有被重視的可能。

因此，部落格或網路媒體（如苦勞網、環境資訊協會）長期所累積下來的紀錄，以及開放的空間，在環境運動的戰爭暫時打完以後，創造了更多可能性——提供從主流媒體認識國光石化這個議題的讀者，更多深入瞭解，思考、甚至論辯及傳播的空間。

比方，有一篇我在 2010 年撰寫有關國光石化區位選擇錯誤的新聞，新聞刊出後，將這篇新聞轉載在自己經營的部落格。今年 4 月，有一位國一生來留言：「我覺得政府應該想遠一點。順帶一提，我才國一，連我都想得到的事，她們不懂嗎？」不久前，則有一位高中教師來信，希望引用我報導的內容去參賽，因為得獎可以被選錄成教案。上個月，她跟我說她得獎了。

如今，在 Google 裡，鍵入國光石化、白海豚，中科四期、蔡嘉陽、灣寶、相思寮這些新聞關鍵字，我的文章通常會排在很前面，換句話說，它成為相關環境事件的資料庫。而在閱聽眾收集資料過程中，又能因為非主流媒體，及其使用的媒介的開放性，開啓更多溝通的管道。這是非主流媒體在運動中，所無法被主流媒體取代的角色。

## 肆、成也主流 敗也主流

從 PM2.5 在國光石化案受重視、死案後沈寂、中國沙塵暴問題又獲得重視的起伏，可以明顯看出，主流媒體關注環境議題的角度，並非只以「公共性」為思考，嚴格地說，公共性若缺乏「聳動」、「新奇」等特點，都會難以曝光。

難以曝光，是運動者在運動中，最常面對的困境，因為一旦缺乏曝光，就無法形成壓力。近年媒體愈來愈重視圖像化及聳動性，大約從樂生保留運動以來，

社會運動在如何吸引媒體關注上，也下了不少功夫。樂生在 2005 年到國民黨部前陳情，除了傳統的絕食之外，首度由學生採取六步一跪的手法。青年、學生、下跪，呈現出乾淨、良善的意象，成功吸引媒體關注。

2008 年 415 搶救樂生大遊行，除了遊行、喊口號、行動劇之外，樂生也再一次採用六步一跪的陳情形式。然而，415 大遊行的六步一跪，人數比第一次增長許多，不僅如此，415 大遊行的六步一跪行列最前頭，還有學生以鐵鏈拖著剖半、點著火的炙熱汽油桶。

樂生青年聯盟將這些呈現手法暱稱為「步步高」。在議題本身就具有新聞性時，可以採取不耗費太多人力、物力的手法，清楚講明訴求；在運動缺乏關注，或是需要加溫時，則應採取一次比一次強烈的表現手法來吸引媒體。不過這種吸引媒體的手法，並不見得對運動全然正面。

2008 年，樂生保留由公共工程委員會做出 530 方案決議之後，樂生保留自救會透過揭發貓纜弊案的民間工程師王偉民，得知樂生地質未作過詳細調查、有超高地下水壓，開挖恐怕引發走山的疑慮；在保留方案訂出後，前往臺北市捷運局陳情抗議。

臺北市捷運局及政府各部門，都曾透過主流媒體，抨擊樂生訴求保留是無理的、是阻礙新莊人通車人權的。在臺灣對人權普遍認知不足情況下，主流媒體對樂生保留的議題，已經感到厭煩。當時，保留方案已定，地下水壓又是複雜且嶄新的議題，主流媒體更是興趣缺缺；加上捷運局對外宣傳，地下水壓只是樂生訴求保留更多的手法，讓主流媒體根本不願認真認識地下水壓的問題。

一旦沒有社會壓力，樂生院民就將遭到迫遷；樂生青年聯盟擔心主流媒體不願關注，在該次陳情行動中，先行告知會有激烈衝突。主流媒體果然聞風趕到。之後主流媒體對於該次陳情活動的焦點，卻鎖定在「衝突」，讓支持樂生保留者相當不滿；主流媒體則強烈抨擊「是你們說會有衝突的！」，引發社運「利用」媒體的激烈討論。

相較於國光石化，當時主流媒體不願關注樂生走山問題；如今，樂生的走山問題，已經導致捷運局工程必須部分停工。樂生的案例顯示，媒體並非「全然可操控」。且媒體對議題的設定，反而更會影響議題走向。

## 伍、反國光的媒體操作

國光石化和樂生，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差異？議題以及民眾的感受度，應是重要關鍵。樂生保留的人權、文化、古蹟，是相當抽象的概念，但國光石化裡的空

氣污染，卻是民眾可以直接感受的問題。此外，樂生保留涉及一般民眾的權益，國光石化則是明顯的財團利益，這些差異，都讓運動者有機會順利地利用媒體，掌握發言的正當性與吸引媒體目光。

反國光石化運動的靈魂人物之一蔡嘉陽曾說：「國光石化一定要是一個全國性的運動！」在主流媒體還沒全面關注之際，他就規劃和臺灣環境資訊協會發起白海豚認股的活動。這個活動，看起來並非反對運動的主戰場，且在缺乏法源的情況下，認股買溼地註定難以成功。蔡嘉陽等人卻決意走這條路，為的是讓反國光石化運動遍及全年齡層。

反國光石化運動開始前，媽祖魚保護聯盟長期關注白海豚的行動，也已打下白海豚是明星物種的基礎，可愛的海豚形象，如同氣候變遷之於北極熊，很快地就吸引小朋友的注意。此時，空污的嚴重性被凸顯，家長的關注也隨之而來，119 元的認股低門檻，轉變了「運動一定要上街頭」的形式，使得反國光石化運動的氣勢，開始拉抬。

之後一對母女長時間於西門町街頭發起認股、小朋友寫信給總統呼籲政府救白海豚，比對政治人物的不聞不問不作為，相當有衝突感，也讓媒體緊追不捨。

有別於過去環境運動只有環保團體的呼聲，反國光石化運動也引進各界學者關注，不僅讓環團的訴求更具有可信度，更讓「學者治國」的馬政府，必須正面應對來自民間團體的質疑。這些手法，使得媒體正面曝光正反雙方交鋒訊息，彌補過去環境運動無法讓民眾正確掌握訊息的缺口。

不能不提的，還有藝文界人士的參與。詩人吳晟在國光石化扮演靈魂人物，他所出現的時機點，某程度也對應了媒體的喜好。

反國光石化之際，臺北南港 202 兵工廠溼地也面臨開發，作家張曉風下跪，讓總統馬英九直接介入，要求重新審視溼地開發。政治立場不同的吳晟，選擇在張曉風之後出現，基本上刺激了政治敏感；接連兩位重量級作家關心環境，對媒體來說，也是嶄新議題，曝光率自然拉抬。

另一方面，吳晟選擇了中庸、說理、不下跪的尊嚴姿態，讓反國光石化議題，不致淪為政治口水。不僅如此，吳晟更與作家吳明益，合編反國光石化文集《溼地·石化·島嶼想像》，搜羅學者、藝文人士與相關媒體報導，意圖讓兩年多來散佈的資訊重新整合，在國際書展前出版，進一步開拓了中產階級、教育界以及藝文界的關注。

## 陸、拉近距離的平臺

反國光石化運動，除了傳統媒體之外，社群媒體，也有一定貢獻。社群媒體在我的觀察中，不是主力，但扮演著重要的多元傳播平臺。在反國光石化運動中，有行動者趁著阿凡達的熱潮，剪輯納美人反國光石化的影片，雖然觀看人數仍屬有限、宣傳效果，也不如主流媒體的反覆播送新聞來得大，但這樣的多元傳播方式，卻製造了一定的「吸引力」，反國光石化大遊行當天，納美人上街反國光，立刻成為媒體焦點。

不過，社群媒體在整體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並非製造媒體效果，而是扮演篩選訊息的功用。反國光石化的運動者，放了一定程度的心力，透過設立群組（臉書粉絲團），傳遞反國光的訊息。

雖然社群媒體的訊息更新率快，訊息過多，容易造成疲乏，但因為經營者先行篩選，只傳播有利於理解議題問題的訊息，在主流媒體正面曝光反國光議題時，這些訊息，能成為「認識議題的懶人包」。

在社群媒體上，反國光石化運動者也舉辦活動（如白海豚路跑），進一步拉近未知者與運動者的距離，提供對運動陌生的人的漸進途徑。

## 柒、另類書寫

由於網路普及，在我的觀察中，多數閱聽眾，已無學界談及的傳統／新興媒體分界，反而是主流／非主流的分野。

網路的興起，使得訊息傳送更容易，但也更複雜、難以確認精確性，在主流媒體傳送的新聞訊息更是明顯。以電視新聞為例，因為很少接觸、追蹤環境新聞，往往抓不到重點；卻在追求獨家與時效的情況下，在新聞播出的同時，也一面將新聞傳送到網路平臺。但平臺上的呈現方式，通常是記者的 S.O.T 稿直接複製貼上，不但毫無重點，連最基本的語意通順，都達不到。

在這種情況下，訊息的傳播，反而製造混亂。對於真正想透過媒體理解社會公共事務的閱聽眾，反而會從網路找尋「值得閱讀的訊息」。

這些值得閱讀的訊息，極少來自主流媒體經營的新聞平臺，大多是到已經經營出一定可信度的非主流網路媒體如苦勞網、臺灣環境資訊協會。近年，許多閱聽眾更會直接找尋記者經營的部落格。如前《聯合報》記者朱淑娟經營的「環境報導」、《立報》記者呂苡榕經營的「過於孤獨的喧囂」，以及我所經營的部落格「我們甚至失去了黃昏」。

在我的部落格中，讀者的閱讀取向，是閱讀「新聞之外的訊息」大於「議題本身」。讀者不偏好看見硬梆梆的資訊、理論，而希望看見「人」。更精確地說，是因為記者透過連結了人與議題的關係，讓讀者能真正理解到「公共事務」的意義。

舉例來說，我曾經寫過反國光運動重要戰將蔡嘉陽的故事。書寫內容提及國光石化只有短短一段，其他篇幅，則描述他帶我去找保育鳥類大杓鷸的過程。

文章中，我描述他什麼攝影、賞鳥用具也沒帶，就看見躲在遠處草叢的青足鷸，我描述他帶我到大杓鷸以前的棲地，彰濱工業區，描述我看見填海造陸以後的現實情況，描述蔡嘉陽，在原本是溼地，卻變成沙丘的彰濱工業區，趴著挖掘，挖出來的，是一面大杓鷸的解說牌。然後他的手機響起，是大杓鷸的叫聲。營造消逝的哀傷感。

社會運動者慣用的語言，是告訴讀者棲地有多重要，可是我不這樣說，我說，一塊被道路和高壓電塔切割的灘地上，有螃蟹，但是沒有鳥類。這是不循環的生物圈，沒有循環，意味死亡。而我們所食用的牡蠣、魚類，來自這個即將死亡的溼地。

我沒有用愛來形容蔡嘉陽對彰化海岸的感情，也沒有用激昂的字眼訴求要保留海岸；但這樣的傳播內容，卻比新聞的點閱率更高，也讓讀者在看完以後，會回頭去關心新聞事件本身。

這種另類書寫，除了上述所提及的傳播效果，某程度更讓運動者具有抗爭正當性。原因是，過去環境運動，很容易被塑造成「外來菁英（環保團體）」與「在地貧民」對立的情況，但是環境議題所牽涉的，從來就不是「在地性」這樣的侷限視角。若不跳脫在地與外來的框架，環境運動很容易被政治分化。

## 捌、反國光，只是練習曲

綜觀來說，非主流媒體、記者、有公民意識者對於價值的捍衛，奠定了運動的基礎、提供了運動的子彈。加上一連串複雜的媒體操作效應，使得主流媒體介入時，快速交織成反國光石化的聲勢。

但政府並不清楚，仍只將媒體視為平板的「快速、有效散佈訊息傳播工具」。因此，在反國光人士一波又一波成功吸引媒體關注的戰略下，政府也反過頭希望透過媒體宣傳。在傳統媒體，政府耗資買下各大報的半版廣告，宣傳「沒有石化業怎麼辦」；在新興媒體上，則架設了網站，以「帥哥美女」的互動廣告，宣傳沒有石化業的可怕。

然而，這兩項廣告的效益都非常差，甚至引發「政府為財團服務」的抨擊。一是政府並無清楚認知，臺灣民眾對於石化業之於環境的損耗，已經有普遍概念，不再輕易被媒體操弄；二是「媒介內容早已重於媒介形式」。

媒體是民主的一環，是呈現與促進民主的工具。在反國光石化運動中，可以發現，閱聽眾早已比政府還要清楚，如何透過媒體，擁護價值。相反的，政府在國光石化的媒體策略，反映的是，執政者對於民主認識的輕薄，更嚴格地說，是踐踏了民主的本質。

主流媒體在反國光石化議題中，看似扮演關鍵角色，但在實際促進社會進步的環節中，重要性已經愈來愈模糊。當媒體不再進步、缺乏核心價值，邊緣化是遲早可預見的未來。反國光石化是民主，也是媒體的練習曲。

# 網路社會動員的繼往開來：反國光石化 運動的社會科技基礎和行動策略演化

## Processes of Web Society Movement: Foundation of Social Technologies and Evolution of Action Strategies in Opposing Kuokuang Petrochemical Park Project

陳順孝\*

Chen, Shun-Hsiao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壹、緒論

美國《時代》雜誌將 2011 年度風雲人物頒給全球抗議者 (The Protester)。《時代》說：抗議者在北非和中東推翻獨裁政權、在墨西哥反毒梟、在印度反貪瀆、在美國反財團貪婪、在俄羅斯反選舉舞弊；他們不滿政治和經濟腐敗，勇於反抗、勇於訴求，即使面對催淚瓦斯和槍彈威脅也不放棄，他們以個體行動引發總體變化、以金字塔底層力量領導社會改革。他們大多是年輕人，運用最新的科技進行最古老的抗爭，展現人性尊嚴、推動全球民主 (Stengel, 2011, December 14)。

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 (簡稱全青盟) 的年輕人，正是這樣的抗議者。他們反對高耗能、高碳排、高污染的國光石化，實地訪調、參與遊行、校園宣講、監督環評，並且善用網路科技、發揮網民創意，架設部落格和臉書專頁宣揚理念、將電影「阿凡達」片段改編成反國光石化影片上網傳播、仿照四大報形式製作四大「蚵報」進行文化干擾 (cultural jamming)，同時與在地抗爭團體、各界聲援組織並肩作戰，終於迫使政府改變政策、國光石化宣告撤案。

---

\* Email: chen328@gmail.com

全青盟成員林樂昕等人在〈反國光石化運動的青年串聯〉一文反思道：「反國光青年聯盟的行動，在串連、形式、創意上或許真有一點形式上的新意，不過這應是隨著人類物質文明發展，溝通、表現的媒材越來越多元而有的應用。但影響我們這波青年行動的關鍵因素，應該還是『走入民間』這個古老命題。也就是說，我們是用新的『樂器』，重彈『走入民間』這首可能曾被人遺忘的老曲調」（黃裕穎、林樂昕、周秀樺，2011）。

用新樂器重彈古老的曲調、用新科技進行古老的抗爭，反映臺灣和全球抗議行動的共同特色。抗議者面對的是千百年不變的情境：掌握政經資源的人為了鞏固一己權力、掠奪一時私利，不惜欺壓基層大眾、犧牲全民長遠利益；抗議者的行動也傳承千百年不變的精神：和基層民眾站在一起，爭取自由人權、捍衛公平正義；不同的是，抗議者的工具越來越新穎強大、策略越來越靈活有力，能夠激發出越來越大的社會運動能量。

網路普及前的社會運動，要進行組織決策，需要散居各地的核心成員長途跋涉開會，要動員支持者，需要奔走各地宣揚理念、串連同志，要和社會大眾對話，得設法爭取大眾媒體報導，但卻常被大眾媒體封殺或扭曲，即使自辦媒體也難和大眾媒體抗衡；網路普及後，散居各地的成員可以隨時上網交換訊息、溝通協調、討論決策，也可以藉由網路連署、社群網站凝聚和動員支持者，更可以用部落格、微網誌、BBS、網路影音來宣傳理念，更快更廣地傳播運動訊息，掀起風潮，迫使大眾媒體跟進報導。

質言之，網路工具加快社會運動的組織動員效益。北非中東的茉莉花革命和許多地區的抗爭行動，因此被許多人稱作「臉書（Facebook）革命」、「推特（twitter）革命」、「網路社運」，這樣的稱呼或許有科技決定論之嫌，但相當精準反映網路時代社會運動的特色：追求古老理想的抗議者，運用最新的網路科技，突破地理阻隔、降低傳播成本，有效提升社會運動組織決策、同志動員、社會對話的效益，進而壯大社運能量、提高社運勝算。

筆者從這個角度看待全青盟在反國光石化運動中的角色和貢獻。他們和1980年代參與鹿港反杜邦、後勁反五輕、宜蘭反六輕、520農民運動、野百合學運的知識青年一樣「走入民間」，但他們擁有的網路傳播工具遠比當年的印刷品更強而有力；他們和21世紀搶救樂生療養院、野草莓運動、白玫瑰運動的知識青年一樣擅長網路傳播——他們之中許多人曾關注、支持、參與這些運動，但他們在這些運動的基礎上，持續改良科技運用和行動方式，發展出更新、更有效的組織決策、同志動員、社會對話策略。

本文將先分析臺灣抗議者用網路社會動員的科技基礎，再闡述其策略演化歷程，然後探討全青盟反國光石化運動的在網路社會動員史上的定位、成就、侷限，最後討論網路社會動員可能的走向和面臨的挑戰。由於林樂昕等人〈反國光石化運動的青年串聯〉一文偏重講述線下實踐，較少討論線上行動，本文另從盧沛樺（2012）《鄉民全都「讚」出來：初探反國光石化運動的青年網路實踐》、莊豐嘉（2011）《臺灣公民新聞崛起對公共政策之衝擊——從樂生、大埔到反國光石化事件之比較分析》兩篇論文中，發掘全青盟的線上行動資料，納入本文論述之中。

## 貳、網路社會動員的科技基礎

社會運動是有意識、有組織的集體行為，目的在推動或抗拒社會秩序的重大改變（林鶴玲、陸政霖，2001；Wilson, 1973）；社會運動由抗議者發動，爭取社會大眾支持，向抗議對象—如政府、財團—施壓（Tilly, 2004 / 胡利均譯，2009：5）；社運運動需要組織決策：讓散居各地的核心成員能夠有效聯繫、溝通、協調、議決，也需要同志動員：爭取大眾支持，並將支持者凝聚起來、共同行動，還需要社會對話：快速、廣泛地傳播訴求、回應質疑。無論組織決策、同志動員還是社會對話都需要傳播媒體。然而，大眾媒體往往站在既得利益的一方，淡化、封鎖或扭曲社會運動訊息，抗議者因此必須打造自己的媒體。

抗議者打造的媒體，通常被稱作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地下媒體（underground media）、基進媒體（radical media）或公民媒體（citizen media），它們沒有固定的形式和內容，不同時代抗議者選用當時的簡便工具，會打造出不一樣的媒體形態。網路普及前，常用的媒體是報刊、傳單、錄音帶、錄影帶，這些媒體需要有人實地發送給社會大眾，傳播的廣度、速度無法和大眾媒體相比；等到網路普及、數位傳播工具蓬勃，抗爭訊息能夠跨越地理疆域，即時傳送到每一個電腦使用者面前，抗議者開始擁有能夠和大眾媒體、和既得利益者抗衡的媒體。

社會運動者經常使用的網路工具包括：BBS、電郵群組、部落格、共享書籤、微網誌、社群網站、網路影音。

### 一、BBS

1992年，中山大學建構臺灣第一個全中文BBS《美麗之島》，目前以臺大《批踢踢》規模最大，包括PTT和PTT2兩站，註冊總人數超過一百萬人，擁有超過

兩萬個不同主題的看板，每日有上萬篇的新文章被發表以及閱讀，尖峰時段兩站容納超過十五萬名使用者同時上線（批踢踢實業坊，2005），《批踢踢》不僅是個巨大的傳播平臺，上面的熱門訊息也常被大眾媒體引用。

## 二、電郵群組

1995年，高雄醫學院學生陳豐偉創辦《南方》電子報，用電郵群組（mailing list）系統開放網友訂閱，掀起人文電子報浪潮；後來，「Google 網上論壇」問世，既可以開放網友訂閱，作為發行電子報之用，也可以封閉、隱密，供核心成員協調、決策之用，許多組織、團隊、社群競相採用。

## 三、部落格

2002年10月，網路社群「藝立協」開始臺灣推廣部落格，幾年之間吸引數百萬人投入部落格書寫。許多人用部落格作為個人媒體，如《環境報導》朱淑娟、《我們甚至失去了黃昏》胡慕情、《龜去來嘻》鄭國威；也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用部落格創辦公民媒體，如《環境資訊中心》、《小地方新聞網》；老牌電子報也紛紛改用部落格平臺，如《南方》、《苦勞網》；此外，公共電視在2007年推出PeoPo公民新聞平臺，接受公民和非營利組織註冊架站發聲，發展成重要的社會人文部落格聚落。

## 四、共享書籤

2005年底開始，共享書籤HEMiDEMi、MyShare、FunP接連問世，網友藉由分享好文認識同好、交流觀點，甚至結成社群、共同行動，風行一時，HEMiDEMi先後出現「媒體觀察站」、「永續臺灣」、「社會運動新聞」、「臺東杉原海灘關懷聯盟」、「樂生療養院」等群組，但當微網誌、社群網站興起後，共享書籤快速退燒。

## 五、微網誌

2006年誕生的推特（twitter）、2008年問世的噗浪（Plurk），一則訊息最多只能書寫140字，但簡單、快速、高互動，能夠聚合好友，既能交流工作和生活訊息，也能相約參與社會行動，很快取代共享書籤，成為網民相互交流、串連的平臺。

## 六、社群網站

2004年問世、08年推出中文版的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迅速在臺灣崛起,到了2011年,註冊人數超過一千萬人,臺灣將近半數人口在臉書上活動(Facebook 中文部落格,2011)。臉書讓散居各地的用戶能夠輕易地聯絡老朋友、結識新朋友、分享訊息、交換意見、組織活動,甚至發起社會運動。

## 七、網路影音

影音分享平臺 YouTube 讓大家可以簡單的上傳影片,相互分享、快速傳佈;網路直播軟體 Y!Live、Justin.tv、Ustream 則允許人們用電腦或手機視訊鏡頭,加上無線網卡,就可以像電視 SNG 一樣將現場畫面直播上網,讓全世界的人都能看見。這些分享平臺和直播軟體的畫面,還可鑲嵌到部落格裡。

此外,還有 Flickr、Picasa 等相片分享平臺,Google 協作平臺、PBworks 等 wiki 架站系統,StickerAction 等串連貼紙製造機,臺灣連署資源運籌平臺和 Google 表單等線上連署機制,也如雨後春筍般問世,爭取大眾青睞、滿足各種需要。

這些工具全都簡單好用,而且免費,全臺灣有超過千萬人使用其中一項或多項工具來分享訊息、交流觀點、聯繫同好。長久以來被動接收大眾媒體訊息的閱聽人,自此轉型為可以一面收訊一面傳訊、一面使用資訊一面創作資訊的創用者(prosumer, producer 和 consumer 之縮合,亦即參與產品製造的消費者、參與資訊創作的使用者)(Tapscott & Williams, 2007 / 王怡文譯, 2007)。

創用者利用 BBS、電郵群組、部落格、共享書籤、微網誌、社群網站、網路影音來發佈訊息、交流觀點、創辦媒體,已經開創出一個公民傳播體系;公民傳播體系和大眾傳播體系有三大差異:一是眾人參與,發送訊息觀點不再是媒體老闆、記者編輯和社會精英的專利,而是每個能用電腦上網者都能參與的全民運動;二是相互連結,地理疆域不再分隔彼此,公眾藉由網路可以相互認識、聯繫、串連、聚合,形成一個個互有重疊、隨意聚散的群體;三是高度互動,公眾不再只是各自被動接收資訊,而會一起發掘、採集、彙整、查核、傳遞資訊,並與發送訊息的媒體、個人、社群互動,即時回應、補充、監督、論辯(詳見圖1)。

眾人參與、相互連結、高度互動的過程中,會激盪出群眾智慧、集體力量。群眾智慧是指公眾各自的知識、見解在網路交流過程中互補有無、相輔相成,激盪出比任何個人、甚至個體總和還高的知能,也就是「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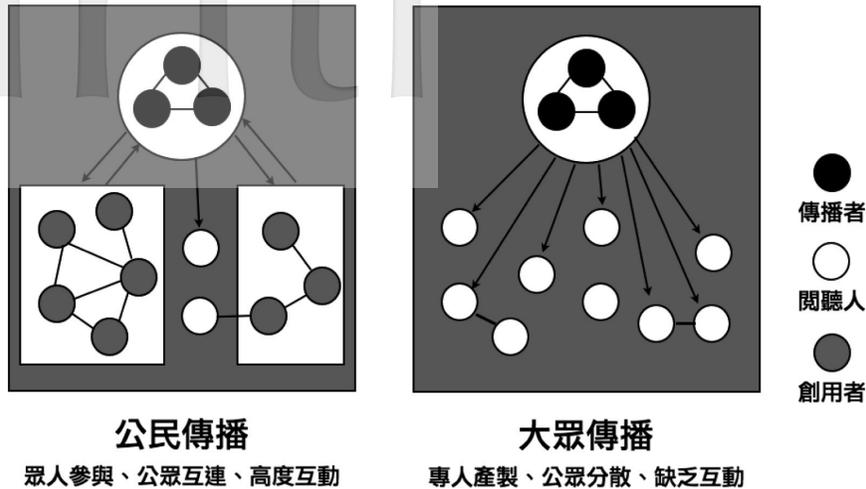


圖 1：公民傳播與大眾傳播的社會網絡比較

亮」的放大版（Surowiecki, 2004／楊玉齡譯，2005）；集體力量是指公眾各自的人脈、資源，在網路上協調整合、相加相乘、分進合擊，能夠以「群」的力量抗衡「大」的勢力。

公民傳播體系就在群眾智慧和集體力量加持下，不斷演化、持續壯大，漸漸能與大眾傳播體系相互補充、監督、抗衡。抗議者能夠利用公民傳播體系裡的各項媒體進行有效的內部組織、同志串連、社會對話，進而引導輿論、設定大眾傳播體系的議題，促使大眾媒體跟進報導，讓抗爭訊息更快、更廣的傳播。

全青盟和網路時代的知識青年就是在眾人參與、相互連結、高度互動的社會情境中，在公民傳播與大眾傳播既競爭又合作的媒介生態下，登上社運舞臺，使用新而強大的科技、進行古老且恆久的抗爭。

## 參、網路社會動員的策略演化

青年抗議者使用網路工具又翻新網路工具用法、借助公民傳播體系又豐富公民傳播體系、延續前人社運策略又改良社運策略。

臺灣青年利用網路工具進行抗爭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90 年代。1993 年，交通大學學生抗議學校餐廳伙食不佳，透過 BBS 發起「便當社」，數百人集結在校門口吃便當，吃完便當，又因校方未解決機車管理問題，繼續阻塞校門交通，成為臺灣第一起從網路發起的抗爭事件（Inertia, 2006）。

部落格崛起後，抗議媒體事件此起彼落。2005年3月，《中國時報》把網友在BBS恨板宣稱女友劈腿引起的騷動，當成頭版頭條新聞報導，三千多人在網路連署要求道歉，網民還發動一次快閃示威，主辦和參與3場座談會聲討中時（陳順孝，2005）；同年10月，中時體育組主管在特稿中捏造美國職棒球評的談話，網友用電郵向美國球評查證後發動抗議，製作「我不看中國時報」網路貼紙，相互張貼串連（PipperL, 2005）；隔年2月，《聯合新聞網》出現醜化精神病患的標題，部落客鄭國威發起「聯合報請向精神病患道歉」行動，數十個網友發文串連響應，精神病友團體和媒體改革組織也到報社抗議（鄭國威，2006）。

2007年的搶救樂生院運動，掀起網路社會動員的高潮。

07年3月5日，政府限令還住在樂生療養院舊院區的漢生病（俗稱痲瘋病）病友在13日前搬離，以便原址改建捷運機廠，否則將強制執行；病友和聲援團體抗爭無效，部落客挺身聲援。

3月9日，部落客瓦礫發起「讓樂生人權決定我們的總統」活動，一百八十多個部落格連署響應；接著，豬小草、HOW訪問學者討論各種保留樂生方案，製作成Podcasting上網；14日，Wenli和HOW手繪出樂生院保留41%（政府的規劃）與保留90%（院民的訴求）的比較圖；15日，董福興透過共享書籤HEMiDEMi募款，一天募得四百多人捐獻的200,000萬元，在《蘋果日報》刊登半版廣告，廣告文案由散居各地的部落客遠距協作完成，引用Wenli和HOW手繪圖，訴求「保留90%樂生能讓捷運與新莊更好」（黃哲斌，2009）。

部落客的積極行動，加上病友和聲援團體的持續抗爭，終於引起主流媒體和政治人物的重視，行政院長蘇貞昌承諾朝向保留90%方向努力（王貝林、曾德峰、項程鎮、林志青，2007年4月12日）。部落客為確保政府兌現承諾，又藉由HEMiDEMi動員參與4月15日的「捍衛樂生」大遊行，並持續關注事件發展，進行相關報導、論述和行動。

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進一步強化網路社會動員的模式。

08年11月，中國海協會代表團來臺簽署協定，警方維持治安時對抗議者進行盤查、禁制、沒收、拉扯、驅離，甚至拘捕，臺大教授李明璁憤而在PTT2個人版號召抗爭，11月6日，數百名學生、教師、社會人士前往行政院門口靜坐，抗議國家暴力、要求修改集會遊行法，演變成以學生為主體的「野草莓運動」。

6日晚上，部落客Wenli到場關心學生靜坐情況，為了讓更多網友了解現場情況，他用網路直播軟體Y!Live，透過筆記型電腦視訊鏡頭和無線網卡，將靜坐實況即時播送上網，宛如社運SNG，直播行動很快吸引數百名網友觀看，包括

外國人，Wenli 用中文解說現場情況、徵求一位英文流利的抗議學生用英文解說，就這樣通宵直播；天亮後，Wenli 要去上班，學生接手直播工作，到了傍晚，鎮暴警察到場抬離學生時，有兩千三百多位網友透過直播觀看抬離實況（陳順孝，2008）。

學生被抬離後，轉往自由廣場集結，開始建立組織，特別設立主播組、成立《野草莓電視臺》，將網路直播常態化。在此同時，臺南、高雄、嘉義、臺中、新竹的學生也就地集結抗議，並且同樣採行網路直播，一來向社會大眾宣傳訴求，二來進行跨地協調和決策，例如「野草莓」這個名稱就是六地學生透過網路連線會議選定的。

直播之外，野草莓學生用 Google 網上論壇建立內部決策群組、用部落格建立運動主體網站，積極到《批踢踢》傳播訊息和對話，並且發動網路連署、進行網路貼紙串連、開放訂閱電子報，同時還將活動影片上傳 YouTube 宣傳，網民小海還創作「野莓之聲」作為運動主題曲上網傳播；這些，形成一個分進合擊的傳播體系，將在此之前眾多社運所用的網路工具和行動策略整合在一起。

在此之後的社運，幾乎都沿用野草莓彙整的網路工具和行動策略，並持續改良創新。2009 年 5 月，反對「農村再生條例」的臺灣農村陣線和立委合辦公聽會，《野草莓電視臺》、《苦勞網》、《環境資訊中心》等網站同步直播現場實況，將直播推進到聯播；2010 年 8 月，民眾不滿法官輕判數起性侵幼童案，發起白玫瑰運動，改用新興的臉書作為運動基地，發起「開除恐龍法官」連署，超過廿八萬人參與，發起大遊行，也有近三萬人走上街頭響應。

這一波波的社會運動，培養出一群又一群善用網路的抗議者，抗議者不斷在前人基礎上翻新網路抗爭形式：使用的工具從 BBS、部落格、微網誌、直播軟體到社群網站，行動的方式從貼紙串連、網路連署、線上募款、參與遊行、長期監督到社運美學（如創作「野莓之聲」歌曲）；進而發展出先行動後組織、平等參與、開放決策、自營媒體、遠距協作、分進合擊的社運模式。

這些作法，讓社運訊息能在眾人參與、相互連結、高度互動的社會網絡裡流傳，在 BBS、電郵群組、部落格、共享書籤、微網誌、社群網站、網路影音構成的公民傳播體系裡發酵，流傳、發酵讓訊息不斷加溫、社運能量不斷增強，迫使大眾媒體一次又一次從遺漏、忽視，轉向大幅報導，讓社運訊息借助大眾媒體的威力，傳送給更多人。

議題設定理論指出，大眾媒體會設定公民討論的話題、大型媒體會設定小型媒體報導的方向（翁秀琪，1992）；上述社運則證明，公民傳播體系也能反向設

定大眾媒體議題，更具體的說，公民討論的話題、抗議者探討的議題，藉由網民相互分享、快速傳播，能夠廣為人知、形成輿論焦點，迫使原本漠視的大眾媒體跟進報導（詳見圖 2）。這種訊息從公民媒體流向大眾媒體的現象，與德國學者所發現的：反對議題由另類媒體流動到建制媒體的議題漫溢（spill-over）效應若合符節 (Mathes & Pfetsch, 1991)，而且速度更快、頻率更密集。

反國光石化運動，就是在網路科技普及、公民傳播體系蓬勃發展、網路社運策略日漸純熟的情況下登場。

### 肆、反國光石化的網路社會動員

國光石化設廠計畫，早在 2005 年就提出，設廠地點幾經變更，2006 年 6 月決定轉往彰化芳苑和大城建廠。部落客朱淑娟早在 2008 年 2 月開始報導此事，胡慕情也密切追蹤，彰化環保聯盟轉寄她們的報導爭取社會關注。到了 2010 年 4 月，環保團體發起「全民來認股、守護白海豚」行動，號召大眾集資將國光石化預定地、白海豚必經之地——濁水溪口海埔地交付公益信託，短短 3 個月，30,000 人響應認股，贏得廣泛注意（環境信託，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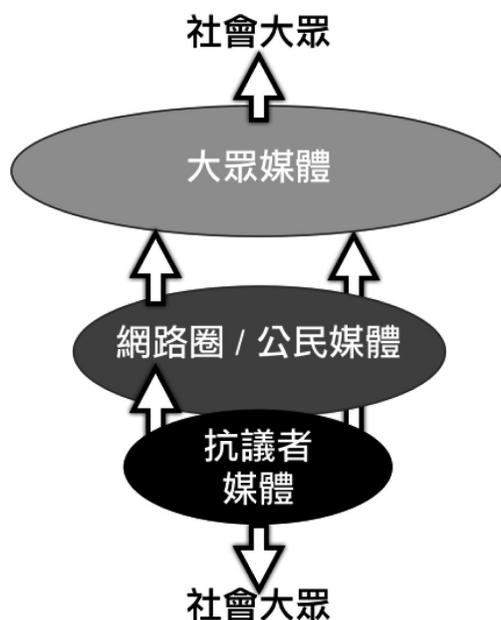


圖 2：社運訊息議題漫溢的傳播動向

到了 2010 年夏天，參與臺灣農村陣線「夏耘農村草根調查」的學生，實地走訪彰化芳苑、大城溼地後，在 9 月投入反國光石化運動、成立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這些青年，多數是大學生和研究生，其中有人曾參與搶救樂生院和野草莓運動，他們在實地訪調、參與遊行、校園宣講、監督環評的同時，也有效延續先前運動的科技運用和行動策略，並且加以改良創新。

首先，全青盟快速建立分進合擊社運傳播網絡。他們以 Google 網上論壇作為內部溝通協調機制，用部落格建立網站，他們還建立臉書社團作為核心成員和支持者分享訊息、相互討論、聯絡感情之用；他們並且到《批踢踢》最熱門的八卦版去散播運動訊息、製作宣導影片放上 YouTube 傳播，以此吸引大眾媒體引用報導；他們同時開放電子報訂閱，用 Google 協作平臺建構反國光石化資料庫（詳見圖 3）。

其次，全青盟改良先前運動的科技和行動策略，最具代表性的是網路直播的運用。在野草莓運動中，網路直播主要是傳播現場學生的抗議行動和演說，但也形成網民監看現場靜坐學生的現象，增加現場學生壓力；反國光石化團體將直播鏡頭轉向抗議對象，將環評會議的實況直播上網，號召網友共同監督，讓參與決策過程的環評委員面對群眾壓力（莊豐嘉，2011：122；盧沛樺，2012：55-57）。

第三，全青盟將文化干擾融入社會運動之中。文化干擾是藉由模仿、改寫手法，將抗爭訊息植入抗爭對象的宣傳文本中，它既是一種反宣傳策略，也是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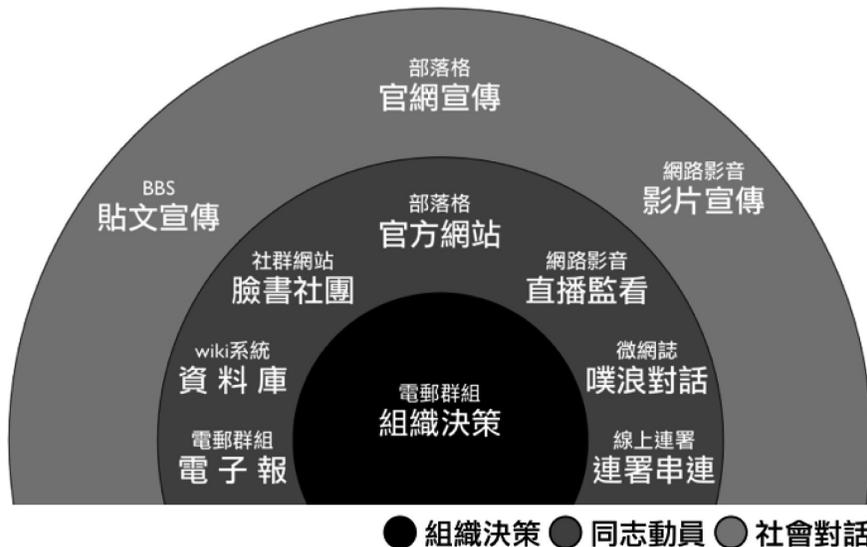


圖 3：全青盟的科技運用與行動策略

藝術形式。全青盟的文化干擾包括：將電影「阿凡達」中納美人捍衛家園的劇情、混搭彰化在地漁民與溼地影像，改編為「納美人出動 11/13 環保救國大遊行」動員影片上網傳播<sup>1</sup>；發行「四大蚵報」，仿照四大報形式，用批踢踢式的戲謔語言預言國光石化撤案，標題包括：「好里卡在有選舉！白海豚不轉政府轉」、「感動媽祖 反對國光 BoBee BoBee」、「白海豚駁斥轉彎說，阿豚：我不會轉彎」（朱淑娟，2011）。這些，不僅在網路圈、公民傳播體系裡廣為流傳，也吸引大眾媒體引用報導，讓社運訊息擴大播送。

不過，就在全青盟加入反國光石化陣營的同時，國光石化陣營也動員部落客助陣。2010年12月，經濟部工業局透過行銷公司邀請廿四位部落客參觀中油高雄煉油廠和奇美南科石化廠，給予5,000元車馬費，但要求撰寫1,500字體驗文回饋，文章上網，幾乎一面倒肯定石化廠乾淨、環保；工業局強調此事與國光石化無關，環保團體則痛批此舉是拿公帑為國光石化護航，網民也群起質疑政府收買寫手（謝文華、陳永吉、高嘉和，2011年1月11日）。

全青盟的行動，加上學界連署質疑、藝文界公開批判、在野黨表態反對，以及公視推出石化週討論，《商業周刊》和《天下雜誌》推出專題報導質疑，終於影響輿論、形成壓力，迫使馬英九總統在2011年4月宣布不支持國光石化到彰化建廠，反國光石化運動贏得勝利。

## 伍、結論

總之，公眾運用網路工具開創出眾人參與、相互連結、高度互動的社會網絡，也用BBS、電郵群組、部落格、共享書籤、微網誌、社群網站、網路影音建構出公民傳播體系，和大眾傳播體系相互補充、監督、抗衡；在這樣的社會網絡和傳播生態下，知識青年參與社會運動，用他們熟悉的網路工具進行組織決策、同志動員、社會對話，與實體社會行動相輔相成，壯大社會運動能量，並且不斷在前次社運基礎上進行改良創新，讓科技運用、社運策略不斷推陳出新，社運能量不斷成長茁壯。

網路青年有時是社會運動的發動者，如野草莓運動、白玫瑰運動；更多時候是社會運動加盟團隊，如搶救樂生院、反國光石化運動。在反國光運動中，參與團隊包括在地的彰化環保聯盟、環境資訊協會等全國性環保團體、學界串連團隊、藝文界串連團隊、獨立記者和公民媒體等等，全青盟只是眾多團隊之一。

1 「納美人出動 11/13 環保救國大遊行」影片網址為：<http://www.youtube.com/watch?v=bh0ORKsKfni>

無論是發動者還是加盟者，網路青年的參與都為社運注入活水：首先，他們的純潔形象、創新行動，有助於吸引大眾媒體報導，增進社運能見度；其次，他們能將硬梆梆的社運訴求「翻譯」成簡單易懂、生猛有力的網路語言，爭取更多年輕人支持（盧沛樺，2012）；第三，他們的參與，有助於連結線上和線下的力量，讓實地抗爭和網路串連的能量相加相乘，壯大社會運動、增加成功機率。

全青盟參與反國光運動，是臺灣網路青年參與社運最新的一頁，全青盟既是這幾年網路社會動員經驗的繼承者，也是未來網路社會動員模式的開創者；更具體地說，全青盟和一波波網路青年實踐、延續、改良、創新的社運模式，就是「無組織的組織」的運動策略。

「無組織的組織」根據網路觀察者薛基（Clay Shirky）的分析，是「一個值得相信的承諾、一個有效的工具、和成員可接受的協議的成功融合」，成員基於共同相信的承諾（如公平正義）投入社運，使用可供聯繫的工具（如網路）來協調行動，並遵守有形無形的社運工作協議，執行負責的任務、追求目標的實現（Shirky, 2009 / 胡泳、沈滿琳譯，2009：11）。全青盟和參與上述一波波社運青年團隊，正是這種「無組織的組織」。

「無組織的組織」的崛起，讓社會運動在組織決策、同志動員、社會對話三大面向上，都出現巨大變化。

### （一）組織決策，分進合擊

首先，社運不一定要先組織再行動，而可以先有人行動、再凝聚成組織；其次，社運組織不一定要經常見面開會，而可以藉由網路群組（如 Google 網上論壇、臉書社團）來進行協調和決策；第三，社運組織不再是內外分明的團隊，而是分進合擊的聯盟，參與者自由來去甚至自主決策，對社運做出貢獻時（如製作動員影片）就算是內部成員，暫停貢獻時就是外部民眾，沒有清楚的內外界線，全青盟被詢問成員有多少人時，就回答道：「我們不是組織，我們都只是網友」（盧沛樺，2012：73）。

### （二）同志動員，各盡所能

動員同志的目標，不再偏重要求支持者走上街頭遊行示威，而可以促請支持者更彈性地貢獻心力，例如撰寫聲援文章、製作動員影片來強化社運論述，或者線上連署、按「讚」、推文、分享、轉寄來傳播社運訊息。按「讚」、連署，常

被譏為懶人行動主義，以滑鼠按鍵替代雙腳行動，演變成「萬人按『讚』、一人到場」的現象；不過，按「讚」連署並非全不可取，這些簡單動作有助於社運訊息的擴散、網路青年的啟蒙，盧沛樺（2012：69）的研究就發現，全青盟成員中有人曾是用滑鼠參與社運的「懶人」，經過長時間啟蒙，終於在野草莓運動時開始起而行，從線上走到線下參與實體行動。

### （三）社會對話，議題漫溢

要宣傳理念、澄清疑慮，不一定要直接爭取大眾媒體青睞，而可以改採「網路包圍傳媒」策略：首先，打造自己的媒體，如部落格、臉書社團、電子報，訴請支持者響應；其次，爭取獨立記者（如朱淑娟）和獨立媒體（如《苦勞網》）相助，在社會運動、公民新聞領域擴散訊息；第三，到影音平臺（如YouTube）、BBS（如《批踢踢》）上傳社運影片和訊息，吸引網路鄉民、社會大眾注意。這些作法，有助於社運議題的擴散、加溫、發酵，進而形成風潮，引導大眾媒體跟進報導，進一步擴大傳播，像搶救樂生院、反國光石化運動一樣形成議題漫溢效應。

不過，儘管知識青年用網路為社運注入活水，但網路社會動員仍然存在偏愛短打、欠缺深耕等問題，有待持續努力、突破。

#### （一）偏愛短打、偏重搶救

網路青年似乎偏愛投入議題激動人心、有時效時限、有高能見度行動的社運，而忽略需要長期耕耘的運動。例如，網民搶救樂生院、反國光石化以搶救白海豚之外，在莫拉克風災剛發生時也積極協助救災，但當莫拉克救災告一段落、進入漫長的重建階段時，網民的熱情就快速消退，即使有《莫拉克獨立新聞網》持續揭露政府和大型慈善團體重建作為的爭議，也難以得到網民奧援（陳順孝，2010）。如何促使網路青年更全面、更深入、更長期的參與社運，是未來社運的重大課題。

#### （二）欠缺深耕、欠缺積累

在一波波的社會運動中，網路青年雖能吸取先前運動經驗、持續改良策略，但仍未能將先前運動資源有效轉移到當前和未來的運動中。例如，每一波的社會運動幾乎都進行網路連署、每個社運團隊幾乎都開放網友訂閱電子報，但每次的

連署、訂閱都得從零開始、費時費力；國外早已出現以網路為主體的社運組織，例如美國的 MoveOn.org（張鐵志，2008），他們將連署和訂戶的電郵名單當作持續經營的資源，例如從野草莓運動的連署名單中找出住彰化的人，在反國光石化運動中優先動員他們捍衛家鄉。未來，臺灣會不會出現這樣的網路社運組織，更專業地發展網路社運策略，值得關注和期待。

此外，工業局動員部落客為石化業美言一事顯示，臺灣近幾年「抗議者＋網路媒體」對抗「被抗議者＋大眾媒體」的社運形態已經出現變化。網路不再是抗議者的專利，被抗議者一如政府、財團—在大眾媒體之外，也越來越積極使用網路工具、動用網路資源；面對「被抗議者＋大眾媒體＋網路媒體」的新形勢，抗議者如何更靈活、更有效地運用網路來突圍，來達成社運目標、實現社運理想，是至關重要又無可回避的挑戰。

## 參考書目

- 王貝林、曾德峰、項程鎮、林志青（2007年4月12日）。〈蘇揆：16日不拆樂生 力保90%〉，《自由電子報》。上網日期：2012年1月14日，取自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apr/12/today-life4.htm>
- 王怡文（2007）。〈結合製造身分的消費者〉，Tapscott, D. & Williams, A. D. 原著、王怡文譯，《維基經濟學》，頁176-209。臺北：商智文化。
- 朱淑娟（2011）。〈四大蚵報：否決國光石化！〉，《環境報導》。上網日期：2012年1月14日，取自 [http://shuchuan7.blogspot.com/2011/04/blog-post\\_19.html](http://shuchuan7.blogspot.com/2011/04/blog-post_19.html)
- 批踢踢實業坊（2005）。〈What is BBS? What is ptt BBS?〉。上網日期：2012年1月9日，取自 <http://www.ptt.cc/index.html>
- 林鶴玲、鄭陸霖（2001）。〈臺灣社會運動的網路經驗——一個探索性的分析〉，《臺灣社會學刊》，25：111-156。
- 胡利均譯（2009）。《社會運動，1768-200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Tilly, C. [2004]. *Social movements: 1768-2004*. Boulder: Paradigm.）
- 胡泳、沈滿琳譯（2009）。《未來是濕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 Shirky, C. [2009]. *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 New York: Penguin.）

- 翁秀琪(1992)。〈議題設定理論〉，翁秀琪(編)，《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頁139-148。臺北：三民。
- 張鐵志(2008)。〈MoveOn十年，Web 2.0的政治實踐〉，《Sounds and fury》。上網日期：2012年1月15日，取自 <http://blog.roodo.com/SoundsandFury/archives/7248463.html>
- 莊豐嘉(2011)。《臺灣公民新聞崛起對公共政策之衝擊——從樂生、大埔到反國光石化事件之比較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順孝(2010年7月)。〈遠距協力 為災民發聲：88news的實踐經驗及其反映的網路傳播能量〉，「中華傳播學會2010年學術研討會」Panel宣讀論文。臺灣：嘉義。
- (2008)。〈野草莓運動的傳播分析(草稿)〉，《打造自己的媒體》。上網日期：2012年1月14日，取自 [http://www.iedit.tw/2008/12/blog-post\\_08.html](http://www.iedit.tw/2008/12/blog-post_08.html)
- (2005)。〈劈腿事件與劈腿媒體〉，《打造自己的媒體》。上網日期：2012年1月14日，取自 [http://www.iedit.tw/2005/03/blog-post\\_04.html](http://www.iedit.tw/2005/03/blog-post_04.html)
- 黃哲斌(2009)。《公民新聞的網路實踐——以樂生療養院事件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裕穎、林樂昕、周秀樺(2011年5月)。〈反國光石化運動的青年串聯〉，「邁向參與式民主的挑戰與實踐研討會」論文。臺灣：臺北。
- 楊玉齡譯(2005)。《群眾的智慧：如何讓個人、團隊、企業與社會變得更聰明》。臺北：遠流。(原書 Surowiecki, J. [2004]. *The wisdom of crowds: Why the many are smarter than the few and how collective wisdom shapes business, economies, societies, and nations*. New York: Doubleday.)
- 鄭國威(2006)。〈聯合報請向精神病患道歉(Portnoy有事相求，拜託大家!)〉，《龜趣來嘻》。上網日期：2012年1月15日，取自 <http://www.bigsound.org/portnoy/weblog/001465.html>
- 盧沛樺(2012)。《鄉民全都「讚」出來：初探反國光石化運動的青年網路實踐》。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
- 環境信託(2010)。〈全民來認股 守護濁水溪〉。上網日期：2012年1月14日，取自 <http://et.e-info.org.tw/node/119>
- 謝文華、陳永吉、高嘉和(2011年1月11日)。〈粉飾國光石化 政府置入行銷 伸進部落格〉，《自由電子報》。上網日期：2012年1月14日，取自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jan/11/today-p4.htm>

Facebook 中文部落格 (2011)。〈Facebook 註冊人數臺灣已破 1 千萬人〉。上網日期：2012 年 1 月 14 日，取自 <http://facebook.22ace.com/2011/01/facebook-taiwan-user-20110123.html>

Inertia (2006)。〈青年文化十年記：網路文化〉，《Mediawiki》。上網日期：2012 年 1 月 15 日，取自 <http://wiki.heterotopias.org/index.php?title=青年文化十年記：網路文化>

PipperL (2005)。〈砍掉不用重練最快：看吳清和報導作假事件〉，《終極邊疆》。上網日期：2012 年 1 月 14 日，取自 <http://blog.serv.idv.tw/2005/11/09/354/>

Mathes, R., & Pfetsch, B. (1991). The role of the alternative press in the agenda-building process: Spill-over effects and media opinion leadership.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 33-62.

Stengel, R. (2011, December 14). Person of the year introduction, *Time Magazine*. Retrieved January 14, 2012, from [http://www.time.com/time/specials/packages/article/0,28804,2101745\\_2102139,00.html](http://www.time.com/time/specials/packages/article/0,28804,2101745_2102139,00.html)

Wilson, J. (1973). *Introduction to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Basic Books.

# 文化行動的可能：以四大蚵報為例

## The Possibility of Cultural Acti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Four-Major Oyster Times

蔡培慧<sup>\*,1</sup>

Tsai, Pei-Hui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Shih-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壹、前言

2011 年 4 月 19 日，臺北捷運公館站 2 號出口，初春的閒適午後，進出捷運的人們少了上下班趕路的急促。他們之中許多人接過一份「報紙」，看到國光石化停建的消息，尋常的報紙藏著不尋常的消息。任何一個對於臺灣發展脈絡稍有瞭解的路人，或任何一個曾經關注過國光石化議題的大眾，可能都會稍稍地懷疑，「這份報紙」所刊載國光石化停建的消息是否為真？定睛一看，斗大的刊頭寫的是「中國蚵報」、「聯蚵報」、「自由蚵報」、「蘋果蚵報」，出刊日期標示 4 月 22 日。是的，這是一份不折不扣的「預言報」，這是反國光石化的抵抗行動之一，這是參與其中的「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以下稱全青盟）的成員觸發社會另一波討論的開始。令人意外的，國光石化興建與否的劇本某種程度按著「四大蚵報」的預言在走，最後果真宣佈「不在彰化興建」，而胎死腹中。

蚵報所預言的「否決國光」與實際宣佈「不在彰化興建」之間的距離，突顯著政治人物的巧言，這一點則是「全青盟」所編輯的「四大蚵報」未能預料的。國光石化案的停建並非在正規環評審議程序中定案，照理環評過程中的專案小組會議做出兩案併陳結論後，應送環評大會審議、定案，以完成法定否決國光石化的程序（陳平軒，2011）。然而決策高層略過正規程序，逕自於專案小組會議結束後一個小時內，直接在總統府召開記者會宣佈國光石化不在彰化興建，留下國光石化死灰復燃的隱憂。

---

\* E-mail: shupeihui@gmail.com

1 本文作者同時為「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成員。

反國光石化運動在地方團體的長期堅持中，以及許多環保團體、文化界、學界、青年、獨立媒體的努力中，取得了階段性的進展——不在彰化興建。這個結果雖然未能徹底否決高污染石化業的擴張，然而，確實已是環保運動多年來重要的成果（孫窮理，2011）。參與反國光石化運動的群眾不僅遍及各個領域，且開創出多元豐富的抵抗行動，地方農漁民、學術界、文化界，包含高中生在內的青年學子、環保團體發揮創意，合作或分頭辦理媽祖魚花車進香遶境、白海豚路跑、單車守護溼地、濁水溪口生態文化祭、濕地巡禮、專書出版、拼健康餐會、公車廣告、萬人遊行等等行動，如同百花齊放；而「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推出預言停止開發的『四大蚵報』，更以這一代青年特有的 Kuso 手法表現議題。國光石化停止開發，與其說是政府對永續發展的初步覺醒，毋寧說是公民影響決策的一盤險勝棋局。」（劉美好，2011 年 4 月 29 日）

「四大蚵報」作為反國光石化運動的一環，以文化形式擾動輿論與公眾認知，有部分媒體以「文化干擾」（culture jamming）稱之（何榮幸，2011 年 4 月 27 日；劉美好，2011 年 4 月 29 日）。然而，身為全程參與的一員，當時的我們（至少我）未必很清楚地意識到這個名詞，而是想藉著「四大蚵報」的發行，擴大反對國光石化的討論，捲動更多群眾（特別是過去未曾接觸此一議題的群眾）正視國光石化興建所帶來的能源、環境永續與世代正義的議題。倒是事後回想，「文化干擾」的形容似乎也恰如其分。是以本文從一個參與者的角度，概述「四大蚵報」以報紙「擬仿」進行文化干擾的過程與想法，擴及「蚵報」引發的政治回應；並反思文化行動的擴展、限制。

## 貳、文化干擾進行式

「四大蚵報」的構想源於 4 月 16 日的一場工作會議，全青盟成員從構思到執行不過短短 3 天的時間（朱淑娟，2011）。從 4 月 17 日文稿擬定，18 日談定印務著手美編、19 日下午編出「中國蚵報」，當晚陸續編出「聯蚵報」、「自由蚵報」、「蘋果蚵報」，19 日凌晨一點多報紙印行完成、19 日下午 2 點公館派報，20 日全臺灣北中南東同步派送。4 月 21 日第 5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前夕，全國各地青年學子發起「遍地反國光、永續護臺灣」行動，於 20 日串連各地的學生社團、地方組織、環保團體，特別選在主要的車站（臺北車站前新光三越、新竹火車站前廣場）、臺中、高雄、彰化鬧區、臺南成大校園等發起各式各樣的反國光石化行動，藉著不同創意的形式，同時派送「蚵報」向社會大眾說明為何

要反對國光石化，並且在4月21日至22日會合彰雲地區農漁民共同會師在環保署場外監督環評。全臺同步的派報行動，顯示出編印「蚵報」的用意並不僅止於顛覆媒體，而是一場有意識的「文化干擾」。當各式社會行動接續發聲，不僅強化了反對國光石化運動的基礎，同時也更堅定了青年學子反石化業擴張的決心與動力。

劉美好的報導生動地描述了「蚵報」的派報效果：

4月20日晚上，關注國光石化議題的年輕人策動一趟小小的遊行，各式各樣的標語牌在新光三越前廣場上熱鬧繽紛，學生們向路人發放「蘋果蚵報」、「自由蚵報」、「中國蚵報」、「聯蚵報」，幾可亂真的排版讓許多人細看才發現自己手上拿的並非正牌主流媒體四大報，參與編輯的鄧筑媛說：『我們把報紙派給老師，老師還沒發現，我們提醒了才知道！』許多藏在文案裡的幽默細節更令人捧腹，從白海豚形狀擲筊到廣告「反國光送烤箱」、在《蘋果日報》特有的「今日我最美」放謝素阿嬤的美女照片都創意和異議精神兼備，製作反國光運動大事紀更顯現學生們對議題的熟悉度（劉美好，2011年4月29日）。

「四大蚵報」派報行動也引起主流媒體的注意，《中國時報》在4月20日當天的第3版大篇幅報導：

「希望周五的報紙真的會這樣寫！」設計報紙版面的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所學生鄭安齊說，他們2天前開始討論分工，寫報導、編版，再請印刷廠比照正式報紙的紙質，印製25,000份，在各地活動現場發送。其中，《中國時報》被改編為《中國蚵報》，旺旺小童帶上「反國光」的面具，頭版頭題是「環評結論 終結石化業擴張」，二題還模擬專訪不願具名的總統幕僚，轉述馬總統出訪彰化大城濕地感嘆萬千，回臺北馬上召集相關官員開會，決定立刻調整施政方針，『所有社會觀感不佳的政策全部轉彎，才能贏得2012總統大選（陳至中，2011年4月20日）！

如同媒體報導所言，預言報的「擬仿」獲取了社會大眾的注意，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報紙的訊息反應了行動者與社會大眾所冀求的「真實」，並進一步改變了現實世界中的「真實」。

正如參與其中，當時就讀高師大地理所的姚量議所指出的：「青年聯盟做的雖然是『山寨版』報紙，但提供給社會大眾的，絕對是真實的訊息」（陳寧，2011）。媒體報導亦已注意到「蚵報」預言有其真實性，「這次「蚵報」『預言成真』，雖結果並非由環評否決，但中油撤資國光石化的官方決策沒有一家主流媒體報導成功預測，最接近的竟是這四份 kuso 預言報，也更進一步跳脫了公民在媒體近用上既有的框架，更擾亂了所謂媒體專業的界線」（劉美好，2011年4月29日）。參與其中、當時就讀於臺大法研所碩士班的陳平軒指出<sup>2</sup>：「蚵報有點改變了我們跟報紙的關係，或者是某些人透過了蚵報與我們產生新的關係」。鄭安齊在訪談中則提及<sup>3</sup>：「我們的確是要說真話，但為什麼我們要說真話，是因為我們現實中充滿了謊話，所以我們要用這種解構手法讓真實背面露出來。我會覺得這個東西對大家很有力量是，我們那幾天所做很像是大家本來不太敢講的東西讓它實現，而我們也很希望它實現。」換句話說，「四大蚵報」的發行並不僅僅是預言，它其實更能反映真實，因為社會現實有賴行動者打造，發行「蚵報」的全青盟與眾多的抵抗石化業擴張的力量，共同結盟，創造了國光石化停建的「真實」。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報紙版面的幽默手法，凸顯出年輕運動參與者的反思精神。儘管報紙的主要內容，在於預言環評否決國光，然而「蚵報」的獨特處也在於細節的幽默感及版面內容與形式的反思。從「今日我最美」的討論與取材可以看出美編成員對於性別與年齡差異的敏感，回顧當時討論編輯版面的電子郵件，一開始討論「今日我最美」專欄時，曾試圖完全擬仿報紙效果，選擇反國光石化運動中最美麗的年輕女性照片。然而，統籌美編重任的鄭安齊點出「蚵報」不應複製性別刻板印象，獲得了大夥的認同。因此照片的取材，選出了「蚵報」最美的定義：蚵農謝素阿嬤。另外，報紙刊頭的人物，取材基層人民的圖像，有別於主流媒體政治人物佔據版面與發言空間的現象。同樣身負美編重任的池依林，則為文點出文化干擾的意識<sup>4</sup>：

模仿四大報的政治意識形態、報導口吻、版面配置、廣告編排等等，製做出四款模仿得維妙維肖的「蚵報」，試著讓嚴肅的議題變得更加親民。這樣的「作品」雖然是「模仿」出來的，但卻是一種提出問題

2 陳平軒訪談紀錄，2012年2月9日訪談。

3 鄭安齊訪談紀錄，2012年2月9日訪談。

4 此文部分內容以〈青年的幽默正義〉為題，刊登於2011年4月26日《中國時報》言論版；在此引用原文。

意識的方法，它的形式其實若以「報紙」角度來看並不具美感，但從美學層次上是一種文化干擾的動作，在相似度極高的外觀之下容易信以為真，進而認識、關注到這些議題（池依林，2011 年 4 月 26 日）。

Eisenberg (1990) 曾界定干擾 (Jamming) 的四個先決條件：「技術 (skill)、結構 (structure)、定位 (setting) 以及懾服 (surrender)」。「定位」指的是文化干擾應致力從尋常生活 (「normal」life) 中創造干擾的裂縫與空隙，鄭安齊亦多次強調從日常生活形式尋求突破的重要。他指出「蚵報」文化干擾的美學定位 (setting)，就是在人們習而不察的細節中，去挑戰、鬆動日常生活的符號與象徵。他指出報紙「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平常很難去察覺它。」當報紙被改編成「蚵報」，同時預言著國光石化停建的消息，日常的形式承載著顛覆的消息，如同「一個日常生活的『共感』，就是報紙跟日常生活一樣，可是出現一點魔幻的時刻，原本這件事情不會成真的，但是它成真了。」鄭安齊特別強調從日常生活的共感中找尋行動形式的重要性：「新聞稿上面的是我們的語言，可是我們用報紙的語言，報紙的語言是大家的語言，報紙的形式，是大家的形式。」<sup>5</sup>

他個人也曾有一次展覽中<sup>6</sup>，以紅布條等市民習以為常的形式，嘲弄了臺北無處不在的都更擴張。文化干擾的形式容或多元，報紙、廣告、塗鴉、音樂等等均是，然而根本的意義在於從人民日常生活中催生、撞擊出對既存資本與政治結構的批判。

## 參、「蚵報」引起官方政治回應——跨越真實抑或創造真實

必須特別一提的是，「四大蚵報」本身也意外地成為了一個有意義的真實事件／新聞。

此事起因於綠黨潘翰聲 (2011 年 4 月 24 日) 以〈蚵報成真，文化力量大〉為題投書《中國時報》，卻引發環保署長沈世宏辦公室 (2011) 以 3,000 多字專

5 引文出處同註 3。

6 2011 年 2 月臺北當代藝術館「活彈藥」(Live Ammo) 特展中，鄭安齊以〈臺北當代藝術館暨周邊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Urban Renewal Plan for the Neighborhood of MOCA, Taipei) 作品參展，並於當代藝術館外牆高掛起「感謝政府都更德政……」等字眼紅布條，並引起地方民意代表電詢當代藝術館：「為什麼有都更案，我不知道！」。

文〈說謊文化不應成為環評委員認定不應開發價值判斷的力量來源〉回應，文中大力抨擊「蚶報」造假，同時質疑環保人士以假消息打擊政府，又為政府部門不能進行「置入性行銷」抱屈。《中國時報》的何榮幸（2011年4月27日）因而為文：「這個四月天果然神奇，國光石化案叫停，堪稱臺灣公民運動的重大勝利。國光石化民股的強烈反彈不難理解，令人錯愕的是環保署對於『蚶報成真』的氣急敗壞回應，甚至抱怨『不准置入行銷』已擴大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環保署缺乏環境正義感也就算了，竟然連文化幽默感與基本民主素養都付之闕如，真是被環保署打敗了。」環保署長沈世宏辦公室的回應，將「四大蚶報」的文化行動轉置為具有實質新聞意義的政治議題，擬仿的報紙本身成為新聞，這真不知是嘲諷得宜還是官僚缺乏幽默了。但也印證了 Naomi Klein 所言「最高招的文化反堵不是單一的諧擬<sup>7</sup>，而是攔截——將相反的訊息切入企業自身的溝通方式，使原本意欲傳遞的訊息出現完全扭曲的結果」（2000／徐詩思譯，2003：331）。從「四大蚶報」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文化干擾的意義除了對真實的「再現」與「創造」，更可藉著對習以為常的象徵符號改造、轉化以引發討論，以文化形式切入、扭轉政治或資本所傳遞的僵固訊息。

馮建三曾言：「『文化行動主義』的企圖無他，就是邀請或刺激人們當下就地反思，方式五花八門，包括通過突兀的內容與鮮明的對比。……在這些形式之外，對準主流文化惹人不快的現象，積極進行干擾（culture jamming）的行動，自然不會放過傳媒而不用。這個時候，文化行動本身就是另類媒介的內容，二者合而為一」（馮建三，2009：118）。「蚶報」即為二合一的載體，既是文化活動本身也是另類媒介。因此，討論「四大蚶報」的效果，要從文本本身，擴及整體的行動，作為社會行動重要環節的「四大蚶報」的發行，並不僅僅作為文化干擾本身，它的首要目的，如同它發行的定位——「預言報」一般，全青盟有意識的實現預言，實質介入反石化業擴張的抵抗行動。

另外一個值得探討的層面，則是文化干擾行動的效果。馮建三曾以《沒問題俠客》為例，強調：「這些干擾確實讓觀賞者心生認同，從嘴角牽動到捧腹大笑，從思索箇中道理到響應或自行模仿行動，都讓觀賞者從中得到培力（empowering，另譯「賦權」）的機會」（馮建三，2009：118）。觀者在其中得到培力或許只是文化行動效果的初步，更要緊的則是行動的擴展，如同馮建三以《沒問題俠客》所做的分析，「當然，文化抵抗並非無所不能，特別是《沒

7 此書譯者將「culture jamming」譯為「文化反堵」，引文沿用。

片，兩位俠客在片尾似乎已經表明，文化表意若能結合群眾，才有可能推進好事的實現」（馮建三，2009：120）。「四大蚵報」起於文化干擾的形式，但不僅止於文化干擾，而是透過編輯、派報及後續行動結合群眾，作為反國光石化運動的一環與眾多地方力量、環保團體以及自覺公民共同推進好事實現。

## 肆、限制與可能

「蚵報」的例子，使我相信論述的擴展事實上是許多不同層次的存在。舉個例子來說，在我們的日常語彙中，習慣將太陽與月亮作為明與暗的對立，陽與陰的區隔，為什麼呢？因為這是直觀的，感受性的，情感的。可是任何一個人在小學的時候就已經知道，若是以現代地球科學的角度來說，地球是繞著太陽轉的，而月亮則是繞著地球轉，在太陽系中太陽與月亮根本是不同層次的存在。論述中關於國光石化興建與否的政治經濟分析，與反國光石化的文化行動亦是分屬不同層次的存在。它們之間沒有非此即彼的互斥，當然也不至於產生孰輕孰重的比較。

文化行動的內在邏輯或可稱之為「感性結構」，它可能連結更多情感的想像，較為強調「象徵」，較為強調與生命經驗的連結，較為貼近人們的存在感。當然，所謂的「感性結構」也不是那麼的個人、直觀，它往往也與人們生存世界的特定脈絡連結在一起。就此而言，文化行動象徵形式的感受力往往與行動者對特定社會脈絡的理解與掌握有關。說到底，人們並非生存於真空的世界，所謂的歷史、所謂的社會脈絡，不正是過去的人事物在時間與空間的共同作用下，所形成之現今人們理解與行動的基礎嗎？人類的理性分析與學術理論不能脫離社會脈絡而進行空泛的指涉；同樣地，文化行動與象徵也必然鑲嵌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之下。

「蚵報」編輯過程的討論、集稿以及編輯過程就已經刻意地擴大青年學子的參與，加上編輯過程的開放性，讓每個人都能發揮各自的長才巧思。當時投入文編的有大一到研究所的學生，包含機械系、經濟系、法律系與英文系等各科系；集稿過程更有賴許多線上記者的攝影作品。美編工作則集合了北藝大藝術創作以及傳統水墨畫作的研究生，在報社編輯印刷領班的指導下，方能在短短2天之中，從無到有編出「四大蚵報」。點出這些細節無非是想藉此說明，一個新運動形式被創造出來的過程中，也能同時擴大組織連結，並且藉著實質的參與，深化對議題的認識、表述與溝通能力。

正是這個共同討論、共同承擔、共同行動的過程，使我相信，文化行動的意義在於活潑的形式與敏銳的社會介入（intervention），更在於過程中行動隊伍的集結。文化干擾有其魔幻的力量，感召人心，突圍媒體。今天行動的隊伍著力於反石化業擴張，他日所捲動的力量或將投入另一場戰役，異議者的形象不僅在於街頭呼喊，文化奇襲的爆發力也有可能鑽進日常生活的縫隙，孕育烽起的能量。

「四大蚵報」的文化行動有其必然中的偶然。當我們執著於批判石化業擴張，反對國光石化興建的同時，我們必然感受相應的反作用力，在這個過程中，參與者無不持續思索如何運用、連結多元的行動以訴求社會大眾的認識與支持。而「四大蚵報」或許是一種對媒介形式的集體反叛吧？當許多主流媒體忽略關鍵議題，動輒以道德審判者自居，以權力者傳聲筒為尚，在此等媒體藉資本的廣告代言維生的媒體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困局中，參與者冀望著扭轉的可能，哪怕只是幽默的短暫輕鬆。當然，參與其中的我們可不能因為單一行動的進展而有所僥倖、停頓或鬆懈，唯有積極面對社會現實，釐清根本問題，持續地團結、持續地行動，才能一步步地趨近我們所渴望的美好世界。

## 參考文獻

- 朱淑娟（2011）。〈四大蚵報：否決國光石化！〉，《環境報導》。上網日期：2012年2月18日，取自 [http://shuchuan7.blogspot.com/2011/04/blog-post\\_19.html](http://shuchuan7.blogspot.com/2011/04/blog-post_19.html)
- 池依林（2011年4月26日）。〈青年的幽默正義〉，《中國時報》，言論版。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辦公室（2011）。〈說謊文化不應成為環評委員認定不應開發價值判斷的力量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上網日期：2012年2月18日，取自 [http://ivy5.epa.gov.tw/enews/fact\\_Newsdetail.asp?InputTime=1000425101939&ParentID=103](http://ivy5.epa.gov.tw/enews/fact_Newsdetail.asp?InputTime=1000425101939&ParentID=103)
- 何榮幸（2011年4月27日）。〈被環保署打敗了〉，《中國時報》，時論廣場版。
- 孫窮理（2011）。〈後國光時代〉，《苦勞網》。上網日期：2012年2月18日，取自 <http://www.cooloud.org.tw/node/59801>。
- 徐詩思譯（2003）。《No logo》。臺北：時報文化。（原書 Klein, N. [2000]. *No logo: Taking aim at the brand bullies*. Toronto, Canada: Vintage Canada.）
- 陳平軒（2011）。〈從網路到街頭：反國光石化的動員經驗、成效與反省〉，《臺灣社會研究》，85：437-450。

陳至中（2011 年 4 月 20 日）。〈全省串連反國光 學生發《預言報》〉，《中國時報》，第 3 版。

陳寧（2011）。〈發行環評結論「預言報」 反國光青年呼籲否決開發〉，《苦勞網》。上網日期：2012 年 2 月 5 日，取自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9571>。

馮建三（2009）。〈「唯唯諾諾」其實是「顛覆進行中」〉，《今藝術》，204：118-120。

劉美好（2011 年 4 月 29 日）。〈青年新遊戲對抗國家舊機器——反國光石化的文化行動〉，《破報》，第 1 版。

潘翰聲（2011 年 4 月 24 日）。〈蚵報成真 文化力量大〉，《中國時報》，言論版。

Eisenberg, E. M. (1990). Jamming: Transcendence through organiz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7*, 139-164.

# 反國光石化運動的「公民」展演<sup>\*</sup>

## How Do the Anti-Kuokuang Petrochemical Movement Activists Perform Role of “Citizen?”

何明修<sup>\*\*</sup>

Ho, Ming-Sho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壹、「公民運動」？

在 2011 年 4 月 22 日，環保署環評專案審查會議結束之後，馬英九總統召開記者會宣佈不支持國光石化在彰化的開發案。至此，自從 2008 年以來的反對運動取得了初步的勝利。在當時，不少參與者與評論者不約而同地以「公民運動」來稱呼此一事件。知名文化評論者張鐵志（2011 年 4 月 28 日）曾指出，反國光石化是「一場公民運動的典範」，記者何榮幸（2011 年 4 月 27 日）也認為，「國光石化案叫停，堪稱臺灣公民運動的重大勝利」。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李根政（2011）則主張，在反國光石化運動中，公民社會的力量成功催化了對高污染、高耗能之發展模式的反省與對話。同樣地，參與反國光石化的青年學生也認為，他們自身的投入可以被視為「青年開創新的公民參與形式」（黃裕穎、林樂昕、周秀樺，2011：47）。

然而，到底什麼是「公民運動」呢？為何「公民」的力量實際展現，可以擊敗一項由政府官員強力背書、地方派系動員支持、大財團參與的重大投資案？更要的地，誰又是所謂的「公民」？在這一篇文章中，我將要論證，反國光石化運動的勝利關鍵之一，即是呈現超黨派與利他主義色彩的「公民」形象之構建。

---

\* 本研究使用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的資源（計畫編號：101-2420-H-002-008-MY2），感謝黃梅蘭、夏慕泓的協助。

\*\* E-mail: mingshoho@gmail.com

## 貳、環境運動的「公民」轉向

在臺灣的環境運動中，受到工業發展危害的群體往往是最先參與抗爭，因為他們的親身經驗使得他們認知到公害的嚴重性。在既有的研究作品中，學者以「受害者意識」（蕭新煌，1988）、「環境權的身體感受」（李丁讚、林文源，2000）、被資本主義擴張威脅的「農漁民」（劉華真，2011）來指稱這種現象。但是僅憑當事者的參與，環境運動很容易就受限制於地理空間，當地人的自力救濟行動會被貼上「鄰避主義」（Nimbyism）之標籤，而無法號召更多人的同情與支持（Rabe, 1994）。反對者被視為只是為了「私利」、「不理性」，如此一來，他們的訴求就不容易取得其他人的共鳴。舉例而言，像核四廠興建這種全國性議題，反核人士卻發現很難說服遠離預定地的中南部民眾（核四公投促進會 1995：149）。同樣地，在後勁反五輕運動中，也有觀察者指出，「反五輕運動一直被孤立後勁地區，無法突破高雄市民的冷漠」（田秋堇，1990）。一旦環境運動無法取得受害者以外的群體聲援，訴求的傳播將會受到很大的限制，進而降低了運動成功的可能性。

從社會運動研究的角度來看，任何的社會運動形態都是行動者所創造出來的，而不是直接反映了某一種先前結構（Gamson, 1992: 70）。到底某一個環境抗爭議題會發展為「地方性」、「全國性」亦或是「全球性」，議題本身固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主事者的能力與策略以及所處的時空脈絡也是決定性的因素。因此，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主張，環境運動是否能超越直接受害者的格局，並不是完全取決於公害威脅的嚴重性（Hannigan, 1995）。從這個角度來看，環境運動其實相當需要局外人的支持與聲援。在面臨在地的污染威脅時，受害者往往需要「良心支持者」（conscience constituents）（Zald & McCarthy, 1987: 23），他們與運動的成敗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卻因為自身所抱持的理念，願意提供資源。而越是在內部不平等的社會，這種跨地域（translocal）的資源越是重要，他們往往形成對抗社區內壓迫菁英的重要助力（Evans, 2000: 18-19）。

最早在 80 年代中期，蕭新煌（1987：73-74）曾指出臺灣環境運動的兩條路線。所謂的「浪漫路線」由生態保育學者所發起的，其訴求的重點在於景觀維護、生態價值、自然教育等。這些受到西方教育與思潮所啟發的學者，扮演著社會啟蒙者的角色，他們希望政府官員能多一點生態關懷，政策導向能從無條件的開發主義轉化為環境保護。另一方面，他們也積極教育民眾，試圖改變其功利主義的心態、落伍的飲食文化，進而產生欣賞大自然的情操。另一種「強硬路線」

則是訴諸群眾的力量，由人民來對抗破壞環境的資本家與政府。隨著 80 年代中期以降環境自力救濟風潮的興起，這種強硬路線展現出十分強大的抗爭能量（蕭新煌，1987；1988；Hsiao, 1999）。

到了 90 年代初期，若干環境運動者試圖超越保育運動與反污染運動的兩元對立。南臺灣的柴山保育運動者將自身定位為所謂「市民運動」（何明修，2007；龔重林，1995）。他們認為，歷史上的「市民意識」從對抗封建專制到改革都會環境，都代表著進步與理性的光明；他們的集體行動是自發的，而且是基於公益的。保育人士認為，柴山山上那些每天撿垃圾與奉茶的熱心人士是最好的榜樣，因為「他的行動沒有什麼『公民參與』、『市民主義』那些文謔譎的理論基礎，他只是單純的愛惜這片難得的山野，並希望它每天都乾乾淨淨的（姚人多，1995 年 10 月 29 日）」。因此，市民運動者所設想的發展情節是由下而上的動員，迫使落後的公部門跟上進步的民間之腳步；保育運動「必需經由廣大人民緩慢而自發性的覺醒過程，凝聚意識、形成民意……向掌權謀利者要求回歸屬於人民的生存尊嚴（王家祥，1992）」。

在晚近 10 年來，「公民」、「公民社會」、「公民運動」等相關詞彙顯得越來越重要。在政治實踐上，知識份子也越來越常以「公民社會」的名義來強調改革的必要性。在 2004 年的總統大選中，民進黨政府推動兩項防禦性公民投票。在當時，親民進黨的臺灣智庫提出了一項政策說帖，來強化公投的正當性；公投被認為可以「壯大公民社會」，因為這項制度將有助於「培養負責的公民意識」（汪平雲、徐永明，2003：32-33）。在政治分歧的另一邊，2006 年興起的倒扁運動也將自身定位於「公民社會」。倒扁學者宣稱，「一個活力的、獨立的公民社會都是國家發展、民主提升的必要條件」，而他們的公共參與也是為了「壯大獨立自主的公民社會」（七一五聯盟，2006）。公共論述的修辭也出現同樣的轉變，因此，范雲（2008）分析報紙言論，她指出，同樣是 *civil society* 的中文翻譯，「公民社會」一詞已經逐漸取代了 80 年代以降的「民間社會」。

進一步而言，以「公民」為名的環境運動具有下列的意涵：

## 一、公民運動是無關黨派，超越藍綠的

最早在 90 年代中期，環境運動與民進黨的政治聯盟已經逐漸鬆動。在民進黨執政期間（2000-2008），原先抱有期待的環境團體紛紛感到失望，原因在於民進黨在路線上逐漸接受以往的開發主義（林冠妙，2007；Ho, 2005）。因此，環境運動試圖走出一條不依靠政黨的道路，直接訴諸社會公眾。

## 二、公民運動是利他主義的，而不維護特定群體的利益

從廣義來講，許多在歷史上發揮過作用的集體行動都可以被看作「政治利他主義」(political altruism)，因為其涉及了為不相干的他人爭取權利之舉動 (Passy, 2001: 8-11)。在臺灣的環境運動脈絡中，利他主義的意義即在於，它不僅不是受害者的鄰避抵抗，且參與者是願意為了受威脅的環境而主動付出代價。因此，一位臺灣的環運健將就曾如此定義「社會運動」，「社會運動係為自發性、追求公義，雖也可能夾雜一些私利，但是私利愈多就不是社會運動」(陳玉峰、李根正、許欣欣，2000：11)。

## 參、展演超黨派

在以往的研究中，社會運動常被視為一種追求集體利益的工具性行動 (instrumental action)。如此一來，社會抗議形式被認為是由策略所決定，而忽略了其內含的儀式性表演之特性。相對於此，抗爭劇碼 (protest repertoire) 的概念，即是要強調社會運動所必然具有的表演性格。劇碼是指社會運動所能採用的抗議形式之總合。劇碼的組成受到文化背景的影響，因此在任何一個時空脈絡中，能夠運用的劇碼必定是有限的，社會運動不得不從其中選擇最適當的形式。一般而言，抗爭劇碼都試圖呈現議題的價值 (worthiness)，以及參與者之間的一致性 (unity)、數目 (number) 與信念 (commitment) (Tilly, 2004: 3-4)。社運組織無不希望他們所舉行的示威活動能儘可能地號召到更多的參與群眾，而預先規劃好統一的標語與口號，其目的不外乎是要展現他們眾志成城的決心。

抗爭劇碼的概念強調，抗議者是選擇性地出招，以呈現與包裝他們的不滿。劇碼的概念強調了社會生活中的表演特性而抗議活動實際上是一種角色扮演，也因此可以用來進一步分析社會運動的戲劇學面向 (the dramaturgical dimension) (Benford, 1992)。儀式性的表演可以激發出仇恨、同情、自尊、關懷、團結感等多種的情緒，亦是維持參與士氣與情感依附的重要媒介 (Deegan, 1996; Esherrick & Wasserstrom, 1994; Taylor & Rupp, 2002)。要說服人民參與社會運動，複雜的現實需要被敘事化，重新被展演出來。

「公民運動」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由公民所發起的社會運動」，亦或是「具有公民精神的社會運動」；如果這樣看待，就是將社會運動的外部展現直接等同於其內部過程，而忽略了社會運動必然涉及的性能面向。更準確地說，「公民運

動」即是一種抗爭劇碼，它試圖在公眾面前，展演出上述超黨派與利他主義之特色<sup>1</sup>。

首先，要如何展演「超越藍綠」？在2010年下半年，國光石化的議題開始出現了政黨間的歧異，民進黨反對的態勢日益明顯，而執政的國民黨則是大力支持此一開發案。從地方政治勢力的分佈來看，彰化縣這一屆共有6位立委，包括4位區域立委林滄敏、鄭汝芬、蕭景田、陳秀卿，兩位不分區立委陳杰、翁金珠。除了翁金珠是民進黨籍以外，其他五位都是國民黨籍。國民黨籍在地立委都傾向於支持國光石化，甚至積極動員樁腳系統，為國光石化搖旗吶喊。更有人利用家族經營的有線電視，在地方臺播放支持國光石化的影片。在這種情況下，除了芳苑鄉自救會以外，民進黨的在地勢力，成為了在當地唯一可以動員的反對群眾。

在臺北的戰場上，田秋堇、劉建國兩位民進黨立委則是運動的重要盟友。田秋堇從最早宜蘭六輕運動以來，始終堅持環境優先的立場，在國光石化的聽證會、環評會場上，她經常與反對者攜手合作，是環保運動者最信賴的政治人物。此外，雲林縣長蘇治芬的表現也為環保團體大力稱許，在環評會場上，雲林縣政府的代表都會事先與環保人士協調，共同發言反對。

儘管民進黨的政治資源或多或少壯大了反國光石化運動的聲勢，但不可忽視的是其參與有非常明顯的政治算計在其中。其中若干人士的態度明顯前後不一，見機翻轉，很難不落人口實。反對國光石化的運動者擔心，隨著民進黨勢力的介入，運動會被「染綠」，因此非常希望能夠引進國民黨的力量。2011年年假之後，反對者中有些人士積極拉攏國民黨民代合作，也有人透過部會首長，與國民黨高層見面。透過這些管道，反對者在3月30日，被總統府邀請，正式與馬英九總統見面。在4月3日，馬英九前往芳苑鄉反污染自救會會長家，親自與在地反對者溝通，在隔天更安排了總統參訪濕地的行程。因此，無論反對者個人的政治立場，亦或是他們實際上的評價，策略上的「尊馬」或多或少也維持了運動的政治中立形象，符合「公民運動」的基本調性<sup>2</sup>。

1 以下的資料，引自謝志誠、何明修（2011）。

2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反國光石化運動也有親綠與「對馬英九有期待」兩派勢力，到了運動後期，這兩派的政治角力十分激烈。不過，筆者在此是著重於運動的公共呈現，而不是內部的派系抗衡。

## 肆、展演利他主義

反國光石化運動之利他主義的展演，也是很值得注意的面向。除了有可能直接受害的在地蚵農與居民外，青年學生、藝文界、都市中產階級、學界的參與，是其明顯的特徵。

反國光石化運動成功地號召到一群有行動力的大學生，構成最重要的主力部隊。臺灣的環運從最早鹿港反杜邦起，就有學生工作隊下鄉的動員，但是參與的廣度與深度都比不上這次。在農村陣線、青平臺等團體的協助下，這群大學生進行了實地訪調工作，實踐了「有感動才有行動」的實作邏輯。在各大校園中，他們也透過社團與農學市集等活動，向同學傳播保衛土地的價值。更難能可貴地，連高中生也開始關心公共議題，當時在彰化縣就曾出現兩千多位高中生參與連署的行動。

廣泛的藝文界參與也擴展了運動的社會能見度。本土詩人吳晟從書寫吾鄉印象，到捍衛吾土家園的賣命投入，進一步激發了多位導演、作家、樂手的參與。而在 2010 年 9 月，賴和基金會所發起的藝文界連署活動，更有三百多位藝文界人士加入連署。另外，包括陳明章、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拷秋勤樂團等，都創作了多首感動人心的歌曲。文化是一種軟實力，透過美感的呈現與經驗所帶來的感動，形塑我們的期望與欲求。以往的環境運動者也曾試圖採取文化路線，例如美濃反水庫運動中的鍾鐵民與交工樂隊，但是很顯然地，規模都沒有這次來得龐大。

在 2010 年 8 月，還有千餘位學者共同連署反對國光石化。他們強調，節能減碳是國際趨勢，而國光石化正走在相反的道路上。兩位中興大學教授的推估，更點出了該投資案的不理性。經濟學家陳吉仲指出，民眾的健康成本、死亡代價、地層下陷等每年必須付出的成本高達 1,000 億，幾乎是預期年度獲益的兩倍。而根據環工專家莊秉潔的計算，一旦國光石化運轉之後，空氣中的細懸浮微粒會顯著增加，臺灣每個人將減少 23 天的壽命、每年造成 339 到 565 人死亡。

此外，透過溼地認股運動，反國光石化運動成功連結了廣大的都市中產階級。用公益信託的方式，募集資金，以保存具有生態價值的地帶，是外國行之有年的環運路線；在臺灣，10 年前的反濱南運動，也曾有人提議要用這種方式保存七股溼地，但是並沒有付諸實行。結果在反國光石化運動中，這項認股運動出乎預料地成功，到 2011 年 4 月底前，第二階段的連署已經有八萬多名民眾參與，其中絕大多數是來自於臺北市與新北市的居民。與一般的連署活動相比，環境信

託的認股活動需要登記身份證字號，在目前高度資訊風險下很容易就讓支持者卻步。然而這更顯示出，參與全民認股活動的民眾是經過充份的思考及認知，而不是隨便簽一簽而已。這股力量，一旦轉為懲罰環境破壞者的選票，對執政者的威脅不言而喻。

透過各種具體的行動，青年的理想主義、專家學者的知識、藝文界的良知與中產階級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共同展示出強大的利他主義。這些行動包括：青年學生在環保署前靜坐守夜，阻止國光石化在環評闖關成功（2011年1月25至26日）、家長和孩子、教師、音樂藝術創作者在西門町紅樓前舉行音樂會與彩繪遊行（2010年6月26日）、自救會幹部跪在泥灘地，向神明表達誓死保護濕地的決心（2011年4月4日）、藝文界舉行「為你唱一首歌」守護濕地詩歌會（2011年5月7日）等。藉由這些高度戲劇化的表演，保衛臺灣生態環境的努力展現為一種強而有力的信念，與此相對的，則是財團與政客的貪婪跟短視。

## 伍、結論

如果將時間倒退回到2008年3月，國光石化公司決定放棄雲林臺西的設廠計畫，選擇落腳彰化大城。在當時，這項大規模的開發案看起來勢不可擋，肯定會獲得政府的支持。而至少有三個理由可以支持這樣的預測。首先，濁水溪口北岸是典型的「風頭水尾」海口地帶，在地居民向來謀生困難。20年前，雲林麥寮人用舞龍舞獅來迎接臺塑六輕，正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嚐過高雄後勁林園、仁武、大社等地居民被毒害的滋味。也因此，大城在地的政治人物可以提出有98%的大城鄉民「支持」國光石化的宣稱。其次，二次政黨輪替後，向來奉行開發主義而且又與財團過從甚密的國民黨班師回朝。當時的彰化縣又是國民黨執政，國光石化被縣長當成招商的業績，在這種不利的政治格局下，反對者很難有可供運用的政治空間。國光石化的前身中油八輕案，就是在屏東縣蘇嘉全、嘉義縣長陳明文的反對下，而無法落腳枋寮與布袋。這可見，只要是地方首長強力表態，重大投資案是不會獲得通過。最後，在經歷了2008年金融海嘯與2009年的負成長之後，期盼景氣復甦成為主流民意，馬英九的「633」口號無法兌現更成為反對黨攻訐的焦點。號稱將投資六千多億，創造出一萬多工作機會的國光石化，就格外令人垂涎三尺，反對人士也被譏為「愛魚不愛人」、「不食人間煙火」。出乎預料地，國光石化設廠的計畫卻徹底慘敗，政府更宣示要在原先作為設廠預定地的大城溼地設置國家級風景區。

誠如開頭所引用的許多參與者與評論者所指出，這是一場「公民運動」的勝利。但是他們沒有進一步指出的是，「公民運動」其實不外乎是一種「公民的展演」，一旦運動者可以透過各種抗爭劇碼，具體展現出超黨派與利他主義的特徵，如此一來就有可能形成一種槓桿作用，迫使執政者改變其決定，向運動者的訴求讓步。換言之，大衛是可以戰勝巨人哥利亞，前提是他手上握一顆可以擊潰敵人的石頭；綜觀整場反國光石化運動，那顆神奇的石頭即是「公民」。這個故事對於許多從事守衛家園的運動者格外具有啓示，如果能夠強而有力地展現出「超黨派」與「利他主義」的形像，不利的對抗格局是可以被扭轉改變。

## 參考書目

- 七一五聯盟（2006）。〈壯大公民社會、提升臺灣民主：我們共同的回應文〉。  
上網日期：2007年3月1日，取自 <http://blog.roodo.com/michaelcarolina/archives/1936438.html>
- 王家祥（1992年9月2日）。〈人的精神不能永遠被踐踏〉，《自立早報》，第10版。
- 田秋堃（1990）。〈利用政治：環保中立神話的結束〉，《臺灣環境》，28：1。
- 何明修（2007）。〈公民社會的限制——臺灣環境政治中的結社藝術〉，《臺灣民主季刊》，4(2)：33-65。
- 何榮幸（2011年4月27日）。〈被環保署打敗了〉，《中國時報》，第A15版。
- 李丁讚、林文源（2000）。〈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臺灣的歷史形成；1970-1986〉，《臺灣社會研究》，38：133-206。
- 李根政（2011）。〈國光撤案，公民運動再接再厲！〉，《環境資訊中心》。上網日期：2011年7月20日，取自 <http://e-info.org.tw/node/66190>
- 汪平雲、徐永明（2003）。《落實公投、鞏固民主——一個公民社會的觀點》。臺北：臺灣智庫。
- 林冠妙（2007）。《2000年臺灣政黨輪替後社會運動團體之轉型——以臺灣環境保護聯盟（TEPU）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姚人多（1995年10月29日）。〈柴山的人文與未來〉，《自由時報》，第35版。
- 范雲（2008）。〈從民間社會邁向公民社會〉，王宏仁、李廣均、龔宜君（編），《跨戒：流動與堅持的臺灣社會》，頁23-36。臺北：群學。
- 核四公投促進會（1995）。《核四公投·千里苦行》。臺北：玉山。

- 張鐵志 (2011 年 4 月 28 日)。〈一場公民運動的典範〉，《中國時報》，第 A15 版。
- 陳玉峰、李根正、許心欣編 (2000)。《搶救棲蘭檜木林運動誌》(中)。高雄：愛智。
- 黃裕穎、林樂昕、周秀樺 (2011 年 5 月)。〈反國光石化運動的青年串聯〉，「邁向參與式民主的挑戰與實踐研討會」論文。臺灣：臺北。
- 劉華真 (2011)。〈消失的農漁民：重探臺灣早期環境抗爭〉，《臺灣社會學》，21：1-49。
- 蕭新煌 (1988)。《70 年代反污染自力救濟的結構與過程分析》。臺北：行政院環保署。
- (1987)。《我們只有一個臺灣：反污染、生態保育與環境運動》。臺北：圓神。
- 謝志誠、何明修 (2011)。《八輕遊臺灣：國光石化的故事》。臺北：左岸。
- 龔重林 (1995)。《市民運動與市民意識之轉化：柴山自然公園運動的例子》。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Benford, R. D., & Hunt, S. A. (1992). Dramaturgy and social movement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power. *Sociological Inquiry*, 62(1), 36-55.
- Deegan, M. J. (1996). "Dear love, dear love" feminist pragmatism and the Chicago female world of love and ritual. *Gender and Society*, 10(5), 590-607.
- Esherick, J. W., & Wasserstrom, J. N. (1994). Acting out democracy: Political theater in modern China. In J. N. Wasserstrom & E. J. Perry (Eds.),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pp. 21-70). Boulder, CO: Westview.
- Evans, P. (2000). Introduction: Looking for agents of urban livability in a globalized political economy. In P. Evans (Ed.), *Livable cities?: Urban struggles for livelihood and sustainability* (pp. 1-30).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amson, W. A. (1992).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A. D. Morrism & C. M. Mueller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pp. 53-76).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annigan, J. A. (1995).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 Ho, M. S. (2005). Taiwan's state and social movements under the DPP government, 2000-2004.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5, 401-425.

- Hsiao, H. H. M. (1999).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Taiwan. In Y. F. Lee & Y. S. Alvin (Eds.), *Asia's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pp. 31-45). New York: M. E. Sharpe.
- Passy, F. (2001). Political altruism and the solidarity movement: An introduction. In M. Giugni & F. Passy (Eds.), *Political altruism? Solidarity movement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p. 3-26). Lanham, MD: Roman & Littlefield.
- Rabe, B. G. (1994). *Beyond nimby: Hazardous waste siting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Taylor, V., & Rupp, L. J. (2002). Loving internationalism: The emotion culture of transnational women's organizations, 1888-1945.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7(2), 141-158.
- Tilly, C. (2004). *Social movements, 1786-2004*. Boulder, CO: Paradigm.
- Zald, M. N., & McCarthy, J. D. (1987).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 國際移工／民傳播權的在地思考

陳春富\*

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暨大眾傳播研究所副教授

### 摘要

全球化發展之下，國際人口的遷徙日趨頻繁多元。本文以東南亞移工與新移民為主體，透過其在臺勞動條件、媒體再現、媒體近用等面向的觀察，輔以人權、傳播權、媒體近用權與文化公民權意涵的交互辯證，檢視國內傳播政策中對於國際移工／民的思維與想像。此外，本文亦援引其他國家多元文化族群與傳播政策的基本內涵及措施，從中檢討全球化國際遷徙脈絡中，臺灣在落實多元文化主義與傳播權方面的作為，並且提出未來政策規劃上的幾點建議。

**關鍵詞：**文化公民權、多元文化主義、移工、移民、媒體近用、傳播權

---

\* E-mail: 061328@mail.fju.edu.tw

投稿日期：2011 年 9 月 24 日

接受日期：2011 年 11 月 29 日

## 壹、新興族群的興起

自 90 年代以來，臺灣社會的人口結構出現重大變化，除了原先居住於國內的「四大族群」<sup>1</sup>之外，外籍勞工與外籍配偶的人數也逐日增加。根據內政部 99 年第 5 週統計通報資料，98 年底在臺外籍人士（不含大陸人士）共計 552,792 人，其中持居留簽證者 460,945 人，持停留及其他簽證者 91,005 人。就國籍來區分，以印尼籍 154,159 人所占比例最高（27.89%），其次為越南籍 125,418 人（22.69%）、菲律賓籍 75,086 人（13.58%）、泰國籍 70,781 人（12.80%）較多，其餘則依序為美國籍 29,117 人以及日本籍 28,388 人。

另外，若以身分別加以觀察，所謂「在臺外籍人士」的組成中以外籍勞工 351,016 人所占比例 63.5% 最高，其次則為尚未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之外籍配偶 51,758 人（不含大陸港澳配偶）所占的 9.36% 居次，兩者合占在臺外籍人士總數約 73% 之比例，其中，來自東南亞地區者占了 97.86%。若將以上兩種類別的「外籍人士」加總來看，每年至少有超過五十萬的東南亞外籍勞工及配偶居留臺灣。從這些官方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外籍勞工與外籍配偶儼然已成為臺灣社會中的一支新興族群；換言之，臺灣在人口組成上可謂呈現多元族群國家之樣貌。

### 一、外籍勞工

一般論及「在臺外籍人士」，理應包括所有非中華民國國民身份的外國人，然而由於原生國家國力與使用語言之差異，不同國籍乃至種族的外籍人士在臺灣面臨差別的待遇。行政院勞委會的相關法規中即明白揭示，藍領「外籍勞工」與白領「外國專業人員」適用不同的法律條款，顯見臺灣不僅對於不同國籍與工作屬性者存有階級之分，其中也隱約帶有種族歧視之意味<sup>2</sup>。臺灣自 1990 年開放外籍勞工協助「十四項重要建設工程」，1991 年 10 月正式開放民間 15 種行業得以聘用外籍勞工，並於 1992 年公佈並實施〈就業服務法〉，明文規定外籍勞工在臺工作的合法事項，聘僱合法外籍勞工政策施行至今已近二十年。根據行政院

1 一般所指稱的「四大族群」包括外省族群、閩南族群、客家族群、原住民。

2 根據〈就業服務法〉第五章關於外國人之聘僱與管理規定，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之工作、學校教師、政府核准投資之事業主管、補習班外語老師、運動員及教練、宗教、藝術、演藝人員，以及交通部特許商船之船員不受國別及數額之限制，工作時間以 3 年為限，可無限延展，工作期間可轉換雇主及工作，其雇主無須繳納就業安定費。從事海洋魚撈工作、家庭幫傭、因應國內重大建設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工作，則不但有國別及數額的限制，工作時間最長 2 年，期滿得延展一次，不得累計 6 年，亦不得更換雇主及工作，雇主必須繳納就業安定費。前者多半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等已開發國家，後者則來自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等較低度開發國家。

勞委會的資料顯示，截至2011年10月底，已有超過四十二萬名外籍勞工在臺工作與居留，此群勞動人口成為臺灣境內最龐大的外籍族群。

具體而言，「外籍勞工」指的是藍領階級的勞動者，多半為產業或社福外勞，主要來自印尼、泰國及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由於臺灣政府未能與東南亞國家取得以國對國方式招募勞工的正式協定，加上聘僱規定繁文縟節，使得私人仲介得以從中獲得賺取暴利的空間（王宏仁、白朗潔，2009）。再者，勞基法中幾項不合理的規定，使得外籍勞工在臺工作條件更形劣勢，諸如：外籍勞工入境後，必須定期辦理健康檢查，一旦發現不合格立即遣返；除特定情形之外<sup>3</sup>，外籍勞工不得轉換僱主及工作場所；最長工作年限為9年<sup>4</sup>；工作、生活管理、延展與遣返的權力均掌握在僱主手中。此種訴諸僱主「球員兼裁判」的管理方式，使得背負龐大仲介費用的外籍勞工敢怒不敢言。其中，缺乏人權精神的「客工」（guest worker）制度及其背後的思維成了在臺外籍勞工遭受層層剝削的主要原因。

反觀「外國專業人員」，所指涉的為白領專業人員，多半從事專業技術、補習班語文教師及學校教師等職業，以日本、美國及加拿大等國籍者居多，每年約有三萬名左右的外國專業人員在臺工作。外國專業人員的聘僱規定相對寬鬆，例如不硬性規定健康檢查、得以自由轉換僱主及工作、沒有在臺工作的年限，僱主不需繳納就業安定金。此外，臺灣出入境移民法規中針對移民性質設定不同的限制，其中積極延攬的移民對象為歐美、日本及港澳地區人士，開放其得以「專業身份」申請來臺居留；從事勞動產業的外籍勞工則被定義為「補充性人力」，沒有在臺居留的權利。曾嫻芬（2004）認為，臺灣政府為了維持種族的同質性，將外籍勞工設定為暫時填補人力不足的「過客」、「客工」，使「他們」沒有機會成為「我們」；所謂的客工政策即是在此種以「我族」為中心的思維下產生。

此種勞動與移民規範上的差異，反映出臺灣政府在政策擬訂之時即隱含著國族與階級歧視，對於西方、進步的社會張開雙手擁抱，而對東南亞、落後的國家則是處處刁難設限。藍佩嘉（2008：98）指出：「處於半邊陲的臺灣人，在抬頭仰望白皮膚的『優越他者』的同時，複製了殖民之眼的凝視，低頭蔑視膚色更深的『低劣他者』」。此外，臺灣政府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缺乏國際組織的約

3 勞基法第59條（轉換雇主或工作之情形）規定，外國人受聘僱從事第46條第1項第8至第11款之工作，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得轉換雇主或工作：（一）雇主或被看護者死亡或移民者。（二）船舶被扣押、沈沒或修繕而無法繼續作業者。（三）雇主關廠、歇業或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經終止勞動契約者。（四）其他不可歸責於受聘僱外國人之事由者。

4 2007年6月立法院通過〈就業服務法〉修正案，放寬臺灣僱主聘僱外籍勞工的在臺工作年限，由6年延長至9年。

束，使得在臺工作的國際移工也未能獲得諸如自由移動、社會福利或家庭團聚等基本移工人權。

以目前臺灣社會實然面觀之，外籍勞工不再僅是暫時的補充性人力，而是隨著國內產業轉型以及出生率的持續降低，逐漸成為長期的替代性人力。自 1992 年開放合法僱用外籍勞工迄今，以東南亞國家為主的人口成為臺灣社會勞動結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對於國內近年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貢獻，然而其權益卻未隨著時間的開展及勞動價值的改變而提升。值得注意的是，當跨國移工逐步成為一個永久性的現象時，其所反映的不再只是特定時空中一項暫時性的身份，而是全球化發展中一個持續的適應模式（成露茜，2008）。因此，接待國必須正視其作為全球遷徙時代中「國際公民」的權利訴求與主張；也就是說，臺灣社會必須積極回應外籍勞工的需求，給予其應有的社會權利。

臺灣社會對於國際移工的歧視也反映在主流大眾媒體對於東南亞籍外勞的污名與標籤化。顧玉玲（2008）的研究發現，臺灣開放外籍移工合法工作多年，然而整體社會卻從未真正嘗試了解移工的文化，或是傾聽其內在聲音與需求。因此，即使在臺外籍勞工不時受到大眾媒體的關注與報導，然而總是以「有問題」的一面躍身媒體版面，其形象不是「可憐」便是「可惡」。另外，若檢視國內探討臺灣主流報紙如何呈現外籍勞工與家事勞務工形象的研究（如楊芷茜，2006；劉徐琦，2008；謝敏芳，2004）即可發現，臺灣主流媒體長期以來對於外籍勞工的報導偏向負面，論述中若非責備，即是充滿同情的語氣，此種偏差及至近幾年方有些許改善。

## 二、外籍配偶

90 年代起自東南亞遷徙至臺灣的人口中，除了廣大的勞工群眾之外，尚有一群透過國際通婚移入或是歸化的外籍配偶，其中以女性占多數。過去研究指出，此類人口遷徙多半出於經濟考量；在全球資本流動與國際勞動分工的背景，邊陲國家處於經濟劣勢，人民為解決困境，選擇向半邊陲或核心國家移動（Hahamovitch, 2003; Stalker, 2001）。臺灣雖然未列已開發國家之林，卻具有相對的經濟優勢，吸引不少東南亞人民前來。然而，許多東南亞女性原以為藉由國際通婚得以翻轉其在原生國家的經濟困境，來臺之後卻發現並不盡然，迎娶她們的「臺灣郎」可能是社會底層的弱勢族群，使其處境更為窘迫。

93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提出〈現階段外籍與大陸配偶移入因應方案〉，指出外籍配偶的加入有助人口穩定成長、促進多元文化、增加消費以及國際交流，但同時也為臺灣帶來負面效應，諸如文化適應與教育問題、婚姻商品化的偏差價值觀、排擠國人就業市場，以及增加社會福利支出等。接著，內政部於97年12月頒布〈外籍配偶生活照顧輔導實施計畫〉<sup>5</sup>，指出計畫目的在於「提升其（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能力，使能順利適應我國生活環境，共創多元文化社會，與國人組成美滿家庭，避免因適應不良衍生之各種家庭與社會問題」。此計畫提撥經費予各縣市政府辦理語文研習班、推廣多元文化，以及生活適應宣導等活動。此外，內政部每年亦彙整各機關單位輔導外籍配偶之措施，作為施政報告供民眾參考。

雖然臺灣政府積極投入外籍配偶生活適應之輔導，然而各縣市政府並未成立專門處理與回應相關問題的窗口<sup>6</sup>；與外籍配偶密切接觸的單位不是衛生所即是警察局，暗示其衛生條件差或是具犯罪傾向（曾熾芬，2008）。更重要的是，臺灣政府在制訂相關方案時，似乎存在著一項命題——外籍配偶若適應不良即會造成社會問題，因此政府必須未雨綢繆，籌辦相關輔導措施。廖元豪（2008）表示，臺灣雖為移民社會，然在法律規範中卻處處流露對東南亞移民的歧視與排擠，包括不公平的入境條件、嚴苛的面談機制、歸化時得出示財力證明等，即使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仍未能與一般國民享有相同權利。由此亦可看出，相關政策乃立基於「規範」與「管理」外籍配偶「問題」的思維，希望其完全「融入」本地社會，成為「正港的臺灣人」，方能避免諸多問題的產生。在此種政策思維之下，外籍配偶的原生文化未能廣為宣傳，使得臺灣社會缺乏理解、認識，進而尊重與包容差異文化的空間。

夏曉鵬（2002）於研究中訪談駐雅加達臺北經貿代表處官員，分析其眼中的跨國婚姻現象，發現這些官員以「優越的自我」看待「低劣的他者」，印尼人被視為「難民」，想盡辦法來臺，迎娶新娘的臺灣男子則是社會底層的「失敗者」，因為在臺灣娶不到老婆才會「越洋尋妻」。此種跨國婚姻關係從一開始即被視為社會問題的來源。若以「外籍配偶」或「外籍新娘」等關鍵字搜尋國內新聞報導或期刊文章即可發現，多數篇章著眼於探究外籍配偶的教育、輔導、生子健康及

5 資料參考自內政部移民署網站。網址：<http://www.immigration.gov.tw/lp.asp?ctNode=31539&CUnit=17110&BaseDSD=7&mp=1>

6 內政部「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辦理情形彙整表」附錄所列之「外籍與大陸配偶法律諮詢服務窗口彙整表」中，處理窗口包括民政局、社會局、服務中心與家暴防治中心等。

社會適應問題；亦即，外籍配偶在臺灣是以「社會問題」的框架具現於大眾的認知之中。

舉例而言，林開忠、張雅婷（2003）從媒體再現的觀點分析「外籍新娘」如何被建構及看待，其研究發現臺灣社會普遍缺乏對於外籍配偶原生文化的認識；朱涵（2007）研究臺灣報紙如何再現「外籍新娘」，發現以負面形象的類目最多，強調其弱勢形象且為社會問題製造者；蔡臺鴻（2009）以新聞事件的報導探討在臺外籍配偶如何被污名化，發現新聞媒體呈現外籍女性的題材往往聚焦於社會問題、婚姻仲介、假結婚真賣淫等，無形中導致社會大眾對其產生負面觀感。此外，夏曉鶯（2002）則從資本國際化下「婚姻商品化」的角度切入，以官方、自我認同以及大眾媒體的建構等觀點闡述臺灣的「外籍新娘」現象，並主張識字班的訓練為外籍配偶培力的重要途徑。

如上所述，臺灣移民法規中同時鼓勵擁有資金的外籍人士申請中華民國國籍，希望藉此促進國內經濟發展並提升國人生活素質；對於來自東南亞的移居者卻透過各種政策擬定與官方論述，表達抱持憂心的態度。這些顧慮包括社會秩序、衛生安全、人口素質等面向，似乎暗示著來自東南亞國家的人口天生素質低落，或是具有犯罪傾向。除此之外，臺灣主流媒體習於以負面角度報導東南亞移工與移民，將其建構為「社會問題」的根源，企圖將其排除於國家之外，強化以漢人為中心的移民社會觀點。再者，多數研究中缺乏對於國際移工／民與其原生文化之間關係之關照，在命題上一味著重探討「他們如何融入我們」，卻未關心「我們如何認識他們」，以及「他們如何認識自己」的議題。

值得注意的是，當人們無法親身接觸或深入了解跨國移工／民時，媒體建構了特定的族群形象，即使有所偏頗，卻形塑了人們對於移居者的主要認知。再者，此類媒體所再現的形象往往成為刻板印象，或是呈現扭曲的族群特質，並在文化習慣、政治力量及市場邏輯的影響下，形構成如 Write (2002: 64) 所言，一種對於異族處境扭曲的圖像性理解（iconography of predicament）。相對地，對於各類少數族群而言，媒體資源的有無與其文化發展則是息息相關，而凝聚族群意識的最大力量往往亦來自於大眾媒體 (Alia & Bull, 2005; Chisman, 1998; Cottle, 2000; Garmer, 1998; Napoli, 2006)。因此，關於在臺移工／民的傳播權益及媒體近用情形，是臺灣社會面臨國內人口與族群變遷之時一項不可忽視的議題。

## 貳、人權、傳播權與文化公民權的辯證

### 一、國際移工／民的基本人權

聯合國於1948年提出〈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其中第22條指出：「每個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因此，無論是否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舉凡在臺灣生活與工作的人都應享有最基本的人權保障。1990年所通過的〈保護所有移工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其背後的精神則在於將國際移工視為有家庭的人，除了禁止所有剝削行為、提供保障措施之外，亦須將其家庭成員的權益納入考量。此外，國際勞工局所制訂的公約中亦明確揭櫫5項原則，即平等待遇、單一適用立法、國外權利與給付的保留、給付年資的維持以及國家平等互惠，其宗旨在於提供國際移工安全無虞的工作與生活環境(孫建忠，2008)。

除了保障工作安全與社會福利之外，移工／民即使身處異鄉，也應享有保留原生國宗教與文化的權利。關於此點，王俐容(2003)指出，全球化發展促成諸多新興團體出現，包括難民、移工、外籍配偶、非法移民等，全球政經結構的改變連帶也產生了新的宰制與壓迫關係。因此，政府應從多元文化的角度思考外籍勞工與配偶相關政策，使其獲得應有的「文化認同權」、「文化生活參與(接近)權」、「文化再現權」以及「文化發展權」，避免落入種族歧視之譏，成為壓迫人權的禍首。然而觀諸社會實然，即使臺灣近年來積極投入深化文化公民權意涵的建構，卻不免流於表層，例如著重提升公民藝術文化素質或是打造藝文環境等，未能深入人民日常生活，無法開拓外籍勞工與配偶的文化發言權<sup>7</sup>，其聲音仍舊被淹沒於眾聲喧嘩之中。

若以西方部分國家的經驗相對照，臺灣政府對於移住者之人權保障思維顯然未能與時俱進。廖元豪(2008)認為，臺灣目前關於移住者政策的立法精神屬於「規範管理」，而非「保障權利」；其內涵所彰顯的是「次等正義」，而非「普世人權」。此種保守的政策思維在其他國家中同樣存在，例如與臺灣同為屬人主義的德國，在廉價勞力輸入初期即展現強硬的民族理念，以法規迴避移工成為移民的可能性。然而，隨著聯合國與歐盟等國際組織致力於提升國際移住者基本權

7 根據王俐容(2006)整理的資料，臺灣的〈文化公民權宣言〉雖然主張保障各個弱勢團體的權利，但其指涉的「公民」概念究竟為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的「公民」，抑或是包含居留臺灣的外籍人士以及歸化中的移民，則未有具體明確的說明。

利，德國為避免破壞國際形象，亦開始逐步增進多項移工權利，諸如自由遷徙與工作權、家庭團聚權、永久居留權，或是參與工會、組織社團、參與地方選舉、設立私人企業等，移工甚至有機會得以歸化德國國籍（龔尤倩，2008）。

普遍而言，亞洲國家的移工制度一向較為嚴苛，未若歐洲部分福利國家試圖給予非公民的移民部分社會權利，使之受到應有的基本保障（藍佩嘉，2006）。長期以來，臺灣政府為了避免東南亞移工進一步成為移民，不僅限制工作居留時間，亦禁止其自由轉換雇主，更遑論被國際社會視為基本人權的家庭團聚權與公共事務參與權。對於流移四海的移工與移民而言，不僅失去原生國的法律保護，亦無法獲得遷移國的權利保障，處境堪稱艱難。

## 二、傳播權與媒體近用權

1948年聯合國所公佈的〈世界人權宣言〉中，提及「人人都有提出主張及發表意見的自由。包括使主張不受干涉，以及不受國界限制經由任何媒體尋求、接受及傳播消息與思想的自由」。馮建三（2002）闡釋該宣言內容的意涵及落實方式，認為「只要是人」，無論屬於何種國家或族群，皆應該擁有自由表達意見的傳播權。據此，傳播權為基本人權之一，國家除了不應有壓制新聞自由的力量，更應該發揮提倡人權、傳播權以及規範媒體秩序的功能。

在多元文化社會中，少數族群應具有認同、文化、語言、教育、媒體以及政治參與等權利，而外籍移工與外籍配偶的傳播權亦屬積極性的人權要項之一，即使不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仍不應損及此種權益。Barron (1967) 探究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認為人人均享有言論自由，但必須確保媒體近用權方得以施展。McQuail (1992) 則強調公民社會應該提供人民自由、平等近用各種資訊，並獲得暢通的發表管道。中華民國憲法第 11 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大法官會議第 364 條解釋文中更說明，為保障憲法賦予人民的言論自由，必須制訂法律給予人民平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同樣地，〈通訊傳播基本法〉中亦強調通訊傳播近用與普及服務的重要性。關於媒體近用權的保障與落實，洪貞玲（2006）研究指出，解嚴後的臺灣政府因未能有效管理與分配媒體資源，致使公民的近用權難以施展，而媒體近用權乃是傳播權的核心，因此政府應從媒體內容面與使用面強化公民的聲音。

在法源基礎方面，廖元豪（2008）批評中華民國憲法「內外有別」，在「人權—公民權—國民權」權利三分法的思維下，將擁有國籍者納入基本權利保障，

在其他法律未能適度補充的情況下，在臺灣的外國人往往未能獲得基本人權的保護。若傳播權為基本人權，代表每個人均具有自由接收與表達意見的權利；也就是說，包括在臺灣生活的移民與移工在內，皆應擁有自由的傳播權與合理的媒體近用權。更重要的是，若欲建立一個多元文化國家，必須維持移工與移民的文化殊異與認同基礎，不僅要賦予其以自己的話語自我表述的管道，也必須能與本地人民對話。

國外研究部分，Husband (1994, 2000) 檢視西方國家政經情勢的發展，發現少數族群的傳播權利多處於劣勢，主流媒體礙於商業目的亦難充分呈現各族群的文化內涵，使得少數族群有被邊緣化的可能。Riggins (1992) 則強調族群媒體的雙元特性，一方面可能加速少數族群向主流文化趨近，另一方面則得以保存特殊文化，減緩同化的危機。Riggins (1992) 進一步指出，主流商業媒體呈現少數族群的方式傾向負面與偏見，所反映的為少數菁英的利益，忽略廣大多元族群的需求；若能成立族群媒體，則得以從語言傳承、議題設定、公開傳佈、廣告宣傳等方式保存少數族群文化，並且向外界傳播，達到相互溝通的目標。

此外，Murdock (1992) 提出檢驗媒體生態是否含納公民權的三項原則：一是近用資訊的權利；二是詮釋與辯論的自由空間；三是公民得以在媒體再現中認同進而表現自己。若要達到這些目標，媒體必須擁有多元開放的特質。若以此觀察國內媒體生態，臺灣的傳播政策過去長期忽視多元開放精神的重要性。洪貞玲、劉昌德（2006）檢視臺灣傳播政策，發現其中缺乏傳播權精神與價值的規劃，因而主張政府應由消極規範轉為積極介入，透過有形與無形的資源配置，給予公民近用媒體的權利，包括在法規中保障少數族群的媒體近用權。

### 三、多元文化主義與文化公民權

近年來學界在論及少數族群的傳播權益時，多由「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為出發，主要乃針對過去自由主義者所倡議之「多元主義」（pluralism）進行修正。後者以共同的、多數的利益為優先，希望將殊異的文化融合，以追求具共同性的價值；如此雖有助於社會團結並強化集體認同，卻忽略了為主流意見排除在外的邊緣團體與少數族群權益，例如過去美國所謂的「文化大熔爐」主張，最後卻形成單一的「美國文化」。

Kymlicka (1995) 即認為，自由主義國家強調中立原則與普遍主義，讓文化自由發展的結果，往往是優勢文化取得特權，而少數族群則被邊緣化為劣勢文化。

多元文化主義則不同，在承認社會乃由不同但卻相關的文化傳統組成的前提下，其核心精神為「差異」與「認同」，而非「同化」或「社會整合」(Fraser, 1998; Georgiou, 2007; Hartley, 1997)，主張人與人之間必須相互承認、尊重與包容彼此的文化差異，因而較具備多元性的思維。在多元文化主義的思維中，社會是由不同單位拼貼組合而成的「文化馬賽克」(cultural mosaic)或是「沙拉碗」(salad bowl)，而非隱含主客位階之別的「文化融爐」(cultural melting pot)；換言之，多元文化社會是透過各種不同文化與族群彼此間持續互動，共同形構而成的一處實踐場域。

在多元文化社會中，不同社群存在於國家與個人之間，若政府忽略團體對個人認同的重要性或是團體之間的差異，則將產生「壓抑、宰制、或邊緣化的後果」(張錦華，1998：40)，因此必須給予弱勢族群參與公領域的機會，尤其是媒體參與。葉乃靜(2004)檢視國內原住民與新住民的資訊使用狀況，發現弱勢族群同樣存在對於知識與資訊的渴求，當社會人口結構出現變化時，政府不僅應正視各族群的權益，更需「主動」回應其實際需求，如此方符合多元文化主義平等關懷的精神。此外，Valaskakis (1992) 在一篇檢視加拿大傳播政策的文章中提及，文化隨著不同環境與價值而改變，同時與社會實踐及生活經驗息息相關，而維持文化的基本方式就是傳播。該篇文章中舉例說明，年輕一輩的伊努特人(Inuit)對自身文化背景了解不深，主因即在於缺乏溝通與傳播的管道。

如上所述，每個族群的文化皆有其獨特性，同時也應具有被理解的權利，而唯有透過自由的傳播管道，族群之間才得以有效溝通。Kymlicka (2001: 276-277) 主張「少數族群的權利」，認為任何族群均應避免陷入「非歸化即邊緣化」的極端處境，進而得以保持自身獨特的文化屬性；這些權利包括「對媒體中的刻板種族形象實行政府管制」以及「以成年移民的母語提供(公共)服務」。換言之，若欲維護少數族群的權益，一套強調承認差異、尊重與包容精神的多元文化傳播政策是政府亟須積極規劃的方向。

多元文化主義所指涉的對象，當然也涵括了隨著全球勞動分工與資本流動而日益增加的國際遷徙人口及文化社群。Castles & Miller (2003) 回顧人口遷徙的歷史，發現近年來國際遷徙的發展呈現出幾種普遍的趨勢，包括(一)全球化：越來越多國家的人口組成受到遷移的影響，而遷徙人口的來源國也含納更廣泛的區域；(二)加速化：國際遷移的人口持續大規模的成長；(三)分裂化：國際遷徙人口的類型日形多元，包括勞工、難民、永久定居等；(四)女性化：女性在國際人口遷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勞工遷徙部分；(五)政治化：

國際人口遷徙對於各國國內政治、國際安全及雙邊關係都造成巨大衝擊。在此種趨勢之下，全球人口的國際遷徙已然成為常態，世界各國都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影響，若非人口輸出國，即是人口輸入國，或是兩者兼具，而此種發展態勢也進一步地挑戰了當代社會發展中以國族與血緣為基礎的族群關係思維。

也因此，在全球化發展下，不能單純以國族觀念看待各類新興團體，而必須從地球村及跨國界的角度制訂符合多元文化主義精神的政策。即使外籍移民與臺灣公民的法定權利義務必然有所差距，然而在文化政策上仍需嘗試賦予此類新興族群「文化公民權」(cultural citizenship)。在此，文化公民權所強調的不再是國籍、種族、同化與容忍，而是以開放性的精神，從肯認與尊重為出發，視公民權為文化培力的一種形式。關於此點，王俐容(2006)的研究發現，臺灣外籍勞工在文化生活參與權、文化再現權以及文化發展權方面嚴重受到壓抑。至於多元文化主義的意涵及其與公民權之間的關係，黃葳威(2006)提出「入境隨俗」與「賓至如歸」的觀點，認為在邁向多元文化主義的理想時，必須在社會各成員間取得平衡的權利關係，如此才符合公平正義。因此，國人如何看待國際移工與移民，賦予其何種位置，以及伴隨而來的權利義務等問題，均為評估臺灣在邁向多元文化國家之時，是否確實落實文化公民權的重要思考面向。

## 參、在臺移工／民的傳播需求與媒體近用

如前所述，近二十年來臺灣人口結構持續地變化，除了過去為各界所關注的少數族群如原住民之外，增加了另一支新興的外籍族群。蕭新煌(2005)曾為文說明臺灣乃是一個移民社會，包括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族群，以及外配與外勞，若要建立一個多元文化社會，則必須承認、接納及尊重各族群的存在。易言之，為了讓各族群的文化得以保留與傳佈，政府必須正視其社會權益的保障，其中也應包含移民與移工的傳播權及媒體近用權。

媒體在族群認同上扮演重要角色，不僅有助於保存獨特的語言與風俗習慣，同時也具有凝聚認同感之功用(成露茜, 2008; Bailey, Georgiou, & Harindranath, 2007; Cottle, 2000; Riggins, 1992)。臺灣在1993年之前並未有專為少數族群設立的電視頻道或是廣播電臺，即使有些許以少數族群母語製播的節目，也僅屬零星、點綴與象徵性質。若以此觀察目前臺灣新移民與移工所面臨的傳播需求與媒體近用處境，實則與過去的原住民有幾分相似，主要仰賴公部門提撥經費製播零星節目，內容則多半以政令宣導、語言學習或是認識臺灣文化等方式呈現，難以顧及在臺移工與移民的真正需求。

近年來國內開始出現若干關於移工／民媒體使用的研究，然多屬初探性質。在新移民部分，王俐容、王維菁、朱淑娟（2008）分析專為外籍配偶製作的電視節目《臺灣媳婦》，發現節目內容除了強化女性傳統角色之外，亦刻意突顯臺灣本土意識，期望外籍配偶能盡快適應本地文化習俗、拋棄原生國文化。再者，該節目雖也觸及東南亞國家風俗民情，然而主要偏重於節慶表演等表層文化，並且以「我族中心」的觀點，將外籍配偶的原生家鄉描繪為貧窮落後的國家。此種對於外籍配偶原生文化的再現方式，就如同早期國內媒體對於原住民族的報導一般，流於「山茶花式」的敘事類型<sup>8</sup>，無法深刻反映各國多元豐富的文化意涵，使得文化交流形成強烈的權力不對等，期待外籍配偶與原生國社會切斷連結，成為「真正的」臺灣人。

其次，柳紹鈞（2004）研究越南籍配偶在臺媒體使用行為與文化適應，發現新移民女性最常使用的媒體為電視，其中又以收看感情劇為主，然因語言不通，往往只能「看圖說故事」；也因此，受訪者期盼能夠看到或聽到原生國家的節目，以抒解鄉愁、教育下一代，同時破除媒體所建構的刻板印象。另外，李佳玲（2006）觀察國內服務外籍配偶的廣播節目，發現該類節目普遍製播經費不足，時段不夠或是冷門，若使用原鄉語言恐影響新移民融入本地社會，但以中文播出則又無法達到抒解鄉愁與反映原生文化之目的，加上欠缺專業人才、宣傳不夠，使得在臺外籍配偶陷入媒體使用需求難以被重視的困境。

在移工部分，邱琬雯（1998）觀察早期國內服務東南亞外籍勞工的廣播節目，發現製播經費主要來自各廣播電臺、勞委會及仲介公司，由於視移工為補充性人力，節目方針著重於協助其認識臺灣社會。不過，隨著外勞政策的逐步鬆綁，如今移工停留臺灣的時間逐漸加長，媒體使用的需求亦相對增加，此時「越境者媒體」（transnational migrants' media）<sup>9</sup>就必須負責扮演服務短期居留者的角色（邱琬雯，2003）。此外，劉子亮（2009）分析何以臺灣製播予東南亞移工收聽的廣播節目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從中歸納出兩個思考面向。其一是臺灣社會以自我為中心，對移工採「同化」的立場，忽視其對原生語言媒體的需求，而節目多半被安排在冷門的深夜或早晨時段，阻礙收聽習慣的養成，加上宣傳不彰，許多移

8 參照尤希·達衰（1992）〈重視少數民族的傳播權益——應合理分配傳播資源〉一文中的用語。

9 根據邱琬雯（2003:75-76）的研究，「越境者媒體」為日本學者町村敬志所提出的概念。「越境者」指的是各式各樣超越國境邊界的移動者，至少包含三種人，即長期定居的移民、以族群性為訴求的少數者，以及短期居留頻繁移動的寄留者；而越境者媒體則因應此類族群而具備各種不同的特性與功能。

工並不知悉此類節目的存在；其二則是雇主軍事化的管理、移工經濟能力與科技素養限制，再加上受到其他傳播管道排擠，使其在近用上存在諸多困難。

上述國內關於在臺移工／民媒體使用相關研究突顯了一項重要課題，即臺灣社會在製播移工／民所收聽或收看的節目之時，往往著眼於前述「社會問題」的思維，製播節目成了「預防」或是「解決」此類問題的合理手段。因此內容多半以宣導與彰顯本地文化為主，希望藉由媒體使用達成教育文化與社會適應之目的，卻忽略了外籍族群休閒娛樂、抒發鄉愁，以及表達意見等傳播需求。此種思維與一般商業媒體並無太大差別，Cottle (2000) 即認為，主流媒體往往刻意忽略少數族群的存在，或是以社會問題製造者的角度加以呈現。此外，陳清河（2004：109）在提及國內原住民傳播需求時亦曾表示，「在未了解臺灣原住民的需求與狀況之前，僅以漢人的角度來思考臺灣原住民的需求，其實是有很大的落差」。目前看來，臺灣社會在規劃、製播移工／民使用的媒體內容時，似乎陷入了相同的窠臼。

除了傳播的功能之外，「培力」（empowerment）更是族群媒體的目標之一，對特定族群而言，媒體參與所賦予的培力功能不僅使其有能力決定自身事務，亦能翻轉不利的處境。近年來一些關於移住文化社群的媒體研究更指出，跨國移工利用移住者媒體（migrant/immigrant media）內容的生產、流通、消費，或是藉由對定居國媒體內容的重新解讀，來維持其文化的主體性（Athique, 2005; d'Haenes, 2003; Mitra, 2005），從而在移入國特殊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創造出「離散公共領域」（diasporic public sphere）（Appadurai, 1996），並且開創兼具在地性、跨國性以及異質性的媒體參與及社會實踐。

過去臺灣社會在探討原住民與客家族群文化議題時，不少學者認為，若欲去除弱勢族群長期被貼上的標籤與刻板印象以保存其獨特文化，必須仰賴公共媒體的支持。臺灣原住民人數約為五十萬人<sup>10</sup>，客家族群人數約有四百萬，相對於外省及閩南族群而言，人數較少且居於文化上的弱勢。為了替弱勢族群發聲，學界提出「多元文化主義」及「媒體近用權」等觀點，藉以闡明少數族群擁有專屬媒體的重要性。在各界的努力之下，客家電視臺於2003年7月1日開播，成為全球唯一全頻道客語發音的電視臺，而原住民電視臺亦於2005年7月1日開播，更是全亞洲首創之舉。

10 截至2010年為止，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合計512,701人。資料來源：行政院內政部網站內政統計年報。網址：<http://sowf.moi.gov.tw/stat/year/list.htm>

成立客家與原住民電視臺的主要考量，無非是冀望透過族群專屬頻道製播母語節目、保存語言文化，向社會大眾傳播族群文化的深度內涵，導正既存的刻板印象，讓各族群學習尊重、包容彼此的差異，同時提供表述意見與對外發聲之管道。然而，若觀察國內另一支新興族群，包括新移民與移工，其得以近用的媒體管道與內容則是寥寥可數。外籍勞工與配偶人數與原住民相差不多，環顧臺灣媒體生態，主流商業媒體充斥，僅有少數以此類族群為服務對象的廣播節目，例如由勞委會提供經費委外製播予外籍勞工收聽的節目<sup>11</sup>，或是針對外籍配偶製作的節目，例如《飄洋過海找幸福》、《南國姊妹情》等。檢視該類節目可知，目前臺灣提供外籍族群收聽的節目數量稀少且異動頻繁。以2010年為例，全臺近兩百家合法廣播電臺當中，相關節目不到二十個。若將2006年新聞局所彙整的資料與近期調查（如附錄）加以對照，更可發現不少節目已停播，或是移至更為冷門的時段。

相較於澳洲的媒體政策，該國政府為了保障境內廣泛移住族群的媒體近用權，開設了公共電視廣播網絡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SBS)**，其宗旨即在提供「多語言、多文化」的節目以服務各類移民，除了作為外來移民與澳洲本地社會溝通的管道之外，同時也藉由母國語言的保存及延續，與其原生的文化社群進行連結。臺灣目前僅有少數廣播節目由公部門挹注經費製播，不僅播出時間短、時段冷門，頻道亦不固定，難以形成收聽習慣，在臺外籍配偶與移工仍倚靠人際傳播作為主要的資訊交流方式。

平面媒體部分，主要是由各原生國進口的報章雜誌，以及接待國政府與民間團體印製的刊物。初步觀察發現，在臺灣得以取得的進口刊物包括來自菲律賓的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Manila Bulletin*；來自印尼的 *NOVA*、*Indo Sound*、*Intai*；各國所製作的移工月刊，如 *The Migrant*、*Taiwan Index Magazine*、*RADRA TAIWAN* 等。上述刊物多半仰賴在臺東南亞外配或移民獨立籌辦，在政府未能挹注經費的情況下，在移工與移民社群內扮演傳遞家鄉訊息的重要角色。此外，臺灣政府陸續出版《外籍勞工在華工作須知》、《外勞文化地圖》、《外勞詩文選集》、《凝視異鄉》以及《外籍配偶在臺生活相關資訊手冊》等刊物，提供移工與新住民相關工作、生活與法律須知，或是透過詩文創作分享思鄉之情。《臺灣立報》則以募款與廣告方式固定發行《四方報》，以泰語、越南語、印尼語、菲

11 相關節目資料參考勞委會網站：<http://www.evta.gov.tw/files/89/broadcast.pdf>

律賓語及柬埔寨語等5種東南亞語言印行，提供移工／民一處資訊交流、情感抒發，並且得以與本地社會對話的空間。

## 肆、以傳播權與媒體近用權為思考的多元文化傳播政策

### 一、國外多元文化傳播政策與經驗的參照

全球化發展之下，人口的跨域遷徙早已展開。其中，許多國家的人口組成與臺灣相似，包含來自不同時期的族群移民，例如新加坡、澳洲、加拿大等，而同屬東亞國家的南韓、日本等國也存在國際移工與通婚移民的輸入。這些國家在傳播權與媒體近用政策上與臺灣存有何種差異？其中又有何值得借鏡之處？此部分值得探究參考。

舉例而言，新加坡與臺灣同為臨海國家，在人口結構上為由不同時期來自中國大陸及其他地區族群組成的移民社會。新加坡人口以華人為大宗，其他尚有馬來人、印度人以及西方人等，屬於「多元民族新興國家」(Wong, 2001)。然而，與臺灣不同之處在於其立國精神為「文化的民主」(cultural democracy)，在以多元文化主義為依歸的共識下，主張各種族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並且得以發展各族群既有的語言、文化、宗教、習俗，崇奉本身的歷史、傳承與價值(洪謙德，1996)。再者，各個族群在文化發展上一律平等，官方語言為英語、華語、巫語及淡米爾語，並且要求大眾媒體必須同時使用4種語言，不得有所偏好，藉此保存各移民族群的獨特文化內涵，據此確立新加坡為一具有「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多元語言」的國家<sup>12</sup>。

行政院《新加坡語言政策與少數族群媒體近用權考察報告》中指出，新加坡政府並未針對「族群平等」的概念明文立法規範，然其精神卻在各項措施中處處可見。例如新加坡的報紙、有線電視及廣播電臺均提供以各類族群語言所製播、發行的節目內容或頻道，為了顧及少數族群的使用需求以及政府的社會責任，即使在虧損的情況下仍舊持續提供服務。再者，該報告內容呈現新加坡媒體展現的文化多元性，亦對臺灣的傳播政策提出多項建議，例如：制訂語言政策、語言平等法、強化公共電視的功能、培育多元族群媒體的專業人才等。

其次，澳洲的傳播政策亦富含多元文化精神的思維。根據行政院客委會至澳洲進行的考察報告，澳洲於1991年通過SBS法案(The Special Broadcasting

<sup>12</sup> 國家認同先於族群認同，因此新加坡人以「新加坡」這個國家作為認同標的，稱自己為新加坡馬來人、新加坡華人，或是新加坡印度人。

Service Act），規範 SBS 必須提供多語言與多元文化的廣電服務<sup>13</sup>。澳洲多元文化廣播電臺播放 68 種非英語節目，提供境內 270 萬非英語系的人口收聽；政府則依據該國人口組成的變化，配合各移民族群遷入的時間長短及英語程度等因素，適度調整各地區的節目內容，此種媒體政策使得澳洲持續朝向接納多元文化社會的方向發展。王菲菲（2005）的研究則指出，澳洲 SBS 設立的目標，不僅在於提供不同文化社群的澳洲人一項多元及多語言的傳播服務，其內在精神更是明確標舉著澳洲本身就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

另外，加拿大作為一個多元移民族群所組成的國家，早於 1971 年即宣佈實施多元文化主義，在此精神下的加拿大廣播電視暨電訊委員會（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CRTC）設定兩個主要目標：其一，作為一面鏡子，讓所有加拿大人民均得以看見自己；其二，讓來自不同文化與觀點的人參與電視廣播體系，藉此反映出各族群真正的聲音（吳克能，2005）。因此，加拿大成立公營媒體、原住民公共廣播電視網等，並且輔助民營媒體製播服務移民的多元文化節目。不過，縱使如此，主流媒體仍然以英語與法語節目居多，尚未能完整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社會的樣貌，再加上公共媒體資金不足、對民營商業媒體亦無強制規範的能力，因此在族群文化與語言需求的保障方面尚有加強空間。

Valaskakis (1992: 72-74) 在檢討加拿大的傳播政策時指出，1983 年該國政府提出「北方原住民傳播近用計畫」（Northern Native Broadcast Access Program, NNBAP），資助本地報紙、廣播以及國家原住民傳播社群（National Aboriginal Communications Society），扮演定義與傳播原住民文化的重要角色。然而，這些以原住民語言播出的節目反而將內容侷限於傳統文化的描繪，使得一般民眾難以親近，易使弱勢族群陷入再度被邊緣化的處境。因此 Valaskakis（同上引）主張，多元文化主義的媒體政策應著重於傳播不同族群之「觀點」，而非只是「語言」與「傳統」。

13 報告內容亦說明澳洲〈公廣憲章〉中載明 SBS 必須滿足下列事項：1. 滿足澳大利亞作為多元文化社會的傳播需求，服務對象包括族群及原住民社區；2. 多元文化對於澳大利亞社會持續發展的貢獻，需增加公眾對此之認識；3. 澳大利亞文化、語言、族群多樣性，促進澳人對此之理解與接受；4. 致力於語言與其它文化技術的保存與持續發展；5. 在可行的範圍內，以澳大利亞人偏好使用的語言，來進行告知、教育、娛樂；6. 利用澳大利亞多元多樣的創意資源；7. 對澳大利亞廣電環境的多樣性服務有所貢獻，應將澳大利亞廣播公司 ABC 與社區廣播部門的表現列入參照考慮；8. 經由對眾多觀點的展現，以及創新的表達方式，來擴展澳大利亞廣電服務之範圍，並反應出澳大利亞社會的變動本質。

上述幾個國家的傳播政策均強調多元文化主義的精神，並且透過公共規範與政府力量設立專屬頻道製播多元文化節目，但主要是針對「移民公民」，亦即排除了非公民的移住者（例如尚未取得歸化身分的移民與移工）。然而，隨著全球遷徙時代的到來，若從社會變遷與轉型的角度來看，多元文化精神所指涉的層面也愈加廣泛。對於移工與非公民的新住民而言，作為當代許多國家一股新興的文化資源，移住者媒體扮演了其在移入國社會中協商並重構文化認同的重要角色。近年來不少研究亦指出，媒體資源的可得性對於維持、活化各形各色移住社群的內部認同與外部溝通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 (Athique, 2005; Husband, 2005; Mitra, 2005)。

至於南韓，其情況與日本類似，向來被視為是具有強烈民族認同與血緣情感的國家，因此移民政策較諸其他國家顯得嚴苛，不歡迎移工長時期於國內工作，更遑論規劃專屬媒體節目與頻道，近年來卻出現了由 NGO 團體與公共資源共同挹注成立的「移工電視臺」（Migrant Worker Television, MWTV；該電視臺已於 2011 年更名為 Migrant World Television）。該電視臺由南韓境內跨國移工自製節目，透過公共近用頻道 RTV 以及網路媒體播送，目前共播放 9 種語言，內容包括新聞週報、家鄉新聞、重要議題以及值得關注的韓國新聞，提供在南韓工作的各國移工收看。

該電視臺之成立乃源於部分東南亞籍移工因工作苦悶組成樂團，為了讓樂團的歌曲得以傳送，加上不滿南韓主流媒體長期對其負面的報導方式，因而自主性地集結合作，在社運團體、移工社群、南韓志工的協力下，輔以 RTV 頻道硬體與技術上的支援，持續自製自播各類攸關移工社群權益的節目內容。在南韓嚴格的移工輸入政策以及保守的移民制度下，該國境內的國際移工們藉由此種具草根與跨國雙元性的「移住者媒體」培力，突破結構性的限制，透過彼此之間的串連與合作，形構出屬於移住者的多元文化社群，並且找到對外發聲的管道。

除此之外，歐洲也存在若干持續關照移民與難民傳播權益的社會團體，例如英國的 Migrants Resource Centre (MRC) 與 Migrants' Right Network (MRN)、愛爾蘭的 Forum on Mig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FOMACS)、匈牙利的 Hungarian Association for Migrants (Menedek) 以及西班牙的 Cepaim 等。上述組織彼此串連，為增進各國境內以及廣泛的歐洲移住者權益而努力，希冀培育專業新聞傳播人員，翻轉移住者長期背負的負面與刻板印象，並且強化移住者的媒體參與，教育其媒體製播的能力。這些來自民間的力量與對待外來族群文化的態度，亦值得臺灣社會參考。

## 二、傳送端、內容端、接收端「三位一體」的規劃方向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廣電媒體多元文化指標研究》報告中提及，傳播媒體為公共領域再現之平臺，應該理解並尊重各族群文化皆有自由、多元與平等的對話機會。該研究計畫訪談民間團體、媒體工作者及學者之意見，規劃衡量多元文化的指標，作為媒體自律與接受評鑑之標準。該報告中提出幾項多元文化指標，包括「承認」<sup>14</sup>、「平等」<sup>15</sup>與「欣賞」<sup>16</sup>等，未來可作為 NCC 審核換照的參考，並且列入評估媒體表現的項目，藉此規範商業媒體在人事安排與節目內容上皆須符合多元文化精神。然而，此類指標的落實主要訴諸媒體自律，若未能進一步納入政策規範中，則容易淪為虛設；再者，節目內容是否符合多元文化標準恐涉及主觀意識，該由哪些人組成考核團隊才符合公平原則、如何多方廣納臺灣社會各公民團體的意見等均是值得深思的議題。

另外，NCC 目前亦正草擬促進傳播媒體多元文化相關政策，其中主要精神包括：（一）引領傳播媒體尊重文化差異，提供多元報導及資訊服務，符合社會的多元文化需求；（二）要求傳播媒體訂定並遵守涵納多元文化觀點的自律公約；（三）要求傳播媒體對不同族群、風俗、習慣、性別、宗教、地理或語言使用者應公平呈現，不得有貶抑或不當的情形；（四）協調促進具有多元文化精神的頻道內容享有合理發展的機會；（五）分配傳播資源須兼顧多元文化發展；（六）推動傳播媒體培育多元文化人才，鼓勵各種語言使用，提升媒體多元文化知能；以及（七）監督傳播媒體多元表現，維護多元社群權益<sup>17</sup>。

由以上傳播政策的想像、規劃及其立法精神可以看出，臺灣政府對於新移民或移工的加入，尚未提出具體完整的媒體因應方案。多元文化主義在其中尚屬一抽象概念，該如何具體實踐？多元文化指涉哪些對象？如何積極落實多元文化的發展？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需要更深入的探究與相關指標的研擬，才能真正落

14 「承認」所代表的意義為：接受多元文化，瞭解社會中存在著各類型的群體；檢討媒體的所有權、經營權與工作權是否符合多元近用原則；檢視媒體內容是否觸及多樣性語言與文化，並照顧到各群體的相關議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07：9）。

15 「平等」的意義為：反對偏見與歧視，強調各群體間地位的平等，主張所有文化或價值體系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強調資源的公平分配、合理的升遷機會、以及組織內外申訴或溝通機制之順暢操作；避免以刻板印象再現少數族群或弱勢團體，透過正面形象的呈現或平衡報導的機制，矯正可能的偏差（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07：9）。

16 「欣賞」的意義為：透過不同群體的文化呈現，促進相互學習、瞭解與欣賞；強調文化多樣性的價值與群體間差異的必然性，相互尊重與肯定；提供鼓勵性措施與多元文化的學習機會，廣泛製作與多元文化議題相關之節目與新聞，創造媒體的正面價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07：9）。

17 資料參考自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多元文化主題網站：[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2718&sn\\_f=21655](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2718&sn_f=21655)

airiti

實並保障各族群平等暢通的傳播管道。因此，未來對於傳播政策中多元文化意涵的闡釋，應該更充分反映近年來臺灣社會及族群的變遷，以各族群的實際需求與權益為基礎，提供族群之間平等雙向的傳播平臺，如此方能同時達到保存語言文化、保障各族群傳播權益，以及促進文化間溝通與理解之目標，以避免陷入「各說各話」或是「一言堂」式的極端。

隨著臺灣人口組成的變化，以服務不同族群為目標的公共媒體，是否應該提出因應的對策與規劃，賦予各族群及不同語言人口平等的媒體近用機會？政府為媒體資源的管理者，是否看見臺灣屬於多元文化社會的事實？在保障移民與移工傳播權方面，政府又應扮演何種角色？關於此點，蕭新煌（2005）認為族群媒體的目標不應停留在為特定族群設立專屬媒體頻道的層次，而是必須創造一個新的、全民可共享的族群多元之主流文化，因此族群媒體的發展必須達到5個目的，包括提升族群文化、加強族群榮譽感；傳遞多樣族群文化；建立多元的主流文化；發揮倡議功能，為各族群爭取應有權益；以及建立族群多元、國家認同一體的共識。此種開放的多元文化觀點或可作為臺灣規劃族群媒體的檢討方向。

此外，Napoli（2001）提出傳播的多元性可從幾個面向加以檢視，包括「來源多元」（source diversity）、「內容多元」（content diversity）及「近用／暴露多元」（access/exposure diversity）。其中，內容多元包含節目類型與意見的多元，此也意味著媒體內容在少數族群的呈現上是否反映現實，以及是否具有社會、政治與文化觀點的多元性。其次，近用／暴露多元指涉接收行為的多樣性，亦即閱聽眾是否擁有多元的媒體近用管道，以及接觸媒體的行為與程度。透過以上各類指標的交互檢驗，也得以提供觀察少數族群媒體近用之情況，以及其於媒體中出現的頻率與形象等議題，了解是否確實達到多元性的媒體表現目標。

綜合以上所述，本文主張臺灣新興族群的傳播權益不能僅以單一角度思考，而是必須兼顧人權理念與社會發展的精神，從傳送端、內容端及接收端「三位一體」的面向進行長期性的檢驗與擘劃，方能發揮實質的效果。以下分別就上述3個面向探討，提出相關政策措施在規劃上的幾點建議：

在傳送端的部分，由於國內媒體資源長期為集團所有，媒體近用的門檻過高，使得弱勢族群的傳播權益遭受忽視或流於地下化，目前僅仰賴政府單位提撥經費製播節目的方式，在時間、時段與內容上均不利於移工或新移民收聽。有鑑於此，建議通傳會未來在廣播頻譜的重整與分配上，至少規劃1至2個頻道固定作為移工／民公益傳播之用，並且依據來臺移工與移民的人口比例，製播多國語

言的節目。如此不僅得以增加節目的多元性與可接近性，亦能固定頻率，方便目標閱聽眾建立長期收聽的習慣。

其次則應加強無線電視臺教育文化之功能，規劃多元語言與文化節目內容，提供移工與新移民收看。近年來無線電視數位化過程中，頻道數量雖然大幅增加，卻未見節目品質與多元性的有效提升，特別是資訊型節目與商品置入泛濫，內容乏善可陳且重播率過高，未能充分利用無線頻譜公共財，製播切合公共利益與需求的節目。未來若能規劃部分時段提供多元族群節目內容，不僅得以善用國家傳播資源，亦能照顧弱勢團體之需求。平面媒體部分，可以考慮採取公辦民營的方式，籌畫較小規模的社區報紙，將《四方報》的辦報理念擴及至更廣泛的移民與移工團體上。此外，政府亦可進一步透過獎勵與補助的方式，具體鼓勵服務新移民與移工的出版業務。

在內容產製方面，以國內目前的情況觀察，由公部門提撥經費委外製播廣播節目，其中一項亟待解決的問題，在於缺乏通曉東南亞國家語言的傳播專業人員，同時內容多以臺灣觀點為主，偏向政令宣導與生活須知等制式訊息，因此，培養專業且具語言能力的傳播從業者為現階段重要的課題。關於此點，除了積極延攬臺灣本地製播人才之外，亦需徵募並訓練精通中文的新移民，將其納入媒體內容的製播行列；如此一方面有助於更為深入地觸及移住社群文化的內涵，另一方面亦可提高目標閱聽眾的收聽動機。

再者，臺灣主管機關可與移工／民原生國家合作，透過其在臺辦事處取得該國最新資訊，包括各類新聞與家鄉動態，或是向當地國媒體購買節目，諸如戲劇、音樂，或是新聞聯播等。必須注意的是，為避免頻道與節目流於異國風情的介紹或是成為官方單位的傳聲筒，在內容呈現上不應刻意強調移工／民的奇觀性或是社會邊緣位置，如此方能製播出真正符合在臺外籍族群需求的節目內容。換言之，多元、平等並且尊重差異的節目內容及觀點之可得性，乃是提升在臺移工／民傳播權益的一項重要前提。

在接收端的部分，過去國內許多研究均發現，即使政府固定提撥經費製播廣播節目，收聽率卻不如預期，其中一項重要因素在於僱主或本地家庭對移工與新住民的多方管控。關於此點，臺灣社會應從公民教育中逐步改變大眾對於移住族群的認知，將其視為本地社會的「生活者」，而非「問題製造者」，正視保障其資訊、溝通、娛樂，以及與原生文化連繫的傳播權益。同時，未來國內研究可以進一步針對在臺移住族群的實際傳播需求及現況進行「接收端」的探究，以其為

主體，關照在殊異的文字、語言及風俗習慣下，國際移工與移民在臺灣生活所面臨的文化差異及相對應的傳播需求。

此外，政府應採取鼓勵措施，協助僱主與新住民家庭開發較為友善的媒體近用環境。具體措施方面，包括鼓勵僱主與新住民家庭提供近用各類媒體之基本接收設備，或是訂閱報導原生國資訊的報章雜誌；積極輔導新住民家庭，助其了解跨國遷徙族群對於原生文化資訊的需求以及母語節目的重要性；提供在臺移工與新住民得以表述意見之各類刊物、廣電節目或是其他資訊近用管道，從中建構具有回饋性質的傳播平臺，協助移住社群內部及外部進行溝通連結，進而促成不同文化間的實質交流。

## 伍、結語與研究限制

臺灣近年來的人口組成因外來移民與移工的加入產生變化，除了原有的四大族群之外，增加一支主要從東南亞國家移入的族群，可謂「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國家。2004年，前總統陳水扁於就職典禮上強調確立「文化公民權」的重要性；同年民主進步黨於全國黨代表大會中通過〈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其中第8點提到各個族群都是臺灣的主人，各個族群的語言也都是臺灣的國語，第4點則強調應摒棄「同化融合」的政策，秉持「主張尊重差異、共存共榮的多元文化政策」，共創和諧的臺灣社會。2009年3月31日，立法院通過〈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兩項聯合民眾權國際公約，並由馬英九總統於同年5月14日公開簽署，強調透過此兩項公約的國內法化，積極宣示臺灣人權保障與國際接軌的發展方向。

在資本與技術快速移動的全球化社會中，人口的國際遷徙已成為常態，世界各地皆出現各式各樣的國際人口遷徙與居留現象。隨著全球遷徙時代的到來，如何積極研擬相關政策與法令規範，讓四海為家的移工以及來自海外的移民享有基本人權與社會權益保障，是每一個接待國政府的責任。然而，觀諸社會實然，在種族、國族與階級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之下，國際移工與移民遭逢來自主流社會的偏見，往往陷於弱勢與邊緣的困境，不僅在勞動過程中頻頻遭受不公平對待，也面臨來自接待國社會的歧視與污名。

臺灣自1992年正式開放外籍勞工以來，一直將其視為短暫性的補充人力，因此無論在政策法規的制訂，或是在僱主管理、勞動條件以及社會福利等配套措施上均未能以長期性的角度思考，甚或選擇視而不見。2007、2009與2011年12

月，國際移工在臺灣連年舉行「我要休假」、「還沒休假」及「血拼休假」大遊行，突顯出其「休假」訴求喊了多年，卻未見接待國政府態度有何改變，更遑論修正相關法令規範。另一方面，長期定居於臺灣的新移民人數日漸增加，政府除了積極加強教育輔導、推廣識字教學，協助其適應本地社會之外，亦未能針對其在地的需求研擬適當措施，顯見臺灣尚未為迎接「多元文化社會」做足準備。

臺灣在邁向民主化社會的過程中，隨著媒體的解禁與開放，在市場高度競爭的情況下，形成媒體集團化與產權集中化的趨勢，資源未能公平分配，少數族群的傳播權益也因此常遭到漠視。傳播權的落實不能僅仰賴商業媒體社會責任論的自由心證，更需要透過政府公權力的介入，在資源上進行合理的分配。過去十年來，在學界的大聲疾呼以及民間團體的努力之下，臺灣成立了客家族群與原住民族專屬的電視頻道，雖然自開播以來仍有不少問題待檢討，然而至少在保存族群語言與文化方面有其成績。如今臺灣社會人口持續變遷，為數不少的國際移工與移民在臺短期工作、長期定居，堪稱國內第五大族群，卻未見政府積極研擬相關方案，保障其應享有的基本人權。檢視國內廣電法規，包括〈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以及〈有線廣播電視法〉等，亦鮮少針對「多元文化」或是「多元族群」做出進一步的闡述，顯見臺灣政府對於此類議題仍停留在消極的精神宣示，未有積極具體的政策作為。

本文以臺灣在地經驗為焦點，從過去關於臺灣移工與新住民勞動條件、媒體再現及媒體近用諸多面向的回顧討論，初探在臺東南亞移工／民的傳播權。在論述上藉由層次性（人權—傳播權—文化公民權）的推導及辯證，從對於國際移工／民「基本人權」的保障出發，連結至具積極性人權指涉的「傳播權」與「媒體近用權」（其中，媒體近用權乃傳播權的重要核心，唯有合理媒體近用管道的擁有，方能保障各族群自由表達意見的傳播權），並且延伸探討現今多族群、多文化社會變遷過程中，所謂「多元文化主義」的具體內涵，以及「文化公民權」在當代全球人口跨國遷徙趨勢下，作為重新定位族群與文化關係的重要性。

誠然，不同理論背後關於「傳播權」與「多元文化」的知識基礎、核心價值及實踐策略不盡相同。本文認為，傳播權乃是基本人權之一項重要範疇，同時亦屬普世價值，透過國內外學術研究以及法學基礎中關於傳播權思維的爬梳，從相關概念的基礎意涵出發，輔以前行研究所提出的現象觀察，說明何以傳播權（與媒體近用權）的精神需廣及至跨國移工／民此一國內新興族群之上。至於「多元文化」的內涵與指涉，則藉由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核心價值與終極

關懷的剖析，從中檢視多元文化主義的實質精神，以及此種概念所彰顯出關於社會發展的進步性觀點。

依循此一脈絡，本文進而倡議「文化公民權」的理念，將其視為反映並回應當代全球化發展下，新的人口組成、轉換及變遷社會中一種具開放精神的公民權思考方向，並且說明多元文化主義何以是文化政策（包含傳播政策）所應具備的思維。至於在實際的政策落實上，更有賴文化公民權所揭櫫的開放性與包容性培力途徑，來重新審視移工／民與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換言之，多元文化主義的族群政策必須與時俱進，將移工與非公民的移民納入範疇，方符合文化公民權的訴求，同時亦須將媒體視為移住者與其所屬文化社群、移入國、原生國社會之間活化認同、相互溝通的重要資源，以期促成多元文化社會的持續發展。

在國外傳播政策的參照部分，本文選擇在人口組成上以外來移民為主的國家，就其傳播政策與媒體措施中所彰顯的「多元文化」精神為據。當然，由於身分以及法定權利義務之差別，移工、移民與公民之間在政策的適用及保障上存在不可避免的落差。在承認此種差異的前提之下，本文嘗試提出「移工—移民—公民」此一光譜鬆動的可能性（不同國家對於移工成為移民、移民順利歸化為公民的思考與作法不同）；亦即，探討在國際人口遷徙已成常態且跨國移（定）居者日形多元的背景下，如何以他國族群與傳播政策中具開放與進步精神的多元文化思維為參考，納入臺灣相關政策規劃上的借鏡，因為臺灣境內多達數十萬的「新住民」（含中國大陸配偶）同樣面臨傳播權與媒體近用管道缺乏的問題。

如上所述，作為一個自由民主、強調人權立國的國家，如何重新審視全球文化的轉向與本地社會的變遷，以及此種轉型過程中所衍生的諸多議題，是臺灣政府必須加以思考之處。其中，國際移工與移民的傳播權即應屬於積極人權的保障範圍。有鑑於此，本文嘗試剖析目前在臺移工與新移民之傳播權益及媒體近用情形，從中檢討國內現行傳播政策中的盲點，並且援引其他國家相關政策之精神與作法為參照，同時也呼籲臺灣政府應積極致力於多元文化主義與文化公民權思維的提升，如此方能進一步落實本土人權保障與國際接軌的理想。

在研究限制方面，本文旨在就以往臺灣本地研究中未觸及的國際移工／民傳播權及媒體近用權進行初步性的探討，希望透過多重面向的思考與綜論，提陳出幾項重要的政策議題，因此在主題上略顯廣泛，未能兼顧個別學理概念以及政策內涵的深入分析。關於此點，建議未來相關研究針對在臺各類跨國移住者傳播需求、媒體近用、媒體再現以及政策內涵等不同領域子題，進行焦點性的分析，以期累積跨國移住者傳播研究更為豐富的實證經驗與參考資料。

## 參考書目

-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2011）。《100年外籍配偶諮詢專線資源手冊》。臺北：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 尤希·達袞（1992）。〈重視少數民族的傳播權益——應合理分配傳播資源〉，《島嶼邊緣》，5：30-32。
- 王宏仁、白朗潔（2009）。〈誰從越國際勞動力流動獲利？移工、跨國仲介與制度設計〉，夏曉鶯（編），《騷動流移：臺社移民／工讀本》，頁201-227。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王菲菲（2005）。〈多元文化與公共廣電機構：澳大利亞的實踐經驗〉，《中華傳播學刊》，7：103-134。
- 王俐容（2006）。〈文化公民權的建構：文化政策的發展與公民權的落實〉，《公共行政學報》，20：129-159。
- （2003）。〈全球化時代的多元文化主義——從臺灣外籍勞工的文化政策談起〉，《當代》，189：120-129。
- 王俐容、王維菁、朱淑娟（2008）。〈跨國性社群電視媒體初探：以《臺灣媳婦》為例〉，《中華傳播學刊》，14：267-313。
- 朱涵（2007）。《臺灣報紙再現「外籍新娘」之研究——以聯合報、自由時報為例》。世新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成露茜（2008）。〈移民／工發聲與媒體〉，夏曉鶯、陳信行、黃德北（編），《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下冊），頁129-158。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李佳玲（2006）。《弱勢社群節目製播與回饋之研究——以服務在臺外籍配偶廣播節目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克能（2005）。《多元文化主義下的加拿大廣電政策》。（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出國專題報告書）。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邱淑雯（2003）。〈越境者媒體：臺灣的外勞廣播節目〉，《新聞學研究》，75：73-102。
- （1998）。〈外勞族群媒體研究初探：以臺灣泰語廣播節目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1：169-193。
- 林開忠、張雅婷（2003）。〈台灣媒體中的外籍新娘〉，蕭新煌（編），《台灣與東南亞：南向政策與越南新娘》，頁187-213。臺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洪貞玲(2006)。〈誰的媒體？誰的言論自由？——解嚴後近用媒介權的發展〉，《臺灣民主季刊》，3(4)：1-35。
- 洪貞玲、劉昌德(2006)。〈傳播權觀點的商營廣電管制〉，《中華傳播學刊》，10：27-53。
- 洪鎌德(1996年12月)。〈新加坡的種族問題與政府的族群政策〉，「1996族群問題研討會」論文。臺灣：臺北。
- 柳紹鈞(2004)。《越南籍跨國婚姻女性配偶在臺媒體使用行為與文化適應研究》。國立政治大廣播電視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孫建忠(2008)。〈移工社會保障宣言及實施——國際經驗與我國現況的初探〉，《社會發展季刊》，123：160-169。
- 夏曉鶯(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張錦華(1998)。〈多文化主義與原住民傳播權益——以澳洲的原住民媒體政策為例〉，《臺大新聞論壇》，5：37-60。
- 陳清河(2004)。〈科技、政治與弱勢傳播——以臺灣原住民族之廣電媒體近用為例〉，《臺灣民主季刊》，1(4)：109-138。
- 黃葳威(2006)。〈從「入境隨俗」到「賓至如歸」：再看多元文化主義〉，《傳播研究簡訊》，46：4-11。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07)。《廣電媒體多元文化指標操作手冊》。臺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 馮建三(2002)。〈人權、傳播權與新聞自由〉，《國家政策季刊》，1(2)：117-142。
- 葉乃靜(2004)。〈多元文化主義與資訊服務〉，《圖書與資訊學刊》，51：68-76。
- 曾熾芬(2008)。〈誰可以打開國界的門？移民政策的階級主義〉，夏曉鶯、陳信行、黃德北(編)，《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上冊)，頁135-164。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2004)。〈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臺灣社會學刊》，32：1-58。
- 楊芷茜(2006)。《移住家庭監護工的媒體再現：以臺灣報紙對「劉俠事件」與「馮滬祥事件」之報導為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廖元豪(2008)。〈移民——基本人權的化外之民：檢視批判「移民無人權」的憲法論述與實務〉，夏曉鶯、陳信行、黃德北(編)，《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上冊)，頁213-244。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蔡臺鴻 (2009)。《外籍新聞的污名化——以新聞事件報導為例》。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劉子亮 (2009)。《鄉音不相應：在臺東南亞移工收聽 RTI 母語節目之研究》。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徐琦 (2008)。〈社會弱勢者媒體形象研究：以外籍家事勞動者與雇主關係之報導為例〉，「2008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臺灣：宜蘭。
- 謝敏芳 (2004)。《外籍勞工報紙形象之趨勢研究》。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 蕭新煌 (2005)。〈多元文化社會的族群傳播：剖析一個新典範〉，《中華傳播學刊》，7：3-8。
- 藍佩嘉 (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臺北：行人。
- (2006)。〈合法的奴工，法外的自由：外籍勞工的控制與出走〉，《臺灣社會研究季刊》，64：107-150。
- 顧玉玲 (2008)。《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臺北：印刻。
- 龔允倩 (2008)。〈客工制度安魂曲？——由臺灣與德國客工政策的比較談起〉，夏曉鵬、陳信行、黃德北 (編)，《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 (上冊)，頁 243-273。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Alia, V., & Bull, S. (2005). *Media and ethnic minorities*. Edinburgh, UK: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Athique, A. (2005). Watching Indian movies in Australia: Media, community and consumption. *South Asian Popular Culture*, 3(2), 117-133.
- Bailey, O. G., Georgiou, M., & Harindranath, R. (2007). *Transnational lives and the media: Re-imagining diaspora*.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Barron, J. A. (1967). Access to the press: A new first amendment right. *Harvard Law Review*, 80, 1641-1678.
- Castles, S., & Miller, M. J. (2003).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3rd ed.).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Chisman, F. P. (1998). Delivering on diversity: Serving the media needs and interests of minorit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A. K. Garmer (Ed.), *Investing in diversity: Advancing opportunities for minorities and the media* (pp. 1-30). Washington, DC: Aspen Institute.

- Cottle, S. (2000). Media research and ethnic minorities: Mapping the field. In S. Cottle (Ed.),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media: Changing cultural boundaries* (pp. 1-30).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d'Haenes, L. (2003). ICT in multicultural society. *Gazette*, 65, 401-421.
- Fraser, N. (1998). From redistribution to recognition? Dilemmas of justice in a "post-socialist" age. In C. Willett (Ed.), *Theorizing multiculturalism: A guide to the current debate* (pp. 19-49). Malden, MA: Blackwell.
- Garner, A. K. (1998). *Investing in diversity: Advancing opportunities for minorities and the media*. Washington, DC: The Aspen Institute.
- Georgiou, M. (2007). Diasporic media across Europe: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and the universalism -- Particularism continuum.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1, 481-498.
- Hahamovitch, C. (2003). Creating perfect immigrants: Guestworkers of the worl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abor History*, 44(1), 69-94.
- Hartley, J. (1997). An aboriginal public sphere in the era of media citizenship. *Culture and Policy*, 8(2), 43-64.
- Husband, C. H. (2005). Minority ethnic media as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Professionalism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interac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1, 461-479.
- (2000).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In S. Cottle (Ed.),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media: Changing cultural boundaries* (pp. 199-214).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1994). *A richer vision: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media in western democracies*. Paris: Unesco.
- Kymlicka, W. (2001). *Politics in the vernacular: Nation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citizenship*.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5).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 McQuail, D. (1992). *Media performanc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London: Sage.
- Mitra, A. (2005). Creating immigrant identities in cybernetic space: Examples from a non-resident Indian websit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7, 371-390.

- Murdock, G. (1992). Citizens, consumers, and public culture. In M. Skovmand & K. C. Schröder (Eds.), *Media cultures: Reappraising transnational media* (p. 17). London: Routledge.
- Napoli, P. M. (2006). *Media diversity and localism: Meaning and metric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2001). *Foundations of communications policy: Principles and process in the regulation of electronic media*. Cresskill, NJ: Hampton.
- Riggins, S. H. (1992). *Ethnic minority media: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Newbury Park, CA: Sage.
- Stalker, P. (2001).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ondon: Verso.
- Valaskakis, G. (1992).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technology: Satellites and northern native broadcasting in Canada. In S. H. Riggins (Ed.), *Ethnic minority media: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p. 63-81). Thousand Oaks, CA: Sage.
- Wong, K. (2001). *Media and culture in Singapore: A theory of controlled commodification*. Cresskill, NJ: Hampton.
- Write, T. (2002). Moving images: The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refugees. *Visual Studies*, 17(1), 53-66.

## 附錄：國內廣播電臺外語（非英語）節目一覽表

廣播電臺名稱	外語節目名稱	播出時段	播出語言
臺灣廣播電臺 臺北一臺 AM1323	1. 外勞交流道	1. 18:00 ~ 19:00 (每週五)	1. 國、臺語
	2. 開心假期雅加達	2. 18:00 ~ 19:00 (每週六)	2. 印尼語
	3. 湄南河畔	3. 7:00 ~ 9:00 (每週日)	3. 泰語
	4. 寶島湄江情	4. 13:00 ~ 14:00 (每週日)	4. 越南語
	5. 開心假期雅加達	5. 17:00 ~ 18:00 (每週日)	5. 印尼語
	6. 賓至如歸—飛向馬尼拉	6. 18:00 ~ 19:00 (每週日)	6. 菲律賓語
臺灣廣播電臺 臺北二臺 AM1188	外勞交流道	17:00 ~ 18:00 (每週日)	國、臺語
臺灣廣播電臺 大溪一臺 AM621	1. 湄南河畔	1. 07:00 ~ 09:00 (每週日)	1. 泰語
	2. 開心假期雅加達	2. 17:00 ~ 18:00 (每週日)	2. 印尼語
	3. 賓至如歸—飛向馬尼拉	3. 18:00 ~ 19:00 (每週日)	3. 菲律賓語
	4. 外勞交流道	4. 19:00 ~ 20:00 (每週日)	4. 國、臺語
臺灣廣播電臺 大溪二臺 AM1062	1. 開心假期雅加達	1. 17:00 ~ 18:00 (每週日)	1. 印尼語
	2. 賓至如歸—飛向馬尼拉	2. 18:00 ~ 19:00 (每週日)	2. 菲律賓語
	3. 外勞交流道	3. 19:00 ~ 20:00 (每週日)	3. 國、臺語
臺灣廣播電臺 新竹廣播電臺 AM1206	1. 湄南河畔	1. 07:00 ~ 09:00 (每週日)	1. 泰語
	2. 寶島湄江情	2. 13:00 ~ 14:00 (每週日)	2. 越南語
	3. 湄南河畔	3. 16:00 ~ 17:00 (每週日)	3. 泰語
	4. 開心假期雅加達	4. 17:00 ~ 18:00 (每週日)	4. 印尼語
	5. 賓至如歸—飛向馬尼拉	5. 18:00 ~ 19:00 (每週日)	5. 菲律賓語
	6. 外勞交流道	6. 19:00 ~ 20:00 (每週日)	6. 國、臺語
臺灣廣播電臺 臺中臺 AM774	外勞交流道	17:00 ~ 18:00 (每週日)	國、臺語
關懷廣播電臺 FM91.1	開心假期菲律賓	22:00 ~ 23:00 (每週日)	菲律賓語
中聲廣播電臺 AM864	新的一天新的希望	23:00 ~ 00:00 (每週日)	菲律賓語
桃園廣播電臺 FM106.9	外勞臺灣情	1. 09:00 ~ 10:00 (每週日) 2. 22:00 ~ 23:00 (每週日)	印尼語
	1. 菲勞俱樂部	1. 19:00 ~ 20:00 (每週六)	1. 菲律賓語
神農廣播電臺 FM99.5	2. 臺灣心泰國情	2. 19:00 ~ 20:00 (每週日)	2. 泰語
	外勞臺灣鄉土情	19:00 ~ 20:00 (每週六)	

資料來源：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100年外籍配偶諮詢專線資源手冊》（2011）。

# Rethinking the Communication Righ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 Workers/Immigrants: A Local Perspective

Chen, Chun-F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rts &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New Taipei, Taiwan

## Abstrac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diverse under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takes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in Taiwan as the subject of inquiry.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n their work condition, media representation, and media access in Taiwan, combined with the dialectical analysis on the contemporary meanings of human rights, communication rights, right to access media, and cultural citizenship, the study aims at scrutinizing how international migrant workers/immigrants are imagined and manifested in Taiwan's communication policies. Furthermore, the study also seeks important references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from migration-related communication policies in other countries. In so doing, the study is able to closely examine the current conducts of Taiwan's communication policies with regard to multicultur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ights in an era of global migration,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policy-making.

**Keywords:** cultural citizenship, multiculturalism, migrant worker, immigrant, media access, communication rights

---

\* Email: 061328@mail.fju.edu.tw

Received: 2011.09.24

Accepted: 2011.11.29

## 從媒材轉換談動畫新聞對傳統新聞產製 與標準之影響：以《動新聞》為例<sup>\*</sup>

江靜之<sup>\*\*</sup>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 摘要

本文從媒材轉換角度出發，以《動新聞》為例，探討文字新聞被轉換成動畫新聞對傳統新聞產製與客觀新聞標準可能產生的影響。本文指出，從文字到圖像及口語配音，動畫新聞產製者一方面須填補大量視覺及聽覺細節，影響記者蒐集及查證工作，另一方面，也須注意圖像與口語可能隱含社會刻板印象，影響閱聽人的新聞判斷及感知。此外，本文認為《動新聞》的圖像畫面有時採當事人的第一人角度進行新聞敘事，以及使用動漫手法及文化，不但衝擊傳統客觀新聞標準，也可能引發「真相」及「憐憫」等新聞倫理議題的討論。

**關鍵詞：**口語、書寫、動畫新聞、媒材轉換、圖像

---

\* 作者感謝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及建議。

\*\* Email: morecc@nccu.edu.tw  
投稿日期：2010 年 7 月 6 日  
接受日期：2011 年 5 月 6 日

## 壹、前言

蘋果日報於 2009 年 11 月中旬在臺推出名為《動新聞》的動畫新聞，引發臺灣社會不少爭議（黃慧敏，2009 年 11 月 24 日；蔡惠萍，2009 年 12 月 10 日）。時任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主委彭芸甚至直言：「動新聞在我的界定中，根本不叫新聞」（陳佺任，2009 年 11 月 26 日）。

雖然《動新聞》引發許多爭議，但臺灣電視觀眾對新聞動畫並不陌生。中國武漢大學 Huang (2008) 曾以臺灣電視新聞為例，指出動畫新聞優點包括：再現突發的新聞事件以滿足觀眾知的權利；透過動畫影像及聲音，觀眾可用最少的心力得到最多的資訊；讓電視發揮影視媒體特徵，不致淪為電視新聞廣播化（TV news radiolization），用聽即可等。Huang（同上引）甚至認為在手機及網路電視等通道需求下，動畫新聞市場極具發展潛力，故建議中國電視新聞發展、運用動畫新聞。

既然動畫早已出現於臺灣電視新聞，又有上述優點，《動新聞》爭議究竟從何而來？本文認為，關鍵在於動畫在電視新聞中，只是輔佐（文字、口語及影像）新聞的配角，但到了《動新聞》卻搖身一變，成為新聞呈現的主角。從配角到主角，動畫對新聞的影響不僅是新聞呈現方式的不同，更直接衝擊原來因循書寫傳統而來的新聞標準及邏輯。

事實上，從報紙新聞開始，「書寫文字」就是再現新聞的主要方式。現代新聞標準如客觀性更奠基於書寫邏輯（沈錦惠，2005），即使後來廣電媒體崛起，電視新聞大行其道，影像也未能完全取代文字在新聞中的優先地位。舉例來說，Huang (2008: 3) 認為中國電視新聞工作者偏向文字思考，使得他／她們無論在電視新聞訪問或呈現上，容易忽略發生於新聞情節中的語言、行為及細節，因此無法滿足電視影像新聞的需要。此外，牛隆光（2005）研究電視新聞，也偏向用文字新聞的邏輯及標準去看電視（影像）新聞，認為電視新聞有「小報化」趨向。而 Ekström (2002) 及 Costera Meijer (2003) 等學者之所以提出一套評判電視新聞的新角度或標準，也是因為原來判斷（文字）新聞的標準不適合電視影像新聞。

因此，從報紙文字新聞、廣播口語新聞、電視影像新聞，到網路動畫新聞，我們要注意的不只是從印刷報紙、廣電媒體到網路媒體，傳送新聞載體（媒體）的改變，更應關注新聞主要媒材（mode）的轉變：從報紙新聞的文字、廣播新聞的口語、電視新聞的影片，到網路新聞的動畫。尤其在數位多媒體時代，Opgenhaffen (2008: 15) 也建議，新聞的分析單位不該只停留在傳佈新聞的媒體（media），如報紙、電視或廣播，而應以用來設計新聞故事的媒材代之，以媒材作為分析新聞（多）媒體的單位。

由於不同媒材有各自擅長及不擅長表達的意義，如口語和書寫文字擅於說明有時間序列的因果關係，圖／影像較能表現物體間的空間關係 (Kress, 2004)，故同一概念或故事若以不同媒材呈現，便會展現不同樣貌。Stahl (1979) 和 Tannen (1982) 曾比較用來表達個人經驗的口語及書寫版本，發現此二者在「說什麼」及「如何說」上皆有不同 (轉引自 Johnstone, 2001: 643)。而本文主要從媒材轉換角度，探討動畫新聞如何牽動新聞產製需求的改變，同時衝擊傳統客觀新聞學標準。

本文以下先透過文獻檢閱，說明三種主要新聞媒材 (口語、書寫及圖／影像) 特徵，之後再以《蘋果日報》與《動新聞》為例，指出從「文字」到「動畫」新聞，新聞使用主要媒材的改變，可能對傳統新聞產製及標準產生哪些影響。而本文選擇 (報紙) 文字新聞，而非 (電視) 影像新聞作為比較對象之理由有三：第一，本文重點之一在於討論動畫新聞對傳統客觀新聞標準的影響。如前所述，客觀新聞學主要起於文字新聞，或說在文字新聞上較為顯著，而且，其是否適用於電視新聞尚有爭議。第二，文字與圖像的差異大於影像與圖像的差別，所以本文選擇從文字與圖像 (新聞) 著手。第三，就本文目前蒐集的個案資料來看，《動新聞》同時使用動畫與影像資料，主要是以前者彌補後者資料的缺乏。若以電視新聞作為對照，較難找出相互比較的分析個案。而且，本文作者撰寫此文之時，《壹電視》尚未開播，也無法獲得《壹電視》的影像新聞作為比較對象。

## 貳、新聞主要媒材

何謂媒材？如何區分媒材？媒材與媒介 (medium) 的關係為何？對於這些問題，目前學界尚無定論 (Kaltenbacher, 2004: 194-195)。舉例來說，Bezemer 與 Kress (2008: 171) 將「媒材」定義為用以產製意義的社會及文化資源，可分為書寫 (writing)、口語 (speech)、靜止的圖／影像 (image) 及會動的影片 (moving image) 等。Stöckl (2004: 12) 則認為「媒材」是一個有結構層次的網絡系統，可細分為核心媒材 (如語言)、中間媒材 (medial variants, 如書寫)、邊陲媒材 (如版面印刷)、次要媒材 (如顏色) 及特徵 (如顏色飽和度)。

此外，van Leeuwen (2006: 145) 主張符號資源可以被組織成「媒材」或「媒介」，端視它是否擁有可單獨存在的字彙 (lexis)，以及組織字彙的文法規則 (grammar)。根據 van Leeuwen，「媒介」只有個別「字彙」，但「媒材」卻是「字彙」與「文法」兼具。不過，隨時空流轉，「媒介」可能轉變成「媒材」，而「媒材」

也可能又變回「媒介」(Kress & van Leeuwen, 2001: 22)。換言之，媒材內涵可能隨時空環境而變，如同 van Leeuwen (1999: 8) 強調，所有符號系統皆為「情境化」(contextualize)，有其特殊歷史、社會和文化背景。

進一步，媒材分類也無普世標準。一方面，媒材分類須視社群而定，例如一般人習慣籠統地將視覺圖像 (visual image) 視為媒材，但對專業攝影師來說，視覺圖像和照相攝影 (photography) 應分視為兩種媒材 (Kress, Jewitt, Ogborn, & Tsatsarelis, 2001: 43)。另一方面，媒材分類也與研究對象有關，以顏色為例，Kaltenbacher (2004: 195) 指出，在繪畫 (尤其是抽象畫) 中，顏色表達許多意義，是舉足輕重的核心媒材 (core mode)，但對文字文本 (text) 來說，卻可能是無關重要的次要媒材 (sub-mode)。

雖然學界對媒材定義及分類尚無共識，但目前普遍將媒材界定為一組有 (文法) 組織規則，可用來產製意義的符號資源，包括書寫、口語、圖／影像、音樂、姿勢動作等 (Iedema, 2003; Jewitt, 2004; Kress et al., 2001; Kress & van Leeuwen, 2001; van Leeuwen, 2006)。本文聚焦於文字與動畫新聞的媒材改變，故決定採此定義，將新聞主要媒材區分為書寫、口語及圖／影像。

根據 Eckkrammer (2004: 217)，不同媒材的關係包括轉換 (例如將文字轉成圖像)、共存 (例如用文字說明圖像)、混合 (例如漫畫混合運用文字與圖像) 及融合 (例如視覺詩將文字與圖像合而為一)。而本文主要關注媒材轉換問題，探析從文字到動畫新聞，媒材轉換可能對新聞產製與標準產生之影響。以下分述書寫 (文字新聞)、口語 (動畫新聞配音) 及圖／影像 (動畫新聞畫面) 之媒材特徵，指出討論媒材轉換應注意的重要面向。

## 一、口語

口語使用「語言」，擁有字彙、文法與句法等語言媒材資源 (modal resources) (Bezemer & Kress, 2008: 171)。以「你喜歡花」此句為例，口語運用「你」、「喜歡」、「花」等字彙，將之作文法排列：「你」為主詞，之後接動詞「喜歡」及名詞「花」，以直述句句法陳述。此外，口語還使用「聲音」，所以擁有聲音媒材資源，包括音量、語調、音調、長度及沉默等 (Kress, 2004)。同樣以「你喜歡花」直述句為例，言者可用語尾上揚的語調，將之變成疑問句。

由於「語言」具線性連續特質，能凸顯事件、行動及先後順序 (sequence)，擅於說明因果關係，適合用來敘事 (narrating)、指向 (pointing)、描述、解釋及分類 (Kress, 1998, 2004)，所以口語媒材也擁有這些語言功能特徵。

另一方面，根據 Kress (1986)，口語的特色是立即與自發的 (spontaneous)，因為言者只有極少或甚至沒有時間深思熟慮及反思，所以建構口語文本的方式就像鍊子般一句接一句，充分發揮「語言」一字一句，依時間序列出現的線性連續特質 (Kress, 1998, 2004)。也因此，口語的文法邏輯主要透過語調，以及「和」、「但是」、「所以」、「因此」、「雖然」等連詞 (co-ordinations)，變成序列的、重複的與重述的 (Kress, 1986)。沈錦惠 (2007, 頁 58) 整理 Walter Ong (1982) 文獻也指出，口語是串連各種觀念的「增添型結構」，而非相互從屬。

## 二、書寫

書寫一方面與口語共享語言，同樣擁有字彙、文法與句法等語言媒材資源，具備上述語言功能；另一方面，不同於口語透過聲音，書寫是藉由圖像物質 (graphic substance) 呈現語言，所以擁有視覺 (visual) 相關資源包括：字型 (typefaces)、字體 (font type)、字的大小、顏色、字距及段落等 (Bezemer & Kress, 2008: 171; Kress, 1998, 2004)。以「你喜歡花」直述句為例，要將之變成疑問句，作者可於文句最後加上問號「？」，或用粗體字「你喜歡花」強調受詞「花」。

根據 Kress (1986)，寫作者有時間深思熟慮，可建構、編輯與重寫文本，所以書寫文本偏向整合、有主從關係 (subordination) 及階層式。而且，書寫同時擁有語言與視覺圖像資源，既可在抽象隱喻層次，運用句法階層順序，也可於實際呈現層次，透過版面視覺，表達意義，可謂具有雙重空間性 (doubly spatial) (Kress, 1998: 71)。因此，寫作者也可運用視覺版面強化，或減弱書寫句法階層表達的意義。

## 三、圖／影像

動畫新聞是由一張張圖畫串連起來，所以圖／影像可說是動畫新聞的基本媒材。要瞭解圖／影像的媒材特徵，我們可從它與語言的差異著手。如前所述，語言依時間序列出現，較能凸顯事件及行動，善於說明因果關係；圖／影像則透過空間開展，較能凸顯空間中的物件、實體及相關成分之間的關係，較不容許模糊的空間 (Kress, 2004: 112)。

舉例來說，無論以口語或書寫表達：「小明站在小英旁邊」，即使不說明小明和小英的長相、方位關係及距離等，依然能夠清楚傳達文意。但要將這句話化為圖像，圖中便須增添小明和小英的輪廓樣貌（他們是男是女，是高是矮，是胖

還是瘦？），以及他們倆的空間距離及關係（「旁邊」是指距離多遠？小明與小英誰在左誰在右？他們倆手牽著手嗎？）。也就是說，從語言到圖像，作者必須因著圖像媒材的需要，增添他／她在語言中無須交代的具體外型、空間及關係等細節。

另一方面，就接收者角度來看，由於語言的時序關係，接收者必須依照口語／書寫文本的固定順序聽／讀。相較之下，圖／影像的文本順序較開放，接收者可從圖／影像的任何一處開始觀看，對文本有較大的重構空間 (Kress, 2004: 113)。Stöckl (2004: 17-18) 也指出，不同於語言字詞有其慣用的語義，透過圖／影像傳達的意義總是模糊又紛歧。除非輔以其他媒材（如書寫或口語），或將之鑲嵌在有限的傳播情境中，否則圖／影像無法精確地傳遞意義。

同樣以「小明站在小英旁邊」這句話為例，接收者必須依照口語／書寫順序進行理解：小明是主詞，「小明站在小英旁邊」主要表達小明的動作（站）及位置（在小英旁邊）。然而，一旦將「小明站在小英旁邊」此言轉成圖像，接收者便可自由觀看，既可將之理解為「小明站在小英旁邊」，也能將之視為「小英站在小明旁邊」，甚至可以說是「小明和小英（或小英和小明）站在一起」。換言之，當語言被轉換成圖像，原本透過語言文法表達的主從關係也因此消失。

簡言之，不同於語言是時間取向，適合敘事，圖／影像為空間取向，擁有媒材資源包括空間成分 (elements)、顏色、物件大小、距離、角度及構圖等 (Stöckl, 2004: 12)，適合安排 (arrangement) 與展示 (display) (Kress, 1997)。

值得注意的是，圖／影像本質上是具象的 (concret)，擅長傳達直覺或整體性資訊，較難表達抽象概念 (Doumont, 2002: 221)，雖然這不表示空間取向的圖／影像一定無法表達抽象概念 (Kress, 1998: 65; Kress & van Leeuwen, 2006)。進一步，Doumont (2002: 222) 指出，圖畫比照片較能表達抽象概念。他以描繪人手為例，若用真實的人類手部照片，則不免看出膚色、性別或年齡等其他具體資訊，反之，用圖畫則可畫出較抽象或中性的手。但落實在報紙新聞上，van Leeuwen (2004: 16) 認為，照片比圖畫有更高的真實聲稱，因圖畫較擅長於虛構的幻想領域，而非事實領域。

## 參、動畫新聞對新聞產製的影響

從文字到動畫新聞，媒材轉換發生於說故事的主要媒材，從書寫轉變為圖像描繪，以及從文字引述轉變為口語配音。以下分別詳細分析，動畫新聞圖像及配

音的口語媒材使用，探討媒材轉換可能對傳統新聞產製帶來哪些影響，以及值得思考的問題。

## 一、從文字到圖像呈現，改變資訊細節的需求

動畫是一張張圖片的連續集合，故本文比較文字新聞之書寫與動畫新聞的圖像媒材。如前所述，圖像是透過空間開展，偏向凸顯空間中的物件、實體及相關成分之間的關係，故新聞使用圖像，便須將圖像中的物件、實體及其間關係等交代得「清清楚楚」。

以《動新聞》2009年11月24日「狂漢斬路人 提頭逛街」新聞（蘋果動新聞，2009年11月24日）來說，《蘋果日報》文字新聞直接指出吳姓男子（之後簡稱吳男）「從家裡拿出菜刀」作為兇器（蘋果日報，2009年11月24日）。相較之下，《動新聞》口語旁白說吳男：「隨後拿刀，逢人就砍」，同時搭配圖片畫面（下頁圖1）：吳男進入一個有冰箱、水槽及粘板等的地方——廚房（地點），拿起在粘板上（刀的位置）狀似菜刀的刀子，因此我們得知吳男拿的是「菜刀」。

下頁圖1顯示，要以圖像表達原本文字新聞的簡單敘述：「從家裡拿出菜刀」，動畫新聞必須填補許多文字新聞沒有的成分及空間細節，包括吳男是從家中「何處」取得菜刀？若是廚房，吳男家的廚房是何樣貌（例如廚房一定有冰箱嗎）？菜刀在廚房的哪裡（在粘板上還是在廚櫃裡）？吳男如何拿到菜刀，是直接看到順手拿，還是刻意尋找？這些與圖像媒材資源有關之空間細節問題可以一直延續下去，乃至於廚房裡的器物、擺設位置、顏色及大小等。

此外，因應圖像媒材的空間細節需求，動畫新聞連原本文字新聞一筆帶過的事件發生背景，也須詳細描繪。舉例來說，文字新聞僅提及吳男砍人之前曾「攻擊一名婦人，婦人連忙拿雨傘阻擋，路人嚇得紛紛走避」（蘋果日報，2009年11月24日），但《動新聞》旁白提及吳男「隨後攻擊路旁阿婆，路人嚇得紛紛走避」（蘋果動新聞，2009年11月24日）時，卻需在畫面上增添許多文字新聞缺乏的背景資訊（下頁圖2），包括吳男是在「鄉間小路」上攻擊阿婆，旁有兩名「路人」，一男一女，以及阿婆和兩名路人的穿著打扮等。

值得注意的是，《動新聞》口語旁白雖然省略原文字新聞陳述：「婦人連忙拿雨傘阻擋」，但動畫圖片還是「忠實地」畫出婦人拿雨傘阻擋吳男攻擊的動作（下頁圖2）。只是，圖像不像文字有導引讀者觀看的作用，《動新聞》將「婦人連忙拿雨傘阻擋」此句轉換成圖像，拿雨傘的婦人及其動作遂成圖像呈現的眾多要素之一，不一定會在閱聽人心中形成「婦人連忙拿雨傘阻擋」的意象。

進一步，動畫新聞還得交代在社會新聞中甚為重要的動作細節，如圖 2「婦人連忙拿雨傘阻擋」的阻擋動作為何？再以文字新聞簡單帶過的一句話：「他先砍中一輛機車，把防風罩切碎」（蘋果日報，2009 年 11 月 24 日）為例，《動新聞》以旁白說明：「見車就砸。他砍中機車，擋風板應聲粉碎」（蘋果動新聞，2009 年 11 月 24 日）（圖 3）的同時，圖像還得描繪主角「如何」砍機車？他砍機車的動作是甚麼？砍了幾下？到了第幾下擋風板碎了？擋風板又如何「應聲粉碎」？

以上顯示之空間、背景及動作細節看起來似乎無足輕重：吳男此案重點在於兇器「菜刀」，而且「菜刀」出現在家中「廚房」也十分理所當然；吳男攻擊拿傘婦人是在何處路旁，以及路人有幾位，是甚麼樣的人等，好像跟主要新聞事件無關；至於吳男砍機車一事，觀眾只要知道此事即可，至於怎麼砍、砍了多少刀並不重要，畢竟吳男被捕不是因為他砍了機車，而是因為他之後「砍下婦人頭」。

然而，如同 Rundblad, Chilton 與 Hunter (2006: 73) 強調，再微小的字詞差異也可能引發讀者不同的理解。何況從抽象文字到具體圖像，動畫新聞填補的圖像細節雖然表面上看起來無關緊要，卻可能影響觀眾對新聞的解讀。舉例來說，吳男是刻意還是順手拿菜刀，可能涉及觀眾判斷他是蓄意傷人或只是一時情緒失控；吳男是在甚麼情境下攻擊拿傘婦人，描繪出的路人反應可能影響觀眾對當地



圖 1：空間細節



圖 2：背景細節



圖 3：動作細節

社會的觀感（例如此事若發生在都市人多處，觀眾可能會認為「都市人冷漠」）；而吳男砍機車的動作也可能影響觀眾對吳男個人的評價。

而且，視覺具有引發既有詮釋基模，連結觀眾熟悉的事件或社會故事之功能 (Wojcieszak, 2009: 469)，故圖像也可能強化社會刻板印象。以電視新聞為例，Dunn (2005: 149) 指出，圖／影片本身便有意義，所以當電視新聞為了滿足畫面需求，從新聞資料庫取用既有圖／影片，便可能持續強化原有圖／影像含有的刻板印象。本文認為，同樣情況也可能出現在動畫新聞中，尤其動畫新聞需要填補許多視覺圖像細節，無論為了可行性或節省作業時間，皆可能運用既有圖庫及常識，複製、強化既有的刻板印象。

從上可知，要將文字新聞轉變成圖像，新聞產製者首先面臨因媒材轉換而來的資訊需求問題。由於圖像比文字更不能容忍模糊的意義，若要「如實」報導，新聞產製者須填補許多文字新聞缺乏的視覺資訊，包括空間、背景及動作細節等。因此，在運用動畫新聞優勢包括：將抽象概念具體化，強調事件本質，闡述角色的行為，保證新聞的精準度，同時提升新聞的可讀性及可信度等 (Huang, 2008: 8) 之前，我們不得不先問：記者要提供多少，以及哪些資訊，才能讓新聞夠「精準」或至少「不失真」？這無疑將衝擊現有（文字）記者蒐集資料及查證工作。

進一步的問題是，新聞產製者（無論是記者或繪圖者）可以用「想當然爾」的常識和既有圖庫，自行填補那些看來無足輕重的圖像細節嗎？新聞產製者如何判斷哪些細節重要，哪些細節不重要？而觀眾又可以容忍動畫「新聞」的視覺細節與實際有多大出入？或是，觀眾對「新聞真實」的要求及標準，將因動畫新聞的「圖像」媒材特質而變？這些都是未來發展動畫新聞必須正視及思考的問題。

## 二、從文字引述到口語配音，添增聲音的媒材需求

從文字到動畫新聞，媒材轉換除了將文字轉變成圖像，還有將文字引述轉換成口語配音。對照《蘋果日報》與《動新聞》可以發現，後者目前只對文字新聞中有直接引述，但無實際影像畫面及聲音資料者進行配音，亦即為動畫人物配音，「直接引述」新聞人物所言。舉例來說，圖4是「狂漢斬路人 提頭逛街」新聞中唯一有口語配音的片段（蘋果動新聞，2009年11月24日）。根據文字新聞，此片段是吳男「把陳婦從自行車上拉下來，陳婦錯愕大喊：『我和你認識，你砍我幹什麼？』」（蘋果日報，2009年11月24日）。

要將文字引述轉換成口語配音，新聞產製者除了要確認引述（語言）內容的正確性，還得考量口語配音要使用何種腔調、語氣、語速和音量大小等口語媒材資源。以圖 4 為例，雖然它的口語配音內容（「你幹麼砍我？」）與文字新聞直接引述的內容（「你砍我幹什麼？」）有些微差異，但因口語與書寫共享字彙、句法及文法等語言媒材資源，要將引述內容「一字不差」地轉換成口語配音，問題不大。口語配音真正困難之處在於，要使用何種腔調、語氣及語速等與聲音有關的媒材資源。

這裡牽涉兩個與媒材轉換相關的新聞產製問題。第一，若要「真實」重現陳婦所言，新聞產製者不但得知道陳婦「說了甚麼」，還得知道她「怎麼說」。這涉及記者採集資料的範圍，例如記者採訪時是否需要知道陳婦使用的語言是國語還是其他方言？陳婦的音質如何？她說話有沒有特殊腔調？她當時說「你幹麼砍我」的語速如何？她「大喊」又是多大聲等。第二，即使陳婦如文字新聞所述「錯愕大喊」，動畫新聞產製者又要如何，以及運用哪些口語媒材資源，表現「錯愕大喊」？

一般可能認為這些口語聲音細節在此個案中無足輕重，而且也不可能要求新聞產製者將之「原音重現」，畢竟再怎麼逼真的口語配音也只是「模仿」。但本文強調，新聞產製者進行口語配音，不可忽略口語聲音媒材的重要，因為「怎麼說」比「說甚麼」更能影響觀眾對言者個人及其所言，以及當時情境的詮釋與判斷。

舉例來說，聽者可以從言者的語調、音量及語速等聲音媒材資源，猜想言者來自何處、是何省籍或國籍、社會階級的高低、當時情境和心情等。而且，如同新聞文字常隱含報導者的意識型態及刻板印象，聲音也不例外。以《動新聞》「『要去醫院』泰勞劫救護車」新聞（蘋果動新聞，209 年 11 月 13 日）（圖 5）為例，其中外勞配音就像一般電視戲劇、綜藝節目或廣告（如 3M 魔布拖把廣告）呈現的外勞口語聲音，有濃厚的腔調及較平的語調，但「這一位」外勞的說話方式真是如此？



圖 4：直接引述的口語配音



圖 5：隱含刻板印象的口語配音

我們也許又會認為外勞說話腔調與他偷救護車及搶計程車的新聞事件無關，所以觀眾不知道「這一位」外勞的口語聲音特質也無傷大雅，動畫新聞只要運用「一般」外勞說話方式配音即可。然而，如同之前圖像媒材的討論，本文強調，口語配音的語調、音量及語速等媒材資源運用，可能複製這個社會對該新聞人物代表的「那一群人」的刻板印象，進一步影響觀眾對「這一位」新聞人物（及其所屬團體）的看法或評價。

尤其大眾傳播媒體呈現的外勞國語總給人一種滑稽感，常被臺灣人或臺灣媒體拿來模仿取笑。《動新聞》的外勞配音不但複製了臺灣社會對於外籍勞工的刻板印象，也讓此則新聞「娛樂性」大增。每當本文作者將此則新聞播放給學生觀看，動畫中外勞跌倒的動作及口語配音，總是引起學生哄堂大笑，覺得這名外勞實在太過「蠢笨」。

本文認為口語配音將成為動畫新聞產製不可忽視的一環。將文字引述轉換成口語配音，新聞產製者需填補文字新聞無須交代的口語聲音媒材細節。一方面，這涉及新聞記者資料蒐集範圍（未來記者直接引述新聞人物所言時，一定得同時注意其口語談話特徵或進行錄音？若記者未能親耳聽聞新聞人物所言，又該如何處理？）、記者與配音人員的溝通（即使記者親耳所聞，他／她又要如何描述語調、音量及語速等媒材特徵給配音人員知悉？）、配音人員如何模仿新聞人物說話（知道語調、音量及語速等媒材特徵就能做好模仿？），以及「模仿」是否有「失真」疑慮，挑戰原來新聞須「如實」呈現的標準？另一方面，口語配音與圖像一樣，皆可能複製、強化社會刻板印象，新聞產製者進行口語配音時不可不察。

### 三、小結

從文字新聞到圖像呈現及口語配音，媒材轉換為新聞產製者帶來新的挑戰。首先，若要符合原來新聞真實的標準，「如實呈現」新聞人物及事件，新聞產製者便需填補原來文字缺乏的圖像空間、背景及動作細節，以及口語配音需要的聲音媒材細節，包括新聞人物說話的語氣、語速及腔調等。而這些將影響記者蒐集資料及查證範圍，以及新聞產製者如記者、繪圖及配音人員的分工及溝通。

其次，填補動畫圖像及配音口語媒材細節的需求可以無限制擴張，但在新聞產製時間及可行性限制下，新聞產製者要如何拿捏，因媒材轉換而來的資料需求？又如何能既保新聞真實，又完成新聞再現，同時避免隱含於圖像及口語媒材使用中的刻板印象或意識形態？

最後，以上討論也指出，新聞主要媒材從文字轉換成圖像，以及從文字引述轉換成口語配音，可能衝擊原有新聞對「真實」報導的要求。以下本文聚焦於動畫新聞的圖像媒材使用，探討動畫新聞可能對傳統客觀新聞標準帶來哪些影響。

## 肆、動畫新聞對客觀新聞標準的影響

無論使用文字或影像，目前主流新聞還是信奉「客觀新聞學」，例如純淨新聞的倒寶塔式寫作便隱含客觀新聞學典範 (Ytreberg, 2001)，新聞教科書也明載記者應避免現身（聲）於新聞之中（紀慧君，2002）。在文字新聞中，用全知的第三人角度說新聞故事更成為達成客觀的方法之一 (Craig, 2006: 162)。

那麼，從文字到口語、圖像媒材，新聞敘事角度是否有所變化？本文分析十則《動新聞》社會新聞發現，目前動畫新聞敘事邏輯類似電視新聞，是以口語媒材為主 (Wojcieszak, 2009: 472)。根據 Wojcieszak (同上引: 467) 的研究，電視新聞透過旁白敘事 (voiceover narrative)，以及出現在螢幕上的文本，降低多重詮釋的可能性，將觀眾導引至某種特定的解讀。他指出，在電視新聞中，無論是靜止的影像或連續的影片，都需要口語解釋，因為即使是連續的影片，也不一定是連續動作，而且影片有時更缺乏新聞意義。

上述電視新聞的敘事邏輯也可見於目前的《動新聞》。一方面，《動新聞》偏向依事件發生時間的先後順序，訴說事件發生過程，如之前分析「狂漢斬路人提頭逛街」的動畫新聞（蘋果動新聞，2009年11月24日），其從「前天他在家跟父母爭執」，一直到播放實際影片以旁白報導他人反應：「事發後村民都議論紛紛……」為止；另一方面，《動新聞》偏向以口語旁白，賦予畫面及口語配音意義，引導閱聽人對該則新聞的詮釋，例如之前圖2以口語旁白：「隨後攻擊路旁阿婆，路人嚇得紛紛走避」解釋圖像意義，或2010年2月11日《動新聞》「恥 張誌家、陳致遠 求刑兩年」新聞（蘋果動新聞，2010年2月11日）中，圖6-1的口語旁白說：「檢調痛斥他（張誌家）」，使得下一張圖片（圖6-2）中，「檢調」人員的口語配音：「是最惡劣的涉案球員」得以被定調為「痛斥」。

雖然《動新聞》的口語旁白主要以第三人稱進行新聞敘事，但值得注意的是，動畫新聞跟電視新聞一樣，有鏡頭／畫面角度的問題（王泰俐，2004：10-13），而《動新聞》的畫面角度有時以第一人稱進行敘事，與採第三人稱的口語旁白相互衝突。此外，即使動畫新聞敘事採第三人角度，若圖像運用誇張的動漫傳統及文化，也可能衝擊原有文字新聞的客觀報導標準。以下分就圖像畫面的人稱角度及動漫運用進行討論。



圖 6-1：旁白定調



圖 6-2：人物配音

## 一、圖像畫面的第一人稱敘事角度，增加新聞的渲染力與資訊需求

如前所述，目前《動新聞》以口語旁白敘事為主，而口語旁白從第三人角度訴說新聞故事，看起來也符合傳統新聞學的客觀標準。然而，本文發現，《動新聞》的畫面角度常在不知不覺中，從第三人角度轉換成（社會新聞事件）當事人的第一人角度。亦即新聞產製者不再使用客觀的第三人稱，而是透過當事人的第一人稱，進行新聞敘事。

同樣以「狂漢斬路人 提頭逛街」新聞（蘋果動新聞，2009年11月24日）為例。圖7的口語旁白從旁觀者角度敘述被害人被兇嫌追殺「不慎摔倒」，圖像畫面也採第三人角度。但到了圖8，雖然口語旁白還是從第三人角度描述：「兇嫌跨坐她身上亂砍」，但圖像畫面卻轉換成從被害人角度往上看，看見跨坐在「自己」身上的兇嫌。亦即觀眾透過鏡頭畫面看見的是，從被害人角度看上去的兇嫌。

本文再以圖9及圖10為例說明圖像畫面的人稱角度。圖9擷自《動新聞》「蒙面潛入房 打甩兩門牙 印傭毆劫女主人」（蘋果動新聞，2009年12月2日）新聞，呈現女主人被印傭用毛巾塞口，但此畫面只能從當事人印傭的角度看見，故圖像畫面為第一人稱敘事。對照圖10擷自《動新聞》「『我要眼睜睜看她死』鐵鍊弑孀」（蘋果動新聞，2009年12月3日）新聞則可發現，圖10是第三人角度，因為從躺在地上的祖母視野來看，不可能出現這樣的景象。

無論《動新聞》將圖像畫面從第三人稱切換成第一人稱之理由或目的為何<sup>1</sup>，本文認為動畫新聞採用第一人稱的畫面角度涉及兩大問題：

1. 要知道《動新聞》「為何」要將鏡頭畫面從第三人稱切換成第一人稱，須訪談《動新聞》產製者方可得知，但本研究認為以第一人稱代替第三人稱，有時或許可以避免過於煽色腥的表現。以圖8為例，如全程以第三人角度拍攝，則畫面必須描繪兇嫌如何亂砍被害人，以及如何砍下被害人的頭，如此描繪可能會過於血腥，引起更大爭議。然而，即使為了避免過於血腥而採第一人角度敘事，動畫新聞產製者還是需要注意，鏡頭敘事角度從第三人轉變成第一人稱，對觀眾可能造成的影響。



圖 7：第三人角度敘事



圖 8：第一人角度敘事



圖 9：第一人角度敘事



圖 10：第三人角度敘事

第一，Craig (2006: 174) 曾針對文字新聞指出，詳細的文字敘述，以及從第一人稱角度說故事，特別容易引起閱聽人的興趣、情緒及共鳴，因為如此不但能讓讀者沉浸於新聞中，更能與讀者建立情感連繫，達成從第三人稱進行新聞敘事，無法做到的效果。運用第一人稱敘事的抽象書寫文字新聞都有如此大的力量，遑論使用具象畫面的動畫新聞。動畫新聞若利用畫面運鏡，讓觀眾用新聞事件當事人的第一人角度觀看，其渲染力可能更強於文字新聞，新聞產製者實不可不慎。

特別對於社會新聞，動畫新聞產製者宜進一步思考：透過第一人稱陳述事件發生經過，過於誇張的動畫表現可能引發滑稽感，使閱聽人輕忽新聞事件重點或嚴肅性；另一方面，動畫若過於逼真，則可能引發觀眾的負面情緒或感受，造成無法回復的傷害。尤其《動新聞》除了鏡頭畫面，也常利用配樂，增加新聞感染力，例如「狂漢斬路人 提頭逛街」新聞（蘋果動新聞，2009年11月24日），一開始配上小聲、較慢的懸疑音樂，之後隨著動畫描述行動越來越暴力，配樂聲音也越來越大聲，同時變得更加緊湊。

第二，Craig (2006: 166) 強調，淺薄的報導絕無可能產生有力的文章，而記者發聲力道的強弱，又有賴其蒐集到的資料強度。加上如前所述，動畫新聞使用圖像及口語媒材，對視覺及聲音媒材資料的要求又遠甚於文字新聞。因此，動畫新聞若要採第一人稱進行新聞敘事，便得蒐集從第一人角度或觀點「看見」或「說出」的資訊，提供更多細節，建立新聞可信度。

然而，如此一來，又回到本文之前的討論：從文字到動畫新聞，記者要如何隨媒材轉換更改資料採集與查證的範圍、方向及深度？記者與其他新聞產製者（包括繪圖、配音和編輯）如何分工協力與溝通？觀眾又要如何判斷動畫新聞的真實性？或是，觀眾對動畫新聞的真實性要求到何種程度，可以容忍新聞動畫與事實有多大的出入？這些都是隨著未來動畫新聞發展，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 二、圖像動漫化，挑戰新聞的真實聲稱

之前文獻提及，圖像比照片更能表達抽象概念，且真實聲稱較低。因此，動畫新聞援用漫畫及動畫（以下簡稱動漫）手法呈現新聞，將圖像新聞「動漫化」，無疑將降低傳統新聞的真實聲稱，衝擊傳統客觀新聞對真實的要求。

雖然 Huang (2008: 6) 認為動畫傳統及文化發展超過一個世紀，人們已能接受動畫的幽默特質及記錄現場（on-the-spot record）的風格，所以用動畫再現新聞事件，不但可以幫助閱聽人想像事件發生過程，也不用怕閱聽人分不清現實與虛擬。然而，本文認為，Huang 的說法顯然忽略透過「動畫傳統及文化」呈現新聞，可能營造不同新聞意義一事。

Stöckl (2004: 21) 指出，當一種文本類型（如新聞）挪用另一種文本類型（如漫畫）的印刷頁面資源，其中不僅涉及視覺圖像的改變，更可能對文本所欲傳達的意義產生影響。以報紙新聞為例，Kroon (2006) 發現瑞典小報常以漫畫使用的氣球框呈現政治人物所言，再搭配負面的引述內容，便有削弱政治人物專業及專家權威的效果。

因此，動畫新聞如何運用漫畫手法呈現新聞事件也是值得關注的焦點。以之前提及《動新聞》「恥 張誌家、陳致遠 求刑兩年」新聞（蘋果動新聞，2010年2月11日）來說，對照文字新聞報導 La New 熊隊前投手張誌家被起訴，導言說張「應訊時卻辯稱他為拒絕打假球，故意在比賽時弄破手指，提前下場」（蘋果日報，2010年2月11日），《動新聞》則以口語旁白敘述張「還謊稱他故意弄破手指皮」，並輔以漫畫慣用的氣球框顯示張「謊稱」說「故意弄破手指皮」（圖 11）。

再以美國 NBC 晚間及深夜脫口秀節目時段調動引發的收視大戰新聞為例，《動新聞》不但用漫畫手法，以亮燈泡表示 NBC 經理朱客的靈光一閃（圖 12），更利用圖像擅於表達空間概念的優勢，將節目時段「前後」移動（圖 13）及收視率「下」跌（圖 14）兩個抽象的空間概念「具體化」（蘋果動新聞，2010 年 1 月 19 日）。

此外，《動新聞》也用圖像展現新聞人物與「節目時段前後移動」和「收視率下跌」兩個抽象概念的「關係」：在圖 13 中，左邊的新聞人物朱客，欲將兩個節目「推」回原來時段，但右邊另一節目主持人康納卻不願意，死命阻擋；圖 14 呈現，隨著收視率下滑，畫面上雷諾的姿勢也越來越低，試圖不被下滑的收視率阻擋觀眾看到自己，但還是「撐不住」一路下跌的收視率（蘋果動新聞，2010 年 1 月 19 日）。

雖從媒材角度來看，《動新聞》的確發揮圖像媒材擅於凸顯空間及成分關係的特徵，但誇張的動畫卻易產生娛樂效果，使觀眾分心，輕忽新聞的重要性，



圖 11：運用漫畫氣球框



圖 12：以漫畫手法表現靈光一閃



圖 13：時段移動圖像化



圖 14：收視率下跌圖像化

或未能注意原有的新聞重點。本文認為，在上例中，《動新聞》已透過漫畫手法及文化，將新聞變成一場娛樂性極高的鬧劇，而這充分展現在它將新聞主角康納「化身」為綠巨人浩克（圖 15），以綠巨人浩克毆打 NBC 超人，比喻康納在其脫口秀節目中攻擊 NBC 主管（圖 16）（蘋果動新聞，2010 年 1 月 19 日），提供觀眾輕鬆的娛樂效果，而非嚴肅的新聞意義。

上例也凸顯動畫新聞運用動漫傳統，不但涉及圖像媒材資源的利用，如成分、顏色、物件大小、距離、角度及構圖等，更包含動漫文類（genre）及論述（discourse）的挪用。舉例來說，動畫新聞使用漫畫氣球框，其涉及的資源不僅只有氣球圖案，還有社會既存的「漫畫」文類（所以我們知道一個人頭上被畫上氣球時，氣球內的話語或圖像代表此人所思或所言）；動畫新聞運用圖像將新聞主角化身為「綠巨人浩克」或「超人」，其憑藉的資源也不僅只有形貌（如高大、滿身肌肉，穿著一條短褲的男性）及顏色（如全身綠色），還包括動漫「綠巨人浩克」及「超人」形象（英雄論述）。

換言之，對於動畫新聞運用動漫手法及傳統，我們不但要關心其使用哪些漫畫式圖像，更要注意其如何運用動漫文類及論述，產製何種新聞意義。同時進一步思考，動畫新聞如何在運用漫畫手法引發觀眾興趣的同時，又不至於過於娛樂化，喪失新聞重點或意義。

### 三、小結

本文指出《動新聞》之圖像畫面有時從當事人視角出發，採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不同於口語旁白符合傳統新聞對客觀報導的要求，採第三人稱進行新聞敘



圖 15：新聞主角康納化身為綠巨人浩克



圖 16：以毆打超人比喻攻擊主管

事。而且，在圖像呈現上，《動新聞》採動漫手法及文化呈現新聞，也可能降低動畫新聞的真實聲稱，衝擊傳統客觀新聞「如實」報導的要求。

而上述動畫新聞「真實性」和「敘事觀點」不僅衝擊傳統客觀新聞標準，更涉及 Craig (2006) 所說的「真相」(truth) 及「憐憫」(compassion) 兩大新聞倫理議題。一方面，對動畫新聞「真實性」的討論及要求，反映了新聞行業對「真相」的期待與追求；另一方面，動畫新聞產製者採不同「敘事觀點」進行新聞敘事，應心懷「憐憫」，尤其報導社會新聞，新聞產製者應思考，採第一人稱敘事的動畫新聞，是否可能對報導對象及消息來源造成傷害，以及引發何種閱聽人情緒反應（同上引：22）。

尤其採第一人稱的新聞敘事比第三人稱更能打動人心，與閱聽人產生情感聯繫，有更強的渲染力。動畫新聞採用圖像及口語媒材呈現新聞人物及場景，再加上新聞配樂，不但填補許多文字新聞沒有的媒材細節，將抽象文字描述具象化，也增加多感官的情感衝擊，其影響力與文字新聞相比，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未來動畫新聞設計應審慎考量圖像畫面之敘事角度，以及動漫手法和文化之運用，並且思考、研究可能對閱聽人造成之影響。

## 伍、結論與建議

本文認為《動新聞》在臺灣引發爭議，追根究源與新聞主要媒材從文字轉變成動畫有關。故本文從媒材轉換角度出發，以《蘋果日報》與《動新聞》為例，探討文字如何轉換成動畫新聞，以及媒材轉換如何一方面影響原有文字記者採集資料及查證範圍，另一方面衝擊傳統客觀新聞學，促使吾人再次思考新聞真實標準的問題。

本文的觀察及討論分為兩大部份。首先，本文指出將文字（新聞）敘述轉換成圖像，以及將文字引述轉變為口語配音，媒材轉換驅使新聞產製者填補大量圖像視覺（如形貌、空間關係、大小、顏色等）及口語聽覺（如腔調、語調、語訴及音量等）的細節資料。動畫新聞使用圖像及口語媒材，不但可能隱含社會刻板印象，更連帶影響傳統（文字）記者蒐集及查證資料的類型、範圍與深度，以及新聞產製分工及溝通。同時挑戰傳統新聞再現與真實的界線。

其次，透過《動新聞》個案，本文指出動畫新聞如何運用畫面鏡頭，以第一人稱進行新聞敘事，以及使用動漫手法呈現新聞，衝擊傳統新聞的客觀報導標準。本文認為，動畫新聞透過具體圖像，提供觀眾從第一人角度「觀看」新聞事件，不但須強化圖像媒材的資料強度，更應重視動畫新聞對相關消息來源及閱聽

人可能產生的影響。尤其動畫新聞使用動漫手法呈現新聞，其挪用的資源不僅只有動漫構圖與色彩等圖像媒材，還包括動漫文類及論述，皆有可能影響新聞呈現的意義。

根據《蘋果日報》報導，《動新聞》「以動畫輔助說明新聞事件的創新產品，不僅引起國外新聞網站的注意和爭相轉載……希望可以在報導中引用動新聞的動畫。」（李子凡，2009年12月3日）。但事實上，《動新聞》已非以動畫「輔助說明」新聞事件，而是取代文字及影像，成為呈現新聞的主要媒材。因此，從媒材角度切入，本文建議未來研究及討論可朝以下幾方面進行：

第一，不同媒材表達真實的潛力不同，例如與照片相比，圖畫較擅長虛構的幻想領域，而非事實領域，擁有較低的真實聲稱 (van Leeuwen, 2004: 16)。若是如此，由圖像媒材組成的動畫是否就不適用於強調事實聲稱的新聞？或是，動畫就像一般認為，較適於某些新聞類型，如科學或醫藥新聞（黃慧敏，2009年11月24日；蔡惠萍，2009年12月10日），因為它們可透過圖像表達科學及醫學領域的抽象概念，對「真實」的要求也不同于以人為新的新聞類型，如社會新聞。

第二，本文視圖像為動畫新聞的基本媒材，探討新聞主要媒材如何從文字轉換成圖像，但不可忽略的是，動畫新聞是由一張張連續圖片組成，進而形成新聞敘事。因此，未來研究可分析動畫新聞如何連結單張圖片，以及動畫新聞之敘事結構為何。

第三，本文聚焦於從文字到動畫新聞的媒材轉換，但針對動畫新聞本身，「多媒材搭配」是另一個值得研究的領域，亦即可分析動畫新聞如何搭配使用口語、書寫、圖像與音樂等多種媒材。雖然目前涉及新聞多媒材的研究多聚焦於報紙文字新聞與照片之間的關係，鮮少研究如電視新聞之影像、書寫及旁白聲音的關係，以及媒材之間的交互作用 (Wojcieszak, 2009: 459)，但少數研究電視新聞多媒材者，如 Baym (2004) 及 Wojcieszak (2009) 的研究或可借鏡。

第四，本文指出新聞主要媒材轉換將影響傳統（文字）記者的工作內涵及產製分工，故未來可深入探析新聞組織架構、產製流程及記者工作如何因應動畫新聞的出現，而有不同的設計與分工。舉例來說，在動畫新聞中，繪圖及配音已成新聞產製的一環，故可探析：繪圖及配音人員的組織位置為何？與記者及編輯的關係為何？記者工作如何因動畫新聞繪圖及配音的需要而變？其中可能面臨哪些衝突等。

第五，本文針對動畫新聞進行媒材轉換分析與討論，是將動畫新聞自媒體情境抽離，未考量不同媒體如電視、網路及手機等，對動畫新聞媒材使用，所造成

的可能影響。舉例來說，若放在電視新聞播報情境，主播的口語、表情及動作姿勢等，也成為動畫新聞的重要媒材，不但涉及動畫新聞多媒材搭配的問題，也可能影響動畫新聞的敘事結構。

第六，對發展中的動畫新聞，研究者除了可針對目前已出現的動畫新聞進行媒材分析，也可利用實驗法，一方面嘗試各種媒材搭配及敘事方式，開發動畫新聞的各種可能性，另方面研究觀眾對動畫新聞的理解及情感反應，以設計更好的動畫新聞。

## 參考書目

- 王泰俐（2004）。〈電視新聞節目「感官主義」之初探研究〉，《新聞學研究》，81：1-41。
- 牛隆光（2005）。《電視新聞「小報化」及其守門行為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 李子凡（2009年12月3日）。〈外媒爭相轉載動新聞〉，《蘋果日報》。上網日期：2010年6月11日，取自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2134443/IssueID/20091203](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2134443/IssueID/20091203)
- 沈錦惠（2007）。《電子語藝與公共溝通》。臺北：五南。
- （2005）。〈社群之知 vs. 客觀之知：從電子口語看電子新聞〉，《新聞學研究》，82：1-40。
- 紀慧君（2002）。〈編織新聞事實——紀律權力的觀點〉，《新聞學研究》，73：167-204。
- 陳浪任（2009年11月26日）。〈看了動新聞 NCC 喊夭壽 彭芸：動新聞根本不叫新聞 官員暗示壹電視新聞臺不會過了〉，《聯合報》，第2版。
- 黃慧敏（2009年11月24日）。〈動新聞引爭議 學者：描述犯罪細節侵人權〉，《中央社》。上網日期：2010年6月3日，取自 [http://www.etaiwanews.com/etn/news\\_content.php?id=1116684&lang=tc\\_news#](http://www.etaiwanews.com/etn/news_content.php?id=1116684&lang=tc_news#)
- 蔡惠萍（2009年12月10日）。〈動畫新聞「踐踏人性」 NCC 凍壹電視〉，《聯合報》，第7版。
- 蘋果動新聞（2010年2月11日）。〈恥 張誌家、陳致遠 求刑兩年〉，《蘋果日報》。上網日期：2010年2月22日，取自 <http://tw.nextmedia.com/animation/iplayer/msecid/1/type/Today/ArtID/32297454/TVID/2630/issueid/20100211>

- (2010 年 1 月 19 日)。〈收視差 招牌脫口秀改時段〉，《蘋果日報》。上網日期：2010 年 2 月 22 日，取自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J9m1an-pQ8&feature=relmfu>
- (2009 年 12 月 3 日)。〈「我要眼睜睜看她死」鐵鍊弑癡〉，《蘋果日報》。上網日期：2010 年 2 月 22 日，取自 <http://tw.nextmedia.com/animation/iplayer/msecid/1/type/Today/ArtID/32134410/TVID/604/issueid/20091203>
- (2009 年 12 月 2 日)。〈蒙面潛入房 打甩兩門牙 印傭毆劫女主人〉，《蘋果日報》。上網日期：2010 年 2 月 22 日，取自 [http://www1.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091202&sec\\_id=4104&art\\_id=13480379](http://www1.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091202&sec_id=4104&art_id=13480379)
- (2009 年 11 月 24 日)。〈狂漢斬路人 提頭逛街〉，《蘋果日報》。上網日期：2010 年 2 月 22 日，取自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2112447/IssueID/20091124](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2112447/IssueID/20091124)
- (2009 年 11 月 13 日)。〈「要去醫院」泰勞劫救護車〉，《蘋果日報》。上網日期：2010 年 2 月 22 日，取自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QN4awYPPF64&feature=player\\_embedded](http://www.youtube.com/watch?v=tQN4awYPPF64&feature=player_embedded)
- Baym, G. (2004). Packaging reality: Structures of form in US network news coverage of Watergate and the Clinton impeachment. *Journalism*, 5, 279-299.
- Bezemer, J., & Kress, G. (2008). Writing in multimodal texts: A social semiotic account of designs for learning. *Written Communication*, 25, 166-195.
- Costera Meijer, I. (2003). What is quality television news? A plea for extending the professional repertoire of newsmakers. *Journalism Studies*, 4, 15-29.
- Craig, D. (2006). *The ethics of the story: Using narrative techniques responsibly in journalis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Doumont, J. L. (2002). Verbal versus visual: A word is worth a thousand pictures, too.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49, 219-224.
- Dunn, A. (2005). Television news as narrative. In H. Fulton, R. Huisman, J. Murphet, & A. Dunn (Eds.), *Narrative and media* (pp. 140-152).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ckkrammer, E. M. (2004). Drawing on theories of inter-semiotic layering to analyse multimodality in medical self-counselling texts and hypertexts. In E. Ventola, C. Charles, & M. Kaltenbacher (Eds.), *Perspectives on multimodality* (pp. 211-22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Ekström, M. (2002). Epistemologies of TV journalism: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Journalism*, 3, 259-282.
- Huang, Y. K. (2008). Exploration the position and value of the animation-cartoon industry in China TV news communication. *China Media Research*, 4(2), 1-12.
- Iedema, R. (2003). Multimodality, resemiotization: Extending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 as multi-semiotic practice. *Visual communication*, 2, 29-57.
- Jewitt, C. (2004). Multimodality and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P. LeVine & R. Scollon (Eds.), *Discourse and technology: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pp. 184-195).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Johnstone, B. (2001). Discourse analysis and narrative. In D. Schiffrin, D. Tannen, & H. E. amilton (Eds.),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pp. 635-649). Malden, MA: Blackwell.
- Kaltenbacher, M. (2004). Perspectives on multimodality: From the early beginnings to the state of the art. *Information Design Journal + Document Design*, 12, 190-207.
- Kress, G. (2004). Reading images: multimodality, representation and new media. *Information Design Journal + Document Design*, 12, 110-119.
- (1998). Visual and verbal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in electronically mediated communication: The potentials of new forms of text. In I. Snyder (Ed.), *Page to screen: Taking literacy into the electronic era* (pp. 53-79). London: Routledge.
- (1997). Visual and verbal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in electronically mediated communication: The potentials of new forms of text. In I. Snyder (Ed.), *Page to screen: Taking literacy into the electronic era*. (pp. 43-79). Sydney, Australia: Allen & Unwin.
- (1986). Language in the medi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omains of public and privat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8, 395-419.
- Kress, G., Jewitt, C., Ogborn, J., & Tsatsarelis, C. (2001). *Multimod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rhetorics of the science classroom*. London: Continuum.
- Kress, G., & van Leeuwen, T. (200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 (2001).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London: Arnold.

- Kroon, Å. (2006). The gendered practice and role of pull quoting in political newspaper journalism. In M. Ekström, Å. Kroon, & M. Nylund (Eds.), *News from the interview society* (pp. 165-184). Gothenburg Sweden: Nordicom.
- Opgenhaffen, M. (2008, May). *Redefining multimedia: The (dis)integrated use of multiple media and modalities in convergent journal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Quebec, Canada.
- Rundblad, G., Chilton, P. A., & Hunter, P. R. (2006). An enquiry into scientific and media discourse in the MMR controversy: Authority and factuality. *Communication & Medicine*, 3, 69-80.
- Stöckl, H. (2004). In between modes: Language and image in printed media. In E. Ventola, C. Charles, & M. Kaltenbacher (Eds.), *Perspectives on multimodality* (pp. 9-3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van Leeuwen, T. (2006). Towards a semiotics of typography. *Information Design Journal*, 14, 139-155.
- (2004). Ten reasons why linguis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visual communication. In P. LeVine & R. Scollon (Eds.), *Discourse and technology: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pp. 7-19).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1999). *Speech, music, sound*. Hampshire, UK: MacMillan.
- Wojcieszak, M. E. (2009). Three dimensionality: Taxonomy of iconic, linguistic, and audio messages in television news. *Television & New Media*, 10, 459-481.
- Ytreberg, E. (2001). Moving out of the inverted pyramid: Narratives and descriptions in television news. *Journalism Studies*, 2, 357-371.

# A Mode Transformation Approach to the Effect of Animated News on News Production and Standards: A Pilot Study of News-in-Motion

Chiang, Chin-Chih\*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ome controversy concerning “News-in-Motion” exis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written texts to ani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 transform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pple Daily website’s “News-in-Motion” section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nimated news on traditional news production and standards.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when transforming an article from written to animated form, news producers need to ad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visual and oral detail which influences news gathering and verification. Moreover, visual and oral representations in animated news may imply ideologies just as with written texts, impacting news perception and audience judgment.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imation culture and techniques, and by at times narrating a news story from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via video maneuvers, “News-in-Motion” not only challenges traditional objective journalism but also invokes ethical discussion related to truth and compassion.

**Keywords:** speech, written text, animated news, mode, visual

---

\* Email: [morecc@nccu.edu.tw](mailto:morecc@nccu.edu.tw)

Received: 2010.07.06

Accepted: 2011.05.06

## 電視政論與政／媒互動實踐初探\*

唐士哲\*\*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

### 摘要

隨著近年來電視政論節目蓬勃發展，名嘴論政所牽涉的話語權壟斷，以及對於民主政治常態實踐的影響，成為亟待探索的問題。本研究將電視政論視為一個制度化的政治實踐，並由探究政治論述話語權壟斷特性，探討電視政論節目在政治論述以外的另一個重要面向——政論在當前臺灣民主政治中的治理意涵。相較於早期政論節目由政治人物作為主要參與者，現今政論節目參與者則絕大部分為專業媒體人或政治評論家。政論的「專業化」，除了彰顯政治說服轉趨工具理性化，也某程度影響當前政府政策施為以及政黨政治的運作實踐。鑑於政論的廣泛輿論影響力，政治場域的「回應機制」，是將政論實踐納入政治運作過程中，試圖遷就政論節目的影響力，從而也使得政論有了治理的意涵。

**關鍵詞：**名嘴、治理、政治實踐、電視政論

---

\* 本論文為行政院國科會計畫（制度化的電視政論與政／媒互動實踐分析）（計畫編號：NSC 99-2410-H-194 -104 -MY2）的部分執行結果。期刊二位審稿者細心審閱，給予不少寶貴意見，僅此一併致謝。

\*\* Email: shihchet@gmail.com  
投稿日期：2010 年 7 月 17 日  
接受日期：2011 年 11 月 29 日

## 壹、緒論

在臺灣政治與社會民主化過程中，電視政論的興起具有指標性的意涵：電視政論的社會評價，由十多年前廣電秩序初開放之時，被寄予電子審議政治的代理者厚望，而至今天被越來越多批判的聲音貶抑為民主政治的「負資產」。電視政論窄化的議題選擇、偏激的言論與激情的表演、以及充斥小道爆料的文化，引來知識份子與學者不少的批判（南方朔，2009；姚人多，2009；張大春，2009；張景為，2008；陳玉慧，2009；蔡詩萍，2009）。在譴責電視政論激化對立的同時，多數批判的聲音，將矛頭指向電視政論中的「名嘴」。

檢視這些對名嘴的批判，約莫可被歸納為四點名嘴的「行徑」：

- 一、爆料：透露政黨或政治人物的後臺行徑，如貪腐、性醜聞，但多半以保護消息來源為由，拒絕提供明確的證據。
- 二、干預：對特定司法訴訟或行政事務的細節多所批評，並以連續且集中的議題談論方式，試圖短期內造成強大輿論壓力，以改變現狀，例如迫使不適任的官員下臺，或者在重大司法案件中，對不適任的偵辦人員道德操守的質疑。
- 三、結黨：於選舉前在節目中為特定候選人或政黨抬轎，並整肅異己；選舉後，在政論議題的選擇上或政治論述建構上，不避諱彰顯對特定政治人物或政黨的好惡。
- 四、營私：因個人的輿論影響力，成為特定權勢團體或個人酬庸或籠絡的對象，並試圖用此為自己圖謀更多的名聲或財富利益。

這些批判，多半反映對電視政論「論越分際」的集體社會焦慮。一如南方朔（2009年7月16日）的警語：名嘴跨越媒體及政治兩界，他們可輕鬆製造道德民粹氣氛，可操弄司法政治，也可炮製新的政治正確。電視使得批判時事成為民主社會裡的常設「臺諫」，雖然理想的設計應該是使得關心公共事務的知識份子、社會團體，以及市井小民得以發聲，並有機會與權力團體對話討論，甚至藉此監督時政，但現有的電視政論，卻使得臺諫被「專職化」，成為少數具特定專業身份的人士藉由言詞表演而左右政治情勢的工具。批評專職化，形同批評的「自我異化」（張大春，2009年8月4日）。這些使得政論名嘴不僅是一個媒體現象，更是一個政治與社會現象。

將名嘴視為一現象，本文希望另闢一個探究政治傳播社會意涵的路徑，即由「名嘴化」來探究現今政論節目的廣泛影響力所涉及的政媒互動過程演變。在臺灣過往的經驗研究中，多數對於電視政論的分析，傾向以審議民主的標準評估政

治討論節目內容的表現（盛治仁，2005；陳昭如，1994；楊意菁，2004；盧世祥、林育卉，2004），或者探究閱聽眾政黨認同屬性與收看動機間的關連性等（張卿卿、羅文輝，2007）。然而除了政論節目文本表現與閱聽人收看動因外，電視政論節目對於當前民主政治發展帶來的影響則鮮少觸及。除了節目製播單位以及個別閱聽人外，政論節目還牽涉到政黨政治實踐過程中的一些要角，如政黨、特定政治人物，以及政府治理機構等。這些要角基於政論的民意代表性，也是政論節目的閱聽眾，但他們作為閱聽眾的意義，比起「一般的」家居閱聽人要複雜許多。對於他們而言，政論節目已成了勤跑基層外，瞭解民意動態，甚至藉此影響政治施為或政策治理的一個重要管道。

當政論不僅止於在媒體中討論政治事務，且政論節目所造就的「名嘴」，在政治過程中發揮某種程度的影響性，政論在現今臺灣政治文化的發展中，已可被視為是一個制度化的政治實踐。所謂「制度化」，是指一些參與者慣例性的在電視中討論政治，不單只是個人作為，它還牽涉到電視機構，以及電視機構與電視以外的相關場域間互動與溝通的模式化 (Cook, 2005)。

本文將電視政論作為當今臺灣民主政治發展的一種常態化的政治實踐。以下的討論，將先探討電視政論為何應被視作民主政治的常態實踐；並繼而以當今各個政論節目的與談來賓架構作為觀察重點，審視當前政論節目參與來賓的特性以及與過往的差異，並藉此凸顯當前政論節目「名嘴化」的傾向，以及其作為民主政治實踐的意涵。本文繼而觀察「專業化」的政論實踐，在現今民主政治中愈趨工具理性化的政治傳播文化中，代表的意義為何，以及在政媒互動的層次上，政治場域如何調適政論實踐。本文主張探究政論節目的意涵，應可跨出單純的節目類型或閱聽人的收視效果等評估的框架，並扣連至當代民主政治實踐，以探討政論在現今政治「治理」過程中扮演的意涵。

## 貳、作為政治實踐的電視政論

若欲瞭解政論名嘴在現今整個民主政治過程的意義，除了審視個別節目的論證或修辭風格，或者製播條件，本文主張更應由政論的常態化節目實踐開始探究。因此，以下討論不擬從節目內容說了什麼著手，而將重點先放在一些構成政論節目形式的常態性設計。

社會學近年來對於「實踐」(practice)意涵的重視，將實踐視為突破傳統結構(structure)與個人能動性(agency)間二維困境的另一思考路徑。不主張

人的主觀意識創造社會意義，也不強調既定的社會規範限制或型塑個人意識或行動的意義，「實踐」將探究重點放在觀察慣例性社會行動的過程中，意義如何生成、個體如何在特定意義系統中受限制與尋求突破，以及集體規範如何在實踐的過程中生成與轉變（見 Bourdieu, 1977; Swindler, 2001）。

實踐意涵運用於媒介理論，可以突破傳統傳播媒介研究的「功能」思維，重新思考媒介與社會之間的關係（Couldry, 2006）。功能論假設社會的整體性，並把傳播媒介視為構成有機社會整體性的一個重要的功能性機構，但這樣的設想，往往窄化了傳播媒介實踐的動態特性。比方說，如果我們預先假定政論節目應該具備傳遞政治訊息，且增進閱聽人公共事務討論的機會，則關於節目的種種表現，馬上會被放進一個不利於集體閱聽人整合的社會功能目的前提，但任何目的論的假定社會整體性之必然，並將傳播媒介的種種表現以促成整體性的社會目的探究其功能，只是忽略了許多因傳播媒介而產生的其他社會實踐。

本文援此視野，將電視政論節目定位為常態化的節目實踐，同時強調這種常態化實踐也涉及社會或政治過程的一些演變。以電視政論而言，作為一種節目類型，電視政論是每天固定時段裡固定上演的政治言談，閱聽眾除了在家觀看，政論內容也成為閱聽眾轉述，或與其他人閒聊或爭辯的話題；因此，政論作為民主政治的言談實踐，具有儀式般的形式化與週期性。閱聽眾每天於固定的時段可以看到這個節目，並熟知這個節目的基本運作規則、言談中顯露的政治認同態度基調，與特定節目中哪些人說了哪些話，特定論點是否言之成理，同等重要。換句話說，電視政論所彰顯的民主政治實踐，包含了一整套的符號、意義或者高度重複性的收視習慣（見 Schudson, 2001）。

這種常態性的節目安排，使得電視政論的實踐，類同一種民主政治實踐的「建置」（institution），在定時且持續的播出過程中，它展現民主政治實踐過程的常態性。相較於數年一次的選舉，或者礙於客觀公正的標準的政治新聞，電視政論因為常態播出，且充滿情緒性言談，顯得在語境上更貼近於日常生活，且目前多數節目接受觀眾 call in 表達意見，或者 call out 給相關當事人的節目設計，使得電視政論投射了民主政治中審議制度實踐的想像：意即民主政治的決策過程中，有部分的制度設計是開放給公眾諮詢，且公眾諮詢的特性是參與者資格不設限。

然而，目前多數政論節目的實際運作，與開放的公眾參與的理想顯有不少的差距。即便開放 call in 是多數政論節目會有的作法，它們多半僅出現在節目討論的邊陲時段，且往往淪為陪襯性質，遠多過實質被納入討論或辯論的節目主軸

中。這類 call in 的「聲音公眾」，因為表達的意見都是獨立存在，並未在節目中與他人討論溝通，因此並未能夠體現真實民意藉由意見互動所彰顯的「公眾性」（見楊意菁，2004）。

若真正開放且平等的「公眾參與」並未在政論節目的建置中落實，則參與電視政論實際討論的評論員，顯然就成為探究當前電視政論政治實踐的實際主體。在臺灣的政論節目討論中，「名嘴化」的現象所引發的關注，也多半與少數評論員壟斷多數節目的討論有關。這種話語權的壟斷現象，多少反映電視作為一經濟單位的「成本」考量：一方面，重複的使用特定專業背景的與談人，可以減少因為不熟悉與談人專業程度或論辯能力是否得宜而產生的不確定性，同時降低製作單位需要持續開拓新的與談人選的壓力。同時，與談人的重複性，投和了電視節目維繫其觀眾向心力的一個重要特性——熟悉感（familiarity）。一如其他節目類型如連續劇或綜藝節目，電視傾向藉由重複與可預測的內容培養閱聽眾的收視習慣，藉此增加他們對於節目內容的認同感（Feuer, 1983; Marshall, 1997），而政論名嘴正是基於這種考量下的產物。正如研究電視名流文化的學者 P. David Marshall (1997) 指出，相較於電影明星與影迷間的遙不可及，電視塑造的名流特性在於維繫觀眾的熟悉感，並藉此深化名流與觀眾間較為「親密」的情感聯繫。因此，「個人人格」形象的培養與深化，成為電視創造且維繫其熟悉感的重要機制。

正因為如此，本文主張，電視政論名嘴化的現象，不應只是單純視為是節目文本的特性，並因此僅以節目文本表現是否符合審議民主理想去評斷，名嘴話語權的壟斷，更在民主政治的實踐過程中，也涉及（involve）一些常態的政黨政治實踐，並因此必須拓及廣義的政黨政治或政府治理的過程。正如本文在開頭時，所檢視的諸多對於名嘴現象的批判，這些批判凸顯的，正是電視政論的社會實踐不單只是媒介實踐的焦慮。由政論節目中獨厚「誰」的參與，可以大致瞭解臺灣政論節目的名嘴化現象，是如何造成政治與媒體兩個場域互動的變遷。因此在下一節的討論中，本文將以當前政論節目的參與者的屬性為分析重點，探討這些節目中參與者參與節目討論的模式，並藉由不同時期的實證研究比對，探究近年來興起的名嘴現象背後所凸顯的政／媒互動變化。

## 參、名嘴現象背後凸顯的政／媒互動變化：歷時性比較

一如 Herman & Chomsky (1988; 亦參見 Hoynes & Createau, 1991) 在《製造甘願》(Manufacturing consent) 中主張，傳播媒介對於特定國家或私人利益團體所動員的輿論支持，可以清楚的由這些媒介內容中被刻意凸顯、遺漏、或強調中查出端倪。政治論述霸權的鞏固與維繫，有傳播媒介種種機構內與機構外的複雜考量。即便有形的公眾輿論，似乎皆呈現名嘴壟斷政治論述的問題面向，但這個現象有其社會脈絡的差異性。換句話說，臺灣的政論節目發展，並非總是同樣一群屬性的參與者在主導發言場域。

為了凸顯這個差異，本文先藉由一個歷史剖面的對照，凸顯目前政論節目的參與者特性。在過去十多年來，政論節目的研究產出不少實證性的資料。這些在不同歷史階段出現的政論節目分析，皆曾呈現政論節目參與者的專業特性。若將這些不同歷史時期的政論節目參與者名單作一比對，則可察覺出名嘴話語權的壟斷情形，經歷過一些趨勢上的轉變。

例如彭芸在 1998 年三合一選戰前，針對當時 14 個電視政論節目的觀察，當時政黨人士如候選人、政黨代表、政黨發言人，以及現任的民意代表涵蓋了超過三分之二的來賓比例；而尤以政黨候選人出現的次數為最頻繁，佔了所有來賓總數的百分之 50 (彭芸, 2001: 120-121, 見該文表 3-5 與表 3-6)。顯見在當時的電視政論中，參與來賓幾乎清一色為政治人物。特別在立委選戰期間，各政黨候選人密集的出現在政論節目中，成為塑造形象，以及將政見快速傳遞給選民的一個重要管道。而專業的媒體工作者如記者、主筆或總編輯等，在當時仍未出現在政論節目的與談人名單中。

而在楊意菁於 2003 年左右針對《2100 全民開講》的分析，以及盛治仁在同時期針對 9 個談話性節目的來賓組成分析中，媒體記者或媒體工作者職銜，開始較為頻繁的出現在節目討論成員名單中。楊意菁 (2004) 發現在《2100 全民開講》中，有高達 57.7% 的節目參與者為民意代表。媒體工作者則開始出現在該節目的討論成員名單中 (5.3%)，但頻率仍遠低於民意代表、專家學者，以及各黨的黨工及政黨人士。而盛治仁 (2005) 的分析，則顯現在 2002 年左右，多數政論節目中媒體記者的參與頻率已開始顯著增加，達到 21.9%，但參與的密切程度，仍低於當時居冠的各黨立法委員 (37.3%)。

為了與前述不同歷史時期的政論節目作一對照，本研究於 2009 年 4 月紀錄了一整個月份臺灣各個電視臺的政論節目來賓參與情形，目的是瞭解這些節目

中，常態性的節目參與者有哪些，同時瞭解不同節目中參與頻率最高的與談者參與節目的情形。觀察對象為包括 TVBS、三立、中天、民視、東森、公視等六個頻道總計 12 個政論節目。這 12 個政論節目中，有 11 個是在一般商業有線電視頻道播出，一個由公共廣電頻道製播。這些節目星羅棋布的散佈在各個新聞臺與綜合臺下午以及晚間的時段。若不包含重播，這 12 個節目每週製播時間總計有 91 小時<sup>1</sup>。

在觀察的這一個月中，12 個政論節目中總共有 1,217 人次的參與者出現在各個節目的討論中（見表 1）。其中，媒體記者的參與人數，顯然高過其他專業身份的參與者，達 44.2%，而職銜為政治評論家則有 19.2%。相對而言，過往曾為節目參與的主軸的各級民意代表，則呈現大幅下降的趨勢，包括現任或卸任立委，以及縣市議員等加總起來，大約僅及 15%。

參與者身份	參與人次	百分比
媒體記者	538	44.2
政治評論家	233	19.2
現任立委	91	7.5
學者專家	78	6.4
縣市議員	64	5.7
民間社團代表	69	5.3
專業人士	60	4.9
前任政府官員	29	2.3
前任立委	23	1.9
政黨代表	21	1.7
現任政府官員	6	0.5
其他	5	0.4
合計	1,217	100%

表 1：各政論節目與談者身份分佈表

將上表與前述幾個不同時期的政論節目表現對照來看，則在參與者的專業屬性上，可以明顯的看出不同時期的變化。若以盛治仁與楊意菁等人研究觀察的 2003 年前後作為一分期，則 2003 年前，政論節目討論的主要成員仍是以政府與政黨相關的人士為主要參與者；民意代表如立法委員以及專職黨工顯然是政論節

1. 本研究以一個月作為觀察期，並不擬針對特定新聞議題的個案顯著性定位觀察期，亦未刻意選擇選舉競選期間，凸顯政論節目在這段時間，因各黨選舉造勢而刻意挑起的爭議性政治話題，本研究的觀察期間，純粹取其「常態性」。

目討論的核心成員。特別在選舉競選時期，民意代表候選人以及黨工佔了參與者的多數。其後，媒體工作者參與政論的頻率顯著提升，但整體而言，多數節目中政論的參與主軸仍是民意代表。相較之下，本文觀察的 2009 年期間，媒體工作者以及政治評論家儼然成為政論節目邀約參與者最受青睞的對象。

為了更進一步呈現這種參與者屬性的改變，本研究繼而觀察各政論節目參與者參與情形，並將個別節目中參與次數最高的三名參與者參與情形顯現於表 2。

表 2 呈現在絕大部分商業電視機構製播的政論節目中，幾乎都有少數來賓高度重複參與節目討論的情形。在 12 個節目中，有 9 個節目在超過一半的集數裡，固定邀請 1 至 3 個來賓參與，其餘的節目亦有三分之一的集數有固定的節目來賓。其中，幾個在晚間黃金時段的節目如三立的《大話新聞》、TVBS 的《2100 全民開講》，以及民視的《頭家來開講》，前 3 名的與談者幾乎出現在這些節目的每一集節目中。以三立的《大話新聞》為例，有 4 名來賓出現在觀察期間每一集的節目中，若以每集固定邀請的 7 位來賓觀之，則該節目超過半數的參與者固定不變。這使得他們在節目中的角色，不再僅是單純的與談者，而成了節目「常設」的評論員，即便在節目中，他們仍以「來賓」被稱呼之。其他一些較具指標性的政論節目，如《2100 全民開講》、《頭家來開講》、《中天駭客》、《文茜小妹大》等，亦有頗高的參與者重複出現的情形。唯一堪稱異數的是公視的《有話好說》，不論就與談者的重複性或者與談者專業背景上，皆不如一般商業臺的政論節目同質性來得高。

另外，這些政論節日常客遊走不同節目的情形也很普遍。觀察期間，共有 8 個參與政論節目的常客（吳國棟、陳揮文、楊文嘉、陳立宏、張友驊、唐湘龍、沈富雄、劉益宏、胡忠信，如表中加黑名字所示），在兩個或以上的節目裡，參與次數皆名列該節目的前 5 名。其中，由立委轉換跑道的沈富雄，成了 4 個政論節目中曝光頻率最高的常客。然而即便如此，政論節目的常客參與者分屬兩個陣營，且個別參與者幾乎沒有互跨到其他陣營的情形。

由表 2 中檢視各個政論節日常客的專業背景（節目中的稱謂），則可發現名嘴的專業經歷同質性頗高，多數為媒體工作者。在 12 個節目中，有 3 個節目曝光率最高的前 3 名與談者都標榜是資深媒體人，其餘的節目則至少有 1 位資深媒體人固定參與。目前在政論節目中，仍舊維持高曝光頻率的民意代表，僅邱毅 1 人。

將上述的歷時性比較視作為一個趨勢的改變，則顯然政論節目作為論壇的意涵，在早期與近期呈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特性。

頻道	節目名稱	總集數	參與者姓名	參與次數 (%)	節目中稱謂
三立	大話新聞	22	吳國棟	22 (100)	資深媒體工作者
			鍾年晃	22 (100)	資深媒體工作者
			徐永明	22 (100)	政治評論家
TVBS	2100 全民開講 (含週末開講)	30	陳揮文	26 (87)	資深媒體人
			邱毅	23 (77)	立法委員
			楊文嘉	21 (70)	政治觀察家
民視	頭家來開講	22	陳立宏	22 (100)	資深媒體人
			黃裕宏	20 (91)	21 世紀憲盟總召
			林建隆	14 (64)	政治評論者
TVBS	新聞夜總會	22	張友驊	10 (46)	政治評論者
			林朝鑫	7 (32)	媒體工作者
			董智森	7 (32)	媒體工作者
中天	中天駭客	18	唐湘龍	14 (78)	政治評論家
			沈富雄	12 (67)	前立委
			劉益宏	10 (56)	資深司法記者
中天	文茜小妹大	4	胡忠信	4 (100)	政治評論家
			沈富雄	3 (75)	前立委
			李桐豪	2 (50)	教授、前立委
TVBS	國民大會	22	馬西屏	8 (36)	資深媒體人
			溫紳	7 (32)	資深媒體工作者
			楊憲宏	6 (27)	資深媒體人
TVBS	新聞不一樣	22	蘭萱	13 (59)	資深媒體人
			董智森	8 (36)	資深媒體人
			劉駿耀	7 (32)	資深媒體人
中天	新臺灣星光大道	22	陳揮文	20 (91)	媒體工作者
			劉益宏	14 (64)	資深司法記者
			沈富雄	12 (55)	前立委
三立	新臺灣加油 (含週末)	30	吳國棟	16 (53)	資深媒體人
			陳立宏	13 (43)	資深媒體人
			陳明義	13 (43)	國民黨北縣議員
東森	攔截新聞	22	唐湘龍	20 (91)	媒體工作者
			林朝鑫	10 (45)	資深司法記者
			黃光芹	10 (45)	媒體工作者
公視	有話好說 (含週末 NGO 開講 與南部開講)	30	梁國源	4 (13)	研究機構院長
			盧燕俐	4 (13)	財經雜誌總編
			梁彥平	3 (10)	大學助理教授

表 2：各政論性節目與談者出席率前 3 名名單

早期政論節目的參與者由於多屬政黨專業人士，因此政論節目的論壇功能類同政黨政治互動的「平臺」角色。根據彭芸（2001）以及楊軍良（1997）的觀察，當時政論節目製作單位為了凸顯中立立場，常安排各黨代表同桌討論或辯論。例如《2100 全民開講》在初期，猶以當時各黨中央或地方民代、黨發言人、黨文宣部部長，或者政府發言人等為參與節目主軸（見楊軍良，1997：170-196，第16章）。即便在選舉期間，政論節目多半淪為各黨政治動員或候選人造勢的工具（彭芸，2001），但由於節目設計的來賓參與模式，強調不偏廢特定主流政治立場的政治成員，因此議題的形成與討論，多半在立場對立氛圍下，在節目裡藉由參與者的言辭攻防中顯現。藉由常態性的安排不同政治光譜的政治人物至節目中參與討論，節目等同是一個政黨政治動員、政策意見與評論交換的「平臺」，提供給各黨或政府人士進行政治理念溝通、政見宣傳或者政策說明辯論。即便政論節目成為政黨競爭下的延伸，所有為了塑造輿論氛圍、博得民意認同的政治策略操作，仍然在節目產製邏輯試圖營造中立的前提下，呈現在參與者的言辭展演中。

時過境遷，媒體工作者近年來儼然已成政論節目參與的新主力。與 90 年代相比，近幾年政論節目中所型構的政治論述實踐，顯然因為媒體專業人士角色重要性的提升，以及政治場域的成員相對的被邊緣化，而顯得由政黨政治系統的動員與運作中獨立了出來。不但民代、黨工或政府發言人淡出政論節目，許多節目更將媒體工作者或政治評論家的評論角色固定化，這可由表 2 裡，多數高收視率節目中，少數參與者成為常設評論員中觀察出。

這個趨勢的變化，透露近幾年來電視政論文化脈絡的變遷。根據張景為等人的觀察，2005 年後，隨著陳水扁執政後期許多弊案的揭露，如 Sogo 案、國務機要費，以及二次金改等，以及隨後的紅衫軍倒扁行動，政論節目議題討論的走向明顯日趨以挖掘及批判政治人物的問題行徑作為焦點，對於政治人物後臺行徑的檢視，主導政論節目的議題。特別是 2005 年 9 月高捷弊案爆發後，政論節目連番的揭弊曾導致民進黨立院黨團抗議，點名封殺《2100 全民開講》，要求黨籍立委與黨工不再接該節目的通告。這些皆使得政治人物如立委以及政府官員，逐漸退出政論節目的舞臺，而能言善道，熟知政治內情，且習慣在時間壓力下產出說法的資深新聞記者，成為政論節目來賓的新主力（見唐在揚，2005 年 9 月 27 日；張景為，2008 年 11 月 25 日；彭顯鈞，2005 年 9 月 28 日）。

歸納上述討論，目前的政論節目所呈現的與談者特性，迥異於早期政論節目主要在兩點：

一、常態性的政黨間意見互動消失：目前名嘴主導的政論文化，整體而言呈現兩個陣營各說各話的態勢。這兩個陣營的政論節目，各自擁有其名嘴，且彼此幾乎沒有互動，特別是常態性出現在節目中的來賓，幾乎沒有橫跨不同陣營的政論節目。

二、政黨勢力與媒體專業勢力間一消一長：政論節目不再扮演政黨政治訊息或立場交換的平臺角色。「專業」的媒體工作者主導下，電視政論的政治言談不再是政黨政治互動的展演表徵。

這兩個趨勢的變化，呈現政論節目作為電子媒介論壇的特性顯著改變：如果早期政論節目是政黨政治的延伸，由民意代表、黨工、政府官員或發言人，以及競選時的候選人為主軸的討論成員，在節目中針砭時事，政論節目作為論壇，扮演既有政黨政治運作的工具角色，如今的討論成員，已經自成一獨立運作的體系。以標榜「專業評論」的媒體工作者或政治評論家為主軸，專業媒體人或評論人取代政治人物，成為電視政論節目的主要成員，也象徵電視政論由政黨間政治資訊交換或意見論辯的附屬平臺，成為自成一格，且相對獨立的政治論述場域。

## 肆、說服的工具理性化

對於上述這兩個趨勢，該如何解讀其作為政治實踐的意涵？

一如一些西方的政治傳播學者的觀察，電子媒介的蓬勃發展，正在改變政治傳播的風貌 (Blumler & Kavanagh, 1999; Mancini, 1999; Mazzoleni & Schulz, 1999; Moog & Sluyter-Beltrao, 2001)。特別自 1980 年代後，有線電視的興起帶來的頻道增加，以及近年來網際網路等互動式媒體的出現，使得政治傳播存在的空間不再僅限於報紙政治版、每天數節的電視新聞，或者每週或每月定期出版的政論雜誌中。在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中，電子媒介的增生也帶動許多跨越單純政治資訊提供的新的政治傳播實踐。以電視而言，頻道增加使得政治人物在電子媒介鏡頭前曝光機會增加，也使得政府政策制訂、施政品質以及政黨運作過程受到更多媒體的檢視。這促使政治場域開始尋求各種形象管理或者議題塑造的手段，試圖調適 (accommodate) 或進而收編媒介的影響力 (Blumler & Kavanagh, 1999; Schulz, 2004; Strömbäck, 2003)。包括政治公關、形象顧問、競選廣告、民意調查等，皆在電子媒介興盛的年代裡，成為建構政治事務公眾意涵的主要技術，而隨著這些與民意相關的技術興起的，則是一些與傳播產業相關的專業人士 (Mancini, 1999; Mayhew, 1997)。而這些民意技術無不以左右媒體的政治訊息產製為目的，

它們造成的政治 3C 現象：名流化（celebrity）、消費化（consumerism）、犬儒化（cynicism）則成為電傳媒介影響下，新起的風格化政治實踐（Corner & Pels, 2003; Street, 2003）。

政論節目在這個「媒介豐饒」（media abundance）的環境中，顯然也成了 3C 現象的表徵。這種類型的節目在許多國家的出現與蓬勃發展，除了是「媒介式民主」（mediacracy）的重要表徵，也可從中觀察新型態的專業論政傾向（見 Blumler & Kavanagh, 1999; Meyer, 2002）。在美國，政治談話性節目自 1980 年代以來，即成為華盛頓平面媒體記者跨業或兼職的龍門捷徑，參與政論的名嘴，甚且取代 1970 年代報紙的調查報導記者，成為最負盛名的媒體人，因此平面媒體也受其影響，在報導的寫作風格上變得更為激進，更強調對議題凸顯特定立場（Rosenstiel, 1992）。在以色列，電子媒介在 1990 年代民營化後，新的民營電視臺開始在晚間黃金檔時段製播政論節目，且由於推出後受到歡迎，這些新起的「政治脫口秀」迅速取代曾經在公營電視臺壟斷年代中扮演公共資訊角色的晚間新聞，成為公共事務意涵的主要代理者。同時，採取討論或辯論的手法，還由這些政治脫口秀節目中，蔓延至重大新聞事件發生時的即時新聞報導中（Liebes, 1999）。在瑞典，政治人物的醜聞成為政論節目熱中的談話話題，且所謂專家常常在節目中，成為市井小民公開質疑的對象；這些節目也使得民眾對於政治的看法，傾向犬儒化（Ekström & Johansson, 2008; Phillips, 2007）。而在法國政論節目中，平面媒體記者熱衷上電視談論政治的現象，則促使布迪厄在《論電視》書中批判記者論證所呈現的政媒結構性的象徵暴力。這些國家的政論節目雖然所呈現的風貌不一，但它們共同彰顯電視作為公共政治論壇的功能，已被專業化的政治批評所主導。

這些以政治或政策辯論形式大量複製的政治言談情境，無異是另一種產出快速民意技術的重要代理者。若說民主政治的運作，仰賴各種政治意見的提出，以及藉由說服溝通歧異，則政論節目中，由少數熟知媒體資訊運作規則的專業媒體人主導的政治說服，無異使得說服「工具理性化」<sup>2</sup>。根據 Leon Mayhew (1997:

2. Mayhew 將傳播專業人士主導的政治說服與「工具理性」一詞連結，明顯召喚出韋伯、法蘭克福學派及至哈伯瑪斯對於現代社會只問效率與手段，卻不擇目的的批判。「工具理性」關切「如何」的問題甚於「為何」的問題，採取何種手段可以最有效達到目的成了關切的重點。法蘭克福學派早期的文化工業批判論述，即受到韋伯影響，將重點放在工具理性的擴張影響。例如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其著作《理性的消蝕》（*The Eclipse of Reason*）（1947）中，分析納粹政治的興起，為何在當時德國社會是在理性上站得住腳的時，以手段/目的的區別，分別追溯了西方哲學的理性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三種不同的理性：客觀理性、主觀理性，以及工具理性。根據霍克海默，西方社會的發展，正由客觀理性過渡到主觀理性，且逐步朝向工具理性發展。這個發展

190)，所謂說服的工具理性化，是指在專業的傳播者影響下，政治說服不再是政治理念、嚴謹且本於事實的詳實闡述，或基於公共政策目的關懷的論辯，而是依據效能與短期目的性而設計的工具化的政治說服。這種起因於「專家傳播者」（expert communicator）精心設計的說服，已經使得政治的影響力過份膨脹，因為其缺乏真實社會關係的支持，且不鼓勵參與者真誠的對話，而是基於特定利益目的，試圖鎖定閱聽眾既定的好惡，並藉由種種語藝的技術來操縱這些好惡。說服的工具理性化，使得政治論述的語藝實踐，脫離真實公眾社會生活的架構，其所試圖喚喚的「新公眾」，類似市場中的消費者。一如 Mayhew 主張：「當說服演變為全然的工具化，其技巧便由效能（effectiveness）的標準所主導，原有使得閱聽眾得以將信賴託付給說服者的誠意保證也因此瓦解。」

Mayhew 以社會學及批判理論的工具理性概念，凸顯政治語藝在面臨電子媒介代理民主政治角色日益深化影響下面臨到的衝擊。說服的工具理性化，對於傳統政治社群與政治過程的衝擊，主要在於對於「專業」衡量的標準，是建立在政治影響力的「行銷」上。誠如 Paulo Mancini (1999) 主張，不論是廣告、公關或者民調等專業，在過往皆為商品行銷服務，同時也受到市場經濟理性所規範，而現在這些行銷手法則大舉入侵政治場域，成為選舉，甚至是尋常時期政治組織或動員的主要手段。它們除了帶來新的市場行銷作法來包裝政治，更在過程中，逐步改變政治人物以及政黨的一些思維。比方說，如果傳統理想的政治人物堅持政治理念，捍衛特定核心政治意識型態，同時政治人物所屬的政黨，扮演維繫政治理念價值的奧援系統，則新的工具化說服，不再以理念為依歸，強調的是運用特定技巧，投和特定觀眾之所好。這些外於傳統政治實踐場域的專業人士，與傳統政黨體系內的專業黨工最大的差別，在於他們與政黨組織的關係維繫，是基於市場的交換關係，而非政治認同的忠誠度。因此他們能夠轉換跑道，甚至是轉變政治傾向，提供服務給任何政黨或有志公職的候選人。放在臺灣的政論節目名嘴化現象的脈絡裡，則說服的工具理性化則凸顯了政治場域與媒體場域之間，日益建立在同樣是基於短期效能考量的交易邏輯與互動模式

回顧政論在臺灣電視媒體的發展，可察覺近年來由政論名嘴所型構的新的政治影響力，如何改變政治文化與政／媒互動的風貌。

---

趨勢，使得理性不再以追求具普世性的真理（目的）為依歸。因此，達到真理的行動的是非對錯不再受到關注。主觀理性將理性抽象化，並使得手段高過了目的；而工具理性的唯一標準，則是操作價值或操作者的本意性。因此，所謂真實成了基於少數人的利益或主觀好惡界定下的真實。

政論在臺灣電視的發展，由來甚早。台視在 1962 年開播，即由新聞組製作《政令宣導》與《時事分析》兩個節目，於晚間新聞時段邀請各級政府官員，說明政令的措施和執行（何貽謀，2002）。在黨政軍壟斷媒體的年代裡，電視政論扮演統治者政令宣導的傳聲筒。

1990 年代期間，有線電視臺的電視政論逐漸發展出形式上相對於政治場域的獨立性。相較於反對黨勢力在無線三臺新聞中頻遭打壓，在有線電視新興的政論節目中，不但執政黨與在野黨的政治人物可以同桌辯論，打破言論封鎖，這些電視頻道也脫離執政黨的傳聲筒角色。各個政黨皆將政論節目視為快速傳達理念、影響民意的窗口，政論節目成了政治策略攻防的重要場域。在當時，鑑於政論節目受到歡迎，政黨的文宣組織除了負責蒐集當日重要新聞，彙整法條、數據或相關資訊，提供給參與政論節目的黨籍民意代表與黨工，作為辯論論點的依據，甚至在政黨黨工或黨籍民代中，試圖培養辯才無礙，能夠習慣媒介生態的參與者<sup>3</sup>。在這段期間，電視政論大體上仍是政黨組織內運作動員的產物。參與者的選擇、話題內容相關資訊的蒐集整理，甚至在政論節目裡的討論如何與議會議事過程有所串連等，皆在黨務運作的整體考量之中。

當政治場域的成員如民意代表、黨工、政黨發言人淡出政治論壇的空間，而專業媒體人或者政治評論家開始成為政論節目中常設的與談者，這個發展形同確認了媒體的獨立性。「專業」論政在臺面上脫離政黨政治體系的動員，而成為政黨或政府組織以外，具有形塑政治認同態度、政策批判，甚至號召集體公眾想像的常設建置。

所謂臺面上，是指政府或政黨不再能夠直接藉由政論節目參與者的選派、培養，或者政治資訊的蒐集等，與在野黨或其他政治團體公開在節目上競逐民意的影響力。由於政治評論改走「獨立專業」路線，並強調以少數受到閱聽眾歡迎的特定專業人士為來賓主軸，因此它不再是政黨勢力的延伸，政治勢力若仍希望對於政論內容有所影響，便必須藉由經濟的手段方能達成。於是，政論節目所屬頻道對於政黨政治風向球的掌握，以及個別名嘴的彈性勞務特性，便成為政治勢力可以迂迴影響政治論述走向的一項利器（見江聰明、粘嫦鈺、江祥綾，2006

3. 本研究訪談了國民黨於 1990 年代任職黨部文傳會的專業黨工。根據他的說法，當時文傳會以及政策會裡，有所謂 call in 小組，除了提供當日政論節目討論議題相關的參考數據或資料，亦培養國民黨中的口才便給的黨工或立法委員，以培訓的方式，由常上政論節目的資深黨工，負責傳授辯論技巧。而根據楊軍良（1997），第三屆立委選舉與總統大選期間，國民黨籍的政論節目參與者如文工會、青工會或政策會等高級黨工，以及黨籍民代等由於在政論節目中屢遭砲轟，在黨主席李登輝的裁示下，要求黨的政務官要多上電視 call in 節目，並且，同時期在《2100 全民開講》中，call in 為執政黨辯護的觀點突然增多，引起製作單位是否有 call in 大隊的疑慮。

年10月11日；江聰明，2006年6月10日；江聰明，2006年10月15日）。在2008年總統選舉過後，被視為挺綠大本營的三立新聞臺，傳出對於《大話新聞》在大選競選時期的節目走向過份操作民進黨內派系的對立有所意見，並希望節目轉型為較中立的政論調性，即可見電視臺對於攸關其經濟脈絡的政治情勢發展敏感，並因此自我審查的效應（見唐在揚，2008年3月31日a；2008年3月31日b）。而專職的名嘴基於生存條件，必須配合政論節目製作單位的需求，而在不同時期靈活調整其言論，甚至政黨認同走向等，即是同樣的經濟思維底下的產物（見林富美，2006）。

這種政治論述的專業實踐模式，建立在符合傳播機構經濟成本效益的操作原則上，也可瞭解為何當專業媒體人成為政論節目的主流，個別政論節目並未從此跨出政治意識分歧對立的格局，反倒是更進一步複製了當前兩種政治認同意識對立的態勢。一如 Mayhew 所言，工具理性化的說服，服膺的是效能原則。政論節目的發言主體——名嘴或 call in 觀眾「一邊一國」，各自在屬於特定的屬性頻道的陣營內擅場的現象，除了反映常態性的政黨間政治互動消失這個政治現實，更符合了市場行銷技巧中市場「區隔化」（segmentation）的特性。政治傳播學者 Oscar Gandy (2001) 主張，當電視頻道數量與類型增加，各個頻道基於掌握特定的消費者品味或偏好的考量，也必須發展出明確的「區隔化」策略，試圖將政治事務的呈現定位在針對特定年齡、性別、社會階級，或政治認同的觀眾上。這種定位頻道屬性的風格，無形中便成為政論中一套定義何者是可欲的，何者應該排除的標準。包括話題的制訂、參與話題討論者的同質性，以及言辭展演的風格，都在這套明確化的標準下，成為可以預期的「經營」指標。因此，當言論的「區隔化」使得不同的，甚至是敵對的政治態度長久處於互無交集的狀態，它正投和了市場邏輯對於掌控消費者偏好，試圖以區隔化的政治認同作為收視群劃分的依據。區隔化的邏輯，符合市場理性的原則，因為頻道可以花費最小的成本，鞏固既有的收視旨趣，同時忽視那些需要花費很大力氣去試圖改變的部分 (Gandy, 2001)。

## 伍、當政論有了治理意涵

當政論節目形同「朋黨化」，政治論述成了各個陣營各持己見的態勢，同時政論節目的「專業化」評論又脫離既有政治領域中政黨競爭的脈絡，其作為政治實踐的特性為何？而對於政治場域又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近年來因為政論名嘴化的現象，坊間有「名嘴治國」或「看電視治國」的感嘆（李鴻典，2008；曾意蘋，2009年6月23日），這樣的感嘆背後，凸顯的是政媒互動關係中，媒體勢力擴大後開始影響常態政治實踐的問題。雖然多數對於這個問題的批判，傾向把批判焦點擺在名嘴個或政治人物個人身上，但本文主張，名嘴化問題關鍵，更在於政／媒關係的結構性轉變。電子媒介的政治訊息傳播角色，由於政論節目的常態化實踐具備輿論代表性，使得政治場域因此而改弦易轍，試圖將政論的輿論影響力，收編入日常政治運作或者施政的考量中。

近幾年來，每當特定政治事件成為政論節目中炒作的話題，便可以見到政黨、政府組織或者特定政治人物採取各種方式，試圖對政論節目或名嘴個人採取種種管制、對抗或收編的手段。例如對指控不實的名嘴個人興訟、對於節目播出的媒體機構採取經營權的調查，或者透過中間人試圖私下喬事情，設法減低名嘴在節目中批判的火力等<sup>4</sup>。

然而這些作為，皆屬政治領域針對個別爭議事件的避險或危機控制策略。政論節目對於政治過程另一種更深層的影響，還在於政黨政治與政府政策溝通思維與節奏上，逐漸受到電子媒體資訊產製運作方式的影響。

就政黨政治運作的代議實踐而言，政論節目所討論的議題，由於具備有形、可認知，且持續的輿論代表性，而成為議會問政的重要素材。例如政黨文宣部內的輿情組，每日固定監看並記載政論節目的討論，並做成「談話參考」。這些談話參考針對政論節目裡揭露的重大議題，能即時通報黨籍立委，將政論中的輿情作為立委質詢的內容，同時也成為政黨內部研商政策的主要資訊來源<sup>5</sup>。這些試圖對應媒介政治議題討論的種種機制，在乎的未必是論述所呈現的真知灼見，而是將政論節目視為常設化且組織化的民意風向球。相對於勤走基層，耗費時間精力掌握基層飄忽不定的民意動向，政論節目中帶有激情的專家評論，以及 call in 反映的民意，形同俯拾可得的「速成輿論」。

當政論節目的討論內容以「談話參考」的方式進入政黨政治運作過程，即便未必能夠真正左右這個中介機構的思維，卻相當程度的在「時效」上，排擠了

4. 對媒體機構祭以調查權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 TVBS 的《2100 全民開講》因為揭發高雄捷運的弊案，而使得當時執政的民進黨調查 TVBS 的股權結構是否有中資；2009 年 6 月喧騰一時的魚翅宴事件為例，政論名嘴接受特定利益團體招待，並與在政論節目中嚴辭批判的對象同桌共餐，姑且不論事件發生，是否源於被名嘴批判的當事人企圖息事寧人的一種收編，或者純粹是不期而遇，在專業的價值與倫理明顯出現衝突時，政論的中立特質是否受到影響，以及本應代表公眾論述，因為名嘴個人行徑而模糊焦點，則成為一項無解的問題（見黃國樑、林修全，2005；龔濟，2005）。

5. 研究訪談黨籍民代 A。

其他需要時間運作或轉化的策略或決定，這對於傳統民主政治的民意集結，不免造成影響。Thomas Meyer 主張 (2002)，傳統理想的參與式民主的運作模式，倚賴多數主動的公民持續且投入的參與決策討論，他們參與的持續性，仰賴扮演中介組織的各種政黨、利益團體以及民間團體，這些中介組織蒐集以及轉化各種市民社會中集體或個人的意見、想法或抱怨，藉由他們的中介，「民意」能夠有效的轉化成為各種不同的政治伸張或政見，並進而透過議會政治或選舉過程終而落實成為政策。在政黨民主的過程中，扮演中介角色的這些組織，如欲在政治過程中發揮影響力，除了藉由遊說消弭歧見、藉由公開宣傳擴大訴求，還需與相左的利益團體妥協、溝通或協調等，這個過程皆使得民意通往政策的道路顯得耗時費力。

然而，當視民意為依歸的政黨策略制訂，加上了政論節目的「談話參考」，相較之下，藉由勤跑基層、化解歧見的民意轉譯過程便顯得在時效上落後許多。在一個政黨必須面臨選舉以及選票壓力的政治文化裡，快速的形成具民意代表性的政策，成為各個政黨必須面對的課題。而在這個過程中，政論節目中的「速成輿論」便成為重要的來源。政論節目中「抓」的議題、凸顯議題的方式，經營議題的手段等，皆能成為黨籍民代在議事場上凸顯問政風格的參考指標<sup>6</sup>。相較於勤於經營基層、廣搜民意或者與其他民間或利益團體串連的問政模式，由政論界定，或因政論啟發的「政治議題」，除了使得黨籍民代快速確認議題動向，選投和新聞媒體對於政治事務報導的偏好，即便由政論中所呈現的所謂民意動向，以及政治新聞裡頭對於議事的關注，都統攝在相似的媒體檢視標準下。

這種透過媒體專業篩選過後的政治議題，以及回應媒體報導需求的代議政治實踐，使得政治事務的運作猶如一相對封閉的體系，回應媒介成為問政過程中日趨重要的面向。而這種因應媒介傳播需求的政治實踐，同樣顯現在行政體系的一些因應政論的輿論影響力的回應機制上。

例如馬政府 2008 年主政後，便面臨甫上任的行政內閣團隊受到媒體檢驗其施政的能力。為避免施政成效與民意之間的落差，並打好與媒體溝通的管道，行政院舉行「內閣研討會」，試圖就政策提出、危機控管、媒體互動等，建立一套有效的標準作業程序運作機制，並邀請媒體人與閣員座談，讓內閣閣員能進一步了解現在媒體的特性與環境。除此之外，近年來行政院各部會為了加強輿情回應

6. 研究訪談黨籍民代 B。該民代由於過去有新聞工作背景，使得她認為問政議題的選擇與新聞議題是否掌握有重要關係。比方說 H1N1 新流感疫情傳出時，對於口罩數量是否足夠，是否有人囤積居奇的議題，她的反應速度便比政論節目慢了兩天。

機制，要求所屬員工每天收看政論節目，並隨時待命回報重大訊息，必要時叩應政論節目、傳真媒體澄清（李濠仲，2008年7月22日；李濠仲，2008年7月26日；陳洛薇，2010；黃國樑，2008年7月5日）。

而為了更有效掌握輿情，新聞局更編列預算，委託民間收視調查公司，進行電視輿情蒐集，鎖定監看幾個高收視率的政論節目，並通報各部會相關內容。監看公司發現狀況有異，會以簡訊示警，新聞局也會立即通知相關部會；若政論節目中有不實言論，部會要自己出面澄清。為了強化輿情反應，內政部更訂定了一套「電視政論節目輿情回應機制標準作業流程」，規範各部會該如何即時澄清政論節目對內政部的錯誤陳述（陳洛薇，2010）。

除了被動回應，政府或各政黨亦主動出擊，以更直接的方式主導政論節目內容的討論。一則是藉由合作契約的方式，要求政論節目邀請政黨建議的與談人參與節目討論<sup>7</sup>。或者以贊助方式包下時段方式，將政論節目作為政策宣導或自我澄清的管道。例如在2005年底的選舉，當時的行政院長謝長廷連續兩週，以出資贊助方式，每日出現在民視製作的「挑戰政策」節目，為施政辯護。<sup>8</sup>而特定政治人物著眼於政論名嘴的影響力，亦會利用以個人名義成立的外圍團體，例如基金會等組織，以外製製作單位方式與電視臺合作，在特定關鍵時期如選舉前，製作政論節目<sup>9</sup>。

諸如上述例子所示，由電視政論衍生出一些政媒互動的實踐，促使政治場域中如政黨或執政政府，在立法與行政過程中，用更快速的輿情回報速度或控管流程管理輿情。它凸顯了政治訊息或議題，不是單純由社會環境中多元的利益團體、政治勢力，或個人匯聚至政黨組織，而是由少數以「媒體專業」角度出發的媒體人，經由一套媒體內化的篩選標準，而被凸顯的「媒介化」政治議題，這樣的慣例化實踐影響所及，除了是使輿情成為「媒體專業」定位下狹隘的輿情，還在於促使政治場域沿用商業電視物化觀眾的方式——收視率調查機制的每日監看，節目贊助等，作為因應機制。在政治場域所認定的民意或輿論，成為市場經濟的工具理性下，可以有效管理的產物。

這種收編，表面上似乎是政治體系試圖重新拾回政治論述的主導權，但事實上，急於掌握電子媒介政治輿論的政治體系，卻是整體政治傳播環境受制於

7. 研究訪談資深媒體人。

8. 民進黨黨部雖然宣稱謝揆是受邀，但也坦承該節目100萬元的製作費中，有70萬元由民進黨支付（黃國樑、林修全，2005年11月1日）。

9. 研究訪談前台聯黨黨工。

電子媒介產製邏輯的甕中釀。關於電子媒介近年來對於政治過程的介入性，政治傳播學者常用「媒介化」(mediatization)一詞來形容。相異於較中性的中介(mediation)，「媒介化」一詞彰顯電子媒介的產製邏輯或訊息的產製過程如何導引，甚至改變傳統政治領域的思維方式。換句話說，傳播媒介的廣泛社會輿論影響力，如何使得政治領域中的某些實踐變得更具媒介導向(media-oriented)；甚至繼而衍生出一些新的政治實踐(見Mazzoleni & Schulz, 1999; Schulz, 2004; Strömbäck, 2008)，而上述的這些過往存在於商業環境才有的作為，正是這些因應電子媒介而新起的輿情管理實踐。

在傅科關於治理性的討論中，他主張政治治理在現代社會中，已經超越單純的政府治理，而成為多元的機構、繁複的程序、分析、反思與機巧與戰術的集合體。政治治理的權力關係運作必須結合更精密規訓技術、更詳盡且深入的分析方式，以遂行治理的目的(Foucault, 1991)。因此，傅科主張，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過往總強調市場對「國家」的進逼，使得「政治」萎縮退位，但實情是新自由主義的市場至上，開放經濟思維並沒有導致政府治理權力的龜縮，而是轉化。政府的治理技術，朝向整合更多非正式的管道或技巧，在這個過程中，扮演治理功能的機構增加了，而治理的效能思維，使得具有治理實權的政治機構與這些新起的治理機構、團體或個人，發展出更綿密的權力互動關係。因此，與其說政治退位，倒不如說政府治理被延伸至更多過去非關政治的社會或經濟領域中(Foucault, 1991; Lemke, 2000)。

當我們將上述種種政治領域試圖調適媒介的輿論影響力舉措置於傅科的治理性脈絡中，它彰顯了當前臺灣的民主政治實踐，在電子媒體深化的影響下，也逐漸將電子媒介的種種政治論述實踐，劃歸入其政治治理的範圍中。政論節目中的專家，藉由慣例性的政治討論，以及廣泛但區隔化的民意影響力，使他們超越僅是電視表演者的角色，不論就「論政」的專業角色的認定，以及專業實踐對於政治運作過程的影響，政論節目的種種論述實踐成了政治場域裡的能動者。政治場域對於名嘴專業實踐的收編或者遷就，著眼的是他們廣泛影響民意的能力。而執政者體察民意的技術化操作，充其量是將政治領域與民間社會的溝通管道，常態化為以媒體機構以及熟悉媒體運作邏輯的政論專家作為其代理機制。這種種因應電視政論而生的政黨或者政府治理實踐，使得民主政治的「公眾審議」，慣例化為這些代理的個人或群體間協調與互動的種種過程。

## 陸、結語

本文行文至今，試圖凸顯臺灣政論節目的論述實踐，不單純是節目表現的問題，影響所及，亦不只是選民政治態度或政治認同的影響或強化，本文的核心關切，是希望凸顯電視政論在當前民主政治實踐的過程中，如何以工具化的專業之姿，影響政府或政黨常態政治實踐。臺灣政論節目中的名嘴化傾向，除了是政治說服的工具理性化表現，其作為一個便捷的「輿論」來源，更在當前政黨政治與政府治理過程中，成為「效能治理」企圖籠絡的一環。

在一個以政黨間相互競爭為基礎發展的參與式民主政治體制，政治資訊的透明度向來是維護這個制度運作良好的關鍵因素 (Balkin, 1998)。介於政黨與市民社會之間，如果有一個多元且異質的中介過程，例如各種意見或想法盡皆能在多元的再現或轉譯機制中，有機會成為政治機構代理的標的，則治理的政策施為或政治過程便能與民間社會維持特定程度的聯繫。在這個過程中，政論節目顯然可以扮演一個稱職的中介代理者。如何將論壇開放給市民社會裡更多不同的意見聲音，並藉由討論過程成為社會中有形的輿論，端賴此話語權力是否開放給更多有此需要的團體或個人。

現今臺灣電子媒體的政論文化雖然盛行，但顯然在中介過程中，因為話語權的壟斷，而導致政治「轉譯」的過程出現問題。當名嘴以熟知政治過程或內情的專業角色自居，他們所言談的政治過程，僅止於狹義的政黨政治互動過程的種種，然而，廣義的政治，還包含政治實踐是否有效扣連至更大範圍的社會場域的種種事務或問題，這些皆在現今絕大多數的政論節目中無緣碰觸。當中介的代理者缺乏多元性，且被中介的議題僅停留在狹義政治過程中政治權勢階級的權力傾軋，則由市民社會而至政治廟堂之上的轉譯路徑明顯受阻。

因此，本文主張，凸顯政論節目在當前民主政治過程中的問題，應思考傳播機構的節目實踐、政治社會的政治實踐，以及慣例化的政／媒互動呈現何種風貌著手。對於所謂「名嘴干政」的問題，不應只把重點放在「人為」因素，而是應該細究名嘴擅場的政治空間——政論節目，存在於當前的特定傳輸與經濟脈絡。一如布迪厄主張：不應只是用一種揭發或指控的觀點來看個人或他的作為，而去忽視引導思考行動卻看不見的結構與機製，對這些結構機製的瞭解，使我們能有更具包容性的理解，而不會只是義憤填膺的控訴。因此當面對法國的新聞產業同樣的專業人跨行成為電視名嘴時，他強調重點在於瞭解新聞場域如何生產一種對於政治場域的特殊觀點，並且將這個觀點加諸在公眾身上。他主張新聞業的墮落

與它和政治圈之間的親密關係有關。這種親密關係使得兩個場域逐漸失去自主性，而媒合新聞與政治的親密互動則來自第三個驅力——也就是經濟因素。除了電視節目有收視率壓力，必須藉由收視率來確保自身存在的價值，政治人物關切選票，必須時時面對大多數選民期望，也形成了另一種經濟壓力（Bourdieu, 1996／林志明譯，2002）。

臺灣市民社會的政治討論，在廣電秩序解嚴後，已經沒有言論檢查，或者政府對於媒體經營權的壟斷。但政治言談的集中控制，仍然沒有改變。只是控制的手段，由原先的政黨，變成了更細緻的政治／商業綜合體。這種轉變，除了反映臺灣商業電視環境競逐收視率，因此屈就具炒作價值的政治議題此一環境因素，它更象徵了媒體與政治間權力邏輯上的翻轉：如果過去在言論高度管制的戒嚴時期，媒體是政治當權者統治意志的延伸，則在以媒體數量之多號稱民主化程度高的今日臺灣，電子媒體的政治實踐不但自成一格，它甚且衍生出一些足以影響政治實踐的慣習。

由名嘴論政所引發的種種問題，本文主張問題化名嘴的種種，必須放在政媒互動脈絡中彰顯其樣態。雖然稱職的媒介政治文化應當代表民意，批判時政，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傳播媒介並不是自外於整個政治生態體系來遂行其監督功能。具體而言，在一個民眾普遍藉由消費媒介訊息進而產生政治參與感甚至認同的社會裡，媒介是整個政治體系中環環相扣的一員。所以政論雖然表面上是媒介作為一自主獨立的機構，由外部介入政治過程的一種論述實踐，但究其實，政論卻是政治／媒介互動下的產物。由目前話語權壟斷的問題出發思考破解之道，應是下一步重要的研究探索。

## 參考文獻

- 江聰明、粘嫦鈺、江祥綾（2006年10月11日）。〈胡婉玲不夠綠？「頭家來開講」換主持人〉，《聯合報》，第D3版。
- 江聰明（2006年10月15日）。〈名嘴身價驚漲，爭當一哥一姊〉，《聯合報》，第D6版。
- （2006年6月10日）。〈政論名嘴趕場，禁打對臺〉，《聯合報》，第D3版。
- 何貽謀（2002）。《臺灣電視風雲錄》。臺北：臺灣商務。
- 李濠仲（2008年7月26日）。〈下月油價凍漲？名嘴應邀開藥方，薛香川點點頭……〉，《聯合晚報》，第4版。

- (2008年7月22日)。〈避免溝通不良，避免再出狀況，劉內閣上山閉關練功〉，《聯合晚報》，第A4版。
- 李鴻典 (2008)。〈名嘴治國，臺灣特有〉，《新臺灣新聞周刊》。上網日期：2010年3月14日，取自 <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bulletinid=80486>
- 林志明譯 (2002)。《布赫迪厄論電視》。臺北：麥田。(原書 Bourdieu, P. [1996]. *Sur la télévision suivi de L'Emprise du journalisme*. Paris: Liber.)
- 林富美 (2006)。〈當新聞記者成為名嘴：名聲、專業與勞動商品化的探討〉，《新聞學研究》，88：43-81。
- 南方朔 (2009年7月21日)。〈美國有克朗凱，我們有名嘴〉，《中國時報》，第A3版。
- 姚人多 (2009年7月16日)。〈山寨版法院〉，《蘋果日報》。上網日期：2010年3月17日，取自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1788963/IssueID/20090716](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1788963/IssueID/20090716)
- 唐在揚 (2008年3月31日 a)。〈三立挺綠董事長，淡出新聞部〉，《聯合晚報》，第A2版。
- (2008年3月31日 b)。〈大話新聞轉向？張榮華將約鄭弘儀長談〉，《聯合晚報》，第A2版。
- (2005年9月27日)。〈禁上2100全民開講。2100：邀綠營尚無回音〉，《聯合晚報》，第A2版。
- 張大春 (2009年8月4日)。〈追求民主，別看政論節目〉，《蘋果日報》，第A7版。
- 張卿卿、羅文輝 (2007)。〈追求知識、認同或娛樂？政論性談話節目的內容與閱聽眾收視動機的探討〉，《新聞學研究》，93：83-139。
- 張景為 (2008年11月25日)。〈名嘴、媒體、潛規則〉，《中國時報》，第A4版。
- 盛治仁 (2005)。〈電視談話性節目研究——來賓、議題結構及閱聽人特質分析〉，《新聞學研究》，84：163-203。
- 陳玉慧 (2009)。〈從歐洲看臺灣名嘴節目〉，《網路城邦》。上網日期：2009年10月29日，取自 <http://blog.udn.com/jadechen123/3103569>
- 陳昭如 (1994)。《Call in! 地下電臺：臺灣新傳播文化的震撼與迷思》。臺北：日臻。
- 陳洛薇 (2010年3月8日)。〈蒐輿情、升級版〉，《聯合報》，第A2版。

- 彭芸 (2001)。《新媒介與政治：理論與實證》。臺北：五南。
- 彭顯鈞 (2005 年 9 月 28 日)。〈綠：抵制全民開講 為求自保〉，《自由時報》，第 A2 版。
- 曾意蘋 (2009 年 6 月 23 日)。〈名嘴介入政爭 有失分寸〉，《中國時報》，第 A3 版。
- 黃國樑 (2008 年 7 月 15 日)。〈內閣研討會，媒體人開講〉，《聯合晚報》，第 A7 版。
- 黃國樑、林修全 (2005 年 11 月 1 日)。〈謝揆上民視，包 11 場對幹全民開講〉，《聯合晚報》，第 A3 版。
- 楊軍良 (1997)。《出賣李濤：2100 全民開講幕後祕辛》。臺北：商智文化。
- 楊意菁 (2004)。〈民意與公共性：批判解讀臺灣電視談話節目〉，《新聞學研究》，79：1-47。
- 蔡詩萍 (2009 年 6 月 25 日)。〈我何以不想再被稱為名嘴〉，《聯合報》，第 A17 版。
- 盧世祥、林育卉 (2004)。《透視政論節目：廣電基金政論談話性節目觀察研究》。臺北：廣電基金。
- 龔濟 (2005 年 10 月 30 日)。〈全民起來保衛「全民開講」：言論自由是民主基本人權，濫權撤銷電視臺執照，損害國民權力〉，《聯合報》，第 A15 版。
- Balkin, J. M. (1998). How mass media simulate political transparency. *Cultural Values*, 3, 393-413. Retrieved June 1, 2007, from <http://www.yale.edu/lawweb/jbalkin/articles/media01.htm>
- Blumler, J. G., & Kavanagh, D. (1999). The third ag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fluences and featur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6: 209-230.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ok, T. E. (2005). *Governing with the news: The news media as a political institution*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rner, J., & Pels, D. (2003). *Media and the restyling of politics: Consumerism, celebrity, and cynicism*. London: Sage.
- Couldry, N. (2006). *Listening beyond the echoes: Media, ethics and agency in an uncertain world*. London: Paradigm.

- Ekström, M., & Johansson, B. (2008). Talk scandal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0, 61-79.
- Feuer, J. (1983). The concept of live television: Ontology as ideology. In E. A. Kaplan (Ed.), *Regarding television: Critical approaches -- An anthology* (pp. 12-22).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 Foucault, M. (1991). Governmentality. In G. Burchell, M. Foucault, C. Gordon, & P.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With two lectures by and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pp. 87-104).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andy, O. H., Jr. (2001). Dividing practices: Segmentation and targeting in the emerging public sphere. In W. L. Bennett & R. M. Entman (Eds.), *Mediated politics: 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pp. 141-159).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rman, E., & Chomsky, N.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Hoynes, W., & Croteau, D. (1991). The chosen few: Nightline and the politics of public affairs television. *Critical Sociology*, 18, 19-34.
- Lemke, T. (2000).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and critiqu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thinking Marxism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Amherst, MA.
- Liebes, T. (1999). Displacing the news: The Israeli talkshow as public space. *Gazette*, 61, 113-125.
- Marshall, P. D. (1997). *Celebrity and power: Fame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
- Mancini, P. (1999). New frontiers in political professionalism.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6, 231-245.
- Mayhew, L. (1997). *The new public: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means of social influe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zzoleni, G., & Schulz, W. (1999).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6, 247-261.
- Meyer, T. (2002). *Media democracy: How the media colonize politics*. Cambridge, UK: Polity.

- Moog, S., & Sluyter-Beltrao, J. (2001).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B. Axford & R. Huggins (Eds.), *New media and politics* (pp. 30-63). London: Sage.
- Phillips, L. (2000). Risk, reflexivity and democracy: Mediating expert knowledge in the news. *Nordicom Review*, 21, 115-135. Retrieved June 7, 2007, from [http://www.nordicom.gu.se/common/publ\\_pdf/45\\_Phillips.pdf](http://www.nordicom.gu.se/common/publ_pdf/45_Phillips.pdf)
- Rosenstiel, T. B. (1992). Talk-show journalism. In P. S. Cook, D. Gomery, & L. W. Lichty (Eds.), *The future of news: Television-newspapers-wire services-newsmagazines* (pp. 73-82). Washington, DC: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Schulz, W. (2004). 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 87-101.
- Schudson, M. (2001). Politics as cultural practic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8, 421-431.
- Street, J. (2003). The celebrity politician: Political style and popular culture. In J. Corner & D. Pels (Eds.), *Media and the restyling of politics: Consumerism, celebrity and cynicism* (pp. 85-98). London: Sage.
- Strömbäck, J. (2008). Four phases of mediat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Press/Politics*, 13(3), 228-246.
- Swindler, A. (2001). What anchors cultural practices. In T. R. Schatzki, K. K. Cetina, & E. von Savigny (Eds.),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TV Political Discussion and the Interaction Practice between Media and Politics: An Exploratory Study

Tang, Shih-ch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ia-Yi, Taiwan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olitical talk show has become a popular genre of programming in Taiwan. Due to its popularity, a few star-like political analysts have been able to make a career out of frequent TV exposure and have earned the title of 'Ming-zui'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in various programs.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phenomenon of Ming-zui in Taiwan and argues that its emergence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unique political-economic context of the electronic media in Taiwan. Behind Ming-zui is an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ractice which involves the economic requirements of the channels, the habitus of media professionals, and the mode of message transmission of the electronic media. The project argues that the Ming-zui phenomenon has given rise to two key aspects with regards to the way the electronic media interacts with politics: One is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persuasion as a result of the programs' rating competition; the other involves the way political practices respond to the televised political discussion to accommodate to its prevailing influence of the public opinion.

**Keywords:** Ming-zui, government, political practice, TV political talk shows

---

\* Email: shihchet@gmail.com

Received: 2010.07.17

Accepted: 2011.11.29

## 讀者賞析小說之審美視域與美感反應： 以《神鵬俠侶》之閱讀歷程為例

賴玉釵\*

銘傳大學新聞學系助理教授

### 摘要

本文由接收美學出發，闡釋讀者賞析《神鵬俠侶》之審美視域與美感反應。審美視域可展現於狹義與廣義審美期待。前者指賞析者對類型知識的掌握與理解，後者則涉及五感聯想與生命歷程。研究亦發現，讀者之詮釋活動乃跨越多種媒體，如青少年詮釋文字作品時可以影音媒介等為審美活動之參照對象。讀者除在地文史陶養深植其詮釋歷程外，其亦可融入閱讀史、生活體驗、媒介接觸經歷等，成為構築審美視域之因素。

**關鍵詞：**美感反應、接收美學、審美期待、審美視域

---

\* 本研究改寫自筆者博士論文《讀者理解與文本結構之交流過程——以閱讀金庸武俠小說之「美感體驗」為例》，作者感謝指導教授臧國仁教授之悉心教導、老人傳播研究群師長與成員協助。本文亦感謝評審委員悉心惠賜建議，筆者獲益甚多，敬表謝忱。

\*\* Email: raven.claw@msa.hinet.net

投稿日期：2010 年 12 月 1 日

接受日期：2011 年 12 月 6 日

## 壹、研究動機與問題

美學乃是討論「美感」的學理，盼瞭解人們面對審美對象（詩歌、畫作與音樂等）之賞析歷程，以描繪美感反應（aesthetic response）從何而生（李醒塵，1996）。美感反應實為美學關切之範疇，探討主題包括：閱聽人感知何者為「美」、美感反應包括哪些元素等（楊恩寰，1993）。概略言之，美感反應可指無涉及現實利害關係之心靈愉悅，影響因素涵蓋閱聽人詮釋／解讀作品方式，及融入之感官體驗、情感、生命經歷與記憶（Carroll, 2001; Levinson, 1996; Munz, 2007）。因此，接收者對作品之美感反應，實涉及其如何理解及體認作品（Munz, 2007; Nekrylova, 2007）。故閱聽人、如何詮釋審美對象及美感反應，均是美學關切議題。

美學已發展二千餘年，而美感反應議題業經長久討論（李醒塵，1996）。如早年 Aristotle 認為，事物若具秩序、和諧等形式便可構成「美」的條件；以至 Kant 與 Schiller 又肯定「美」存於客觀事物，需合乎自然律則才是美之成立條件，而忽略閱聽人之理解及參與（李醒塵，1996）。其後詮釋學家 Gadamer 肯定閱聽人理解（詮釋）活動對審美歷程之重要性；而其弟子 Jauss 亦承此主張，強調讀者理解對形塑作品意義扮演要角，依提出美感反應來自讀者「接收」、「文本結構」及兩者交流歷程，而成 80 年代美學思想主流——接收美學（Gadamer, 1986 / 洪漢鼎譯，2005；Holub, 1984; Jauss, 1982a, 1982b）。

以接收美學角度言之，讀者對文本之美感反應可涉及：讀者對事物之先前理解（即「審美視域」，aesthetic horizon）、文本結構、交流歷程與美感反應。以讀者層面言之，欣賞者可依憑自身經歷思考，故審美視域乃為讀者先前對作品的認識所組成，成為品評創作基礎（Holub, 1984; Jauss, 1982a）。「視域」一詞乃是 Jauss 承襲 Gadamer 思想而來，此為「文學接受活動中，讀者原先各種經驗、趣味、素養、理想等綜合形成的對文學作品的一種欣賞要求……，在具體閱讀中，表現為一種潛在的審美期待」（引自朱立元、張德興，1999：295）。就文本結構論之，作品承載歷史文化意涵，並非封閉體系，可邀請讀者融入其中（Jauss, 1982a）。讀者賞析作品之方式，則與創造力、「渲洩」個人情感與想像力、不斷思辨之「否定／辨證」相關（Jauss; 1982b）。

審美視域雖在接收美學扮演要角，但 Jauss (1982a) 僅一詞帶過，未精確指涉定義。其後學者們曾蒐集若干實證資料以確切說明審美視域意涵，如採行實驗法或調查法釐清讀者真正想法（Holub, 1984）。再如 Jauss (1982b) 與 Iser (1978) 均以自身經驗為例剖析審美歷程，如 Jauss (1982b) 曾以 Baudelaire 詩作說明巴黎城

市意象、都市化後之疏離感；Iser (1978) 則以觀賞預告片為例，點出情節突然中斷可讓觀眾產生懸念，並引發一連串想像從而回應作品之邀請。但對一般讀者而言，欣賞作品之視域或交流歷程是否與 Jauss 及 Iser 相同？故審美視域之具體意涵，實具再探索之空間。

如前所述，在審美視域概念可精確描繪之前提下，或可探究：審美視域確切意涵為何？讀者之詮釋活動可引發何種美感反應？承襲接收美學對「審美視域」之關心，本文擬探索：

- (一) 「審美視域」確切意涵為何？
- (二) 「審美視域」對賞析歷程有何影響？可能引發哪些美感反應？

## 貳、文獻探討

接收美學之發源地為 60 年代聯邦德國 Konstanz 大學，主要由 Hans Robert Jauss 等學者發起 (Holub, 1984)。Jauss 特別指出歷史在創作過程之作用，認為「文學、藝術是種創造過程，是由『處於歷史經驗』的個人所創造的」(Jauss, 1982a: 10)；易言之，文學批評不能忽視鉅觀情境及歷史文化對個人與創作之影響。

該學派亦主張，觀眾可依憑視域與作品溝通，受審美視域之引導而有解讀活動及美感反應。Jauss 點出讀者對作品之理解可能承自前人解讀且受傳統露蓋，而當其與作品對話後必然形成獨特審美視域，又得以此與前人想法對話；如此一來，讀者想法亦能納入既存系譜並為文學史傳統的一部分 (朱立元, 1989)。上文已說明接收美學對閱聽人的審美視域之觀察，下文擬接續詳述審美視域及美感反應之意涵。

### 一、狹義審美期待：閱聽人對類型之預想

以閱聽人層次言之，Jauss (1982a) 主張審美視域為引導讀者賞析之重要關鍵，如讀者對文章體裁之預期、欣賞時引發之聯想等均在審美歷程扮演要角。Jauss (1982a: 79) 亦指出，若將「審美視域」鎖定在「類型」討論即屬「狹義審美期待」(原文 Erwartungsrichtung, 英譯 a trajectory of expectations)；而個人生命體驗與視域均可融入閱讀歷程而成「廣義審美期待」(朱立元, 1989)，以下分述之。

### (一) 讀者對類型之定向期待

狹義審美視域可分成「定向期待」(pre-orientation)與「創新期待」(朱立元, 1989; Jauss, 1982a: 41, 79),前者以類型知識出發,指從傳統或先前讀過的作品生成「定向期待」。朱立元認為定向期待是種心理預期,指讀者總先隱含著某種答案盼從文本得到證實,即以先前閱讀模式來解釋作品之資訊。

在審美歷程中,讀者之既存視域會按既定期待來理解對象並有取捨(黎玲、張小元、張晶燕、李紅梅, 2002),若不符合原先期許者則可能視而不見,合乎審美期待者才會多加留意。如讀者習慣某一流派、風格之表達方式,便易形成固定之審美期待,對符合其預期之作品如走熟路般地易得鑑賞趣味;若不合原有期許者則易生排拒感,甚至否定作品之藝術價值(吳思敬, 2005)。

定向期待不但影響了讀者理解審美對象之方式,也影響著可能引發之美感反應。Jauss 並以文學欣賞之經驗為例說明人與作品的交流歷程,指出作品「類型」會喚起人們對某類題材的既定想像(Holub, 1984; Jauss, 1982a, 1982b)。如人們與文本交流時亦得遵守類型隱含之規則,如賞析悲劇時可帶著同理心或「哀矜而勿喜」之心境;但若帶著看笑話的心情欣賞悲劇,恐就無由得到淨化體悟了。

### (二) 讀者對類型之創新期待

創新期待則是強調獨創與新穎性,乃相對於既有審美視域(對類型之原有知識)而來;它與定向期待恰恰相反,講求突破既定習慣,接納與先前視域不一致之事物(朱立元, 1989; Jauss, 1982a)。研究者曾指出,讀者期許作品能「言前人所未言,發前人所未發」甚至「獨抒機杼,自成一家」,故若創作能提供欣賞者較新訊息,亦可能引發審美體驗(吳思敬, 2005: 51)。

如古代詩人多以「悲秋」為題似成常態,如宋玉之〈九辯〉有「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髮衰」,而杜甫亦有「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寒」。但劉禹錫〈秋詞〉則云「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宵」,描寫秋高氣爽之氛圍,其突破之作讓人耳目一新,有別於其他作品之思維定向,或可滿足讀者之創新期待(吳思敬, 2005: 60-61)。

## 二、廣義審美期待：五感聯想及生命經驗

讀者若帶「五感聯想」及「生命經驗」來賞析作品,即可根據文字描寫及所欲表現之客體來構成腦海「心像」(吳思敬, 2005)。再如 Jauss 弟子 Karlheinz

Stierle 即曾認為，想像力及個人建構出之心像乃是賞析過程之核心，也是美感體驗之源 (Holub, 1984)。故讀者欣賞文學創作時得以語言提供之意象為基礎，則不只複製原作旨趣且亦能從自身生活經驗或興趣來補充或發揮 (吳思敬，2005)。下文擬說明廣義審美期待之意涵，及其如何在賞析歷程中發揮作用。

### (一) 五感聯想對審美活動之影響

吳思敬 (2005) 曾說明已知事物與聯想的關聯，指出讀者接收文本訊息後常能以過去感知經驗為基礎而形成相對應之心像。吳思敬 (同上引：16) 援引徐志摩〈滬杭車中〉詩句說明五感聯想對美感形成的重要性。徐詩寫道：

匆匆匆！催催催！  
一卷煙，一片山，幾點雲影，  
一道水，一條橋，一支櫓聲，  
一林松，一叢竹，紅葉紛紛；  
豔色的田野，豔色的秋景，  
夢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隱……

此詩乃描寫詩人在滬杭線火車中所見之景象。隨著時代推移，讀者自然不能看到彼時火車造景或是徐志摩眼見之景物，猶可沿用先前搭車之例為素材，想像自身馳騁於火車上並將快速飛動的景色盡收眼底 (同上引)，亦即將己身感知為想像之原始材料，藉此形成某種意象繼而產生美感體驗。

在視覺聯想部分，文字雖不若圖像般地直接傳遞鮮明色澤，卻可利用固有色彩詞彙來上色，促發閱聽人之視覺聯想 (吳思敬，2005：44)。吳思敬曾以賀敬之〈桂林山水歌〉為例，說明其詩句「是山城，是水城，都在青山綠水中！」之「青綠」2 色運用可予人淡雅平和之感，故具色彩之文字描寫可引發視覺聯想而帶來美感體驗。

聽覺描述亦能激起閱聽眾之想法並喚起記憶 (即「聯想」) 以進一步感受作品旨趣 (朱立元，1989)。如《源氏物語》第 37 帖〈鈴蟲〉提到，三公主削髮為僧後長年處於寂靜佛堂，「那兩伽杯相觸之聲啦，倒水之聲等，教人聽著都打心底感動。……阿彌陀經的大呪微微可聞，那誦經聲自有一種高貴氣氛」 (紫式部，1987 / 林文月譯，2000：859)。讀者可從上述「杯子碰觸之聲」及「倒水

之聲」中體驗平日佛堂幽靜，或從往昔聆聽佛經之回憶來瞭解院府內誦經之狀，凡此均為聽覺聯想之妙用。

## （二）生命經驗對審美活動之影響

Heinz Hillmann 亦曾以實證取向來瞭解生命經驗對審美活動的影響，其實驗施測對象為三百名學生，請其朗讀 Brecht 作品《奎那先生的故事》（*Keuner Stories*）片段後再表述想法；結果發現，讀者們的想法多具創造力或動用個人想像，詮釋故事時多以生命歷程、所屬社會團體及社會化過程為判斷起點（Holub, 1984）。Werner Faulstich 則以律師等職別的讀者為調查對象，發現其詮釋角度會受需求、初級社會化及次級社會化（如正式就業後）影響（同上引）。

亦有研究者主張「媒體識讀經驗」亦在詮釋歷程中扮演要角（Nodelman, 2003）。影音媒介扮演關鍵角色，給予明確之視聽刺激而成閱讀文字作品時之感知及體驗基礎，或將影視作品之刻劃融入原作而成解讀依據。若閱聽人先曾觀賞原作改編之影視作品，則接觸若干角色或地域之描寫時易有「先（影視）人為主」觀念，易將此想像融入閱讀小說歷程以為美感體驗之來源。故閱聽人接觸之影視作品、卡通、教材或電動玩具等，亦可能為形成廣義審美期待之因素。

總之，閱聽人之解讀方式與生命經驗相關，如社會地位、社會化程度與媒體識讀經驗均能讓其發揮主動性，為文本賦予更多意義與想像並引發美感反應。

## 三、審美視域與美感反應

前文言及美感乃指讀者與作品交流後，因與作品建立起聯繫而獲得的體驗；此體驗異於現實生活之自然態度或功利特質，因其協助讀者擺脫了日常生活之牽掛而投身全新領域，而對周遭事物（含作品）有著另一層認識（Ingarden, 1973b）。

Jauss (1982a, 1982b) 等人認為，文本與閱聽人交流之結果（如美感反應）之具體面向包括：

### （一）以「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言之

如人們欣賞事物時，可隨著文脈變更想法以融入文本世界，進而擁有相互理解的感動；隨其逐步投入文本世界，視域可不斷增大而漸次理解作者想法及作品語境，而擁有「視域融合」的美感體驗（Iser, 1978）。

## (二) 以「反璞歸真」言之

美感亦指拋開既定成見，用發現新大陸或以全新角度來看待事物 (Jauss, 1982b)。美感促使人們用全新眼光或返璞歸真的態度來看待事物，此感動宛若回歸童年時期而以全新視角認識世界，排除社會化後的「疏離」（異化）因子（同上引）。

## (三) 以「淨化心靈」（catharsis）言之

「淨化」乃從 Aristotle 的概念而來，可將人們從現實利益及情感干擾中解脫，並將觀者置於悲劇英雄的視角，從英雄的悲劇情感（或悲喜劇）中得到心智的解放 (Jauss, 1982b)。美感乃具雙重特性，一方面打破既定現狀（使人們忘記眼前苦難），另一方面又具有社會整合作用：當人們受作品召喚後被激起感動且能解放心靈，意謂著藝術「傳遞行為規範」之實際功能，使個體融入社會集群；賞析者淨化心靈後，可校正品性而往至善邁進（同上引）。

## (四) 以「沐浴神恩」（to partake of God）言之

美感可與宗教之解脫、救贖相繫 (Jauss, 1982b: 22)。如 Jauss 曾引述 Augustine（奧古斯丁）之《懺悔錄》（*Confessions*）中，曾提及對天堂的體認，是基督教式解讀美感的方式（同上引）。既然人們不能回歸伊甸園時期的純真狀態，故人們需將「感官經驗」提升至「超越感官」的層次；如見著大自然景物時，可感受其和諧、舒適等氛圍，繼而體認到伊甸園的片段樣貌、乃至上帝的形象（同上引）。此可說明 Jauss 對美感與觀察，與基督教與救贖傳統密不可分。

## (五) 以「享受他物並獲得自我愉悅」言之

故美感意味著否定現實事物，創造出虛擬的、符合閱聽人遐想之世界。在賞析歷程中，讀者與作品（被欣賞的對象）相互作用，人們在無功利的快感中獲得心靈解放，在「享受他物時，同時獲得自我陶醉般的愉悅感受」(Jauss, 1982b: 31-32)。

## 四、小結

接收美學之研究系譜中，近年來 Jauss 等人均強調詮釋活動不脫在地文化的範疇。前文已說明「美感反應」之於美學發展之重要性及核心概念，下文擬承襲

Jauss 等人欲延展之審美理解活動旨趣，瞭解特定社群讀者之審美視域。故擬選擇在地文化作品中具代表性之個案，以此為例檢視讀者之審美理解及美感反應。

## 參、資料蒐集與分析

Jauss (1982 / 顧建光、顧靜宇、張樂天譯，2006：1-3) 希冀瞭解「異文化」讀者之詮釋歷程；再如 Gadamer 曾指出，他渴望多認識華人文化以能擴展「詮釋學」範疇（洪漢鼎，2008）。如 Jauss (1982 / 顧建光、顧靜宇、張樂天譯，2006：1-3) 更在《美感體驗與文學詮釋學》中文版序言指陳，他相信華人文化具有獨特的審美觀點，可惜限於語言隔閡而未能深入探究。Iser (1996) 亦云，如何突破「接收美學」面對跨文化之限制，成為美感反應研究必須面對之課題。凡此種種似可說明詮釋學及接收美學皆曾關切「在地文化」之趨勢，特別是 Gadamer 及 Jauss 曾盼進一步瞭解華人之審美歷程，為閱聽人「審美理解」另闢研究蹊徑（如與跨文化研究接枝）。

本文擬承襲 Jauss 等人對華人文化之研究興趣，開展審美視域之探索範疇。依在地文化言之，俠文化一向為華人社群獨有，武俠小說更屬箇中代表，一方面其取材與「中國古代歷史」相關，如小說家喜愛納入刀、劍等古兵器於書寫（林保淳，2000：148），符合「歷時」（傳接歷史傳統）之需。由於武俠小說具有濃厚在地文化意涵，故可以此為起點來延伸接收美學之文本結構概念。

簡而言之，下文擬從華人讀者賞析武俠小說之歷程著手，先說明選擇武俠小說文本之標準以蒐集讀者美感反應之資訊；再述及詳析審美視域意涵之研究策略。

### 一、選擇閱讀文本

武俠小說之核心概念包括了「明辨是非」之教化功能、「為國為民」之忠俠傳統、「冤孽與超渡」之佛道關懷、「兒女情長」之人性刻劃及「反映人情百態」等現世關懷（吳明麟，2002；金庸，2005；陸志平、吳功正，1993；葉洪生、林保淳，2005；羅賢淑，2003）。此 5 題旨承自「善有善報」世俗價值觀，也與明清以降之「兒女情俠」和「忠俠」傳統相互呼應。

## (一) 武俠小說之核心精神與發展歷程

### 1. 以「明辨是非、改邪歸正」為例

小說若能「使人對之，齷齪都銷盡」，便具有淨化心靈、排除心靈污垢之效；就「提昇道德」層次而言，小說隱藏著化育之社會意義，對種族（或民族）亦有集體利益（陸志平、吳功正，1993：188-189）。如司馬翎寫《纖手馭龍》時，曾將化育概念帶入，以彰顯其為社稷謀福之功：

我是崇尚墨家之說的，只要能有利於世，不惜犧牲自我。我當真是篤行實踐的人，所以不太計較成敗得失，不太害怕死亡；只問這件事做得對不對而已（葉洪生、林保淳，2005：101）。

### 2. 以「冤孽與超度」為例

佛道「超脫塵世」思想亦為武俠類型之探討核心。如《凝風天下》則描寫人與自然之和諧關係，內含「眾生平等」概念，可呼應《華嚴經》「有情無情，同圓種智」觀點（葉洪生、林保淳，2005：519-521）。

### 3. 以「兒女情俠」為例

如王敬三（2000；轉引自吳明麟，2002：4）指出，武俠小說可深掘人性特質及感情世界玄妙。明清代讀者渴望見著更多情感描寫，為俠客賦予更多人性特質（龔鵬程，2007），而「兒女情俠」傳統綿延至今似亦理所當然了。

### 4. 以「為國為民，俠之大者」言之

如金庸（2005：9）在《天龍八部》自序提出，早年書寫武俠小說時「漢人皇朝的正統觀念」很強，亦提及其先前的武俠小說很重視民族精神。金庸作品多以「與異族相抗」為背景，展現保家衛民之忠俠傳統。

### 5. 以「反映現實社會」言之

如吳明麟（2002）曾云，好作品需能反映人生課題，而小說家恰可用反諷等非教條式語調來揭示生命的矛盾，讓讀者通透人性；武俠小說需深刻地「反映現實人生」，亦為其核心旨趣。如《水滸傳》林冲被奸人設計陷害卻申訴無門，武松為兄長報仇，有情有義卻迫於現實只能亡命天涯，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最佳寫照。

## (二) 金庸武俠小說之重要性

在地文史在武俠小說扮演要角，而金庸小說之歷史文化質素濃厚，可為箇中翹楚（林保淳，2000）。如《天龍八部》以宋遼之爭為背景、《射鵰英雄傳》及《神鵰俠侶》帶入了成吉思汗和全真七子等歷史人物、《倚天屠龍記》則有朱元璋及韓林兒等抗元事蹟，《鹿鼎記》與《書劍恩仇錄》則涉及康熙與朝隆年間之事（同上引）。整體而言，金庸擅長以歷史為軸帶入虛構之俠行軼事以「藉亂世突顯豪俠」，其對史實之精熟程度就連史家也十分賞識，甚有文學家直言金有「歷史癖」，均可說明金庸作品具濃厚的中國歷史色彩（同上引：170-171，181-182）。

金庸作品不但廣受社會大眾喜愛，亦為學界所欣賞，舉凡碩博士論文、學者專書相繼問世，「金庸國際學術研討會」之會議論文相繼出版（王秋桂，1999；吳明麟，2002；吳家齊，2007；送銘池，2004；許彙敏，1996；陳韻琦，2005；楊瑩薇，2004；葉燕容，2006；劉玉華，2007；羅賢淑，1999；蘇惠美，2003）。以文學價值而言，金庸作品表現淳厚，其間之字面聯想與虛擬形容（如「降龍十八掌」之剛柔並濟）也可展現金庸之文字造詣及想像力（林保淳，2000：81-82）。故若就讀者青睞程度、研究重要性及文學價值言之，皆可宣告「武俠的『金庸時代』之來臨」（林保淳，2000：3）。

考量金庸武俠作品之於武俠作品系譜之影響力、所帶給閱聽人之美感反應，本研究擬以金庸武俠小說為例，瞭解俠文化下之閱聽人審美視域意涵、如何從品評作品中享有心靈愉悅。由於金庸著作等身、質量均佳，故擬揀選特定文本作分析對象。論者曾謂，金庸武俠小說之長篇勝於中篇，中篇又勝於短篇；由於長篇利於作者鋪陳高潮迭起之情節，或製造更多想像空間以供讀者涉入，而短篇小說則限於文長，多只能扼要交待情節，難以營造詭奇氛圍來長期吸引讀者（陳平原，1995）。考量作品之受歡迎程度及讀者涉入心理，本文擬以金庸「長篇小說」為討論對象。

## (三) 個案選擇：以《神鵰俠侶》為例

金庸武俠小說之長篇創作包括《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與《笑傲江湖》。以下分述成書背景、故事內容及其所反映之核心旨趣，作為日後選擇樣本之參考。

金庸首部長篇小說為《射鵰英雄傳》，故事場景為北宋末年之蒙古、中原及江南，藉由成吉思汗欲南征、完顏氏希冀爭霸中原為主線，帶出了南宋俠客郭靖、黃蓉與江南七怪等抗敵之事。除了史料引介，金庸在本書亦帶入「華山論劍」之武林爭霸情節，並藉由西毒歐陽鋒發瘋說明「惡有惡報」義理。

上述情節可與前述武俠類型之核心旨趣「兒女情長」、「明辨是非」、「反映真實人生」與「盡忠報國」相互呼應。金庸描寫了郭靖與黃蓉、楊康（完顏康）與穆念慈之感情（兒女情長）；也藉楊康認金人作父之劇情說明人性具戀慕富貴的特點（反映人生）。整體來說，《射鵰英雄傳》帶入了群雄相爭、盡忠報國的軸線，再輔以郭黃二人之戀情發展，是忠俠為主、兒女情俠為輔之敘說方式。

《射鵰英雄傳》成功後，金庸於1959年創辦《明報》，並連載《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與《笑傲江湖》（羅賢淑，2003）。《神鵰俠侶》為《射鵰英雄傳》續篇，接寫郭靖、黃蓉、東邪與西毒等人之事，然而在主角和核心架構安排上，則以楊過與小龍女的感情進展為重心。故事末了不但有情人終成眷屬，楊、龍協同郭靖、黃蓉等人鏟除蒙古主將。據小說云，襄陽城在郭靖等人協助下，守了16年之久（正史所載為「6年」；同上引）。

《神鵰俠侶》以「兒女情俠」為主線，帶出盡忠報國、明辨是非與反映真實人生（如市井出身的楊過講話流里流氣）等旨趣，同時亦描寫了段皇爺出家後與昔日愛妃的情誼，雖然不免「有情皆孽」但最終仍能看破紅塵以「和平共處」，符合前述之「冤孽與渡脫」佛家觀點。

《神鵰俠侶》在兒女情俠表現尤為突出，金庸摯友倪匡曾謂此作乃是「情書」，從楊過與小龍女之互動、書中人物吟唱詩詞「問世間，情為何物」、以致「情花」之毒需「斷腸草」來解等，無一不和「情」之主題有關（林保淳，2000；倪匡、陳沛然，1997；陳沛然，1997；羅賢淑，2003）。

《神鵰俠侶》後，金庸續寫《倚天屠龍記》並以其為「射鵰三部曲」之終章。故事背景設於元末，帶入張無忌、元人趙敏、峨嵋派掌門人周芷若與明教聖女小昭之糾葛。本書也以漢人反抗異族為題，融入了朱元璋、韓林兒和徐達抗元史實。故《倚天屠龍記》不脫兒女情俠之基調，融入忠俠與明辨是非（如周芷若欲陷害趙敏等人，但最終仍被發現）等副線。

以至《天龍八部》與《笑傲江湖》，金庸融入更多佛學及人生觀察。《天龍八部》以段譽在大理國、仙洞奇遇為起始，帶入王語嫣等多位女角，突顯「人皆有情，有情皆孽」旨趣並反映冤孽與渡脫。《笑傲江湖》則以寫實筆法撰寫五嶽派及日月神教之糾結。此作刻劃了精於算計之岳不群、東方不敗與向問天等人物，突顯江湖人計多詭詐以反映現實人生。

以武俠小說之核心概念或各文學家評點原則來看，「射鵰三部曲」（《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和《倚天屠龍記》）除承襲宋以降忠俠傳統，也呼應現代武俠類型之兒女情俠，書中亦能與明辨是非傳統相合，顯見其之於武俠小說系譜、當代作品之代表性。

再就「讀者反應」言之，上述3書尤以《神鵰俠侶》亦能適切地貼近觀者需求，是「溝通於俗」之通俗文學代表。如金庸至交倪匡表示，金庸當初並不想為《神鵰俠侶》安排皆大歡喜的結局，但考量到讀者期許而得有些權變：

金庸在寫《神鵰俠侶》時喜劇收場，絕對可以諒解；因為那時正是《明報》初創時期，《神鵰》在報上連載。若是小龍女忽然從此不見，楊過淒淒涼涼，鬱鬱獨生，寂寞人世，只怕讀者一怒之下，再也不看《明報》（轉引自孫宜學，2004：120）。

另外，金庸亦自承：「作者寫小說時還是希望接近廣大讀者的興趣，不能完全不顧讀者意見。一般讀者意見總希望人生圓滿，總是一個圓滿結局」（轉引自羅賢淑，2003：31）。

羅賢淑（2003）指出，金庸撰寫《神鵰俠侶》時已參考讀者想法，且自小龍女躍入斷腸崖與楊過訂下「16年之約」時，小說雖另開一線訴說郭襄崇拜楊過之情，但讀者實有足夠時間能向金庸反映期待的結果。研究者亦指出，金庸撰寫《神鵰俠侶》時相當看重讀者期待，畢竟明報多刊些廣受喜愛的文章方能吸引讀者。若小說不合普羅讀者之想法，《明報》銷量也會受到牽連（孫宜學，2004）。

由於《神鵰俠侶》之武俠文類系譜、核心概念均具顯要角色，且金庸寫作時亦考量到讀者之期待與反應，故本研究擬以《神鵰俠侶》為分析讀本。

## 二、深度訪談法之選擇與應用

本研究考量審美歷程源自讀者特有文化背景、閱讀歷程等因素，故採深度訪談法以確切瞭解讀者所想。大體言之，本研究從田野資料歸納出一般讀者所想，瞭解其對特定類型之審美期待。

為瞭解讀者心中所想，故研究者、觀察對象的互動頻次需較高，且應是實質且較為長期的接觸，讓彼此間存有信任、親密的合作關係，似可從深度訪談同理觀察對象所想（郭良文、林素甘，2001；劉駿州，1992，1993，1994）。

如受訪者可用語言呈現生活經歷、感觸或剖析自我並提供豐厚資訊（蔡宛珊，2005）。

研究者需因應情境變化，從資料反映之主題及疑義不斷地修正先前所想(Fink & Gantz, 1996)。此番步驟不停地反覆進行、循環，研究者在思辨歷程中找尋相關線索、逐步貼合資料欲呈現之義理，或貼近觀察對象之視域（郭良文、林素甘，2001）。透過對話歷程，研究者可試著抓取觀察對象所欲表達的意義以同理其想法，也可從先前經驗、文化遺跡與資料中理解行動者何以這麼做(Blaikie, 1993)。研究者需運用可得之證據來詮釋其意，透過往覆辨證過程來理解社會現象（如個體想法），亦即站在觀眾對象之視角方能達成相互理解（齊力，2005；Blaikie, 1993）。故研究者需瞭解受訪者生活經歷並以合宜語言來確認、再表述其想法，讓訪談結果能達到「互為主體」之情況（齊力，2005）。

是而研究者若欲理解訪問對象，得從訪談歷程中明瞭其過往境遇並體認其閱讀文本後的感受與想法轉變；而理解策略便在於用「妥適」語言重述觀察對象的想法，同理甚或釐清其所關切的核心（龔鵬程，2007）。

### （一）訪談對象之選擇

研究可針對特定對象來深入探索以釐清「個殊式」知識（劉駿州，1992，1993，1994）。如胡幼慧、姚美華（1996）曾云，深訪時可考慮「理論基礎」、「深入性」和「符合標準」等選樣策略：「理論基礎」則指觀察者可從學理架構入手尋找資料來精緻化理論內涵；「深入性」之選擇策略著重訪談歷程的資訊細緻，從個案的豐富資訊中來剖析現象的運作機制；「符合標準」之策略則宜找尋符合學理要求者來建構更深刻之理論意涵。

就研究旨趣而言，本文擬從上述篩選標準起始找尋合適的訪談對象，考量重點包括了「個體認知發展」與「閱讀經驗」，以符合「理論基礎」、「深入性」和「符合標準」等策略，而篩選考量如下：

以「理論基礎」與「深入性」言之，因 Jauss (1982a, 1982b) 等研究者均強調審美視域之影響，肯定先前教化基礎能影響解讀故事。如 Jauss (1982a) 之「狹義審美期待」說法顯示讀者對「類型」之期待可導出不同觀看視點，甚至引發相異的審美理解及美感反應，可知類型知識在審美歷程扮演要角。

在進行正式訪談之前，本研究曾訪問 4 位讀者以作修訂問題之參考。為確保問題能切合「審美視域」之「狹義審美期待」主題，前測時邀請 3 位曾接觸「類

型」知識者（皆修習過相關課程）及 1 位從未接觸此類知識者。經前測比較後發現，若先前接觸「類型」知識者對相關概念較易掌握，也較能說明作品結構、角色安排、場景規劃及象徵意義，或反思類型知識對於美感反應之關聯。經此預訪後，本研究決定納入具「類型知識訓練」者為訪談對象；此次以受過類型知識訓練者為研究對象，並非全然排除未受學院訓練或否認未受學院訓練者不具類型知識，而是選取訪談對象上以受過類型知識訓練者為主。惟受訪者需熟讀《神鵰俠侶》等讀本（或接觸其他作者所撰之武俠小說），方能具體援引情節並說明美感反應從何而生。

以「符合標準」言之，考量目前為跨媒體世代，如 7、80 年代後融入眾多視覺文化的因素，與之前著重文字表述之時代不同 (Nodelman, 2003)。由於本文在文獻探索時，已強調廣義審美期待中涵蓋接觸媒體情境、視覺或圖像敘事之影響；考量世代之差異，故選擇以 7、80 年代後出生的讀者（約 40 歲以下）為訪談對象。盼以此釐清讀者除文字描寫外，其廣義審美期待亦會扮演何種要角、甚至如何引導其類型知識之建構。

## （二）訪談背景與資料處理說明

深度訪談法之資料取得有賴受訪者提供資訊，若其對「類型」概念有基本理解即可掌握特定類別作品之呈現手法、表達理念、慣例公式及創作之發展系譜，易於進一步詮釋「類型」期待之於閱讀活動的影響，也有助研究者獲取相關資訊。

基於「理論基礎」與「深入性」的考量，受訪者若接受過類型知識訓練，可協助研究者釐清「狹義審美期待」之影響；讓研究者更易理解類型知識引導下，讀者如何品評文學作品而享美感反應。故本研究並非主張讀者均需受過菁英式之文學訓練，方能作出具體美感反應；而是因考量 Jauss (1982a) 對「狹義審美期待」之重視，故才強調「類型知識」(genre knowledge) 對讀者品評、美感反應之影響力，從而引導受訪者之選擇依據。

總體言之，因「理論基礎」等考量，若受訪者曾涉獵類型知識尤佳，為訪談對象之首選。故本研究考慮「狹義審美期待」（特別是對「類型作品」之瞭解與期待）於美感反應之影響力，故部分受訪者需初步瞭解類型知識，以剖析其過往所學如何引導類型期待、解讀方向與美感反應。

### (三) 受訪者背景資訊

本研究共訪談 17 位武俠小說讀者。讀者均曾拜讀《神鵬俠侶》等作品，其中 9 位讀者修習類型知識之課程（當中 6 位讀者曾修習「武俠小說」等專題課程），可勾勒武俠小說類型輪廓。

受訪讀者並非全然菁英取向，而是展現了各自關切核心，亦反映涉入類型知識之多元光譜。如個案 4、5、6、7、8、10、11、16、17 均曾修習類型知識之相關課程，能瞭解武俠小說之公式、情節及角色構塑之特質。當中不乏涉入武俠世界甚深者，個案 11 閱讀全套金庸作品已逾 20 年；個案 5 亦為武俠小說迷，參與撰寫網路武俠小說之續篇；個案 16 甚為喜愛的人物繪製漫畫圖冊，均可見著迷程度。

個案 2、3、9、12、13、14 均接觸文學史（理論）之相關知識，亦對修辭法及美感反應有興趣。上述讀者可約略瞭解類型知識，並能從敘事者角度思考，修辭、寫作如何引發讀者美感反應。

個案 1、10、15 則略涉及文學史，並對在地文化有興趣，能援引文史背景以詮釋作品。因其受過中國文學史之訓練，故廣義言之，亦曾接觸類型知識。

讀者背景資料如表 1。

### (四) 分析進行步驟

訪談所得之資料乃是研究者揀取、評判後之結果，並非等同受訪者想法之事實；故研究者除需從訪談資料裡蒐羅各項證據以發展合宜構念外（龔鵬程，2007），亦需將此分析結果與受訪者來回討論、相互參照，以確保自身之詮釋確能貼合受訪者之初衷。

在處理訪談資料時，除以文獻探索提及之「審美視域」與「美感反應」等概念為骨幹，也從受訪者之回應中歸納相關質素。如研究者需根據訪問內容之逐字稿，從受訪讀者的每句話中歸納出與研究旨趣相關資訊，得出與理論相關之概念及依附於此之屬性（賴玉珊，2008），而此研究發現也需對照訪談對象之生命經歷與喜好以進一步分析。故研究者從「審美視域」與「美感反應」著手篩選出契合研究主題之文句，區辨出重要敘述並標示之。

篩選出受訪者之重要敘述後，研究者得從自身對「審美視域」之理解出發，並在「理論結構」與「訪談資料」（受訪者原義與涉及之生活經驗）間往覆對話，以逐步跳出文獻探討預設並漸次挪往受訪者之視域。

編號	學經歷簡介	性別	年齡	訪談時地	訪談時地
1	歷史所碩士，畢業論文鑽研服飾文化，曾拜讀金庸、古龍、倪匡、溫瑞安等人作品。	女	32	2008/12/9 於餐廳；12/15 電話。	面訪，並以電話補探。
2	中文系畢業，修習「文學史」等相關課程，曾拜讀金庸與古龍之作品。	女	30	2008/12/8 於受訪者工作地點。	面訪。
3	中文系畢業，曾修習「文學理論」課程，曾拜讀金庸與古龍作品。	女	35	2008/12/9 電話；12/12 於受訪者工作地點。	電話後再以面訪補探。
4	中文系學生，曾修習「武俠類型」相關課程，曾拜讀金庸作品，《書劍恩仇錄》是印象最深刻的一部。	女	22	2008/12/26 於餐廳；2009/2/2 電話。	面訪，並以電話補探。
5	中文系學生，曾修習「武俠小說」相關課程，接觸作品包括臥龍生、金庸、古龍、溫瑞安、雲中岳、黃易與倪匡的創作。個案除閱讀武俠小說外，也曾分析小說故事及撰寫續篇，亦曾參與網路之武俠故事接龍及網路社群討論。	女	22	2008/12/26 於餐廳；2009/1/31 電話。	面訪，並以電話補探。
6	中文系學生，曾修習「武俠小說」相關課程，拜讀古龍、金庸與溫瑞安等人之作品。	女	22	2008/12/26 於餐廳；2009/1/31 電話；2009/2/3 電話。	面訪，並以電話補探。
7	中文系學生，曾修讀「武俠類型」專題課程，從中學便開始拜讀金庸、倪匡和古龍等人作品。	女	22	2008/12/26 於餐廳；2009/2/2 電話；2009/2/4 電子郵件。	面訪，並以電話與電子郵件補探。
8	中文所碩士，曾拜讀金庸與古龍作品，試從「讀者反應理論」分析創作歷程。	女	29	2008/2/16 於餐廳。	面訪。
9	中文系學生，曾修習「武俠小說」專題課程，拜讀金庸、古龍與黃易之創作。	男	22	2008/12/26 於餐廳；2009/1/30 電話。	面訪，並以電話補探。
10	歷史所學生，曾修習思想史並鑽研近代史相關議題，拜讀過金庸與古龍作品。	女	32	2009/1/14 於餐廳。	面訪。
11	中文系畢業、影像類研究所碩士，大學修習俗文學等課程，拜讀過金庸、古龍與黃易作品。約六歲便讀過《天龍八部》，接觸金庸全套作品已超過二十年。曾採訪「金庸武俠小說研討會」，與金庸本人、關心金學發展之研究者作進一步接觸。	女	30	2009/1/16 於餐廳；2/17 電子郵件。	面訪。
12	中文所碩士，接觸文學理論、敘事、符號學與美學等領域，曾拜讀金庸與古龍作品。	女	29	2009/2/8 於餐廳。	面訪。
13	中文系學生，修習詩詞等類型文學，曾拜讀金庸、古龍與黃易作品。	女	21	2009/1/22 於餐廳。	面訪。

表 1：受訪者資料及訪談時地簡表

來源：本研究整理。

14	中文系學生，曾修習文學概論等課程，除拜讀金庸作品外，亦接觸武俠類別之線上遊戲，認為電玩視覺設計可影響讀者想像。	女	21	2009/1/22 於餐廳。	面訪。
15	歷史系畢業生，曾拜讀金庸、古龍、倪匡與黃易作品。	女	30	2009/1/21 於餐廳。	面訪。
16	中文所碩士，修習俗文學，曾拜讀金庸、古龍、黃易、溫瑞安、梁羽生、王度盧、還珠樓主與倪匡作品。賞析金庸作品經歷近二十年，自小學接觸武俠小說並繪製武俠漫畫及接寫續篇，曾拜讀「舊書版」《射鵬英雄傳》與《倚天屠龍記》。	女	31	2009/2/6 於餐廳。	面訪。
17	中文所學生，曾修習「武俠小說」專題研究，除關心金庸武俠作品，亦關切鄉土文學之發展。	男	24	2008/12/27 於餐廳；2009/1/30 及 2009/1/31 電話。	面訪，並以電話補探。

表 1：受訪者資料及訪談時地簡表（續）

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依上述方式逐步分析 17 位讀者之訪談資料，揀擇審美視域與美感反應等質素。本研究依上述二層面歸結出受訪讀者之審美理解歷程，以發掘不同審美視域可能引發之美感反應樣貌。

## 肆、研究發現：武俠小說讀者之審美視域與美感反應

本節分析深度訪談資料，以瞭解讀者之審美期待與感動。下文擬自訪談結果出發，剖析受訪讀者對武俠小說之審美期待。

### 一、狹義審美期待

狹義審美期待可體現在讀者對武俠小說之「既定期待」與「創新期許」，前者指文本結構應包括特定情節、角色或包羅哪些理念，後者為讀者期待的創新風貌。下文分從既定期待與創新期待說明讀者之期許。

#### （一）讀者對武俠小說之既定預期

「定向期待」指讀者對作品的預期或假設文本應有何類資訊，此乃從讀者過往接受的文化與歷史經驗而來。Jauss (1982a) 曾提及角色、情節、公式、寫作視角與理念，下文續以此些面向瞭解武俠小說讀者之既定期待。

#### 1. 武俠文學史之歷時系統

本研究發現，接觸類型知識之讀者研讀武俠小說時多已有定見，期盼作品應具某些特定樣貌。如個案 12 表示，「會比較看重修辭美學的東西，例如從形式、架構上，分析作品為什麼寫得好。也會看作者怎麼鋪排，他怎麼佈局、營造氣氛」。個案 12 從修辭美學之視域出發，嘗試瞭解作者的敘事手法，也可從分析以品評作品繼而與文本交流。

接觸類型知識之受訪者中，多數均參照唐宋以來話本傳統，將近代武俠小說置於文學史系譜解讀。受訪者若以文學史傳統解析武俠，可體現 Gadamer (1986 / 洪漢鼎譯, 2005) 之「效果歷史」精神（意即透過受訪者的詮釋，讓武俠文學類型典律能再臨於世、被世人所體驗）。如從《史記》的〈豪俠列傳〉和〈游俠列傳〉出發，強調武俠類型之核心精神為節義、不愛其軀與捨身相報（個案 5，11）。

如個案 11 表示：

我定義的俠是比如舉〈刺客列傳〉，司馬遷《史記》的那種俠，他不見得是為了什麼了不起的目的，……魏公子〈信陵君列傳〉裡，守城門的老頭說，等你成功那天，就會自刎而死。他也沒有死的必要，可是他就是要實踐他講過的話。……我覺得金庸小說很精準的承襲到這個俠義傳統（個案 11）。

他也從賞析《趙氏孤兒》之個人閱讀史著手，描述何者為俠；個案 11 分析，金庸小說為何廣受愛戴，應該是相當程度反映了俠義精神。

如個案 5 認為，武俠小說特色即在「武」跟「俠」，其最出色之處便在「節義精神」，亦是中國文化特有之意涵。他進一步指出：

豪情、它的節義，才是它重要的地方。而且這是一個很能表現中國文化的東西，因為歃血為盟，或是節義精神。像《史記》裡面，〈刺客列傳〉跟〈游俠列傳〉，像豪俠和游俠，中國武俠小說用這兩個點，把它弄的很漂亮。……其實就隱隱約約查覺到，中國傳統文化在裡面（個案 5）。

個案 11 也指出，「俠義」精神乃潛移默化而來，為武俠小說不可或缺之元素，可溯至史記及宋元話本《水滸傳》傳統。他以《史記》〈刺客列傳〉為例說明俠客「講信諾」特質，再如《水滸傳》之阮家兄弟言及「這一腔熱血要賣予識貨的」亦體現俠義精神。個案 11 認為：「裡面最聰明的軍師吳用，他也知道下場，他也多番勸阻過。他去做這個的原因，就是為了俠義。」他肯定金庸很精準地承襲了《史記》與宋元話本傳統，體現俠士已諾必誠及「明知不可為而為」的浪漫情操。

讀者從武俠小說之文學史系譜出發，肯定此類型應具忠孝節義、不愛其軀、發揚正義之特質，亦稱許金庸作品承襲宋元話本、明清小說之「節義」及「懲惡揚善」核心精神（個案 5，7，8，11，16）。如個案 5 指出：「金庸跟梁羽生來講，他們最重要的是俠情，就是典型的隱惡揚善。金庸來講，……像比起《三俠五義》，都走的是那個路。」

如前文所述，接觸類型知識之讀者中，近三成受訪者修習武俠小說專題課程。參照其修課大綱後發現課程介紹之武俠系譜為「宋元話本」、「清代小說」以至「近代小說」，與其對武俠類型認知相似；故訪談者過往學習歷程（亦是生命經歷的一部分）可融入讀者認知而成「審美理解」來源。

此外，讀者之個人閱讀史亦是形成審美視域之重要基礎，藉此形成「何者為俠」概念；透過受訪者再述之文學系譜及作品承襲典律，方能讓武俠小說敘事核心再次臨現於世人眼前。故武俠小說旨趣（俠義精神）所以能再臨於世，除了憑藉在地文史予讀者之陶養外，亦讀者之個人閱讀史（生命歷程）及詮釋過程中展現之文學典律，息息相關。

## 2. 用字古雅與喚起時代感

古雅用字構成了「古中國」時態感，召喚讀者沉浸文本，易於融入集體記憶或既有文化加以解讀。如個案 14 所述，「用字古雅比較容易帶你到那個時空環境」且可融入更多「情感」與歷史背景。

即使用詞稍具文言以致影響理解，曾接觸類型知識之讀者仍普遍傾向可在「篇章後面使用附註」並願意前後「對照附註閱讀」（個案 4）。是而讀者不但接納武俠小說用字古雅，甚至願意克服古文與白話文之隔閡來賞析作品，顯見讀者對用字典雅之既定期待。細究其因，或許文辭古雅可營造合宜「審美距離」便於讀者融入更多想像。個案 11 即表示，若用字過於現代「就很容易被抽離」情境而無法「沉浸」，如果過於白話則難以想像古時情節。他分析：

就是希望有點距離，這個距離是讓我可以（有）想像的空間，如果寫得太白的話，我就覺得沒辦法去想像。就是你給我一點距離感，可是也不要讓我覺得太遙遠很吃力（個案 11）。

易言之，古典字詞可予讀者悠遠氛圍並融入另一時空，且能喚引讀者懷古等諸多想像。讀者生命歷程（閱讀史）等，亦是肯定武俠小說需用字古雅之因素；如個案 4 常接觸古文與註釋，故願意對照文言文之附註來賞析文章。以此可見，讀者肯定武俠小說需具古中國氛圍，除因前述之民族情感及在地文史外，個人之閱讀經歷（生命歷程）亦是形成「狹義審美期待」之因。

### 3. 時空背景及喚起參與感

個案 5 接觸武俠小說已逾 10 年，她表示：

我必須要細探它的律法。……武俠也是存在歷史上的，就是跟昔日的八卦庶法一樣，是存在於古代的東西。……現在真正那種水上飄的武功已經失傳了……，所以我會比較介意的是，武俠小說只要設在古代，我就可以接受（個案 5）。

個案 5 除了細究寫作律法，亦融入對八卦庶法、「輕功水上飄」之觀察，評析武俠作品應具備之審美因素。

此外，讀者亦表示若作品加入了古代時空實可提供讀者「融入歷史情感」便於涉入（個案 7，14，16）。若小說融入歷史背景可讓讀者體會「因為裡面都是真的人的感覺，他是有血有肉的人在裡面發生的事情」（個案 15），如金庸融入了歷史質素讓故事不會「完全超越你認知的範圍」（個案 15），因而可協助讀者融入情境。如歷史系畢業之個案 15 言及，「像《夜宴圖》雖然是在唐朝，可是因為看了那些東西，所以很多東西你比較容易去想像」。當讀者眼見古意盎然之描寫時，即可聯想起古畫以俠客衣著樣貌而倍感親切，克服陌生感。

易言之，讀者可從過往閱讀史、在地文史之觀察、與古畫之交流體認等，詮釋武俠小說場景為何需設於古代。上述個人生命歷程（閱讀史）、在地文化涵育、與歷史創作之交流過程，均是構成「狹義審美期待」之質素。

### 4. 劇情張力與期待結局

曾接觸類型知識之讀者對武俠小說之既定期待，可反映在此類型之既定行俠模式，如搶奪秘笈、爭奪盟主與江湖爭鬥（個案 1，5）。讀者認為此種安排可帶入人性衝突，近似黑暗面的描寫可引人入勝（個案 2，5，9），如從「奪」及「爭名、利」中見著角色性格與心理掙扎（個案 5，6，15）。

個案 1 與個案 15 均曾言及，在追求絕世武功過程中會涉及「搶」的歷程，以此突顯「每個人的個性、出現的角色性格差異」。個案 5 指出這些慣例情節必須存在，為武俠小說不可或缺之元素：

如果沒有，這武俠小說不知道要寫什麼。因為「武」跟「俠」嘛！如果武俠小說只有情，那就直接看言情小說。而且你看奪秘笈，人家說

老套。可是如果你沒東西奪，帶不出其他人的聲音。就是因為「奪」，才知道人心。有衝突點，他的掙扎在哪裡。好看的地方都在於……那些搶、那些掠奪，那些掙扎（個案 5）。

另情節張力可能來自主角一路受到不平之冤，沉冤即將得雪時又橫生枝節（個案 7），造成讀者心理不斷懸宕並延續閱讀歷程。角色間人際誤解與化開謎團乃是情節吸引人因，也讓讀者不願中斷賞析歷程直到真相水落石出（個案 1，2，12，13，14，16）。讀者雖已猜到結局與謎底，但隨著更多旁枝、離奇情節介入，猜想結局之期待亦不斷延遲。如個案 7 云：「這就是通俗小說一定要的啊！它下一句一定會延遲。明明你就會知道，壞人是誰，它就硬要延，明明他就是被欺負的，但是仍會受到妨礙。」

上述讀者近半接觸武俠小說專題課程，其詮釋武俠小說劇情之模式時，實融入先前所學及理解，肯定旁生枝節、延緩解謎時間為通俗作品之既定表現。故讀者理解武俠小說時，可從個人熟悉之學理及體認之類型公式著手，將武俠類型置於通俗類型系譜解讀而形構對武俠類型表現之期待。

## 5. 時空背景映襯出的角色特質

個案 1 表示，由於武俠小說得藉亂世彰顯豪俠，故敘事者如何藉動盪的時空背景以突顯俠行（人格美質），亦是她對武俠類型之期許。再如個案 2：

武俠小說，都會牽涉到文化背景。所以才會有驅除韃虜、恢復舊河山這種想法。它具有的元素就是歷史情感，角色需要比較有突顯的個性，不能是扁平性格（個案 2）。

個案 2 為中文系畢業生，曾接觸類型相關知識。故其詮釋小說時亦會融入先前所學（角色必須是生動立體的「圓形人物」），將之視為狹義審美期待的一部分；她也進一步分析，適時融入歷史事件可引入劇情衝突點，吸引讀者關注情節走勢。

從讀者反應可知，武俠小說之既定期待形成因素，與歷史情感、文化背景、個人閱讀史相關。或可將讀者視為「俠文化涵育下之閱聽人」，解讀歷程乃受歷史情感、在地文化經驗的影響，間或摻雜個人閱讀史等生命經驗。故在地文化語境、個人閱讀史對審美理解的影響，可引導對武俠類型之狹義審美期待。

## (二) 讀者對武俠小說的創新期待

讀者對武俠小說之創新期待乃植基於前文所述之既定審美期待而來。如部分受訪者體認武俠小說多設在古代江湖，故盼融入「現代」元素(個案 4, 9)。此外，讀者也感覺武俠小說之英雄人物過於完美(個案 1, 2, 9)，反而期待寫實或具缺陷美英雄(個案 9, 13, 14)。以下從小說場景及英雄性格層面剖析讀者之創新期待。

### 1. 小說場景之設定

個案 9 亦曾修習武俠課程、略能掌握武俠類型之公式與表達手法，他認為武俠小說背景設於古代，他渴望創新並突破原初框架以增加閱讀動機：「還蠻想看一下現代的。……武俠小說太被限制在一個框架之內。文學，應該是要一直都有創意的。……不用古代的背景去做一個故事。」

而讀者的創新期待想法也與其接觸的媒體經驗相關，如個案 4 對「現代」武俠之想像是以周星馳的俠幻片型《少林足球》及《功夫》為參考框架，為武俠小說設想創新角度。他認為，只要融入武打且看來有趣，古中國時空並非決定性因素，仍可發展詮釋理想的現代風武俠小說面貌。

### 2. 英雄角色之形塑

讀者論及，想見著較不完美甚或有些缺陷者以符寫實氛圍。如個案 9 言及，「武俠小說，有個讓我比較不能接受的原因，就會有那種太完美的(角色)」。個案 14 也認為武俠小說若打破「完美英雄」或「男俊女美」描寫亦是創新起點，「角色不用每個都很高強，……也不用每個都很漂亮。一般人還是平常比較多，很美還是少數的人」，或可帶來另種「閱讀的樂趣」。

「創新期待」並非憑空而生，除根植於既定審美期待外，相關類型知識與表現亦為其參照來源。

### 3. 文類既定知識之反思

個案 11 分享品評另一位武俠小說家作品的經歷，說明從既定成見逐步翻轉、再終得以接受創新類型的過程：

我後來才知道，……○○○有說他很受外國作家影響。比如說他某一部小說就是會學海明威的文體，……哪部小說又學哪部作家的文體，所以變成說他是有意去做結合的。……如果他有個目的，是刻意為之的，那我就可以接受。就覺得說，有點像是實驗性的（個案 11）。（當中圈號為研究者所加）

易言之，讀者起初賞析小說時，或許會因不符既定期待而略有抗拒；但若結合個人閱讀史（對其他作品之認識），實可從敘事者角度瞭解緣由，作為形成創新期待的基礎。

訪談結果發現，「創新期待」乃是讀者歸類舊有公式後推論出之可能改變方向；亦可能是從往昔閱讀史出發，同理作者實驗初衷而形成另一番新視域。

### （三）小結：既定期待及創新期待

「狹義審美期待」可展現在讀者對小說類型之認知，且在地文史佔極重要因素，讀者可溯及同一類型之古典文學作為參照，剖析主角、情節或行事模式之典型特質。

#### 1. 引發讀者對類型之推定

接觸類型知識之讀者對武俠小說之審美期待可影響其賞析時的交流歷程，如曾拜讀宋元話本可發掘其具「用字古雅」特色，且若其視現代武俠小說為宋元話本所衍生，則易視武俠小說之遣詞用字理應如此。另外，讀者對「情節安排」亦體現在地文史之影響，如認定自古以來通俗文學結局均不斷延宕及主角復仇路必定坎坷，從而肯定節外生枝、延緩解謎時刻為通俗作品慣常手法，甘願繼續拜讀或苦候出版時程以破解心中謎團。

#### 2. 從既定期待所衍生之創新期待

讀者之創新期待並非憑空而生，乃是體認某一表達方式稍嫌陳舊而有革新之期許。易言之，創新期待乃根植於既定期待，若某種類型表現手法過於常見，則反易激起讀者汰舊換新之意念。另外，讀者也可憑個人閱讀經歷、品評其他文學家之敘事手法以反思既定期待，拓展審美視域後而形成新一層認識，作為下一輪創新期待的開始。

## 二、廣義之審美期待

讀者面對同一部作品，仍可用多種方式來現實化、具體化作品，也就是採用不同「審美理解」方式解讀創作 (Ingarden, 1973b)。以下針對個人生命經歷、五感體驗等範疇，依序說明廣義審美期待與美感反應之關聯性。

### (一) 個人生命經歷

#### 1. 觀看媒體經驗

讀者先前接觸電視劇及線上遊戲（如《金庸群俠傳》）亦影響其審美期待，此為由影視、非文字媒介引發之審美期待，反映在小說人物及場景之構思與表現手法。而 Jauss (1982a, 1982b) 等人多以文字媒體為評析對象，尚少論及影視媒體對小說審美歷程的影響，值得後續觀察。下文分從電視劇及線上遊戲等項，細述媒體經驗之於審美期待之影響。

#### (1) 電視劇與審美期待

個案 7 看完電視版《神鵰俠侶》後拜讀小說原著，電視劇引導下的審美期待讓讀者帶入相關視聽畫面來詮釋小說（如原先預期《神鵰俠侶》的鵬是帥氣的，直到接觸小說後才發現「猛禽」原初造型）。

個案 10 亦言及，幼年時觀賞潘迎紫版本之《神鵰俠侶》記憶亦融入小說閱讀經驗，拜讀小龍女相關情節時，潘迎紫的影像不自覺地浮現，成為構塑小龍女樣貌之材料。凡此種種，皆可見先前之觀影經歷對閱讀歷程之效用，如讀者心中的角色樣貌或可隨電視劇牽引而有審美期待。

#### (2) 線上遊戲與審美期待

在電動遊戲部分，個案 13 閱讀小說場景與角色描寫時，會先浮現電動遊戲《金庸群俠傳》設置之視覺場景，之後才慢慢融入自己的想像。

總括言之，影音媒介在廣義審美期待扮演要角，可形塑具體、明確之情景繼而成為閱聽人之感知及體驗來源。在影視媒介的介入下，讀者可用非線性的圖像思考起始，並將此心像挪用至賞析過程，成為想像虛構故事的來源。

## 2. 歷史情感與審美期待

華人讀者之歷史情感亦是交流之重要質素，此亦呼應接收美學關切在地文化審美歷程之議題。如讀者瀏覽《神鵬俠侶》夷夏之防、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典故，民族情感亦隨之興起，故受文本召喚並融入歷史場景。此種與文本交流引發之歷史情感似已觸及華人文化深層底蘊，對讀者而言幾已是共識。如個案 1 分析：

當我們講諸葛亮時，就知道那個是代表什麼子的人物，代表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就是什麼。……那已經變成文化的部分。……已經超過歷史人物的意義了（個案 1）。

故讀者可從文化社群之共識為賞析基礎，同時華人讀者亦可能帶著民族認同之情感與金庸所撰之文本交流。個案 13 則分析，若讀者從儒家傳統出發，較易與文本產生情感交流。個案 14 亦指出，當目睹《神鵬俠侶》江湖人士群起抗蒙古，曾嘆「江湖人士比較守護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呈現很大反差」而有極大的情感觸動；當她融入在群俠抗敵之情節時，對異族入侵之事備覺反感故難以認同。

華人之集體記憶與民族情感，亦是影響讀者涉入之關鍵。讀者也認為，因華人史事有助讀者融入背景知識加以聯想，增添虛構小說之真實感，宛若「看著紀錄片一樣，跟著走一遍歷史」（個案 1）。

## 3. 個人閱讀史與審美期待

讀者可從生命經驗（所學訓練）來分析武俠小說之慣常時空，可見所學、閱讀史對詮釋作品的影響。如個案 1 修習過唐至清代之專史，曾以貨幣及庶民文化等知識，來剖析金庸選擇宋代之後作為創作背景之因：

在宋朝之前，一般民間生活的資料掌握度很低，大部分的武俠小說背景都選在宋朝、元朝、明朝的時候。……至少我們熟悉的東西，二兩銀子啊，普遍變成貨幣是在明朝以後。很多官制、制度和名稱啊，用純漢人的社會比較好寫。而且宋朝之後的庶民文化比較齊全（個案 1）。

另外，讀者可依先前拜讀過之美學讀物，作為對話基礎。如個案3所述：

朱光潛《談美》……他說很多很多的美，其實起於一點距離。……如果產生一種距離的時候，……跳出來看時妳回顧就像蘇軾的回首卻向來時路、也無風雨也無情，辛棄疾的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那時發現那種美（個案3）。

個案3亦引述小說之例，說明美感反應需存在審美距離：「我覺得李莫愁在火光之間，她對她的感情之孤注、投擲，唱著那個歌死掉是一種美。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接近它。所以我們會覺得她淒豔之美。」

故美感反應成立因素乃需有合宜審美距離；若少了合的距離，可能就很難跳脫情境而享「驀然回首」之美。個案3引述《談美》之閱讀體驗，作為詮釋武俠人物之審美基礎。故個人賞析文學之經歷亦是品評作品之判準，為構成廣義審美期待之因素。

#### 4. 個人對日常生活觀察與審美期待

金庸的小說之所以吸引人，乃因其「人事透達」，且讀者可在具體生活經驗中找到共鳴。如個案17以《射鵰英雄傳》與《神鵰俠侶》角色，說明黃蓉性格轉變之因：

黃蓉從《射鵰》到《神鵰》，不是有很多人討厭她在《射鵰》裡面的嗎？可是我覺得……在《射鵰》裡面她是天真無邪的小朋友，可是她到《神鵰》時，變成母親就要面對現實（個案17）。

個案17亦不諱言，對照生活經歷後會感讀小說時似乎體驗到人生百態，小說中人物宛若在現實生活中發生；他亦認同金庸對人情世故之通達理解。故而讀者對日常生活之體驗及觀察，亦是與文本世界唱和之重要因素。

#### （二）五感體驗與審美期待

讀者聯想的聽覺意象包括「武鬥音效」及「國樂」，視覺意象包括從典故中理解角色樣貌與武鬥招式，觸覺聯想則與角色散發氣質及場景溫度相關，味覺與嗅覺意象多與「美食」和「野味」相繫。以下分述之。

## 1. 聽覺聯想與審美期待

### (1) 武鬥音效、器樂之聲

讀者聯想之聲效包括「武鬥音效」與賞析時為小說編製之配樂，此二者均能召喚讀者潛入武俠世界並與文本唱和。

研究者指陳想像活動之於美感反應之重要，接收者可藉由個人感知，將零碎之片段融為一體，讓故事帶有更多奇幻或遐想成份 (Munz, 2007)。美感吸引力可由想像力廣度所賦予，助人們重新造訪相仿的事物及情境，追尋屬於某刻的壯麗或莊嚴氛圍 (Saito, 2007)。當人們的想像範疇擴大時，便帶入更多隨物件表達之特徵所激起的思緒，並激起更多的奇想 (Saito, 2007)。

個案 6 分析，假如音效描寫具體，則易從真實生活經歷聯想音質。故聽覺聯想乃奠基於讀者日常經歷，若文中描寫切合其生活脈絡，則聽覺意象愈形清晰。

讀者對武俠小說之聽覺聯想也展現在國樂聲效上 (個案 1, 7, 9, 10)，乃因武俠小說具傳統文化質素，故需國樂來襯托。如個案 7 與個案 9 均認為，武俠小說之聽覺元素應與「國樂」相繫，以此烘托古中國之意境。總之，廣義審美期待實可與在地文化與生活經歷扣合；讀者對器樂及音律的自然態度，或可反映出其為在地文化下陶育之閱聽人，據此期盼武俠小說與古中國氛圍之聽覺聯想。

### (2) 聽覺詞句之修辭意境美

研究發現，讀者審美時會強調意境帶來的感動，如以白居易的〈琵琶行〉來描摹聲音描述滄茫心境，這些都難以「具體化」，故賞析重點乃是聲音引發之意境、境界而非具像呈現之音符。而武俠小說之聽覺描寫似亦體現此傳統，其元素可能為鋪陳氛圍或氣勢以召喚讀者想像與融入另一層意境。如個案 5 拜讀「射鵰三部曲」後有感而發：「歐陽鋒的鐵錚、黃藥師的玉簫，還有洪七公的長嘯。這就演不出來。」

由此可見，聽覺足可引發讀者遐想，但屬意領神會而非具體摹聲。故此審美歷程實與接收美學先賢所云之「具體化」歷程相悖，讀者們賞析作品時未必得感知符號具之聲律，方能腦中形成若干具體音響 (Ingarden, 1973a, 1973b)。由前例可知，讀者傳統強調之意境美、意像幽遠等似異於接收美學觀察。

此番藉聽覺烘托意境之手法似可溯及中國文學傳統。如個案 3 以〈黃小玉說書〉、〈秋聲賦〉和〈琵琶行〉等描寫聲音之文章為例指出，「需刻意想像」方能營出聲音，否則多半只形成意境但不聞其聲。個案 3 指出：

其實文字要聯想聲音都很難。比如說我們有四大音樂的文章。比如說〈黃小玉說書〉、〈秋聲賦〉、〈琵琶行〉，它們都是音樂。「大珠小珠落玉盤」，誰會去想像大珠小珠的聲音？但是我們一定要去想像時，才會刻意的去想像（個案3）。

總體言之，在中國文學描寫聽覺之傳統中，文字帶來的可能是意境美或修辭美感卻未必是聽覺之具像呈現。在人與作品交流的過程中，讀者的社會判斷、承襲的傳統文化等，均會影響美感體驗 (Jauss, 1982b)；再從深度訪談資料可知，閱聽人可從先前接觸之古籍作品，作為比附、品評武俠作品之依據。以此系譜觀之，武俠小說可用聽覺描寫來武鬥氛圍，但「具體化」與否恐非讀者鑑賞的重心。

## 2. 視覺聯想與審美期待

美感反應牽涉對確切主題的欣賞與瞭解、作品慣常的特徵與組成元素外，也涉及其與作品之交流方式，包括感知、情緒與想像在其間如何發揮 (Saito, 2007)。對讀者來說，如果招式動作明確則易有視覺聯想。如《神鵬俠侶》楊過與金輪國師比試歷程曾提及「紅拂夜奔」、「綠珠墜樓」與「嫦娥竊藥」等招式描寫，個案 15 即以「紅拂夜奔」之跑步意象為例，分享武打招式之聯想：

「紅拂夜奔」的話，會有車輪戰的感覺。會覺得他的手很飄忽，看不清楚，但是招式就一直來，有種夜奔是一直往前。所以我會幻想說，他不斷的在進攻。他的手因為是奔跑，所以就是圓弧狀的（個案 15）。

個案 13 則分析文學造詣、解讀及視覺聯想之關係，需先知道故事內涵才能具體聯想招式樣貌：「像『綠珠墜樓』，如果不知道故事，會覺得綠珠會不會是珠子。……要知道典故，才能解釋。……第一步是把典故擺進去，然後第二想像招式情景。」

以此言之，讀者可從往昔習得之典故著手，並扣合至情節方能詳細勾勒武打歷程；除了回應讀者生活經驗（閱讀史）之於審美理解影響外，亦說明閱聽人如何在華人文化之潛移默化下詮釋及品評文本。

### 3. 觸覺聯想與審美期待

雖然小說中的武鬥場景少不了刀光劍影的描寫，但受訪者較少提及痛覺（筋骨損傷），讀者興起觸覺聯想之章節似較無關武鬥且亦少見血。此點或因「審美距離」作用使其能用旁觀角度賞析情節故難聯想痛感；少數如個案 11 均曾提及觸覺聯想，或可作為說明。

個案 11 從小龍女出場情景聯想到冰鎮、不燥熱而感知小龍女的冰清玉潔；她並以就讀影像科系時習得「過度曝光」概念，描述腦海中的畫面：

她慢慢走出來。……明明是白天，……日光也變成了月光。就覺得再熱妳看到小龍女，就覺得是有一種冰陣之感。……她身邊陽光有點像白熱光，就是過度曝光那種感覺……非常亮。……不是燥熱的光，感覺是冬天的太陽。晒在身上沒溫度（個案 11）。

讀者從冬陽與冰涼感受描繪角色氣質，係從觸覺聯想出發，多面地詮釋角色特質並體現「圓型人物」概念。如 Kant 所云，人們之所以會有美感的「想像」得以「心智」、精神層次為基礎，將事物加以整合 (Jauss, 1982b)。

### 4. 味覺聯想與審美期待

讀者之味覺聯想也不離其生活脈絡，以熟悉或喜歡之食材類比，想像武俠小說中的野味妙處何在。

讀者多肯定美食描寫乃小說吸引人之處。以洪七公之叫化雞為例，讀者們想到「烤雞」（個案 6）、「桶仔雞」（個案 5）與「客家白雞」（個案 11），藉日常生活之熟悉或所喜的食材「具體化」小說描述之野味。如個案 11 以客家油雞想像叫化雞特色：「我想到的是客家油雞。……肉汁很多的，雞的味道很濃郁的感覺。……只有一點點鹽。只要有鹽的調味，就可以吃雞的原味。」

再如讀者見「炙牛肉條」的描寫時，會想到先前欣賞的中國旅遊節目，聯想到實際存在的食物。個案 7 引述觀賞介紹新疆之旅遊節目為例，說明生活經歷賦予的味覺聯想：「看到的時候，你就很想去中國看看。去吃吃道地的肉串。像是烤牛，烤牛肉串，新疆維吾爾那邊的烤羊肉，……就會開始出現一些想像。」讀者聯想食物的味覺後隨即召喚出許多期待，希望能真的嚐嚐這些食材。即使在真實世界難尋，卻也想去中國找些類似菜色，看看自己的「預期」與現實有否差異。

如 Richard Payne Knight 強調想像歷程「從概念的聯想而來，更多材質聯想所帶來的加乘效果，也因此會帶來更多的愉悅」（轉引自 Saito, 2007: 181）。從上可知，小說描寫召喚了讀者之味覺聯想，引發了若干期待與想像（與現實口味不相符），使讀者進一步融入其中。而此種審美期待乃與生活脈絡相關，讀者可融入喜愛之美食來描摹小說之野味。

### 5. 嗅覺聯想與審美期待

嗅覺聯想過程亦涉及讀者參照生活脈絡所引發之想像，如個案 5、7 憶及洪七公之叫化雞時會想到日常熟悉食材（「香香的」或「有香味」的烤雞）。此為讀者接觸日常生活的烤雞後，根據其嗅覺印象進一步挪用至賞析小說歷程。讀者對美食之既定期待融入交流過程可用描述嗅覺意象。

由上可知，小說內容誘發之五感聯想亦與閱聽人認定之「類型系譜」及原生文化相繫，如其將武俠小說歸類為古中國通俗文學系譜，則易有「國樂」等聽覺聯想，或從成語典故論及角色樣貌與動作等視覺聯想。故讀者可從生命經驗及五感體驗出發，隨著文本內容之召喚而有不同聯想與詮釋。即便面對虛幻場景，讀者仍需從真實情境來變更或改造，可見生命經歷對審美歷程之影響力。總之，廣義審美期待展現在「生命經歷」與「五感聯想」，可助其激起創造力而有更多閱讀體驗。讀者賞析武俠小說之「審美期待」意涵，或如圖 1 所示。

## 三、審美視域與美感反應

接收美學研究之「審美愉悅」多基於相互理解而能進一步地融入群體，涉及較多「社會整合」之描寫。本研究發現，《神鵬俠侶》讀者也有抒發情感或留滯在悲傷情緒的需求；此種悸動偏向心靈上之「情感抒發」而少觸及「社會整合」，有別於接收美學對美感之認識。

### （一）體驗惆悵與落空之美

本研究發現，讀者也有抒發情感或留滯在悲傷情緒的需求（個案 7 與 9），體驗惆悵美的感動。此種悸動偏向心靈上之「情感抒發」而少觸及「社會整合」，有別於接收美學對「美感」之認識。

如個案 11 言及，美感伴隨著「無可奈何花落去」，讓讀者體會「落空」及「沒辦法真的抓到的幸福，不是快快樂樂結局」。特別是在無法確切掌握所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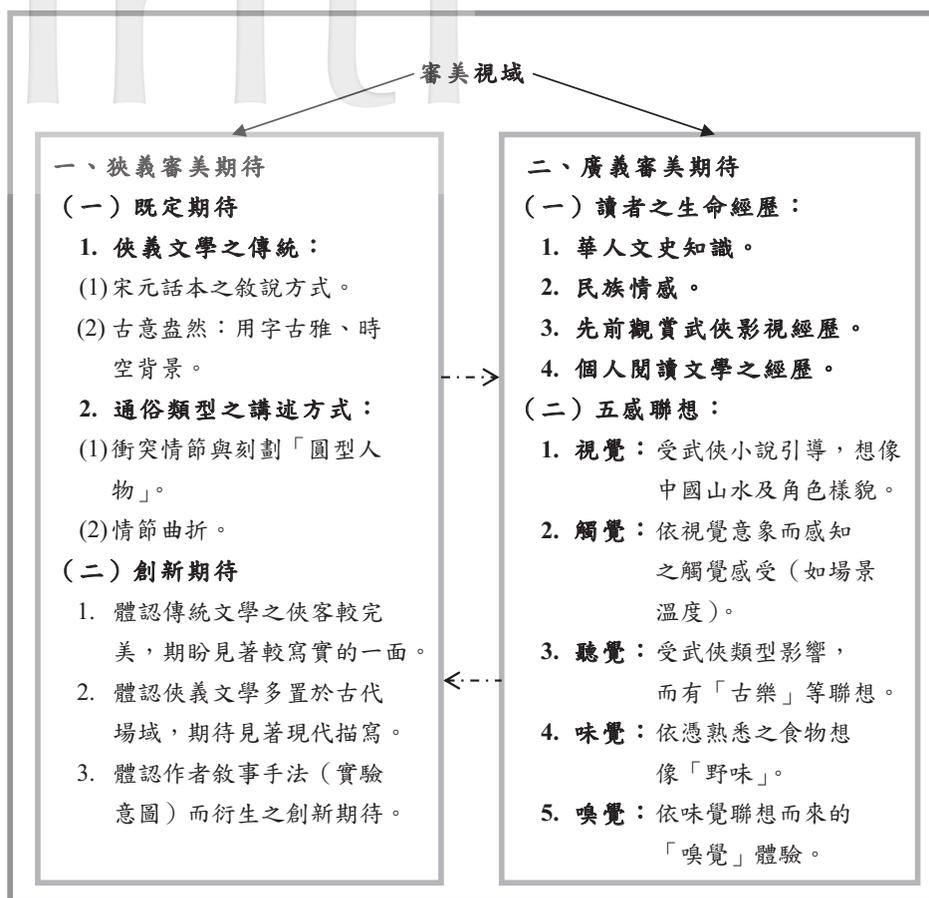


圖 1：讀者賞析小說之「審美視域」略圖

來源：本研究整理。

事物時，更覺「失去的那剎那」感動格外深刻。他以《射鵰三部曲》等作品中人物之悲傷情愫為例，像郭襄與楊過分別時充滿不捨之情，結尾帶到「秋風清，秋月明……相見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頗能展現惆悵之美。

此種惆悵之美、悲劇帶予人心之悸動（並非全然為淨化等道德層次），亦為讀者賞析武俠小說時之特殊美感體驗，過往接收美學典範較少觸及。

## （二）反思與對歷史人物之新認識

美感反應涉及揚棄成見並以全新角度觀察事物，此種暫離先前視域、接納新事物之反思歷程或與「否定式鑑賞方式」相關 (Jauss, 1982b)。

如個案 13 在反思歷程中，感到被「光照」而「亮了起來」，故予人思想刺激時「會有被炸彈炸到的感覺」並湧現許多省思而覺好作品「後勁很強」。是而讀者可用「否定式鑑賞方式」與文本、人生歷程互動，帶入新視野詮釋史事（翻轉先前對某位歷史人物的看法），均為閱讀武俠小說之美感體驗來源。

### （三）同理與交心感動

Jauss (1982a) 承襲「視域融合」觀念而肯定讀者與作者「相互理解」或有交心感動，視野更新之餘易生愉悅感。如個案 3 賞析《神鵬俠侶》援用蘇東坡憶亡妻之詞「十年生死兩茫茫」時，直說她有掉淚的衝動。特別在拜讀古人詩詞時，似能克服時空距離而多了交情匪淺的「無形友」：

你在剎時之間真的非常感動，我真的感動、落下淚的時候，就覺得跨越時空的壕溝。我覺得我比他同年代的人，更瞭解他。……那我們不就做了一場無形友？中間（現實生活）沒有感情的聯繫，但是事實上聯繫的很深（個案 3）。

亦有讀者指出，金庸小說人物遭遇坎坷之處甚多，若要「全然同理」或追求視域融合或得見多識廣，有更多人生歷練方易領會箇中旨趣（個案 2 與 13）。而華人讀者與武俠小說之交心體驗展現於：掌握古典詩詞之意境、領會作者寫作心境，此皆可見在地文史脈絡之於詮釋歷程的影響。

### （四）道德教化（淨化）與肯認人性美質

美感具有社會整合作用，讀者或可修改品格而止於至善，亦收心靈自由之效 (Jauss, 1982b)。武俠小說多少體現了善惡對立的觀念，讀者亦有類似「審美期待」，如體會「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均屬武俠小說之道德教化之效（個案 2）。

讀者眼見善有善報則樂意閱讀，或直呼大快人心。個案 3 提及此感覺可用「痛快」名之，「就是要惡有惡報，善有善報」；個案 13 亦表示，希望見著「俠義、正義感的部分」。易言之，在華人既定審美體系中「（善）報文化」乃是重要觀念（陳平原，1995），亦是構成審美愉悅之重要因素。

個案 16 亦表示，若從在地文化角度來看，如果讀者有了儒家等先備知識，也更容易瞭解作品、較易融入故事情節中。對個案 16 來說，「美」可展現在角

色美質、人性之美，如武俠小說承載華人特有之文化意涵（忠孝節義）。假如同屬華人文化社群，其實比較容易解讀金庸的武俠世界，瞭解其創作意圖。

### （五）享受他物並獲得自我愉悅

讀者若認同某角色，則亦可從「無功利的快感」釋放心靈繼而獲取成就感。

如個案 2 提及，「一圓心願」乃武俠小說等通俗文學吸引人之處，人們可從「角色裡面看到一個遠景」，並對「人生會更有所寄託」，特別「在一般現實生活裡頭，對人生沒有著落的時候」更易寄情於文學。讀者亦提及，人生不免面臨傷心事，故需見著皆大歡喜與大團圓結局以獲心靈安慰。個案 7 認為，虛構故事及奇幻情節當可滿足追求夢想之需求：

就是因為它是虛假的，我們總是需要一點夢想，總是需要一點虛幻的東西來滿足你。就是因為大家都過的很不快樂，所以會需要一點快樂的東西，來慰藉你自己的心靈（個案 7）。

易言之，武俠小說等通俗文學可描繪美好願景，滿足讀者想望以慰藉苦悶心靈，亦為審美愉悅之泉源。

### （六）沐浴神恩未必構成武俠小說審美質素

美感反應亦指人們接近上蒼之感動，被「上帝聖恩」所光照並感到與神同在 (Jauss, 1982b)。如接收美學典範研究者所云，「沐浴神恩」感動與聯想歷程相關，門徒可從宗教劇場景聯想神蹟與彼時背景，因而產生沐浴神恩之感。

對照武俠小說脈絡，關於宗教意涵之描寫可能出現於寺廟場所，但讀者未必感知沐浴神恩。個案 10 表示，拜讀寺廟描寫未必會領受神恩的感受，反而較像是某種門派之聯想。個案 14 亦表示，「寺廟會是遠離塵世的東西，但小說裡會把塵世的事帶進寺廟，在那裡討論塵世的事情，反而沒有寺廟的味道」。

讀者領會禪意（佛理）之境多半植基於對意境之體認，如個案 11 引述小龍女談禪的片段，「明年還是有雪花，可是不是一樣的雪花」，雖事物曾具體存在但「它有個空，不被真的掌控過」。

再如個案 15 也引述曹雪芹《紅樓夢》結尾「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以說明武俠小說的震撼，指出「乾乾淨淨，像曹雪芹講的那種，大地一片白，……這

種轉寰在我心目中，會有種震撼」，並從「歸於原點」描繪憶及洪七公與歐陽鋒相爭一生最後互擁大笑而死之情節，認為安排很巧妙、「境界很高」。故讀者對禪意體悟未必得由宗教場景著手，而可基於佛理或古典文學而來，此似為接收美學典範較少著墨之處。

此外，由於禪宗強調「直觀妙悟」或「不立文字」（個案 11），實與接收美學典範主張從宗教場景聯想而有沐浴神恩之感，有所悖離。禪宗等佛學強調直觀式的瞭悟，亦為接收美學未著力處。

## 伍、結語

接收美學主張，讀者與文本之互動歷程並非任意或武斷地，其視域得隨情節發展而不停調整、持續與作品交流，方能達到意會創作旨趣而有「視域融合」之美感體驗。

Jauss 等人之看法提供學理上之架構，但未實地接觸讀者瞭解確切之美感傳播歷程為何；另則 Jauss、Iser 及 Gadamer 多以西方「基督教文明」為思考起點，然此套觀察可否適用於其他文化，似可進一步探求。故如何面對非西方文化之限制，並從在地視野以詮釋讀者之想法，成為此學派必須面對之課題。

考量 Gadamer、Jauss 及 Iser 均對「華人語用社群」均具濃厚興趣，故本文以俠文化下「審美視域」為軸，進一步闡釋「非西方」文化下之「審美理解」活動樣貌。考量「武俠小說類型」流傳了二千多年並在文學史扮演要角；本文選擇金庸作品《神鵰俠侶》為研究讀本，以瞭解華人讀者「審美理解」歷程及傳承背景。

### 一、讀者之審美視域

本研究承襲接收美學之精神，試釐清審美期待意涵並從「真正的讀者」口中獲知經驗資料。

研究發現，「狹義審美期待」涉及用字、場景、角色、情節等之既定期待，也包括對類型之「創新期待」。接觸類型知識之讀者可將近代武俠小說置於《史記》及宋元話本等文學史系譜（即「歷時系統」）賞析，體會俠士「節義」、「不愛其軀」與「捨身相報」特質；若讀者曾接觸「武俠小說」類型知識，明白其公式、各家風格與表現手法，則此種期待會更加明顯。上述讀者之創新期待則為「既定審美期待」一體兩面，若讀者體認武俠場景多設於古代則希望融入現代元素；若感知英雄人物過於完美，則具「缺陷美」角色。

「廣義審美期待」包括生命經歷及五感聯想，讀者可藉此回應文本之召喚以融入武俠世界。在個人生命歷程部分，讀者之先備知識及使用媒體經歷均與審美期待相關。另讀者也可從日常生活體驗出發，聯想小說場景應具備之特質：如聽覺意象可為「武鬥音效」及「國樂」，視覺意象為角色樣貌與武打招式，觸覺聯想可涵蓋角色氣質及場景溫度，而味覺與嗅覺意象多與「美食」連結。

本研究亦發現，廣義與狹義審美期待兩者互有關聯，並非全然獨立之體系。創新期待乃出自讀者對既定期待之反思，而此創新需求亦與個人近用媒體經歷相繫。

總之，接收美學研究者多將「狹義審美期待」與「廣義審美期待」視為各自獨立運作系統，看似毫無互動之可能。然而本研究發現，讀者之五感聯想與文本構塑之境相相關，亦與既定期待相繫。

## 二、審美視域與美感反應

以華人讀者之審美理解言之，美感可能源自視覺聯想、典故意境相似之聯想或受角色美質所動。實際就教讀者賞析《神鵬俠侶》歷程後，研究發現賞析者之美感體驗未必僅「視域融合」等項，讀者仍需妥適地調整、校正審美理解方能體悟「美」曾存在。

以「視域融合」言之，讀者可瞭解作者人生觀及寫作動機，成為同理作者心境及人生觀之來源。而華人讀者與武俠小說之交心體驗展現於：掌握古典詩詞之意境、領會作者寫作心境、想像小說角色之行事成因。

以「反思」言之，讀者可帶入新視點以解讀史事而感受真理光照，此亦為閱讀武俠小說之美感反應來源。

以「無奈感與惆悵美」言之，接收美學強調之「審美愉悅」涉及較多社會整合討論，而少觸抒情需求。研究發現，讀者亦因備感惆悵而感知「美」之無法捉摸。此種對「美」之認識較偏向情感抒發（而少觸及道德教化），或可擴充接收美學主張之美感反應意涵。

以「道德教化（淨化）與肯認人性美質」言之，讀者立基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之「報」文化，或從宋元話本以降之「懲惡揚善」為出發點，主張小說應具「道德教化」功效。若結局合乎「報」文化及狹義之審美期待，則讀者可感大快人心而收審美愉悅。

以「享受他物並獲得自我愉悅」言之，武俠小說可描繪美好遠景以慰藉讀者心靈或滿足想望，亦與無功利之「審美愉悅」相繫。讀者可將其願望投射至某角言行中，而有「一圓心願」之感並更加認同角色作風。

另外，「沐浴神恩」未必構成武俠小說審美質素。接收美學典範研究者從《懺悔錄》或宗教戲劇出發，說明「聯想歷程」與「沐浴神恩」等美感體驗之關聯性。若對照武俠小說讀者之審美歷程，或因類型相異故賞析時難有「沐浴神恩」之感動。武俠小說雖提及道觀、古墓或寺廟，但主因交待武學背景，故讀者較少體悟神恩。華人讀者之所以感受禪意或有更深層的頓悟，多基於佛理等思想之作品而來，此說明在地文化、既有文學傳統與美感體驗之關聯。

總之，華人讀者賞析武俠小說時較不在意「社會整合」而強調個人綺想及避世等需求。武俠小說在強調集體力量之社群中，宛若扮演渲洩窗口，讓個人得以暫時跳開集群約束而伸展自我。另華人讀者也較強調「禪意」等人生境界，強調「不能完全被掌握」及無常帶來之美感體驗，此皆異於接收美學觀察，與西方著墨救贖（沐浴神恩）之美感假設似有不同。

由於本文欲釐清 Jauss 之「審美視域」（含「狹義審美視域」）意涵，故從理論訴求出發，找尋若干受過類型知識訓練之讀者，盼能回應接收美學之初衷。本文雖盼能貼合該學派之訴求，但訪談資料亦未能涵蓋金庸武俠小說讀者之全貌。建議未來研究，或許可從金庸武俠小說迷著手（未必得接受類型訓練），瞭解其涉入、著迷程度及美感反應，為接收美學開啟不同的研究風貌。

### 三、研究限制

#### （一）未對照不同文化社群讀者之賞析方式

異文化情境可影響讀者的理解活動，如情節邏輯安排與因果關係（動機、心理因素、具體行動、可能伴隨的行為等）、對時空背景之假想或價值判斷 (Casson, 1983)，由此觀之均可見文化情境在傳播過程中扮演要角。如研究者即曾提及，若傳播者與閱聽人所處文化脈絡不同，即可能引發相異詮釋，故理解活動得考量「文化」因素 (Rice, 1980)。

讀者詮釋作品時多參原初生長之文化背景，繼而刪除、選擇性解釋故事情節；如美國讀者詮釋故事時多將「美式故事基模」置入，雖然未必刪去故事內容，但仍常依其社會價值來組織若干題材，出現較不合宜的解釋 (Rice, 1980)。

如就華人社群而言，香港、新加坡與美國華僑之表現或有不同。以金庸寫書年代言之，通俗小說強調「市場」或「主流」趨勢明顯，或許非其他地域能及（陳國球，2007）。故華人未必皆長於中國傳統文史背景，亦會隨不同地域而具異質性，此為後續研究可再著墨處。

故不同文化社群之讀者教化過程、審美期待及理解武俠小說之方式均值得後進關注。未來研究實可比較相異文化讀者之詮釋策略，以彰顯在地情境下「效果歷史」對「審美期待」之影響。

## （二）未能深入剖析讀者之生命史與閱讀史交流歷程

本研究較少論及「審美視域」各元素間之細緻互動歷程，然而讀者之生命厚度（對人情世故之體認與透達）、寬度（對相異事物之接納度）及廣度（如接觸事物之幅員），亦能引導其「洞見」以往未能發現之情節與妙處（吳靖國，2006）。

以「廣義審美期待」為例，似可討論：閱聽人之「生命階段」與「閱讀經歷」等兩者是否有相輔相成之影響？當閱聽人飽經人世歷練看盡人世百態後，對《三國志》之智謀描寫是否更有感觸？拜讀陶淵明之〈桃花源記〉時，是否更易有「繁華落盡見真淳」之感？以老年讀者為例，其可整合人生歷練及拜讀書籍心得以融會貫通成自身「閱歷」，在「六經皆我註腳」情況下詮釋文本（吳靖國，2006）。若老齡讀者之人生態度較正向且樂觀，實較年輕讀者具更多「生命韌度」、寬度及廣度（同上引），亦具更多解讀作品之「資產」與靈敏度。故其如何統合各階段經歷與閱讀心得，而有「自成一家」之詮釋體系，亦為後續美感反應可關切之議題。

因此往後研究亦可詳細剖析閱讀史（如接觸哪類書籍或擁有何種文學批評知識）及生命經歷間如何唱和，而此番互動結果又帶給讀者哪類觸發，並進而開展原先視域。

## 參考書目

- 王秋桂編（1999）。《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遠流。
- 朱立元（1989）。《接受美學》。上海：上海人民。
- 朱立元、張德興（1999）。《西方美學通史（第七卷）：二十世紀美學（下）》。上海：上海文藝。

- 吳明麟(2002)。《「天龍八部」美學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思敬(2005)。《詩歌鑑賞心理》。臺北：揚智文化。
- 吳家齊(2007)。《金庸「射鵰三部曲」新舊版本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 吳靖國(2006)。《生命教育：視域交融的自覺與實踐》。臺北：五南。
- 李醒塵(1996)。《西方美學史教程》。臺北：淑馨。
- 林文月譯(2000)。《源氏物語(三)》。臺北：洪範。(原書：紫式部[1987]《源氏物語》。東京：平凡社。)
- 林保淳(2000)。《解構金庸》。臺北：遠流。
- 金庸(2005)。《天龍八部》。臺北：遠流。
- 洪漢鼎(2008)。《當代哲學詮釋學導論》。臺北：五南。
- 洪漢鼎譯(2005)。《真理與方法》。上海：譯文。(原書：Gadamer, H. [1986].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Continuum.)
- 胡幼慧、姚美華(1996)。〈一些質性方法上的思考：信度與效度？如何抽樣？如何收集資料、登錄與分析〉，胡幼慧(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與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141-158。臺北：巨流。
- 倪匡、陳沛然(1997)。《五看金庸小說》。臺北：遠流。
- 孫宜學(2004)。《金庸傳：千古文壇俠聖夢》。臺北：風雲時代。
- 送銘池(2004)。《金庸小說「天龍八部」事物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事物分析》。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
- 許彙敏(1996)。《金庸武俠小說敘事模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郭良文、林素甘(2001)。〈質化與量化研究方法之比較分析〉，《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7(4)：1-13。
- 陳平原(1995)。《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臺北：麥田。
- 陳沛然(1997)。《情之探索與神鵰俠侶》。臺北：遠流。
- 陳國球(2007)。《情迷家國》。上海：上海書店。
- 陳韻琦(2005)。《金庸武俠小說「神鵰俠侶」研究——遠流版舊版與新修版的解析》。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陸志平、吳功正(1993)。《小說美學》。臺北：五南。
- 楊恩寰(1993)。《審美心理學》。臺北：五南。

- 楊瑩薇（2004）。《金庸「天龍八部」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葉洪生、林保淳（2005）。《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臺北：遠流。
- 葉燕容（2006）。《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碩士論文。
- 齊力（2005）。〈質性研究方法概論〉，齊力、林本炫（編），《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頁 1-20。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 劉玉華（2007）。《金庸「倚天屠龍記」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 劉駿州（1994）。〈實證、批判、詮釋——三大方法典範之初探〉，《新聞學研究》，48：153-167。
- （1993）。《傳播研究量表應用問題初探——一個方法論觀點之分析》。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博士論文。
- （1992）。〈辨而不辯——質量方法的初探〉，《新聞學研究》，46：95-109。
- 蔡宛珊（2005）。《成人讀者對圖畫書的解讀——以幾米作品為例》。國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黎玲、張小元、張晶燕、李紅梅（2002）。《藝術心理學》。臺北：新文京開發。
- 賴玉珊（2008）。《影響新手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關鍵事件之分析研究》。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羅賢淑（2003）。《劍光俠影論金庸》。臺北：萬卷樓。
- （1999）。《金庸武俠小說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蘇惠美（2003）。《金庸小說《神鵰俠侶》研究》。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顧建光、顧靜宇、張樂天譯（2006）。《審美經驗與文學解釋學》。上海：譯文出版。（原書 Jauss, H. R. [1982].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hermeneutic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龔鵬程（2007）。《大俠：俠的精神文化史論》。臺北：風雲時代。
- Blaikie, N. (1993). *Approaches to social enquir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Carroll, N. (2001). *Beyond aesthetics: Philosophical essay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sson, R. W. (1983). Schemata in cognitive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2, 429-462.
- Fink, E. J., & Gantz, W. (1996).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ree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aditions: Social science, interpretive studies, and critical analysi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3, 114-134.
- Holub, R. C. (1984). *Reception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Methuen.
- Ingarden, R. (1973a).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borderlines of ontology, logic,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With an appendix o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in the theater*.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73b). *The cognition of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Iser, W. (1996). The emergence of a cross-cultural discourse: Thomas Carlyle's sartor resartus. In B. Sanford & W. Iser (Eds.), *The translatability of culture: Figurations of the space between* (pp. 245-26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8).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Jauss, H. R. (1982a).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82b).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hermeneutic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Levinson, J. (1996). *The pleasures of aesthetics: Philosophical essay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 Munz, V. A. (2007). What is beauty? On the dichotomy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around 1900. In L. Dorfman, C. Martindale, & V. Petrov (Eds.), *Aesthetics and innovation* (pp. 33-46). Newcastle, UK: Cambridge Scholars.
- Nekrylova, N. V. (2007).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components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L. Dorfman, C. Martindale, & V. Petrov (Eds.), *Aesthetics and innovation* (pp. 21-32). Newcastle, UK: Cambridge Scholars.
- Nodelman, P., & Reimer, M. (2003). *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Rice, G. E. (1980). On cultural schemata. *American Ethnologist*, 7, 152-171.
- Saito, Y. (2007). *Everyday aesthetic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附錄：訪談大綱

### 一、「狹義審美期待」層次

本研究參照前述 Jauss (1982a) 對文本結構之分析，從「作者敘述視角」、「呈現方式」及「傳達理念」三者著手，提問如下：

#### (一) 讀者對武俠小說之預期

1. 在您心目中，好的武俠小說特質為何？
2. 用字需要古雅嗎？
3. 作者需用第三人稱寫作嗎？
4. 發生的時空背景是什麼樣子？
5. 它的劇情鋪陳又該如何呢？有沒有讓您印象深刻的讀本？
6. 在上述內容部分，您覺得它反映哪些理念（像保家衛國）？這部分是華人文化的特有因素嗎？

#### (二) 閱讀武俠小說之經歷

1. 您是否拜讀過哪些金庸著作？當初為何想接觸它？
2. 您還接觸過哪些武俠小說家的作品？
3. 在拜讀金庸小說時，劇情、人物刻劃是否符合你的期待？是否有「出乎預期」的時候？跟金庸鋪陳情節的方式有關嗎？

### 二、「廣義審美期待」層次

此層次涉及了讀者生命史（人生閱歷）、拜讀其他種類型之小說經歷、過往所學，以及情節引發之五感聯想等。題目設計如下：

#### (一) 個人生命經歷及所學

1. 想請問您，過去曾經修習哪些與「文學史」、「類型」的課程呢？它對您閱讀武俠小說有影響嗎？
2. 拜讀《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與《笑傲江湖》時，您會融入自己的人生閱歷嗎？如感情、求學、工作或人情世故的觀察？

## (二) 五感體驗

1. 可否請您依某段小說為例，分享它給您的「視覺」觸動？腦海圖像為何？
2. 可否請您依某段小說為例，分享它給您的「聽覺」觸動？音質、旋律和音量大約是如何？可用您知悉的音樂類別來比擬嗎？

## 三、讀者與文本互動之方式

讀者與作品之互動方式包括「創造式」、「渲洩式」（聯想、同理、認同、淨化及反諷）與「否定式」3種。問項如下：

### (一) 創造式的互動方式

1. 在拜讀金庸作品時如遇到有爭議情節時（如楊過是否喜愛郭襄），您會如何處理呢？會採取哪些方式來解釋？
2. 您會試著分析故事結構以瞭解作者鋪陳劇情的用意嗎？

### (二) 渲洩式的互動方式

1. 聯想型的互動方式：拜讀武俠小說之古意情境會使您想起中國的大山大水嗎？
2. 認同型的互動方式：您最欣賞的角色是？他／她讓您回想起某位英雄或楷模嗎？而這層認同與您的人生閱歷有關聯嗎？
3. 淨化的互動方式：您最同情的是誰？為什麼會覺得份外惋惜？可否舉一個您印象深刻的人物與事蹟分享。
4. 同理型的互動方式：武俠小說除了英雄、悲劇人物外，也有市井小民的角色。在平凡小人物中，您最欣賞誰？您會覺得自己較像某個角色嗎？跟您過去的人生經歷有關嗎？

### (三) 否定型的鑑賞方式

在您閱讀武俠小說經歷中，有沒有對某類人事物印象「翻盤」的例子？這與金庸鋪陳情節的作法有關係嗎？

## 四、賞析後的美感體驗

閱聽人與文本互動後之結果則涉及了「美感體驗」（視域融合、道德淨化、沐浴神恩、體認自我等層次）。提問如下：

### （一）讀者如何界定美感體驗

1. 在您心目中，美好的事物、人生應有哪些風貌？
2. 對您而言，「美」是什麼樣的感覺？

### （二）閱讀時的美感體驗

1. 閱讀《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與《笑傲江湖》時，曾「拍案叫絕」或「被感動」嗎？覺得「寫的真好」？你覺得最美的一段是？觸動您的原因何在？
2. 關於視域融合：在閱讀金庸武俠小說時，您曾有過與作者交心的體驗嗎？例如：能同理他為何這麼寫、安排原因？或以改編版來說，您能同意新版本嗎？
3. 關於道德教化：看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時的感覺為何？
4. 關於淨化心靈：《神鵰俠侶》有著悲劇的成份。當您眼見楊過與小龍女分離之苦時，可否約略描述您的感覺？會讓您想到先前人生際遇嗎？
5. 關於「透過他人境遇，經歷自身」：您閱讀武俠小說時，是否能藉角色經歷來幫您圓夢呢？體驗先前未曾經歷之事物？
6. 關於「沐浴神恩」：在拜讀《倚天屠龍記》武當、峨眉與少林等描寫時會有「禪意」的感受嗎？寺廟道觀的安排給您哪些想像？

# The Aesthetic Horizon and Aesthetic Response of Novel Reading Appreciation: Using the Reading Process of *Divine Eagle, Gallant Knight* as an Example

Lai, Yu-Cha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Abstract

This study begins with a consideration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explaining how an audience interacts with “Divine Eagle, Gallant Knight” via the aesthetic horizon, and describing the type of aesthetic response elicited. The aesthetic horizon may be defined both narrowly and broadly. The narrow definition of aesthetic horizon refers to the genre knowledge grasped and understood by the audience, whereas the broadly-defined aesthetic horizon involves sensory association and life trajectory; both are keys to summoning the reader to involve in the world of the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oadly-defined aesthetic horizon,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interpretative activity of the reader traverses multiple media. Therefo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ture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ccurs via visual and audio media as a reference to artistic perception can serve as an example of broadly-defined aesthetic expectation. In addition to local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at form the deep basis of the interpretative process of the audience, one’s personal reading history, life experiences, and media contact are factors in constructing the aesthetic horizon.

**Keywords:** aesthetic response, reception aesthetics, aesthetic expectation, aesthetic horizon

---

\* Email: raven.claw@msa.hinet.net

Received: 2010.12.01

Accepted: 2011.12.06

## The Oldness of New Media

Peters, John Durham\*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Iowa, Iowa, U.S.A.

My central question here is what if anything is revolutionary in “new media” -- a vague term encompassing digital or computer-based media from handhelds to cell phones, from Facebook to Google. Over the past decades, we all have been hearing promises about the revolutionary powers of new technologies. A skeptical reaction that 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is well deserved. If it’s all so revolutionary, why are the basic problems still the same -- bills, backaches, nasty political campaigns, poverty, and cruelty? Life and death in our era seem to chug blithely along despite all the Jetsonian promises. And though digital media have made communication much easier and faster, there’s little evidence that they have made it any better. The right software can give us unprecedented means of literary and musical composition, but who can match what Shakespeare or Beethoven did with ink and paper? Gothic cathedrals were built with simple tools. Smaller means often yield greater art.

Even so, it is hard to shake the sense that something has changed -- even though it is hard to figure out the contours of a change we are in the midst of. We can begin by rejecting any simple idea of replacement. New media do not replace old media; they rearrange older functions and sometimes provide them with even more powerful platforms. Despite prophecies of decline, the most fundamental media are still with us. The medium of language, which is unquestionably the greatest step forward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definitive of human nature over the millennia of use. It is natural for humans to learn to manipulate symbols; such capacity seems hard-wired in. Everything uniquely human turns on language -- the ability to say “if” or “not,” the act of symbolization that enables the growth of mind and its sharing,

---

\* Email: [john-peters@uiowa.edu](mailto:john-peters@uiowa.edu)

and all the consequenc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cooperation that follow from our shared tongues.

Writing, which is unquestionably the most momentous of all technical innovations in human history, is not going away any time soon either<sup>1</sup>. In contrast to language, writing is not natural. A toddler with something to say will not ask for pen and paper but will use gesture, facial expression, and the interactive array of oral language. Writing is a difficult, unnatural, and even painful medium to practice, and anyone who teaches university students knows that fifteen or sixteen years of intense training in the art is often not enough to master it. Language is a more or less natural endowment of all humans; writing is a technical accomplishment that requires a long apprenticeship and constant practice.

Let us consider writing at greater length -- the mother of all media. A riddle: what is shared in common by a birth certificate, a wedding license, a coroner's report, a diploma, and a birthday card, a declaration of war, a house sale, a legislative bill, and a death sentence? A signature, of course. This cultural form -- somewhere between a word, image, act, and gesture -- still rules over life and death in our world. A signature transforms a piece of paper into a legal act (Fraenkel, 1992).

Nothing binding can be done without it. The signature is a symbol of the enormous power of writing. The introduction of writing had enormous cultural consequences. Whatever culture or society has possessed it has invariably prevailed over others who do not. Writing is a key part of civilization and goes together with such lasting facts as the division of labor, the domination of men over women, and bureaucracy. We all understand Woody Guthrie's point that some people will rob you with a six-gun, and some with a fountain pen.

Another way to get at the import of writing is to consider the dolphins, which regularly show up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path not taken<sup>2</sup>. There is no good reason to doubt that they, with their large brains and obviously gregarious habits, do not have rich practices of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The key contrast between us

---

1. I borrow the term "momentous" from Ong (1982: 85).

2. My own installments in the genre of dolphin communication theory may be found in *Speaking into the air* (Peters, 1999: 260-261) and "Communication as dissemination," in *Communication As ... Stances on Theory* (Peters, 2005).

and dolphins is their lack of hands and their immersion in a medium which permits no permanence of record (Eiseley, 1979). Lasting monuments of any sort are impossible in a marine habitat. There is no way to have a dolphin “world” in Hannah Arendt’s sense of that term, a fixed repertoire of durable things, a built environment imbued with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at outlasts any individual’s life (Arendt, 1958). For dolphins there could be none of what the philosopher Paul Ricoeur (1981) called “the fixation of meaning,” no guaranteed permanence in culture<sup>3</sup>. Theirs would be a very different culture than ours: dolphins could have memory but no history; poetry but no literature; religion but no scripture; education but no textbooks; law but no constitution; mathematics but no equations; music but no scores. Writing does not make us human, but it does help make civilization as we know it, for better or worse. Without writing, dolphins could have culture, but they could not have civilization.

Writing, the graphic storage of signs, is enormously diverse in its history and expression. It is not a single practice. It is clearly more than “the painting of the voice” as Voltaire, in his alphabetocentric way, defined it. There are plenty of writing systems that provide no instructions on how to give voice to the marks on the visual surface. Consider the string of marks: “ $2 \times 2 = 4$ .” The meaning of this set of signs will be instantly understood across the world, but the vocal sounds that correspond to it will vary enormously. “Two times two is four” or “zwei mal zwei gleich vier” or “dos por dos son cuatro.” Written visual signs do not always have an unequivocal acoustic counterpart. The Figure 1 is widely understood by the eye, hugely divergent as spoken to the ear: no smoking, *interdit de fumer*, *ikke røyke*, *μη καπνίζετε*, etc (Powell, 2002).



Figure1

---

3. Thanks to Leonard Hawes, my splendid Utah advisor, for teaching me Ricoeur’s work.

Chinese, though not perfectly ideographic like arithmetic, shares the condition of being widely understood as written, but with huge differences in how it is sounded in various dialects. Even in English, it is quite inadequate to think of writing as a system for freezing speech, since written words can be spoken with an infinite range of pitch, pronunciation, volume, speed, and accent.

The remarkable thing about alphabetic writing was its training of the eye to act like an ear. As Goody & Watt (1963) put it, “The notion of representing a sound by a graphic symbol is itself so stupefying a leap of the imagination that what is remarkable is not so much that it happened relatively late in human history, but rather that it ever happened at all.” As far as we can tell, humans were graphic artists from an early point. They drew and painted to represent events and things and for the sheer exuberant joy of it. But language is not things and events but rather sounds, grammars and systems of meaning. Prior to writing, language existed only as a creature of sound, voice, and ears: it was heard and spoken, not seen. The eye was certainly a very important conduit for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 gesture, posture, facial expression -- but except for sign language, no visual system except writing has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a language. A picture of a cat on a mat cannot decide among such possible interpretations: “‘The cat sat on the mat,’ ‘The cat will sit on the mat,’ ‘The cat sits rarely on the mat,’ ‘If the cat sits on the mat.....’” Pictures do not have the same precision of statement as language (Gombrich, 1972). Writing systems that represented words visually were the radical break, not drawings that represented things. Getting the eye to perceive a word is the great breakthrough. As the Spanish poet Quevedo wrote about reading, “Escucho con mis ojos a los muertos:” I listen with my eyes to the dead. The poet listens with his eyes, and holds converse with the departed. Here we are at the heart of media studies, with its classic questions of sensory transposition and the bridging of space and time.

Writing put together, in various combinations, word, sound, and image. Building on Jakobson and Peirce, John S. Robertson argues that “visual signs are prototypically atemporal, imitative, and immediate, whereas auditory signs are essentially temporal, imputed, and mediate.” Visual perception tends to be all-at-once and auditory perception tends to be one-thing-after-another. With the eyes, we tend to see things and their images, their resemblances, but with the ears, we hear things whose meaning we have had to learn to associate with their sources. When we hear a sound, we turn

our head to the source and intuitively ask, where did the sound come from? But when we see an object, we don't intuitively ask, what does it sound like?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sound is a more conventionalized process, one of habitual association, and we know from psychoacoustic studies that decontextualized sounds, no matter how familiar they may be in everyday life, are often not recognized without their context or accompanying visual stimulus. Radio and cinema sound effects exploit this fact -- shaken aluminum foil can pass as thunder, wooden blocks on a table can pass as horse hooves, and in the movie *Titanic*, frozen celery stalks provided the sound of Rose's hair freezing. Sound interpretation requires learning in a way that visual perception doesn't. This is not, however, to say that seeing is automatic and fully natural; it is to point to the iconic quality of seeing and the symbolic quality of hearing, to use Peirce's terms. Icons are signs that are connected to their objects by way of similarity or resemblance; symbols are signs that are connected by way of convention, learning, and habit. Humans possess (at least) two highly developed ways of perceiving the world that work in very different ways. The eyes are high bandwidth devices that take in whole fields all at once; the ears are lower bandwidth media that are much more temporally acute than the eyes and more omnidirectional in their surveillance. The eyes catch spatial wholes; the ears catch temporal sequence (Robertson, 2004).

Writing did the incredible feat of marrying the two modes. It made space masquerade as time. Writing united visual, auditory, and linguistic processing. "Writing includes both the ho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visual percep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without contradiction, the sequential character of auditory perception. It is at once atemporal and temporal, iconic and symbolic. In short, the potential for writing is at the nexus linking the visual and the auditory channels of perception." (Robertson, 2004: 19) With writing, the eye is taught to behave like an ear: to move serially, from one thing to another, and to catch not the images of things but rather the shapes (or even sounds) of words. This is the great sensory-cognitive synthesis of human history. Writing builds on the fact that vision's material tends to be lasting, whereas speech's is necessarily transitory. Indeed, if sounds didn't disappear, speech and music would be impossible, as sounds would pile up into a muddy soup of brown noise. With writing proper as opposed to a pictographic system, language in its fullness takes graphic form. This is a hugely dramatic feat in human history.

The power to store and transmit across space and time affects social organization, even among those who are not literate. The invention of various forms of writing did not have a huge and instant impact on ordinary life in the form of mass literacy. Many societies -- such as ancient Sumeria, Egypt, and China -- were “oligoliterate” meaning that writing and reading were the privilege of special castes such as scribes, priests, or lawyers (Goody & Watt, 1963: 313). Writing’s biggest effects were in stratifying society into different classes. Even with the printing press, first appearing in the mid fifteenth century, it was not until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that mass literacy was achieved in North America (among white men and women) and Northern Europe. Invention is not the same as impact.

There is a huge and fascinating literature on the history of writing and reading. As one would expect with everything we humans do, reading practices are enormously various<sup>4</sup>. Today we tend to have a reverent attitude toward the written word in comparison to audiovisual media. Good book, bad television. But our high estimate of the cultural worth of reading and writing is not universal in history. New media are criticized and old media are cherished, says Mitchell Stephens (1998). Writing has long been ferociously criticized for its association with death and fixity or its social isolation and solipsism.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it was not unusual for alarmed critics to complain that writing isolated people into private, even illicit pleasures. Readers got lost in an ungrounded fantasy world out of touch with real human beings and objects (Price, 2007). To read these critics, you could imagine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internet pornography. In a way, perhaps they were. The lovers Mme. de Staël and Benjamin Constant used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have breakfast together, and then retreat into separate rooms to write love-letters to each other. They seemed to think that mediation improved their love.

The critique of writing is indeed ancient. It is a puzzle that among 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moral teachers, some refused to write.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all ethical founders. To Moses is attributed the authorship of the whole Pentateuch, a feat whose miraculousness is only burnished by his recounting his own death in its last chapter, and Mohammad transcribed the entire Qur’an as dictated by the angel Gabriel. But we have no record that Confucius, Socrates, or Jesus wrote anything for posterity.

---

4. A nice recent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s “*Reading: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Price, 2004)

All three share the peculiarity that they left no evidence of their doctrine in their own words. Each had an odd, and oddly powerful, way of communicating with subsequent generations. In each case their teaching was recorded, codified, glamorized, or distorted -- nobody knows the precise relationship -- by their disciples. Socrates we know chiefly through Plato's dialogues, in which he is the hero, though Aristophanes also gives us a comically wacky Socrates and Xenophon a more genteel version. Jesus' words are recorded canonically in the four Gospels of Matthew, Mark, Luke, and John, though apocryphal gospels and other traces of his sayings survive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anon of Christian scripture. In his lifetime Confucius had, legend has it, various numbers of disciples (72, 3,000, etc.), and what we possess of his teaching, *The Analects*, is clearly a posthumous redaction of controversial fidelity.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ttitude apparently possessed in common by the historical Socrates, Jesus, and Confucius: the refusal to commit their doctrines to writing?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y were all literate. Socrates certainly was on intimate terms with writing and written works, as the *Phaedrus* makes clear, in which Socrates delivers a blistering attack on writing as destroying memory and creating a kind of pseudo-interaction with dead words. As a rabbi, Jesus was versed in the Hebrew scriptures, which he read aloud in the synagogue (Luke 4:16ff), and John 8:8 (a text itself that many biblical scholars regard as a later addition of dubious authenticity) depicts him scribbling on the ground while the accusers of the woman taken in adultery make their case. Confucius spent much of his life's work as an editor of the Chinese Five Classics. "I transmit," he said, "I do not create" (*Analects*, 7:1). Even if "Spring and Autumn" was "authored" by him, it is presented not as a statement of original doctrine but as a historical redaction whose arrangement presents the doctrine indirectly. Though he was an editor, "Confucius say[s]" and not "Confucius writes" is the phrase by which he is always remembered. Socrates, Jesus, and Confucius were fundamentally oral teachers whose immortality rests paradoxically on the medium of writing.

Their collective failure to write was clearly not a question of capacity, but of will. Perhaps they all recognized the hubris or futility of trying to fix the transient or the eternal, to commit the living spirit of thought to ink and paper. Perhaps they rejected the absolute power over life and death possessed by the written decrees of kings and emperors (Steiner, 1994). Perhaps they were too humbled by the pre-existent texts to

add to them--the text of “the laws” for Socrates, the Hebrew scriptures for Jesus, the ancient writings for Confucius. None of these figures had any notion of “authorship” as it emerged in the modern European culture of individual expression and copyright. Indeed, each of their doctrines rejects the idea that an individual can be a source of truth. Whatever their reasons, Socrates, Jesus, and Confucius did not write their thoughts -- and via a sort of textual ventriloquism orchestrated by their disciples they became the moral guides for a great deal of the human family. It must be one of the greatest ironies of history that the medium of writing has delivered us the teachings of people who abandoned their own words to the air or the memory of their disciples. Their sayings, delivered orally in concrete situations of dialogue, were preserved by the phonograph of the written word for abstract situations of dissemination in Plato’s dialogues,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Analects. At the most basic level the textual sources for all three figures are riddled with mystery. No one knows precisely what the most central terms or teachings mean, what is a joke or serious, what is a scribal error, or even who wrote the text and why. It is perhaps this “failure” of communication at the heart of all three traditions that makes their lasting influence and resonance possible.

Writing is indeed one of the great human wonders. For millennia it was the sole option for sending culture across the expanses of time (recording) and space (transmission). What was not written disappeared into the air or took root in the fickle soil of memory. To communicate across space, symbolic cargo had to be carried across space except for small-scale transmission media such as towers, pigeons, and signal fires. Postal and messenger systems kept people in touch at a distance, and writing in all its varieties -- monuments, scrolls, codices, scripture, libraries, and archives -- kept people in touch over the wide prairies of time. Writing had a monopoly on storage. The only way to store music, dance, cuisine, poetry, law, religion, experience, history, genealogy, or property rights was some form of inscription. Incessant scribbling -- inscribing, describing, and prescribing -- was our only bulwark against tim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omething remarkable happened in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a rupture in the media of recording and transmission. Three key forms arise, all of which pay tribute to writing in their names: the telegraph, photograph, and phonograph<sup>5</sup>.

---

5. The following argument follows Kittler (1986/1999). In Greek, “graphē” means “writing.”

### **1. The key fact about the telegraph is that it enabled practically instantaneous contact at a distance**

Telegraph means distance-writing and all writing, in a way, is distance-writing. The novelist Jack London, in a 1,900 essay called “The Shrinkage of the Planet,” sounds as if he has been reading the late communication scholar James Carey: “Up to yesterday communication for any distance beyond the sound of the human voice or the sight of the human eye was bound up with locomotion. A letter presupposed a carrier. The messenger started with the message, and he could not but avail himself of the prevailing modes of travel. If the voyage to Australia required four months, four months were required for communication; by no known means could this time be lessened. Bu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mmunication and locomotion were divorced (London, 1910).” Carey’s argument was similar: the telegraph sundered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he message becomes separated from its material; communication and became ethereal, non-physical (Carey, 1989: 201-230; Peters, 2006: 137-155). Of course we shouldn’t prematurely celebrate the telegraph’s ruptures any sooner than we should celebrate those of the internet. It was expensive to use, as limited in its expression as text messaging, and its networks were laid out according to imperial needs. As a vast network of switches, the national computer network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already a kind of proto-computer. (If we could extend “Moore’s law” -- that computing power doubles every two years -- backwards into history, we might retroactively see the nineteenth-century telegraph grid as a nation-sized chip.) The telegraph enabled new media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wire services, but it was more an elite medium of business than a popular one of entertainment. Its primary purpose was the management of people and property at a distance. It was more a computational bureaucratic medium than one for sensory enhancement.

### **2. Photography, in contrast, was certainly such a medium**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writing had become autonomous from an author’s will. You could aim the camera and it would “write” (or at least filter) whatever light happened to fall upon it. Oliver Wendell Holmes Sr. (1859) called the camera “a mirror with a memory.” Such “light-writing” was metaphysically shocking. The

philosopher and critic Walter Benjamin (1936/1968) said that photography allowed us to see the world with the “dynamite of one tenth of a second.” He was thinking of fast shutter speeds that allowed us to fix what the naked eye could never see and thus push back the frontiers of visibility. This conquest is a central characteristic of our age. Leland Stanford employed the eccentric English photographer Eadward Muybridge to discover whether a horse’s hooves ever leave the ground when it runs. In 1878, the question was settled in the affirmative --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Benjamin was quite conservative in talking about a tenth of a second; by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stroboscopic photography had gotten down to ten thousandths of seconds, and today laser photography can capture processes at femtosecond speed -- one quadrillionth of a second.)

The still camera allowed for stop action, but motion pictures caught action in its serial flow. (Clearly Muybridge’s photographs are proto-cinematic.) The camera was a kind of artificial eye, an enhancement and extender of vision. It enabled a new kind of memory -- now dancing, gymnastic exercises, the flight of birds, explosions, and even the electrocution of an elephant could be stored for future generations in their real-time flow without having to be converted into the less vivid, literally time-less medium of written words. Film helped break writing’s monopoly stranglehold on cultural storage.

### **3. So did the phonograph**

Usually translated as “voice-writer” from the Greek word *phonē* (voice), we might whimsically but aptly translate phonograph as “writing-killer” from the Greek word *phonos* (murder). With the unprecedented ability to record sound, Edison and his contemporaries loosened the written word’s grip on control over language. The phonograph was just as indiscriminating in what it inscribed as the camera. They both could memorialize things like sneezes, grunts, and throat clearings in a way that writing -- in thrall to the demand to encode its material into symbolic sense -- never could. The realm of the writable grew by leaps and bounds thanks to the graphic revolution. Sounds no longer disappeared forever. The voice c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e body and bottled up for use beyond the grave. In a way even more radical than the camera, the phonograph captured time in its continuous flow. Ever since the ancient origins of drawing, visual images have been recordable. An image requires only space, not time. The phonograph was the first time-based medium, and its ability to record

acoustic events in their temporal flow is truly revolutionary. We could now play sound backwards, speed it up to make men sound like chipmunks, or slow it down to make women sound like men. The phonograph was a hearing aid that allowed our ears to overcome time.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time axis of acoustic or optical flows is unknown in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befor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 marks of modernity (Krämer, 2006).

In short, the bridging of space and capturing of time are the two great breakthroughs of the telegraph, photograph, and phonograph. These new media rearranged writing, sight, and sound. The durable word was no longer tied to the paper it was written on; the image was no longer subject to the slow and sloppy physiology of human vision or the skill of the artist's hand; and time itself yielded before sound-recording. Modern media since follow in the threefold zone of word, optical, and acoustic process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aw the unraveling of the weave that writing once achieved. Where the alphabet once united eye, ear, and word, the photograph, phonograph, and telegraph differentiated them.

The twentieth century saw an expansion of these innovations into institutions and systems of delivering drama to a dramatized society, in Raymond Williams's famous phrase, starting in th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of the world (Williams & O'Connor, 1989). With newspapers, national magazines and national cinemas, radio then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a system arose for programming modern life (Scannell, 1996). Broadcasting scheduled us by the hour or half hour (or 60-30 second chunks to advertisers); newspapers scheduled us by the day or half day; magazines scheduled us by the week or month, and cinema scheduled us more or less by the season. The fundamental innovations in recording and transmission happen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twentieth focused on their perfection as arts and as popular systems of delivery and simulation. Genres, narratives, stars, and audiences for diverse media proliferated. In many ways, the dominant form of communication from around the 1920s to the 1980s -- few speaking to many via high technology using an industrial mode of production of stars and genres supported by the market and/or state -- was quite unusual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most of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the dominant form has not been few to all, but some to some, or few to few, one to few, or even one to none (diaries and blogs) (Peters, 2010). Nonetheless, it was in these

anomalous circumstances that scholars first started to study media systematically, and it left a stamp on our theories.

Now that this system has crumbled, and we see “new” digital media scurrying around the previous century’s electronic mass media like small mammals around hulking dinosaurs, we are tempted to be impressed by the newness of new media. The very expression implies a contrast with what are sometimes called “old media.” But we should be clear: what aro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re mass media, not old media. What we call new media are actually much closer to old media as in ancient media. All complex societies have media. Managing time (recording) and space (transmission) are necessarily part of any civilization. But there is another kind of role played by media that we tend to neglect -- logistics -- and this holds the secret for understanding what we call new (or digital) media today.

Logistical or organizational media are so fundamental they are rarely visible. Their job is to organize and orient, to arrange people and property in time and space. They are rarely content-driven, and Marshall McLuhan’s slogan that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seems particularly applicable to them. They are often abstract data-processors. Calendars, clocks, and towers are classic logistical media<sup>6</sup>. So are names, indexes, addresses, maps, tax rolls, logs, accounts, archives, and the census. Money may be the master logistical medium -- a medium, as Karl Marx complained, has no content in itself but has the power to arrange all things around it. Logistical media often arrange things around a zero point: they have the power to set the terms in which everyone operates. Brigham Young’s cane served as a logistical medium when it marked out the center spot, the temple, around which the Salt Lake valley ever after, like it or not, would be gridded. Logistical media pretend to be neutral and abstract, but they are often subtly and deeply partisan in political or religious senses. People still debate whether our era is better described as “A.D.” or “C.E.” and whether the day after Saturday should be called “Sunday” or “first day.”

The new-old media axis turns on logistical media, and writing once again points the way. Writing, the seedbed of all media, has a logistical as well as space-binding

---

6. See my “*Calendar, Clock, Tower*” (Peters, in press). For a full-length treatment of logistical media, see Judd A. Case’s forthcoming dissert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

and time-binding aspect<sup>7</sup>. It is a commonplace in the history of writing that many of the earliest forms of writing were designed for bureaucratic purposes of counting and accounting. Proto-cuneiform scripts in Sumeria, for instance, concerned the apportioning of bread and beer for man-days of labor<sup>8</sup>. Writing has long been a device of administration and computation as well as cultural storage and transmission<sup>9</sup>.

For the two or three decades before and after 1950, there was, as noted, in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England, France, Germany, and Japan the perfection of a system of delivery and content. Starting around 1975 or so, there has been a major crisis in both. In content, the old segregation of channels into expert and laypeople, producers and viewers, has broken down. This is true of much more than media; in knowledge in general, the boundary between official and popular modes has grown more and more frayed<sup>10</sup>. In delivery, there has been a fading of a single schedule for all in favor of à la carte viewing and the decline of general interest media. In journalism, some scholars lament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editor.” (Katz, 1992) In the blogosphere, it often seems that everyone’s a journalist and nobody’s an editor. We are seeing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right to broadcast. We live in the age of “user-generated-content” on YouTube and Wikipedia and blogs -- or “loser-generated content,” as we might call it, given the stereotype of the people who produce it (Petersen, 2008)<sup>11</sup>.

New media fit more in the lineage of the telegraph than the photograph or phonograph. They neither promise nor deliver an improvement in sensory imitation. For much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sound and picture quality on analog media got progressively better: first they were married in sound film and then came stereo and surround-sound, color, cinemascope, and high-definition. The digital platform has decisively reversed the trend toward better production values. To be sure, computers have become much richer in sound and image than in the days of punch cards or

---

7. The interest in media as bureaucratic “paper-machines” or data-processors is characteristic of recent varied media theory by German-language scholars such as Bernhard Dotzler, Bernhard Siegert, Cornelia Vismann, and Hartmut Winkler.

8. For instance, Friberg (1999: 107-137). Thanks to Dan Emery for this essay.

9. This point is made nicely by Wolf Kittler (2007).

10. That our era is marked by “promiscuous knowledge” is the thesis of my late colleague, historian Ken Cmiel.

11. The more pungent sense of “loser,” however, I owe to Ben Peters of Columbia University.

alphanumeric commands but they have not caught up to analog fidelity. Digital media generally sacrifice quality for ease. YouTube marks a degradation of optical and acoustic quality. MP3 files indisputably sound worse than vinyl LPs<sup>12</sup>. Between 2007 and 2008, text messages surpassed phone calls in frequency. Surely these mini-messages, limited to a maximum of 160 characters including spaces, are less articulate than letters and carry less information than telephone calls<sup>13</sup>. In terms of expressiveness, “new media” are surely worse. The project of virtual reality claimed in the 1990s to do for the skin what film and sound recording had done for the ears and eyes: provide sensory extensions in space and time. The promise of perceptual enhancement by new media has all but vanished today.

Today the energy of invention is found not so much in recording or transmitting or building better sensory simulations, but rather in ease, accessibility, and mobility. Our key innovations are logistical. Our key communication projects today require massive indexing and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communicative act today may be “tagging.” Massive searchable archives are being compiled, some of them public and many of them proprietary, with effects that few have considered<sup>14</sup>. No one knows, for instance, how long all this digital documentation will last; paper could turn out to be a more lasting storage medium than digits, and the future historian may find 1908 better documented than 2008. The more ubiquitous something is, the less likely it is to be preserved for posterity. The mass-market potboilers of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often never made it into libraries and political campaign materials, so abundant amid an election cycle, vanish from the archive. At the height of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the existential fear was the loneliness of communication breakdown; now the much more banal equivalent might be the annoyance of getting “poked” on Facebook. Friends I haven’t seen for three decades are now cropping up in cyberspace. Bits of music heard on the air that once would have vanished forever now can be identified with the song-identifying utility on your phone. We face what might be called the disappearance of oblivion. It’s so difficult to lose anything lately (Bossewitch, 2005). No one, amid

---

12. Text messages are limited to 160 characters, including spaces. On poor sound quality, see Sterne (2006: 825-842)

13. Not to say that there are no new aesthetic and creative potentials in texting: see Crystal (2008).

14. My colleague Mark Andrejevic (2007) considers them at length.

this mad rush to index, seems to be worried about its long-term storage. With all this tagging, I sometimes instinctively start to do a Google search when I can't find my keys.

Which we should briefly consider. Google is arguably the most powerful media company in the world. It is at least the most symptomatic of our moment. Google is not Time-Warner or M-G-M; NBC, CBS, or the New York Times; Disney or EMI. It produces no content whatsoever -- at least no unique content. Its ambition is to make available all content, to be a universal library. Google's genius is logistical: it is a massive index to a massive archive, and its products involve classic logistical devices such as maps, desktops, calendars, language translation, not to mention money, which it seems quite happy to make. It has become an almost indispensable gateway for most of us to the world's knowledge. Its trademark is the analysis of massive amounts of data. We should be very nervous when any entity gains a monopoly control over communication<sup>15</sup>. Google's informal slogan is "Don't be evil" and it doesn't take a Freud to observe that the commands we lay upon ourselves are usually a pretty good indication of the things we are tempted by. What if Google went bad? Just what is it going to do with all the amassed data in our gmail accounts, that huge traffic of documents which it is privy to? When I feel like scaring myself with nightmare scenes of what could go really wro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 think of what could happen if the divine mind that Sergey Brin, Google's co-founder, helped dream up -- he once said that a perfect search engine would be like the mind of God -- turned demonic.

It might seem slightly lame to pick on Google, especially when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major institutions around that don't even try not to be evil. (I could name a couple, but I'll leave that to your imagination.) But it seems to me that power today works as much through logistical as through narrative, sensory, or content means. A whole generation is flocking innocently to new media as empowering "social utilities," as the ocean of sociability through which they swim,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consequences. I am not concerned that our networked selves are being exposed to bad sorts of messages necessarily, though they are certainly plenty of those to go around in any medium. The concern is more fundamental: what does it mean to live in a hive of constant connection? As communication scholars, we are too in love with ideology, and

---

15. The classic concern of the great media historian Innis (1951).

not enough with accounting; too interested in content, and not enough in mobilization. In a post-9/11 world, power is exercised as much through organization as propaganda.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it seems to me, converge here. The state constantly stirs us up to diligence and vigilance through what I call “alert culture.” We are supposed to be watching for, well, we’re not exactly sure what. The public address systems in airports tell us that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has set the alert level at “orange” but this is as empty a signifier as a Facebook “poke<sup>16</sup>.” We are to watch out for evil doings and be constantly on tiptoe, but there is no clear ideological content to beware of. Our world is full of alarms and alerts -- about weather, travel, transfats, toys from China, creepy internet predators, and other terrors. The market, for its part, has provided us with abundant tools to keep us linked in. Cell phones, PDAs, e-mail, I-pods, Facebook, MySpace, Blackberries -- these and similar devices and platforms are always there providing something for our thumbs, eyes, ears, and voice to attend to. Our job is to be agitated, updated, connected, waiting for the event to arrive. (What if it arrived offline?)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keep administering the jitters to us in small doses. “Attention!” they cry and we step to. Suddenly the existential solitude that so many twentieth-century authors lamented no longer sounds so bad.

This is a good thing for the institutions and technologies whose interest it is to keep us plugged in to them. When I started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ver 20 years ago, I noticed that anything life-changing would come through my mailbox. Now nothing important comes through there. Everything comes through the computer. We once rushed to answer the phone; now we plug in to the digital IV-drip. The key fact of power today is mobilization (or perhaps immobilization), not indoctrination. One of the benefits of having an uncooperative back is a constant reminder of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computer work -- that reading and typing is a form of labor, time spent that could be spent elsewhere. Power in communication is of course partly the power to tell the story -- as well as the power to determine who gets to tell it, how it’s told, and who gets to listen. But stories are not the only story: the deeper issue is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tellers and listeners and the time spent there, rather than doing something else. New media are like old media in that their central task is the problem

---

16. Orange seems a happy settlement: “red” would be too alarming, and “yellow” would suggest a government that was insufficiently diligent.

of order, the problem of memory, and the problem of scale. The rise of so-called new media returns us to blatantly political and ethical questions. They invite us to freshly face the institutions that determine our names, weights and measures, stamps, money, holidays, seconds and minutes. Power has always involved computation; digital media emerge out of the oldest need in the book (as it were): the need of the temple to record, the market to transmit, and the palace to organize (Couch, 1986). New media bring back the ancient problem of commanding loyalty -- with a vengeance.

Media are not just pipes or channels. They are our condition, our fate, and our challenge. As the word suggests, media are things in the middle, what is common and connecting. Altering our anchorage to the signifier is always momentous (Lacan, 1977). No longer should anyone ever have to spend two weeks retyping a master's thesis again; history has changed in some key way. But gone forever are the days when most of us knew no such thing as the constant grind of e-mail. None of us chose to live much of our lives in front of the screen; but neither are we willing to give it up. Media studies is a fascinating field because it asks us to face the choices we make with limited time, space, and energy. Media show up wherever humans confront the unmanageable mortality of our material existence, the melancholy fact that memory cannot hold up against time, and the inevitable desire to control these basics. Media are more radically part of our condition than we usually allow. They are the ground, not the figure. They are both basic and difficult. Recording, transmission, organization; labor, work, and action; temple, market, and palace -- these basics of our condition always implicate media. The fundamental fact of media studies might be summarized thus: and now abide time, space, and power, these three; but the greatest of these, at least at the moment, is power.

## References

- Andrejevic, M. (2007). *iSpy: Surveillance and power in the interactive era*. Lawrence, KS: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 Arendt, H.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njamin, W. (1968).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H. Zohn, Trans.). W. Benjamin (Ed.), In *Illuminations* (pp. 217-255). New York: Schocke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6)

- Bossewitch J. (2005). Unforgettable in every way: Person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pervasive omniscient surveillance. *Pocket Knowledge*. Retrieved December 30, 2011, from <http://pocketknowledge.tc.columbia.edu/home.php/viewfile/18367>
- Carey, J. W. (1989). Technology and ideology: The case of the telegraph. In J. W. Carey (Ed.),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pp. 201-230). Boston: Unwin Hyman.
- Case, J. A. (2010). *Geometry of Empire: Radar as logistical medium*.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Iowa, Iowa City, IA.
- Couch, C. (1986). Markets, temples, and palaces.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7, 137-159.
- Crystal, D. (2008). *Txtng: The Gr8 Db8*.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iseley, L. (1979). The long loneliness: Man and the porpoise. In H. Donald & D. L. Emblen (Eds.), *A writer's reader* (pp. 140-147). Boston: Little, Brown.
- Fraenkel, B. (1992). *La signature: Genèse d'un signe*. Paris: Gallimard.
- Friberg, J. (1999). Counting and accounting in the proto-literate Middle East: Examples from two new volumes of proto-cuneiform texts.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51, 107-137.
- Gombrich, E. H. (1972). The visual image. *Scientific American*, 227, 82-96.
- Goody, J., & Watt, I. (1963).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 304-345.
- Holmes, O. W. (1859). The stereoscope and the stereograph. *Atlantic*, 3, 738-748.
- Innis, H. A. (1951).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Katz, E. (1992). The end of journalism? Notes on watching the wa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2(3), 5-13.
- Kittler, F. A. (1999).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G. Winthrop-Young & M. Wutz, Tra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6)
- Kittler, W. (2007). Aphrodite gegen Ammon-Ra: Buchstaben im Garten des Adonis, nicht in Derridas Apotheke. In L. Engell, B. Siegert, & J. Vogl (Eds.), *Archiv für Mediengeschichte: Stadt-Land-Fluss* (207ff). Weimar, Germany: Verlag der Bauhaus-Universität.

- Krämer, S. (2006). The cultural techniques of time axis manipulation: On Friedrich Kittler's conception of media.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3(7-8), 93-109.
- Lacan, J. (1977). *Écrits: A selection*. New York: Norton.
- London, J. (1910). The Shrinkage of the planet. In J. London (Ed.), *Revolution and other essays* (pp. 139-157). New York: Macmillan.
- Ong, W.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New York: Methuen.
- Peters, J. D. (in press). Calendar, clock, tower. In J. Stolow (Ed.), *Deus in Machina*.
- (2010). Mass Media. In W. J. T. Mitchell & M. Hansen (Eds.), *The Media studies Reader* (pp. 266-27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6). Technology and ideology: The case of the telegraph revisited. In J. Packer & C. Robertson (Eds.), *Thinking with James Carey: Essays on communications, transportation, history* (pp. 137-155). New York: Peter Lang.
- (2005). Dissemination. In G. J. Shepherd, J. St. John, & T. Striphos (Eds.), *Communication as ..... stances on theory* (pp. 211-222). Thousand Oaks, CA: Sage.
-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etersen, S. M. (2008). Loser generated content: From participation to exploitation. *First Monday*, 13, 3.
- Powell, B. B. (2002). *Writing and the origins of Greek litera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ice, L. (2007). You are what you read.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December 30, 2011,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07/12/23/books/review/Price-t.html?pagewanted=all>
- (2004). Reading: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Book History*, 7, 303-320.
- Ricoeur, P. (1971). The model of the text: Meaningful action considered as a text. *Social Research*, 38, 529-562.
- Robertson, J. S. (2004). The possibility and actuality of writing. In S. D. Houston (Ed.), *The first writing: Sipt invention as history and process* (pp. 16-38).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annell P. (1996). *Radio, television, and modern life*. Oxford, UK: Blackwell.
- Steiner, D. (1994). *The tyrant's wri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ephens, M. (1998). Which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is it, anyway?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5, 9-13.
- Sterne, J. (2006). The mp3 as cultural artifact. *New Media and Society*, 8, 825-842.
- Williams, R., & O'Connor, A. (1989). Drama in a Dramatised Society. In A. O'Connor (Ed.), *Raymond Williams on television: Selected writings* (pp. 3-12). London: Routledge.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言詮與我群：評介《話語的摸索與尋繹：傳播觀念史》

Interpretation and We-Ness: A Critical Review of Speaking into the Air

doi:10.6123/JCRP.2012.011

傳播研究與實踐, 2(1), 2012

作者/Author：夏春祥(Chun-Hsiang Hsia)

頁數/Page：201-22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23/JCRP.2012.01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言詮與我群：  
評介《話語的摸索與尋繹：傳播觀念史》\*  
Interpretation and We-ness: A Critical  
Review of *Speaking into the Air*<sup>1</sup>

夏春祥\*\*

Hsia, Chun-Hsiang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最早接觸本書是在 2002 年，由於新期刊《中華傳播學刊》的創立，個人參加了一群由當時中、壯年學者組成的團隊，撰寫專題文章<sup>2</sup>。過程中接觸到這本書的評介，也翻閱了書中內容，當時大體上覺得豐富、有趣，但也有點匪夷所思、不好掌握；畢竟，關注傳播的理論思考多所談論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實超出過往在行政與批判典範下的閱讀經驗與學術想像。2003 年 9 月開學前一週，臨時接受任教科系指派，開設臺灣相關研究所比較少有的課程「人類傳播思想史」（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Human Communication）<sup>3</sup>以為入門導論；原先想以本書做為教材，但因時間匆促、無法完整理解，改以作者約翰·彼德斯（John Durham Peters, 1958-）早年發表的

\* 本文撰寫過程中，感謝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唐士哲、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楊智明、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沈錦惠，以及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班課程「傳播史與哲學專題研討」2011 年秋的修課同學所給的協助與建議。

\*\* Email: chhsia@cc.shu.edu.tw

- 1 本書名稱直接翻譯自英文原版，未採用大陸學者何道寬（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的簡體字譯本，乃因翻譯作為一種再現，也是一種創作，更是一種辛苦付出，有必要單獨且慎重地看待，故置於後面再行討論。此文評介的對象主要是彼德斯的原著，故根據英文重新翻譯，後面的討論亦同，以直接面對作者，並擔負起評論者應該承受的責任。
- 2 個人完成的文章是〈眾聲喧嘩的迷思——關於傳播研究的筆記〉（2002），寫作團隊則是由當時擔任中華傳播學會理事長的郭良文與學刊主編林靜伶所召集，參與成員有鍾蔚文、方孝謙與黃鈴媚，在召開三次討論會之後，每個人發表一篇專題文章。相關背景資料可參見林靜伶（2002）。
- 3 這一名稱是 2004 年才更動成今日樣貌，原先的課程名稱為「口語傳播研究導論」（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中、英文之間的不一致，乃是檔案資料的真實情形。

文章〈傳播研究中學術貧困的制度性來源〉(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Intellectual Povert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eters, 1986) 一文作為閱讀材料。2005年起，個人開始在碩、博士班的課程<sup>4</sup>中正式用為教科書，並在教學相長中逐步閱讀、漸次熟悉。

現在回頭看整個認識歷程，作者在書中對於傳播的厚實熱情令人印象最為深刻。更重要的是這種以個別體驗為溝通基礎、又以群體歸屬作為傳播核心的感性深度，作者竟然能以開闊的視野、嚴謹的邏輯，以及鋪陳有序的方式架構出來，這種理性能力在傳播領域中相當少見，也是我輩以知識作為志業的研究者與學習者很有價值的參考對象。主標題「言詮與我群」所試圖描繪與回應的，便是作者探討傳播過程中幾個不可忽略的面向：個體與他人互動的終極媒介是語言和相應而來的行動，而體現著這些關係的社群也因而形成；只是隨著社會的變遷，大眾媒介複雜了這樣的關聯，產生了各式各樣的多種情境等待釐清與探究，而傳播的根本作用也隨之在眾口稱是的情況下被混淆與遺忘。在論述中，莫比烏斯帶 (Möbius strip)<sup>5</sup> (Peters, 1999: 113) 這個在自我與他者、個體與社會之間的統一體比喻乃是此書關懷的典型象徵 (請見圖 1)。作者彼德斯是在討論黑格爾 (Georg W. F. Hegel, 1770-1831) 的承認時，為了說明傳播在我 (I) 與我們 (We) 之間的作用而引入討論的。舉例來說，「我」的創意是基於甚麼樣的「我們」環境所刺激、引導，與被認定的，而這種由語言表述所被理解的創新，正體現著一個社群的整體文化，畢竟「我必須依賴他人才能獲得對自我的認識」 (Peters, 1999: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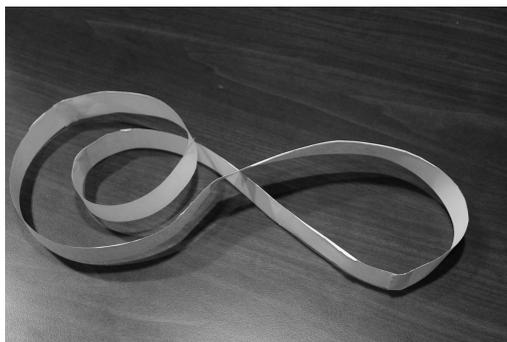
閱讀彼德斯此書，常讓我想到的是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筆下那種漫遊者 (flâneur) 的姿態，那種對主題相當熟悉，卻又能站在一個與眾不同的獨特位置，不斷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繼而從容、細膩地描繪出那壓在眼前極端混亂的詭異傢伙。想必是一種頑固、堅持的內在狀態，才使其書寫成品免於當代那種速度與氛圍的外在挾持。只是，也沒有薩伊德 (Edward Said, 1935-2003) 筆下知識分子那種戰戰兢兢、嚴謹慎重的緊張焦慮，他反倒是以一種輕微戲謔與偶現幽默的方式，完整討論作為一種觀念的傳播歷史。這種處於認真投入

4 個人在博士班任教的課程為「傳播史與哲學專題研討」(Special Topic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碩士班的課程名稱則如同文中所提。

5 本詞彙的翻譯，評介者參考了維基百科提供的資料，與中央研究院化學所學者們的相關討論。莫比烏斯帶是由德國數學家、天文學家莫比烏斯 (August Ferdinand Möbius) 等人在 1858 年揭示的，這個結構可以用一個紙帶旋轉半圈再把兩端沾黏之後製作出來；它最主要的特質是：沒有起點與終點，所有由環上任一點出發，都會回到原點。



(I)



(II)



(III)

圖 1：莫比烏斯帶圖示組

註：I：典型的莫比烏斯帶，左邊為沾黏點。若一邊為我，一邊為我們，將可發現我與我們之間是互為起點與終點的，共享同一個表面與邊界，II：典型的莫比烏斯帶，在由中間對分之後的結果，整個兩面似乎成了完全沒有隔閡的一體成形，關鍵在於左上角那個交錯點在上下擺置時的立體重疊；在這裡，個人與社會關係中的辯證性發展被具體地圖像化出來。III：由其中再對分的結果，形成兩個典型的莫比烏斯帶，一大（左）一小（右），彼此環繞、互相牽制，有共同而類似的經驗，卻又有著完全可以區別的生活世界。

製作、攝影：夏耘莘 圖說：夏春祥

與自在揮灑之間的矛盾令人好奇，等到那天彼德斯來臺講座<sup>6</sup>、在臺北的城市旅遊時才發現，那種 WOW！的高度驚嘆，是如何以一種沉靜方式與他的虔誠信仰與溫和性格融合一起。

也許是因為這樣的作者特質與再現風格，使得這本上個世紀最後一年（1999年）出版的老書，至今仍被廣泛引用與討論。2001年時，加拿大的傳播期刊便曾刊登了一篇由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指導過的學生、後來曾擔任加拿大特倫特大學（Trent University）校長的特沃爾（Donald Theall, 1928-2008）關於本書的書評（Theall, 2001），他指出彼德斯不僅將傳播研究中的冷門範疇進一步延伸，還對不斷發展中的媒介革命做出回應。他在做此書評介時，是將其與《古騰堡星系：活版印刷人的造成》（*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sup>7</sup>等量齊觀、同時看待，並認為彼德斯和麥克魯漢一樣，同樣長於為那些生活於書寫世代的讀者帶來震撼。而在紀念本書出版10周年時，《傳播調查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便有一篇訪談約翰·彼德斯的文章（Kane & Peters, 2010），文中也提到《話語的摸索與尋繹：傳播觀念史》一書，乃是在迷失的愛戀與神秘的靈魂的學術架構下，將歐洲、加拿大、美國的傳播學術關聯起來共同討論的文本。

從這樣的背景下來檢視一本學術著作，它的價值無庸置疑，已逝傳播學者詹姆斯·凱瑞（James Carey, 1935-2006）便曾以「光彩奪目」（splendid）來形容這份依循著歷史、哲學、宗教、文化、法律和技術等寬廣脈絡來理解傳播研究的專書（Carey, 1988）。而在新世紀的第一年（2000年），此書也獲得美國傳播協會（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修辭與公共演說領域「卓越學術獎」的肯定。只是，凱瑞表達「欣賞」的同時也寫著：「對於彼德斯論證中的深度、細膩與洞察，還是無法完全理解。」<sup>8</sup>作為美國傳播與文化研究領域的代表人物，凱瑞恭維的話語給了相當肯定，但這有其本土指涉，當然也有其全球意涵；只是，2011年的情況，又是如何呢？而做為以中文為表述工具的華文傳播學者，作者也試圖釐清此書對於臺灣社會與中國文化的意義。

6 彼德斯於去年（2011）的11月1日至7日來臺進行短期參訪與演講。並應嘉義中正大學傳播學系以及臺北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邀請，進行三場公開演講。講題分別是「新媒介的古老性」（The oldness of new media）與「媒介理論的各種地平線：昨天與今日」（Horizons of media theory: yesterday and today）。

7 本書名翻譯，參見臺灣繁體字版（McLuhan, 1962 / 賴盈滿譯，2008）。

8 凱瑞書寫的文字，請參閱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Peters, 1999) 的書面封底。

## 壹、勾勒速寫

這書的第一版共有八個章節，加上附錄、謝辭，與索引、計有 293 頁的內容，沒有任何圖表與相片。全書敘述開始於〈緒論〉中傳播問題的討論，完成於〈結語〉中傳播概念關鍵元素的指陳；中間從第一章開始的六個章節，分別討論作為觀念的傳播，在歷史上經歷過哪些發展歷程，包括了這個詞彙的發展背景、浮現時機、原初指涉，以及後來意義被層層堆疊於今日溝通描述之中等等。究其核心，「傳播是甚麼？」(What is communication?) 乃彼德斯的論述起點，而在社會生活中，對於這個概念的薄弱想像與偏差執著，例如：審議對話必然優於大眾傳播，以及心靈層面的溝通較身體面向的互動來得高尚等等，則是他試圖回應的主要脈絡。

乍看之下，數位匯流、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觸控螢幕、未來文化，以及推特、臉書等字詞似乎都不可能出現於這樣的論述裡，而這種看似脫離時代背景的抽象解釋，又能對於臺灣社會目前飽受抨擊的新聞環境，與五花八門的傳播表現，產生什麼啟發呢？當然，這些疑問都合情合理，也嘗試彰顯本地讀者可能會有的困惑。只是，在第一個問題上，作者不可能完全漠然，只是它是以一種間接的方式觸及。他在名為〈生者的幻影，與死者的對話〉的第四章中寫道：

在我們這個時代，正在經歷數位革命的種種，現在重溫以往曾經歷過的各種震撼，是深富啟發性的。今天關於傳播的迫切問題——時空的壓縮（像網路），和人類經驗與身分的複製（像虛擬實境）——在電報和攝影、留聲機與電話、電影及廣播的時代中，就曾以類似方式探索過了。以下所依循的，就是指出這些新媒介宣稱讓我們更加地靠近彼此，事實上只是讓傳播、溝通變得更加不可能而已 (Peters, 1999: 143)。

在此，新的數位媒介形式，例如：行動電話、視訊軟體、網路連線遊戲等的具體內容與社會影響為何？並非是《話語的摸索與尋繹：傳播觀念史》一書的核心關注。彼德斯在意的是：新科技的媒介概念，真的有改變我們對於「傳播」觀念的想像與認識嗎？換句話說，這些新媒介之於我們，就如同我們的祖先與前輩在每一個時代與新媒介的遭遇一樣；我們一點都不獨特，只不過是現在新媒介形式出現的頻率，不再是以「10年」作為單位，而是被高度擠壓在「1年」、「2年」，甚至是以「月份」作為單位，以至於我們現在少有恐慌，更多時候則是擔憂落伍

的流行心態，這可從蘋果電腦的 iTunes, iPod, iPhone, iPad 以及 iCloud 等源源不窮的推陳出新可以看出。

當然，做為學術研究者會有這樣的好奇：在不斷向前發展的背景下，傳播還需要釐清嗎？而我們對於此概念的普遍認識為何？為何新科技的出現，會改變過往的認識與想像呢？這些好奇指出作者的問題意識背後預設著一個本質性的關懷，好像有一個「什麼」就在那裏，說明著「傳播」這個人為創造概念的核心內涵。這樣的基礎其實與 1980 年代以後的「後」（post-）學術風潮格格不入，但也標示著作者不隨風潮、有所堅持與擅於提問的研究身影。他在〈緒論〉中開宗明義地寫道：

雖然自古以來，亞里斯多德便已說過：人是「會說話的動物」；然而，也要到了 19 世紀的晚期，我們才從與他人溝通能力好壞的角度，來界定我們自己。在自我的描述與認識上，這個革命性變遷的學術、道德，與政治上的各種意涵，一直未被充分地回溯，本書因而嘗試展開這樣的溯源 (Peters, 1999: 1)。

很明顯地，作者問了一個少人發想，但絕對是既大且根本的問題。就這本書與其他學術性傳播書籍的差異來說，這樣的歧異還只是開始而已，後續的寫作方式、文獻來源，與論述架構，彼德斯更是獨樹一格。

## 貳、描述繪製

在寫作方面，這本書非以專業術語為尚，寫作平易近人；一位學會書評便指出：彼德斯關於黑格爾的討論，是他看過相關論述中最清晰易懂的 (Hobbs, 2001)。一般讀者則多以令人驚嘆 (amazing)、引人入勝 (fascinating)，與啟迪人心 (inspiring) 等詞彙加以描述 (Google Books, 2011)。但是，這些說法只適合於以英語文化做為成長背景的人士。對於想要趕緊認識「傳播」的中文讀者來說，這本絕對要讀的好書有點不好親近。因為作者試圖描繪出現實生活中真正的溝通情形，並且藉之闡明學界中人對於傳播概念的虛幻與偏執。但是對於那些想要找到捷徑、趕快認識內容的人來說，這是種專敲邊鼓的折磨。

對於美國人來說，生活常識的旁徵博引會使得生硬的學術概念變得活潑有趣；以第六章〈機器、動物與外星人：無法溝通性的各種範圍〉的內容為例，他提到作家愛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與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的同時, 卻也提到 SETI (The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搜尋外星文明計畫)、英國邏輯學家艾倫杜靈 (Alan Turing, 1912-1954), 與《星際大戰》系列 (Star Wars)、《星際爭霸戰》 (Star Trek) 等通俗文化。因此對於華人來說, 這樣的作法恰好形成了難以跨越的鴻溝。除非你是個熟悉西方文明的基督徒, 或是熱愛美國文化的亞洲人。不然, 彼德斯整本書的寫作方式就有點像我們在臺灣介紹傳播概念時, 是透過四書五經、先秦諸子、宋明理學、當代儒家、五四運動、國共關係、經濟起飛、黨外運動、總統直選, 以及臺灣的科學園區、電腦產業等的脈絡重建, 再加上乩童作法、觀落陰等民間信仰、民國白話文、華人保釣運動、臺灣校園民歌、港、澳大眾電影, 與流行文化的實例闡述, 而偶然出現對於魯迅、金庸、倪匡、賴和、吳濁流、楊逵、朱西寧、楊喚、周夢蝶、鄭愁予、夏宇, 以至於北島、阿城某部作品, 甚至是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討論說明, 作者援引廣泛, 貼近西方人的生活世界, 也增加不少閱讀滋味, 但都能以容易理解的方式介紹理論爭議, 實屬不易; 典型的案例, 可以書中 89 頁到 94 頁關於「梅斯默博士及其流體」 (Dr. Mesmer and His Fluids) 的相關討論來加以說明。

歷史上, 梅斯默博士 (Franz Anton Mesmer, 1734-1815) 擅長的, 是今天我們稱之為另類療法的一種引導與溝通技巧。在當時, 這種方法被使用者描述為「動物磁力說」 (animal magnetism), 因為他的博士論文《行星對於人體之影響》 (1766), 便是在探討一種看不見的、但受行星影響的微妙流體, 對於人類健康的影響; 1775 年, 他修正相關說法並提出「動物磁力說」的闡釋, 主張人體內有種動物磁力, 只要分佈不當就會產生疾病。此時, 他更設置了一種類似降靈會的治療儀式, 幾個受治療者在室內圍坐於放滿鐵粉或水的大木桶四周, 木桶蓋上則插有許多細或粗的鐵棒, 提供受治療者以手握住。緊接著, 會有人彈起鋼琴<sup>9</sup>, 梅斯默並在此時身著絲綢黑袍, 手持鐵杖現身, 來回穿梭於受治療者間, 並以手或鐵杖接觸患者的身體。於是, 受治療者開始出現各種不同的反應; 後來, 特別是那種經過這些治療程序的人, 不用靠近醫生或親臨現場, 梅斯默眼神或心靈感應便可以擁有同樣的效果。這種讓被治療者進入似醒似睡狀態的方式, 被稱為梅斯默療學 (Mesmerism) (Peters, 1999: 89-94)。

9 莫札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 與梅斯默於 1781 年便已認識, 也曾為此彈琴, 並受其委託製作歌劇 (Franklin, 2004)。

這樣的書寫方式與討論內容，在西方主流學術社群中會被視為是創意的巧思（當然，不可能沒有爭議，但已獲得關鍵學術團體的認可），卻很難在作為學術邊陲之地的臺灣獲得重視。畢竟，梅斯默療學指涉的乃是後來被稱之為「催眠術」（hypnotism）的前身，書中寫道：

……（梅斯默博士）認為自己是人類心靈中的牛頓。但是，「梅斯默療學」和「進入梅斯默狀態」等字詞，卻很少讓我們想起梅斯默博士，反倒始終注意到那個要到 1840 年代才被命名為催眠術的現象 (Peters, 1999: 90)。

在現象與個人之間，彼德斯對大眾讀者的普遍關心念茲在茲（這是臺灣學術社群中比較少見的寫作取徑，特別是在傳播學界），卻更有意識地藉此闡述傳播概念中的一些既定印象是如何層層積累、逐步堆疊起來的。他緊接上述文字寫道，並藉以凸顯作為本書主軸的傳播。

梅斯默身處的時代，人們偏好以自己的姓名來為各種與電有關的過程命名（伏特、賈法尼、高斯、瓦特、歐姆、安培）<sup>10</sup>。「動物磁力說」——梅斯默的名字也被用來為這個發現命名——他認為這是物理（地心引力）與社會（愛戀）吸引力的核心關鍵。……梅斯默和他的信徒們認為自己既非神秘論者，更不是馬戲團式的穿插表演秀，而是朝理性道路上邁進一大步。他們提供可以將物質力量與道德力量一體化的田野理論。就如同萬有引力使得行星處在軌道之上，動物磁力說也使得靈魂處在愛戀、健康，與溝通之中 (Peters, 1999: 90)。

……梅斯默式支配的觀念，經由催眠術傳遞到群眾心理學，也出現在大眾傳播，與在 20 世紀裡逐漸變質的大眾傳播之中的各種觀點。作為一股在法國大革命中積極主動的政治力量，梅斯默學說的生命短暫；但是由於對群眾心理學的影響以及透過催眠術來中介的特質，它總是

10 這些字詞均是國際通用，或是特定地區與學科用以度量某些抽象力量的度衡單位。伏特（1745-1827）是義大利人，後來姓名裡的第一個字母 V，就被作為電壓單位。而同樣是義大利人的賈法尼（Galvani, 1737-1798）、德國人高斯（Gauss, 1777-1855）、英國人瓦特（Watt, 1736-1819）、德國人歐姆（Ohm, 1787-1854），以及法國人安培（Ampere, 1775-1836）則分別是測量微幅電流的檢流計（galvanometer）、磁感應強度單位 Gs、功率單位 W、電阻單位  $\Omega$ ，與電學單位 A 的紀念對象。

作為大眾傳播贖罪與糟糕特徵的形象提供者。憑藉著指出那些表達贊同的自我……有著易受影響的缺點，催眠術已成為描述獨裁者與廣告人經由廣播、電影，與電視來鑄造他們閱聽眾的巨大魔力的主要隱喻。梅斯默學說的後來發展協助形塑了我們對 20 世紀大眾媒體的理解，因為它透過大眾傳媒不斷重複、無處不在、或訴諸潛意識影響卻未被清楚告知的技巧等，來作為大眾控制和說服的代理機制，總是能以某種方式繞開公民們有所警戒與防備的是非良心、直接進入野獸內在的古老恐懼（或無知與懶惰）之中 (Peters, 1999: 93-94)。

在這裡，彼德斯旨在闡述現代大眾傳播遭受詬病之處。那就是在人們生活中一旦鬆懈不加注意，對自己產生危險的狀態（令人喪失判斷能力）立即透過大眾傳播靠近我們的心靈旁邊。這種從工業化以來無聲無息、深入內在，與現代性（modernity）有關卻極度又極度隱晦的真實存在，其實就是當代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的發展基礎，也是傳播理論早期效果研究觸及卻未言明的關注重點。

只是相當值得注意的是，彼德斯不僅使用與效果理論中完全迥異的概念與詞彙，避免了在歐美學術社群踵事增華中無奈的因循苟且，類似於曾任教英國劍橋大學耶穌學院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所致力的一樣。但他更為特殊的是，在關注文化之餘，完全能為那些在邊陲社群中鸚鵡學語下的不明所以，重建出思考傳播問題的歷史脈絡，以架構出豐厚且具縱深的發展空間。上面的引述雖未言明，但是對於傳播學發展過程中對於模式（model）曾有的迷戀 (McQuail & Windahl, 1993)，也就是那種在 1950 年代前後由謝農（Claude Shannon, 1916-2001）、韋弗（Warren Weaver, 1894-1978）、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 1902-1978）等人所發展出來的科學說明，提出了最具視野的脈絡性說明。這種以淺顯方式闡釋傳播學門知識性的醞釀，是本書很重要的價值之一。也就是說，在普及專業知識的主張同時，他無形中開拓了一般人對於傳播學門接受與肯認的可能性。

## 參、設色塗抹

當然，每一種新穎的傳播媒介並非是全然的罪惡，《話語的摸索與尋繹：傳播觀念史》一書甚且是在為大眾傳播形塑出來的交流處境辯駁、捍衛。

作者的知識背景與被視為是大眾傳播代表人物的史蘭姆（Wilbur Schramm, 1907-1987）類似，同樣熟稔英美文學，史蘭姆甚至與後來有著長遠影響的愛荷華寫作工作室關係密切。只是，史蘭姆的學術作品卻比較少見到這方面的明確影響，反倒是再現方式的直接、明確，使其更傾向於知識養成的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傳統。在這個要點上，彼德斯也是大學英文系畢業，但在碩士層級以後，則從口語傳播的面向轉入了傳播研究的領域<sup>11</sup>。因此，兩人釐清大眾傳播的論理方式相當不同。前者直接肯定了大眾傳播的社會功能，並積極尋求與國家發展現代化之間的關聯（Schramm, 1963, 1964），他對英美文學的熟悉並未使其注意到醞釀於此一領域的口說傳統；彼德斯則以抽象化層次更高的理論掌握，在口語表達的脈絡中將大眾傳播的時代意義與文化矛盾揭示出來。

兩位學者的論證都有其時代背景的意義，但彼德斯顯然對其所處的時、空位置更加自覺，並認真地對前輩們的研究成果做出整理與反省，這對傳播門下一階段的发展，有其相當積極的前瞻性。在全書裡，他提到史蘭姆有兩次，且都是在緒論的文獻回顧之中。彼德斯指出「傳播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過程」（Peters, 1999: 25）的社會科學典範是由其所揭示。在其前、後文的脈絡中，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s，DNA 作為偉大的符碼）與人文學科（liberal arts，語言就是溝通）是同時並列的範疇，傳播則做為可以統合三者的完整觀念。另外一處，則是他中肯地對於史蘭姆及其類似取向的研究成果做出評估，認為「那些試圖從學術研究上使得這一詞彙在理論上更為精確的動機，有時候反倒無力抗拒普遍用法中那種煙霧繚漫的模糊，從而加深了這種混亂」（Peters, 1999: 6）<sup>12</sup>。

在美國傳播研究的系譜中，與史蘭姆相較，彼德斯顯然更接近於前面提過的哥倫比亞大學前新聞學院院長，也是傳播研究中文化取向祭酒的凱瑞。而凱瑞出現的段落，也多半是在他闡明傳播概念的主要論述之中。

……梅斯默療學與電報系統都憑藉了一種共同的文化表達：在遠距離個體之間與電有關的聯繫。電報既刺激又利用了那些與遠距離精神行動有關的古老論述。所謂的閃電線引出了被韋納（Norbert Wiener）與緊接其後的凱瑞等人稱之為「記號經濟」（the economy of the signal）

11 請參見 Peters (2011) 在「自傳履歷」上的相關記載。彼德斯是在史丹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鍾蔚文則是他的前期學長，兩人熟識並有討論之誼。

12 彼德斯舉例的具體案例，是〈傳播如何運作〉（How communication works）（Schramm, 1954）的文章。

的問題。這不是貨物的運輸，而是沒有明顯物質地位的信息差異活動 (Peters, 1999: 94)。

在《政治經濟批判綱領》(*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7-1858 年草稿) 中，馬克思也將商品的神奇力量視為是部分源於產物與產地關係在地理上的分離 (Peters, 1999: 126)。

原則上，對於信號——不是身體——來說，摩擦的係數已被降低到幾乎沒有。「時間與空間的消失」令人驚嘆，但某些早期的狂熱傢伙作夢也想像不到這一景況；畢竟，就近使用 (access) 與成本花費 (cost) 的物質特性都使得電報只能作為普遍接觸的想像烏托邦。就如同 James Carey 所論證的，電報形塑了運輸與傳播決定性的分離 (Peters, 1999: 139)。

書中這三段與傳輸運送、大眾傳播有關的文字，都摘錄於詹姆斯·凱瑞廣為人知的《傳播作為文化》(*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一書中的第八章 (Carey, 1988)，一個透過電報來說明技術與意識型態關連性的完整論述。第一個段落的文字，主要是為電報、攝影，與無線電波的出現作鋪陳，招魂術中的靈媒 (the spiritualist mediums) 則是當時民眾可否接受此新興事物的想像依據之一，因此，媒介 (media) 概念很清晰地被用來掌握這一切。

第二段引述，彼德斯主要是用來闡述馬克思對於金錢 (money) 作為一種媒介的看法：「馬克思認為金錢貨幣是大眾傳播，而他對此深惡痛絕」(Peters, 1999: 122)。而將大眾傳播與金錢貨幣關連起來的比喻，是個相當有趣的聯想；倘若將大眾傳播中的訊息可被轉換到不同時空脈絡中呈現的特性，對比於金錢的相同功能，那麼我們便可以理解彼德斯在此的經營巧思。為了更清楚地闡明，他在討論中也提到指出社會契約說的英國人約翰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洛克主張金錢解決了人類勞動與自然資源積累的道德問題，由於不讓勞動換來的私有財產任其腐壞，所以轉換成為可在市場中購買商品的貨幣，便可使人類的活動脫離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繼而獲得一種當時人們難以想像的幸福（當然，這得同時強調擁有財產之後對於貨物與鄰人的責任）。馬克思當然反對，畢竟這種在地理空間上的文化突破與相應而來的商品資本與私有財產，將會扭曲，甚至顛倒人類社會的自然關係。在此，彼德斯是反對馬克思關於異化 (alienation) 的看法與延伸。他認為即時將訊息脫離時空限制，並傳遞至很多地方的空間延伸，是我們無法阻隔的必然發展；既然如此，我們更應該在接受與承認大眾傳播之餘，竭

力去發展相應與適合的理解與態度，而非一直著眼於這項中介事務的短處、缺點與罪惡，畢竟在原先使用口頭傳播的人際關係中，話語的濫用與權力問題也依舊存在。

第三段文字，作者討論的前後脈絡是媒介出現以後傳播行為的改變，也是今日新媒介層出不窮背景下的具體參照，因此，這個從 19 世紀以來至今都方興未艾的媒介發展被描述為電訊傳播（telecommunication）。很清楚地，彼德斯指出這些新媒介的發展動力是在傳播行為方面，人類長期以來想要克服環境限制下的努力，尤其是為了滿足人性本能中的慾望需求。只是，各種媒介一旦發展便有其自身歷程，若不加調整、釐清，則相應發展出來的文化往往走火入魔，反而吞噬我們追求的幸福。所以，彼德斯才會援引凱瑞觀點來說明傳播字詞原本就有運輸、傳遞的交通指涉，以及大眾傳媒自身也具有的本質限制，藉以追本溯源地釐析現況與困境。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指出彼德斯此書是傳播研究中人文主義傳統下的一份扛鼎之作，絕對是被接受的描繪與定位。只是也要記得：任何標籤都有其簡化的缺陷。相當明確地，彼德斯是站在這樣承先啟後的位置，展開他對於傳播概念的摸索。只是他並非此時才開始，前面提過的〈傳播研究中學術貧困的制度性來源〉（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intellectual povert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Peters, 1986）一文，便是他邁向這一旅程的起點。在幾年前出版的一本合集中，他便有一文〈傳播研究中思想史的制度性時機〉（Institu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Peters, 2008）提到了兩者之間的關連。《話語的摸索與尋繹：傳播觀念史》專書則是將相關探索匯集起來並畫上句點的努力。只是，這樣的摸索想追尋的究竟為何呢？從文化觀點來為大眾傳播的意義做辯護的努力，雖然回應了傳播學科目前學術研究的主要路線——傳播媒介社群化，甚至還克服這一路徑中分歧、困頓之處，並有所總結，最重要的是他在全書中展現出一種學術想像的創新能力，實值得我們當代的傳播研究者學習與體認。

## 肆、名家手法

在臺灣，彼德斯被討論與被援引的機會都相對稀少，影響力有限，甚為可惜。畢竟在書中，彼德斯展示出一種極為可貴的學術視野。他想要替大眾傳播說些甚麼，卻非以攻擊口語傳播做為出發；他對修辭語藝相當熟悉，卻謙卑爬梳更為廣闊的哲學知識。他瞭解理論思潮，卻轉而運用寓言故事，以揭示更多平民百姓的

關懷與共鳴。這種透過口語傳播的歷史縱深，來為大眾傳播現況進行辯護、闡釋，從而提醒我們在當代全球文化下，重新認識傳播概念有其積極價值的作為，實乃大家筆觸，也是深化傳播學術正當性、開拓新世紀傳播研究重要的路徑與方向。

換句話說，視野開闊卻有源頭活水的論述方式，具有激濁揚清、辨識優劣，繼而建立起共識的作用，確實是新世紀傳播學門需要的寫作方式。前面提到他對於電訊傳播的介紹，是放在 19 世紀電報、攝影被發明出來的脈絡下。只是，他不直接說是誰發明了電話、收音機，轉而重建了 19 世紀以來的文化脈絡；在「紀錄與傳輸」的小標題下，彼德斯這樣寫道：

距離與死亡始終是愛戀的兩大障礙，也是慾望的兩大刺激。巨大的障礙激發了濃烈的熱情，就如同蘇格拉底在《斐德羅篇》裡陳述的，人性本能的慾望衝動（eros）不是由占有所構成，而是在於想要的嚮往；還有甚麼比距離，尤其是死亡這類終極的距離，更加地刺激慾望呢？人性本能的慾望衝動謀求的是千山萬水的跨越、上窮碧落下黃泉，以彌合所有分歧。正是這條原則，使我們超越以話語表達和身體接觸方式和他人互動等常態模式的侷限。新媒介粉碎了相互交往（intercourse）的古老障礙，放大了慾望的帝國，扭曲它傳統的型態，因此人們常把這些新媒介理解為性感的或錯亂的，或兩者兼而有之（sexy or perverse or both）。……如今，遠方可以和近處說話，死者可以和活人交談。與此類似的事情發生在 19 世紀。若以更鮮明的方式來表達，是在 1830 與 1840 年代，攝影克服了時間，而電報克服了空間。……就是在 19 世紀，人類接觸的環境經歷了空前未有的轉變，特別是在兩個軸線上：傳輸與紀錄。關鍵的變化被記錄在遠距離傳遞（tele-）和書寫、紀錄（-graphy）的字詞裡，所以在接下去的媒介命名中，他們無所不在。遠距離傳遞指出了一種新的距離刻度——電報（telegraphy，話語）、電話（telephony，聲音）、電視（television，影像），和心靈感應（telepathy，精神）；而書寫、紀錄則指出了嶄新的銘刻形式——電報（telegraphy，話語）、攝影（photograph，影像）、留聲機（phonograph，聲音），以及腦電波檢查圖（electroencephalograph，腦波）。在時間的限制與空間的束縛上，十九世紀經歷了一場革命（Peters, 1999: 137-138）。

在這樣忽古忽今、忽大忽小的角度轉換下，也在理想與現實的對比之間，作者很技巧地把新媒介發展的核心動力闡述了，更在順便交代了新興媒介的發展背景中將今日複雜而繁冗的傳播環境描繪出來。在這樣的論述之後，約翰·彼德斯便援引一些既有的研究文獻與探索成果，包括前面已解釋過凱瑞關於電報形塑出運輸與傳播決定性分離的論述等，回顧式地寫道：

……通訊和運輸的分離，意味著召喚出一個平行的宇宙。在當中，個人的複製品棲息於此，並受到和血肉之軀遵循的法則迥然不同的規律所制約。「媒介總是會產生鬼魂現象」。雖然蒸氣力量使得透過鐵路和船舶在運輸人群和貨物上大大加快，但身體依舊跟不上聲音、圖像和視覺的各種再現。我們的身體知道疲勞與極限，但是我們的肖象一旦被記錄下來，就可以毫無限制地在媒介系統裡流通，繼而超越空間與時間的浪費 (Peters, 1999: 140)。

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的詞彙未被觸及，但明顯地，今日網路連線的特質與現實生活的關係已被揭示：兩者的範疇截然不同，但人們對此的認識明顯有限。這樣的學術再現模式不太多見，因為在這樣表面文字背後的學術想像，必須涉獵廣博又相當細緻，這是成熟文明裡對於理性極為深刻的表達形式之一。

只是，這種獨特而新穎的想像在書中處處可見。舉例來說，始於首章關於柏拉圖對話錄 (Dialogues of Plato) 與對觀福音書 (the synoptic Gospels, 或譯為符類福音書)、蘇格拉底 (Socrates) 與耶穌 (Jesus)、人性慾望 (eros) 與無私大愛 (agape)、對話 (dialogue) 與撒播 (dissemination)，以及口述 (speech) 與書寫 (writing) 等一系列的對比。其目的在於扭轉我們一般認為在所有溝通與傳播形式中，對話具有神聖屬性的絕對偏好。

而後經過第二章 (錯誤的歷史：精神論者的傳統) 與第三章 (邁向更為堅定卻喧鬧的心靈視野：黑格爾、馬克斯與齊克果) 的鋪陳，作者首要闡明：在過去的歷史上，傳播的本質性問題是如何被處理的？而當代關於此概念的似是而非與似非而是等印象，又是如何累積形成的？在接續下去的第四章〈生者的幻影，與死者的對話〉、第五章〈尋求真正的連結，或彌合分歧〉，與第六章〈機器、動物與外星人：無法溝通性的各種範圍〉中，約翰·彼德斯都是從各種不同的面向來闡述問題。

當然，作者的論證是比較繁複的，但歸根究底來說，他認為當代西方文明中的傳播，總希望能夠達成人類心靈的交流（a merging of human minds）與不同精神間的融合一體（a union of souls），是種一廂情願的神話，也是當代溝通問題層出不窮的主要背景。彼德斯將此視為是西方文明歷史中的偏見，不過，他並沒有棄之如敝屣，反倒是先肯認其位置並加以論述：「意義是不同於媒介的，內容也有別於形式。而符號就像身體一樣，是精神的容器。傳播的任務便是要超越符號與身體的限制，繼而達成意義與心靈交融的立即純粹」（Peters, 1999: 64）就因為彼德斯替他所反對的神話展開論述的謙遜作法，使我們同時可以理解西方文明數百年來的累積過程，尤其是被用來發展各式各樣傳播媒介（communications）的技術信念，是立基在甚麼樣的觀念脈絡裡。而前面提到的兩個章節，便在反覆論證這一論述的發展，而為了更清楚地加以闡釋，天使（angel）可以超越身體物質限制的原型，與繼之而來的天使學（angelology），便被用來闡述這些在對話基礎上產生的偏見。

再次強調，作者不是否定傳播概念中的天使學企圖，更非一筆勾消這種關於對話理想的真誠渴望。而對於當代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這類詞彙，一般開放社會多表肯定，繼而眾口一致地傳誦、擁戴，反而容易忽略了眾聲喧嘩中激盪出來的鮮明意義。約翰·彼德斯所致力於的，便是這種位置的辨識；在第一章節結束之處，他的深刻理性與辯證邏輯便有一個很細膩的演練與展示。

總體而言，單向傳播（one-way communication）並沒有什麼好被侮辱輕蔑或矛盾吊詭之處。透過對話產生真實心靈的結合並不是唯一的選項。事實上，對於傳播的高傲期待可能使我們對於撒播（dissemination）或被暫停、終止的對話（suspended dialogue）中更為細緻的輝煌有所蒙蔽。在許多人關於什麼是美好傳播的想像中，對話具有至高無上的位置，但是對我們的基本詞彙來說，撒播呈現了更為明智的選擇。對於我們這種運用符號的動物所投身的古怪實踐而言，也對我們以公平、善意與他人接觸，卻經常有所差池的企圖來說，灑播都是更為友善的形式。相較於配對式的分享，公開的散播（open scatter）是更為基本的形式；它提供素材，進而使得對話能在那些稀罕而絕佳的場合出現。撒播不是生活中的殘骸，而是我們的命運（Peters, 1999: 62）。

透過這種在精神與物質、在口語與大眾間的矛盾張力，彼德斯揭示出傳播媒介與我們日常生活的緊密關係與道德價值。當然，替大眾媒介作辯護不是他的目

的，只是他很有力量的工具。彼德斯始終的關懷都是在本體論（ontology）的層次上，將歷史脈絡與當代處境中的傳播做出闡明，藉以回應在前面所陳述的本質性問題。在〈結語：堅定心意手牽手〉（Conclusion: A squeeze of the hand）的章節中，他便直接寫道：

我們的互動絕不會是內在思考（cogitos）的交會，頂多就是一場接觸對方的舞蹈。不應該是孤獨心靈和鬼魅幻影這類難以承受的問題，傳播的衡量尺度應該是行為之間的成功協調。所有我們在內心生活所知道的、目睹的、耳聞的，和感受到的，都是透過話語、行動與姿勢所體現；以某種明確的方式來說，它們都是公共的。問題不應該是我們能夠彼此溝通嗎？而應該是：我們能夠公正而寬厚地愛護彼此，和對待他人嗎？（Peters, 1999: 268）

在此，態度上的公正與寬厚變成了釐清傳播概念的關鍵面向。然而，相較於物質來說的精神事務，似乎比較適合來描繪態度問題，但是「行為之間的成功協調」已經把這種抽象的面向填充進具體的素材。也就是說，傳播互動中經常會被忽略的，是它者的（other）和身體的（bodily）經驗；「無論『傳播』意味著甚麼，位居核心的都應該是他者而非自我」（Peters, 1999: 265）。也因此那些看似正確的態度闡述，一旦觀念模糊，也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在這個層次上，彼德斯始終清晰有序地安排自身的主張。以〈結語〉中的標題為例，他不直接使用 touch, pull, hand in hand 等字眼，反倒是藉著 squeeze，一種多方面的施加力度，以凸顯「牽手」是在意識到他人與自身不同的意向之後，個人經由廣泛思索與認真看待來抉擇自己的行為。誠如個人在探索臺灣傳播研究時曾經指出的：眾聲喧嘩「重視它覺的自覺意識之提倡，以至於在視野遼闊的對話中覺察並安頓人、我之間的關係」（夏春祥，2002：19）；彼德斯由此出發，並揭示出身體接觸經驗對於傳播、溝通概念的意義。這種有意識的社會行動所傳達出來的意涵，乃是一種心意的堅定，這也是中文翻譯幾經思索後的裁量。

從這樣的脈絡中，自可理解到本書的論述架構是多麼獨特；從哲學到神學、從理論到神話、從文學到劇場，以及從小說到電影等。只是，需要釐清的是在傳播研究中，實證主義（positivism）式的書籍會有邏輯與形式的討論，但多缺乏實質生活經驗的驗證；經驗主義（empiricism）的討論會觸及每日流程，但基於客觀描述的前提，難以在宗教信仰的神秘體認中自在進出。因此從他的章節安排與

每一章節中的分析對象與論述架構，自可以發現實用主義（**pragmatism**）在此隱而未顯的作用，那種勇敢面對生活、嘗試解決問題的決心，是相當引人入勝的。約翰·彼德斯在導言中寫道：

現在的任務是為傳播尋求一種闡述，既不抹殺其核心之中它者性的奇特事實，也不湮滅用話語訴諸行動的可能性。語言對我們的意圖有所抗拒，以黑格爾的詞彙來說，語言訴說我們，但是語言又是我們所知道最可靠的說服方式。雖然，語言是一個無法如內心所想反映事物的黑暗容器，但是多數時候，它還是能夠協調我們的行動。這個中間位置被再現於最近保羅·呂格爾和漢斯·高達美<sup>13</sup>的論辯之中，我也將它視為是向不可思議神秘與理性務實，同時採取開放態度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立場 (Peters, 1999: 21-22)。

粗體字為評介者所加，因為在這部書籍的閱讀中，往往會因為觸及到的面向太多而在首次接觸時被忽略。更何況在建國百年的臺灣社會中，實用主義常被聯想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中國學生胡適（1891-1962）關於民主與科學的介紹，以至於常把宗教神學的務實關懷忽略甚至排除。簡單來說，這份作品可被視為是實用主義在 21 世紀復興的一部分，更是在較近的未來，國際上傳播學術研究最前線的發展 (Bergman, 2008; Simonson, 2001)。無疑地，這也是對於提倡新實用主義的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在傳播面向上的回應。

在前面的敘述中，微觀的小處如介紹電報發明的鋪陳方式，與體現實用主義等本質關懷的鉅觀架構上，《話語的摸索與追尋：傳播觀念史》一書皆有可觀之處。當然，約翰·彼德斯這種看待與處理傳播的論述方式不是突然地浮現，而是在理論化傳播的思考中，杜威與凱瑞在新時代中的延續。

13 評介者註：保羅·呂格爾（Paul Ricoeur, 1913-2005）和漢斯·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 2002），兩者都對詮釋學在當代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同樣反對在詮釋過程中對於客觀方法的過度強調，但是在詮釋於主觀投入面向上的內涵，兩人則有不同觀點；相對而言，呂格爾更強調作品本身具有的客觀屬性。在此點上，彼德斯更明顯地贊同保羅·呂格爾的主張。

## 伍、經典圖像：代結語

經歷了前面的討論，評介者嘗試表達的是：這本書在西方學界與大眾生活中的價值。當然，文章裡亦步亦趨的是西方傳播研究的最新發展，包括了思想史、文化的關懷，以及新媒介的各種變化。在這個面向上，作者從班雅明那兒借來關於建構論者的（*constructivist*）方法相當嚴謹<sup>14</sup>，全書的架構、理路，到再現方式中文獻的討論、譬喻的引用，作者都恪遵這一原則，繼而裁剪、安排出令人驚訝的作品。當然，他的論點也非常清晰，只是彼德斯似乎不喜歡直陳重點，書中最常見的是迂迴、曲折，但絕對是完整而細膩的書寫風景。

簡單而言，彼德斯的重點是在凸顯：作為我們這個時代核心詞彙的溝通（*communication*），傳播研究做出的貢獻實在有限。因此，他在仔細地考察主要論點之後，不再侷限在與此概念相對應的傳播學門，反而轉向更為寬廣的學術脈絡，與各種背景的傳播觀點相切磋，甚至也揭示了 17 世紀的約翰洛克，「在某種意義上，是傳播這個概念的作者」（*Peters, 1999: 80*）。只是作為任教於傳播科系的專門研究者（愛荷華大學傳播研究系），彼德斯一如 1980 年代時的主張一樣，認為相關研究的重新出發，「應該是先承認傳播這個詞彙在概念上毫無效用」（*Peters, 1986: 551*）。需要釐清的是他絕非取消、否認傳播這個概念與學科，而是「擱置爭議、延長這個學門面對問題並加以解決的時間」（*moratorium; Peters, 1986: 551*）。從這裡來看，彼德斯以 13 年的時間重新安排討論這個概念的歷史脈絡，成功地完成了這份對自我的期許與工作上的挑戰，面對現實問題的勇敢決心實在值得我們凝視。

評介者認為這是一份氣勢磅礴的著作，而且觀點新穎。只是華人閱讀者得先煎熬過那種不同文明與相異文化之間的隔閡，尤其是華人大眾文化中那種粗淺輕薄的過客心態，與臺灣社會那種忙碌生活步調的折磨、壓迫。只要能夠「hold 住」<sup>15</sup> 傳播在書中被界定為他者性（*otherness*）的勇敢辨識、尊崇與欣賞，讀來必能感到曲徑通幽且柳暗花明。而齊克果在這本理論化傳播書籍中最主要的作用，便是「給了我們一種不是描述心靈合一的傳播想法」（*Peters, 1999: 129*）。他

14 彼德斯對此方法的討論，可見於〈導論〉。在論述中，他將建構主義式的原則對比於歷史主義式（*historicism*）的方法。前者主張「歷史學者不應該等待過去來訴說其完整性，而是應該積極、主動地把不同時代排列起來，互相比較」（*Peters, 1999: 3*），以使現在的意義在歷史脈絡中清楚地展現出來；後者則認為歷史是已經被架構完成的、也是被給定的線性發展，因此歷史學者只要有充分的耐心與足夠的艱苦去召喚，歷史就會依照原來的狀況據實回應。

15 hold 住，一個孕育於 2011 年 8 月、但在華人流行文化中頗受到熱烈回響的新興詞語。

堅持這種站在主流印象對立面的位置，並相信「在供給過度的時代，溝通的任務就是使基本要素變得陌生」（同上引）。在齊克果活著時候的丹麥，人人都宣稱是基督徒，對於教義的真理也都耳熟能詳，因此這位丹麥人相信，只有遇到挫折與困惑，才會讓人開始用盡心力去理解真正的基督；在這個尋覓的過程中，傳播自應扮演責無旁貸的作用。只是，這種外顯且自在的態度必然得源於內心情懷的反覆辯證與深刻自我的完整理解。如此，我們也才有可能堅定地將敞開心扉的心靈融合視為是應該被反省的缺陷論述。

換個話說，這本書在出版 12 年後，仍然值得我們華人認真看待的重要原因，絕非是政治性的權力問題，而是那棲息在書冊、扉頁中鮮活而有力的慾望熱情，與深刻而完整的人文特質。這種理性探索的普世動力，更應在全球化日益普遍之際，為在地華人所注意與接受。在臺灣，我們對於這本書的討論極其有限，傳播社群少有觸及，遑論其他學科；而在大陸，近些年致力於譯介美國媒介生態學的傳播學著作、曾任教於四川外語學院與深圳大學的資深英語學者何道寬（1942-）完成的中文譯本，提供了容易親近此書的接觸管道，實有其意義。美中不足的是，作為這本書在全球最早的譯本，倉促之間有些疏失。也因此，在結束前夕，本文想要討論一下在使用中譯本時應該知道的與應該注意的。

首先，這本書籍的豐富是超乎預期的，而中譯本大體上能夠反映出此點，雖然有些疏漏，但無太多的刻意刪除與疏忽漏譯，起碼兩相參照，會省去很多查閱資料的時間。只是，很多用詞與臺灣社會不同，閱讀原文反較容易掌握，隨意選取的案例如：「信道能力」（channel capacity；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19），以及將本地熟悉的「齊克果」譯為「克爾愷郭爾」。第二，譯者用心地寫有〈譯者前言〉與〈譯後記〉等文字，協助讀者理解本書，一如他在許多傳播經典書籍翻譯過程中所做的貢獻；只是譯者提過對全書妙論雋語所做的附錄二，並非是完整地置於後面，而是被編輯者置放於每頁之中，效果比較有限。另外，編輯、校對上的疏失不少，例如：將 conversation 譯為「繪畫」（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30）、將 perfect 譯為「不完美」（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52）、將 quite like 譯為「完全不像」（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119），則會讓整個閱讀變得有點不知所云。當然，有些詞語的使用是譯者的選擇結果，確實可以多斟酌、考量再三的，畢竟此書深具意義。具體案例如：本書將 eros 譯為「愛慾」，可以理解；但翻作「人性慾望」的語彙，似乎更為貼切，「溝通的主要原則是人性慾望，而不是傳輸」（Peters, 1999: 37）便可作為佐證。至於第一章將柏拉圖對話錄中的 Phaedrus 翻譯為《斐多篇》，忽略了這是海內外

柏拉圖研究者對於 *Phaedo* 篇慣常的華文翻譯，則容易造成誤解，讀者不可不慎，本文將之譯為《斐德羅篇》。第三則是彼德斯為這本書寫的〈中譯本序〉，內容明確，有衍伸原文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以始終一致的謙卑姿態仔細討論了孔子與蘇格拉底、耶穌的比較，以及他與傳播媒介的關係，對華文讀者會有不同啟發，而關於「怨道」的闡述也令人期待，只是篇幅太少。

然而，中譯本比較需要慎重看待的，乃是譯者關於傳播學科的看法，與約翰·彼德斯那種想要釐清傳播困境的務實決心有所不同，因此多有簡化或不夠周延的情形，非常可惜。以原書的英文標題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為例，譯為《交流的無奈：傳播思想史》（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就容易給人錯誤印象。

先是將 *communication* 譯為「交流」，在中文詞彙上不能說錯；但若放在彼德斯自述此書為 1986 年文章的回應，以及他的探究多在釐清傳播領域中大眾傳播研究角色的脈絡裡，那麼譯為「傳播」才算是恰當的理解，畢竟他在經營、回應的是自身在傳播學術發展過程中的願景期盼與閱讀經驗。再來則是觀念史與思想史不太一樣，這從美國哲學家洛夫喬伊（Arthur Lovejoy, 1873-1962）出版觀念史名著《存在巨鏈：觀念史研究》（*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Lovejoy, 1936）以來，便引起不少討論，相關變化比較繁複，這裡就不再細談，只是很清楚地，彼德斯談的是作為觀念的傳播的演變歷史，因此譯為觀念史比較恰當。第三個是英文原書中，無奈的情緒或許是書中論及傳播的背景之一，也是論證的起點，但到了全書後半段，尤其是第五章與第六章，彼德斯發展了一個相當正面且積極的理解，指出媒介對於本質性傳播問題的現實作用，繼而帶出了傳播概念中「身體」面向（此時若以中文來表達，比較貼切的詞彙是溝通）的重要性，因此，片面凸顯「無奈」反而侷限了全書主旨的彰顯。當然，主標題 *Speaking into the air* 主要源出於新約《聖經》保羅書信裡的〈哥林多前書〉第 14 章第 9 節，英文原版的引用是在 206 頁討論廣播時出現；根據〈譯者前言〉中的說明，「『向空中說話』是浪費精力、毫無意義的徒勞之舉」（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2），這大概是無奈感受的由來。只是考究聖經原文，該段話確實有「意思無法傳達」、「表達出來的話語，他人無法理解」之意，但同時亦有「信念堅定，不受影響」的指涉，因此為了更忠實地回應約翰·彼德斯在書中的主要想法，評介者遂將其譯為《話語的摸索與尋繹：傳播觀念史》，以中性詞彙重新安排出彼德斯希望我們遭遇的美麗風景。

## 參考文獻

- 何道寬譯 (2003)。《交流的無奈：傳播思想史》。北京：華夏。(原書 Peters, J. D.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林靜伶 (2002) 〈編者的話〉, 《中華傳播學刊》, 1: ix - x。
- 夏春祥 (2002)。〈眾聲喧嘩的迷思——關於傳播研究的筆記〉, 《中華傳播學刊》, 1: 3-26。
- 賴盈滿譯 (2008)。《古騰堡星系：活版印刷人的造成》。臺北：貓頭鷹。(原書 McLuhan, M. [1962].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Bergman, M. (2008), The new wave of pragmatism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Nordicom Review*, 29(2), 135-153.
- Carey, J. W. (1988).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 Franklin, J. L. (2004). Mozart, Mesmer and Medicine, Chicago Literary Club. Retrieved December 6, 2011, from <http://www.chilit.org/Franklin1.htm>
- Google Books. (2011).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Reader's comments*. Retrieved December 2, 2011, from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KusFkCTWU1kC&sitesec=reviews&hl=zh-TW>
- Hobbs, S. D. (2001). Book review -- John Durham Peters's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History and Computing*, 4(1). Retrieved December 2, 2011, from <http://quod.lib.umich.edu/j/jahc/3310410.0004.122?rgn=main;view=fulltext>
- Kane, C. L., & Peters, J. D. (2010). Speaking into the iPhone: An interview with John Durham Peters, or, ghostly cessation for the digital a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4(2), 119-133.
- Lovejoy, A. O. (1936).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cQuail, D., & Windahl, S. (1993). *Communication models: For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London: Longman.

Peters, J. D. (2011). Curriculum vitae, University of Iowa. Retrieved November 6, 2011, from <http://www.uiowa.edu/~commstud/people/faculty/peters/peterscv2011.pdf>.

-- (2008). Institu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D. W. Park & J. Pooley (Eds.), *The histo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tested memories* (pp. 143-162). New York: Peter Lang.

--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6).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intellectual povert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3, 527-559.

Schramm, W. (1964).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63). *The science of human communication: New directions and new finding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54). How communication works. In W. Schramm (Ed.), *The processe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imonson, P. (2001). Varieties of pragmatism and communication: Visions and revisions from peirce to Peters. In D. K. Perry (Ed.), *American pragmat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1-26).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Theall, D. F. (2001). Review paper --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6: 413-424.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最接近又最遙遠的距離：評介約翰·杜罕彼德斯《交流的無奈：傳播的思想史》

The Closest but Furthest Distance: Comments on John D. Peters'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doi:10.6123/JCRP.2012.012

傳播研究與實踐, 2(1), 2012

作者/Author：張約翰(Yueh-Han Chang)

頁數/Page：223-23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23/JCRP.2012.01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最接近又最遙遠的距離：  
評介約翰·杜罕·彼德斯  
《交流的無奈：傳播的思想史》

**The Closest but Furthest Distance: Comments on  
John D. Peters'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張約翰<sup>\*,1</sup>

Chang, Yueh-Han

《臺灣立報》副總編輯

Editor in Chief, Lihpao Daily, Taipei, Taiwan

《交流的無奈》是一本談論傳播本質的奇書，個人是在修習世新傳研所博士班夏春祥副教授開設的課程「傳播史與哲學專題」時才有機會仔細閱讀。最初接觸這本書，尚未翻頁，就被原書名「*Speaking into the air*」深深吸引，腦海中浮現一片蒼茫大地上，一座巨大的天線向無垠宇宙發射電波，希望得到地外生命回應的畫面。待打開目錄一看，果然在第六章發現了外星人的踪跡；不過彼德斯是從談廣播的章節引文摘出這個書名，不是第六章，而且書名原文出自聖經，與外星人的關係只是筆者主觀的期待。

雖然本書是傳播學術著作，但彼德斯的論述卻幾乎不碰觸現有的傳播理論；他談論傳播的原始驅力，是從柏拉圖、聖經當中尋找，事實上書名即出自哥多林前書；他以黑格爾、馬克斯、齊克果論證媒體的本質與宿命；他以各種傳播方式與傳播媒體作為例證，無線電、電報、電話、郵件、廣播還在意料之中，動物磁力說（animal magnetism）、招魂術（spiritualism）、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動物溝通（communicate with animals）、地外生命搜尋計畫

---

\* Email: johann@lihpa.com

1 作者同時為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生。

(SETI)<sup>2</sup>，也被彼德斯用來說明傳播本質，就令人初閱匪夷所思，繼而拍案叫絕了；最後的結論以愛來比喻傳播的本質，已經跳出了我們慣常閱讀的傳播理論著作，實在是奇峰突出，無論如何難以想像。

## 壹、全書概觀

彼德斯此書以對話 (dialogue) 與撒播 (dissemination) 為起點，以柏拉圖《斐多篇》中的愛欲 (Eros) 論對話，以福音書的博愛 (agape) 論撒播，將兩者視為傳播本質的兩個原型，是傳播的第一組辯證關係——人總是渴求與另一個人的接近，又同時希望能與每一個能接觸到的人心靈相通，但這種渴望因為目標的數量、中介的影響，不可能全部實現。

初看之下，對話與撒播，很容易被熟知傳播學門演變者對號入座，以對話對應口語傳播，撒播對應大眾傳播。但彼德斯的意思並不是如此。他談對話與撒播，目的是為人類的傳播行為以及傳播媒體的演變尋找驅力。對話與撒播在各種媒體中體現，每一種媒體，不論發明的動機為何，其發展總是同時受到這兩股驅力的影響。這一點，在該書後面論及傳播媒體的章節中，可以得到印證。

接著彼德斯又藉福音書、天使學、以太與招魂術，論證傳播中靈魂與物質的關係：靈魂可以直接相通嗎？傳播有沒有可能達到完全的靈魂相通？不透過任何介質 (中介) 的傳播有可能存在嗎？中介又對傳播產生什麼影響？這裡是傳播的第二組辯證關係，靈魂 (訊息) 與物質 (中介/身體) 的關係。

由此，彼德斯在第三章談黑格爾、馬克斯及齊克果，對傳播的本體論作進一步思辨。黑格爾的主奴戲讓我們認識傳播中主體與客體彼此依存的關係，絕對精神論則提醒我們意義的存在不只在於主體的心靈中，更有一個外在的、公共的物質載體，承載著公共意義。馬克斯對貨幣的討論，可以讓我們思考承載意義的中介物本身是否也是意義的一部分。齊克果則通過晦澀的語言告訴我們，傳播的心領神會是不可能存在的，凡是能輕易出口的東西都在出口時失去傳播的價值。

於是彼德斯在第四、第五兩章，以對話與撒播、靈魂與中介，來看待近代出現的傳播工具，包括攝影、郵政、電報、無線電、電話、廣播、電視，甚至網路。這些媒體的發展過程，都體現了對話與撒播、靈魂與中介的辯證關係。

---

2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多個不同機構組織搜尋地外文明的行動。1896年，特斯拉 (Nikola Tesla, 特斯拉線圈發明人、電磁學家) 就曾表示，無線電可以用來搜尋地外文明。康乃爾大學 1960年啟動歐茲瑪計劃 (Project Ozma)，蘇聯亦於 1960年代著手接收無線電訊號。現在則有柏克萊加大在加州帽溪的「艾倫望遠鏡陣列」 (Allen Telescope Array)，還有 SETI@home，鼓吹網友提供電腦的閒置時間供分析無線電訊號之用 (2011年4月因經費問題暫停，2011年12月部分恢復)。

傳播工具（中介）的發展，使身體缺席的傳播更加頻繁，然而人對與他者接觸的渴求卻又試圖拉扯、影響造成身體缺席的傳播中介。因此，經過前幾章的討論，彼德斯再進一步，以他認為極端的傳播形式——與機器、動物、外星人的傳播——來看待新科技對傳播本質的影響，或說這些極端的例子是否也能體現傳播的兩組辯證。

最後，彼德斯總算較為明白的點出：交流的隔閡總是存在的。我們試圖傳達給對方的訊息，永遠不會是原來的模樣。「交流是沒有保證的冒險。」（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251）在交流中追求滿足是白花力氣。交流的目的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對方。不論傳播工具如果發達，人的交流能力還是有侷限的，這個侷限包含了空間與時間。而時間與空間之所以成為障壁，是因為彼德斯認為身體親臨現場才是跨越人與人鴻溝的保證，然而我們的生命有限，一如我們的愛無法平等的給每一個人類，我們的交流也只能限縮在有限的範圍內。

## 貳、是誰在說話？——以廣播為例，看傳播媒體的演進

這就是向空說話了。（欽定本聖經哥林多前書 14:9）<sup>3</sup>

當今，人類的生活環境中，瀰漫各種為傳播而發射的無線電波。每一道電波都承載著訊息，只看你有沒有耳朵去聽，有沒有眼睛去看；在電訊科技較為發達的地區，甚至人人都在發射電波——手機（無論有沒有「智慧」）、平板電腦、衛星導航——而不止是接收者。

彼德斯在第五章介紹廣播（收音機）時，引了聖經「向空說話」這句話為開場，並進一步摘為書名，筆者認為是因為這一章最能體現彼德斯對於傳播本質的看法。彼德斯認為人與人的交流不可能向天使一般的心領神會、互通無礙；相對的，不論是面對面透過話語交流、還是通過各種媒體的傳播，尋求身體的接近，以及向盡可能多的對象交流這兩種驅力，同時影響廣播媒體的走向。

廣播的出現，是在無線電通訊成為可能之後。無線電通訊最早的應用是電報，電波承載的是長短音組合而成的電碼；在進展到調幅廣播，能以電波承載音樂和聲音後，無線電廣播成為可能。無線電通訊有兩種形式：一對一或小群體間

3 原文所引「For you shall speaking into the air」出自詹姆士國王欽定本英語聖經，中譯則出自華人最普遍使用的和合本。

的雙向通訊，以及一對多的單向大眾廣播。彼德斯的對話與撒播，同時體現在無線電廣播上。

筆者服役時，擔任的職務是無線電報務士及通信排副排長，專門負責收發無線電報及營指揮部的無線電話務。在守電臺的寂聊長夜中，也曾像業餘無線電玩家一般，試著調整頻率捕捉空中漫射的電波，還真的恰巧聽到營區附近民家無線電話傳來的情侶對話。

真正業餘無線電玩家的通訊，是沒有特定對象的，而是漫無目的的發出電波，期待有人能恰巧對上頻率，與遙遠陌生的對象進行通話，甚至以儘可能拓展通訊距離為目標。彼德斯認為，業餘無線電玩家將無線電通訊視為公共論壇，人人可以自由參加，玩家的身分並不重要。無線電能撮合的是靈魂的接近，身體的距離愈遠愈好。無線電波漫無目的的撒播，最後達到的是對話，而這種對話是身體缺席的對話。彼德斯這麼說：

無線電有一種奇怪的能力，像電話一樣，它可以使說話人和聽話人接觸，兩者卻不必在場，也不必互相認識。……無線電可以衝破空間、時間和聽覺距離的侷限……（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195）。

彼德斯認為，無線電通訊成為大眾傳播工具，是薩諾夫（David Sarnoff）的功勞，他日後成為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總裁，薩諾夫將無線電廣播作為銷售收音機的推力，把無線電描繪成進入每個家庭的音樂盒子，當時他還沒發現廣告是更有力的利潤來源。薩諾夫將無線電可以針對數量龐大的看不見的聽眾說話，視為無線電的特長，而不是缺點。

無線電通訊進入商業時代後，成為大眾媒體。至此，廣播的撒播特性，與業餘無線電尋求的對話目的脫離。早期的商業電臺向無數不知名的聽眾播放，聽眾則不知聲音的主人，因為商業電臺為避免播音人員抬高身價，要求的是制式的低沉嗓音。

然而，這種身體缺席的接觸，與人類尋求身體接近的驅力產生抵觸。彼德斯說：

讓主流社會接受無線電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要把距離、無形之象和廣播之間的鴻溝填平（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195）。

這種身體不在場的交流，會產生焦慮。彼德斯認為，如何安撫這種焦慮，成為廣播業的重要課題。於是：

他們設計出新型的比較散漫的談話，以彌補廣播媒介的結構缺陷。目的只有一個：恢復失去的親臨現場的感覺（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197）。

廣播業者不再將聽眾視為無面目的大眾，而是有血有肉的對象。播音員使用親切的聊天語氣，彷彿面對面談話，氣聲、鬥嘴、閱讀來信……甚至假裝從看不見的聽眾那裡得到反饋，用各種技巧邀請聽眾想像進入廣播人和聽眾共組的世界。時至今日，這些技巧我們已經非常熟悉，包括彼德斯未提及的叩應（call-in）形式——甚至有節目讓聽眾叩應進現場唱歌。一切都為了填平身體缺席造成的鴻溝。

但不論如何模擬人與人的互動，彼德斯認為人與人身體的互動關係是無法完全恢復的。不安不可能永遠壓制住。在精心打造的親切外表下，總潛伏著鴻溝引起的寂寞。無線電通訊猶如與遙遠的靈魂——包括亡靈——對話，現場直播（live）就是為了打破死亡和距離之間的紐帶。廣播傳播的不再只是過去的紀錄，它可以同步傳播「活生生」的材料。但即便是羅斯福的爐邊談話再怎樣讓聽眾覺得他就坐在你家的壁爐旁，畢竟都是一種姿態，一種讓你以為他只對著你說話的對話姿態，實際上，他根本不知道你是誰，你此刻的苦惱與歡喜，你的表情與姿態。

身體與身體渴望互相接近，然而若擴及世人，彼德斯認為，這種民主的愛欲，既廣博又密切的接觸，是不可能的，與社會秩序的要求相衝突。一對一的二重交流形式由於技術延伸而達到很大的規模後，媒介的侷限性又會回過頭來報復我們。不論記錄與傳輸的技術再如何進步，我們並不因此而更加幸福。我們一直在媒介的演進中掙扎於身體與靈魂的貼近與鴻溝。

從彼德斯對一般被視為大眾媒體的廣播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愛欲與博愛、對話與撒播、靈魂與物質在單一媒體演進中的辯證角色，彼此相互糾纏。是以筆者才會認為，將對話與撒播視為單純的口語傳播與大眾傳播的對映，是誤解了彼德斯。

## 參、寂寞與不寂寞——用彼德斯之眼看臉書

大眾傳播理論的政治問題使人看到，媒介造成的社區是可能的。問題是，你的血肉之軀不在場的時候，你能夠參與嗎？可不可以說，聽眾參與了遙遠的事件呢（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204）？

藉由廣播，我們可以看到人與人之間互相接近的渴望如何影響、驅動媒體的演進。商業廣播畢竟是一對多的傳播媒體，接收的一方反向參與的程度不成比例。《交流的無奈》1999年出版，正是網際網路剛剛興起的年代，當時儘管已有電子郵件、電子布告欄，然而前者的交流對象限於現實社會中既有的人際網路，而後者則是匿名的虛擬社群。

進入 21 世紀，我們有了社群網站，佼佼者首推臉書。臉書原名「Facebook」指的是學校、機構發給成員附有所有成員大頭照、姓名與聯絡方式的通訊冊，2004 年 2 月，尚在哈佛就讀的馬克·祖克伯（Mark Zuckerberg）創辦了「The Facebook」，成為美國大學生在校內、校際之間互相交往的管道。2006 年 9 月，臉書對具有有效電郵帳號的全部網路使用者開放，至 2010 年 7 月，全球的活躍使用者超過六億。在臺灣，臉書於 2009 年底擁有超過五百萬用戶，成為第一大社交網站。（維基百科，n.d.；蔣昕，2010）

臉書有幾項特色，體現了它既能貼近人與人之間互相靠近的需求，儘可能彌平人類透過中介交流時身體難以接近的鴻溝，又能公開地、民主地滿足彼德斯在本書第六章末以海豚為例所說「人人都說話，人人都聆聽」（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243）的多邊對話需求。

首先，臉書是實名制的網站，要求使用者以真實姓名註冊，與一般網站傳統的匿名特性相反；同時，使用者基本資料頁面列入了「感情狀態」、人際網絡（例如就讀校系、居住地、工作地）等欄位，顯示臉書作為交流的中介，十分重視使用者現實生活中的人際網絡；使用者之間還能列出友誼關係網（共同的朋友、粉絲頁、應用程式）。關係，就是人與人之間互相接觸的管道，也是臉書擴展使用者時的重要依靠。

其次，臉書讓使用者的身體形式具體化，製造交流中的身體替代品。臉書是多媒體的社群網站，除了文字，使用者可以分享照片、影片，並在照片、影片中標籤（tag）自己或朋友；同時，在臉書上，使用者的名字幾乎總是伴隨著大頭

貼照。個人資料當然不用說，塗牆上的留言、應用程式中的其他朋友、通知頁面的設計，都儘可能讓使用者名字與大頭貼照同時出現。

然而臉書不僅試圖填平使用者交流時身體缺席的鴻溝，它也同時試圖滿足使用者能同時與多數人交流、向特定或不特定多數人公開發聲的需求。

臉書的訊息與聊天室功能，都容許使用者不只一對一，還能一對多、多對多的群聊。使用者在塗鴉牆上的任何分享，包括相簿、連結、近況動態，甚至個人基本資料更新、應用程式使用狀態、生日，在隱私設定的功能下，可以只對特定個人、對所有書友、對書友的書友公開，甚至完全不設放的公開；塗鴉牆右上角的輪播牆還能即時顯示書友在臉書上的任何動態。

彼德斯在本書揭示人類傳播的兩種原始驅力，是渴望身體接近的愛欲，以及渴望公開發聲的博愛。臉書的功能設定，看起來同時滿足了這兩者。然而我們必須留意，臉書現有的功能是上線8年以來不斷彈性調整的結果。最原始的臉書，是由實際人際網絡出發，進一步追求彌平交流中身體缺席的焦慮，於是有了相簿、影片、標籤等功能。我們必需留意，這一切的功能，都無法真正代替身體。

使用者在臉書上的自我呈現，其實都不脫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戲劇理論（Dramaturgical Theory）（參見蔣昕，2010）。使用者呈現出來的自我，與在臉書之外其他舞臺的自我，並不是完全相等的兩個實體，前者只不過是使用者扮演的角色之一。可以說，我們是在臉書上塑造出一個角色做為代理人，透過它與其他使用者的代理人交流。這個代理人其實並不真正具有身體，它的身體是經由使用者的挑選而呈現在臉書上。

其次，作為傳播媒體，臉書上一樣呈現出霸凌、沉默螺旋等效應。多邊發聲，多邊聆聽，透過臉書的隱私設定與封鎖功能，理論上不是不可能實現，然而隱私設定的設計總有缺漏，而且有操作上的技術門檻，使用者未必能無所顧慮的享受人人公開展演的民主交流。

臉書一如廣播，印證了彼德斯對人類傳播本質的看法——交流的渴望總是存在，人們尋求身體的接近，同時又希望心靈相通，這些期望會同時體現在交流的中介（媒體）上。我們在最遙遠的距離希望交流我們的身體，又在最接近的距離希望交流我們的靈魂，而媒體則試圖滿足這永遠無法滿足的相悖的渴望。

## 肆、補遺

書名中譯本被譯為「交流的無奈」，其實是譯者何道寬對本書中彼德斯觀點的詮釋。「無奈」之發生，必定為某種主觀期待落空，事與願違，方為無奈；然

而筆者以為，彼德斯在本書中對傳播本質的看法，並沒有什麼「無奈」，純粹就本質談本質；向空說話究竟無奈與否，是應該留給讀者去判斷的，按彼德斯在本書的理路，並不會越俎代庖，替讀者描繪讀者的感覺。因此筆者認為，直接以聖經合和本林前 14:9 所譯「向空說話」，是比較恰當的。

本文既為書介，仍然以已出版的中譯本書名為準，免得讀者混淆，但中譯書名的問題讀者不可不留意。

## 參考文獻

何道寬譯（2003）。《交流的無奈：傳播思想史》。北京：華夏。（原書 Peters, J. D.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蔣昕（2010）。《臉書上的一張臉譜：社交網站上的劃界與展演》。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維基百科（n.d.）。〈「Facebook」條目〉，《維基百科》。上網日期：2012 年 1 月 25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Facebook>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從愛慾與身體出發：在《交流的無奈》中探尋傳播本質

On Eros and Body: Looking for the Nature of Communication from Speaking into the Air

doi:10.6123/JCRP.2012.013

傳播研究與實踐, 2(1), 2012

作者/Author：陳柏程(Po-Cheng Chen)

頁數/Page：231-24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23/JCRP.2012.01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從愛慾與身體出發： 在《交流的無奈》<sup>1</sup> 中探尋傳播本質

## On Eros and Body: Looking for the Nature of Communication from *Speaking into the Air*

陳柏程\*

Chen, Po-Cheng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生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壹、前言

傳播作為一個學門 (discipline)，卻常被批判太過於分裂、以及缺乏一個核心理論概念。奎格 (Craig, 1993) 則認為由於科學與人文中界線已經不再明確，導致於傳播「理論眾多」(源自「理論作為一種論述」[theory as discourse] 與「理論作為一種知識」[theory as knowledge] 兩者間不夠清晰，因而讓理論一事更加令人苦惱)，奎格建議從事理論建構的過程中，應從美學、道德、政治等的價值來評斷理論，因而理論不僅僅是一種知識，還必須肩負著社會實踐的責任。

傳播學門一直以來有一部分建立在實用主義 (或指向實證主義) 上看待學門中的研究方法，導致於在追求理論的建構過程中，我們成就了一種「社會科學」的「類科學」，研究傳播的學者凱斯米爾 (Casmir, 1994)<sup>2</sup> 不只要令理論能夠建構

---

\* Email: Titan7729@gmail.com

- 1 彼德斯 (John Peters) 原書名為 *Speaking into the air*，大陸譯本書名為《交流的無奈》(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 2003)，譯本中的翻譯雖有待商榷，但在文藻的使用上仍具文化親近性的價值。本文建立在何道寬先生譯本進行評析，但仍編上原文頁碼，供讀者對照；若有文字歧異，請以原文為準。另外，何道寬先生在譯本中所使用「交流」一詞即為「傳播」(communication) 之意，為求閱讀脈絡順暢，書評中皆統一替換為「傳播」一詞，在此特別註明。最後，筆者認為《交流的無奈》之譯名確實彰顯出彼德斯之獨特用心，因此本書評仍使用《交流的無奈》作為該書譯名。
- 2 凱斯米爾 (Fred L Casmir) 認為，一個好的傳播理論，能清楚地讓我們認識世界，同時這樣的經驗，能夠適用社會、歷史、文化環境等，並能實際應用與實踐。因此理論的建構，必然要透過科學的程序才能得以組織個人的經驗、獲取一套具有一致性解釋的理論。

意義 (Sense-making)、它還要是能夠下放至人類生活之中，產生象徵 (figure)、配置 (configuration) 的能量。早期，我們用了科學典範的方法來作為我們建立理論以及學門的工具，筆者相信這是 (稍) 後期的研究者感到苦惱的根源之一，理論非要科學化嗎？還是理論中必定夾著科學？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假若科學跟理論抽離，那麼傳播理論還能不能是傳播理論？傳播成了甚麼？為此，學門中爭議不斷，更分割出不同派系。

然，2011 年 11 月 4 日，筆者參與了彼德斯 (John Peters) 來臺演講，他提點了筆者過去看待傳播的思維邏輯。甫開始彼德斯直接以海豚團體的傳播行為 (嚴格說來是傳遞訊息的方式)，作為一種傳播境界的最高理想 (其著作中還有天使的大愛撒播)。然在彼德斯的「天書」——《交流的無奈》(*Speaking into the air*) 中，彼德斯考究了西方哲人們的思想與歷史，藉此描繪出他所認為傳播的理想樣貌，最終得出傳播一事的無奈之意。

之所以稱為天書，主要在於該書中引用了太多的西方經典，在毫無背景脈絡下，華人必然看得一知半解，更遑論從中得知彼德斯在該書中所要傳遞的訊息。

彼德斯書中領域甚廣、森羅萬象，連靈媒都成了探究傳播的一種介質。為了快速地進入與該書對話，筆者簡化地探究彼德斯在該書中所要陳述、貫穿全文的兩個要旨，即對話 (Dialogue) 與撒播 (Dissemination) 兩者之間的爭議。從第一章起，彼德斯先引了柏拉圖在《斐德羅篇》(Phaedrus)<sup>3</sup> 中的對話故事，在這則小故事中，所要表達的意涵即：「交流必須是心靈和心靈的對接，要在有形體的人之間進行，在親近的互動中進行，交流必須要適合參與交流的每個人……」(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41；Peters, 1999: 47)，因此彼德斯所指出的，一個「有機會」進行傳播、成為成功的傳播、並在對談中讓對方了悟其所要表達的事物，其中一個前提即為「在場」(presence) 的肉身存在才得以實踐；而撒播的概念，彼德斯所引用的乃是《對觀福音書》(synoptic gospels)<sup>4</sup> 中的說法，撒播寓言的前提在於寓言的特徵：傳輸的統一性與接收的多樣性 (uniformity in transmission and diversity in reception) (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45；Peters, 1999: 52)，這裡指的是一種單向傳播的概念，而接收者各自會接收到不同的訊息。這兩個概念造成本書全文的辯證。其論證主要在於，柏拉圖式的對話乃是一種理想的傳播情境與狀況，藉由面對面的傳遞訊息，加上彼此能接收愛

3 中譯版何道寬先生將 Phaedrus 譯為《斐多篇》，但華人社群多以《斐多篇》作為 Phaedo 之翻譯，本處須特別提出，Phaedrus 應翻為《斐德羅篇》較為恰當。

4 Synoptic Gospels 另還有符類福音、福音書總論等等的中譯。

慾<sup>5</sup> (Eros) 的能力，因而達到完整地訊息傳遞；然而，撒播的概念造成了我們對於中介的一種進步的慾望，人們開始希冀藉由撒播的過程裡，同樣地達到面對面傳遞訊息的可能性，因而持續地讓傳播科技發展，文字、信、廣播、電視、網路等等。兩造的辯證成立了其書後面的篇章，如生者與死者、電話（筒）與廣播、不可交流的動物與外星人等等。然而對彼德斯而言，人要達到真正的傳播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所分析中的結論是如此，因而有所謂「傳播的無奈」），因為「傳播是無法進行保證的」（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251；Peters, 1999: 267）。傳播的過程充斥了太多的不確定性，誠如彼德斯利用海豚作為一種完滿傳播的說法，在他的書中「……除了天使與海豚得到救贖的情況之外我們無法擺脫交往目的的束縛」（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252；Peters, 1999: 268）。

回過頭來問，那麼，若以彼德斯書中的結論，那麼我們可以接著追問，究竟何為完美的傳播？彼德斯在最後結論留下了一個無奈的伏筆，即回到人的身體、並獲取其在場性，他用了觸覺（Touch）與時間（Time）做了本書的結尾。他說得再明白不過：「認為傳播是真實思想的結合，那是低估了身體的神聖……觸覺是人類最古老的感官，也許是最難得偽造的感官……到場的追求未必使你進入對方的心靈本身，然而它的確可以使你接觸對方的身體……沒甚麼東西能夠像觸覺那樣給人……難以駕馭」（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254；Peters, 1999: 270），「……觸碰與時間，這兩個我們可以共享但不能再生的東西，是我們真誠的唯一保證……然而時間只允許每個人真正地關愛地球上為數不多的居民，終其一生，每個人只不過有時間給少數幾個人以關愛 ... 我們直接面對的是，我們有限的生命既神聖又悲哀」（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225；Peters, 1999: 270-271）。因此，彼德斯指出傳播的無奈，乃是人們既又想傳遞出自身、又要令接收者一絲不漏地收到訊息；既想利用撒播的傳播科技來塑造在場的形象，好得以讓訊息完整、卻又因撒播的形式缺乏身體的在場，導致兩造雙方最真誠的傳播失去效用。

在這本書裡，傳播確實無奈，因為彼德斯寫出科技的矛盾、寫出人慾望的進退維谷、寫出人在不可能中所希望創造的卑微可能。當然，我們都能理解所謂無奈的提出，必然是希望後進能夠找出更實用的方式填補這個「無奈」。如此，

5 Eros 源自於希臘神話中的愛神之名。多譯為愛慾，特別要注意的是，Eros 在彼德斯的書中並非直接單一指涉性、愛或者慾望，而是一種生命的本能（life instinct），此概念與佛洛伊德（Frued）在精神分析中的使用類似。

airiti

假若我們都將無奈地傳遞訊息、然後等待死信的無窮無盡，豈不將傳播學門給說死了？這世界難道真如彼德斯所謂僅有天使與海豚的傳遞，才是一種完美的傳播形式？

有沒有甚麼是我們在彼德斯書中所遺漏掉的事物？彼德斯一方面將傳播做了定調、另一面則又留給讀者太多遐想的空間。讓我們回到柏拉圖的《斐德羅篇》中的解釋，對柏拉圖（蘇格拉底）而言，對話當中除了身體在場、以及另一重要的元素——愛慾（Eros），透過交談的在場過程、傳遞著彼此無限的愛慾，這才是最完整的傳播。然而我們可以試著將愛慾推展開來，提升它的層次，不只讓它停在愛慾的意義上，而是誠如所謂傳播過程中的乙太（ether）一般，無限數量並蔓延在空氣之中，讓溝通兩造雙方都能獲得相同品質的訊息內容。也就是說，當人們希望藉由撒播的形式傳遞訊息，事實上就是希望藉由傳遞的過程中，能夠獲得也撒播出愛慾的雙向效果。

## 貳、視愛慾為傳播動力的本質

在彼德斯著作的第 5 章中，為了回應該章節 *hoc est corpus, hocus-pocus*<sup>6</sup>（這是我的身體，虛假的身體）<sup>7</sup>，佛洛伊德的名書《文明與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在此被引用：「『性愛是兩個個體的關係，第三者是多餘的或令人不安的，相反，文明則是依靠很多人的關係』……他認為，文明的藥物必然是把個體、家庭、國家與種族扭結成更大規模的原慾（libido）<sup>8</sup>單位。它所要說的要害是，真正民主的愛慾是不可能的」（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200；Peters, 1999: 219）。彼德斯在此引用的佛氏內容，雖然為的是處理對話（個體對個體）與撒播（個體對多人）的說明，但事實上更為吸引人的部分，乃是將佛氏的原慾與柏拉圖所謂的愛慾對照後所獲得的訊息。

6 *hoc est corpus* 為了紀念耶穌、以麵包為聖體時所說「這是我的身體」，而後被引為 *hocus-pocus* 則是虛假之意。

7 本章節彼德斯處理的問題在於人們冀望傳播科技能夠確實地傳遞「面對面的在場對話」，因而進入處理廣播這個科技議題。廣播以一種同步（live）的真實撒播至彼端，創造出在場的假象，因而彼德斯更進一步地為法蘭克福學者阿多諾（Adorno）補充，說明閱聽眾在與廣播互動的過程中，被削弱了自身的能動性（因為相信廣播那端是活生生的人「在場」互動，補償了撒播不在場的缺憾），進一步地習慣了這種虛假身體真實的存在。因此中譯本將其譯為「這是我的身體，虛假的身體」，確切地表達出彼德斯闡釋「在場又不在場」的矛盾之意。

8 原慾（libido）又被稱為利比多。

柏拉圖的愛慾是屬於一種純粹之愛（內省的愛，當然有參雜性慾的成分）的總合，涵括性慾的；然對於佛氏來說（筆者認為，佛氏的內容乃是彼德斯未細緻比較的部分），原慾、愛慾、愛（love）是三個不同層級的爱慾：原慾是純粹之性慾單位、愛慾則是人類文明的起源（與 Ananke，必然性、需要之意，是佛氏認為人類文明之必要的兩大條件）(Frued & Strachey, 1930/1961: 19)；而所謂的爱（love），則是更高層級、所延伸出的親屬關係，如親情。對佛氏來說，人類終其一生受性慾的驅力催動，因而成為壓抑的動物。誠如馬庫斯 (Marcuse, 1955) 在評論佛氏該書時所認為，佛氏該書的論點旨在說明文明壓抑個人內在、人類必須持續尋求這種趨力的平衡點，同時發展出追求愛慾的存在（追求與平衡成為循環關係）。馬庫斯利用佛氏該書來說明文明壓抑的過程，作為資本主義壓迫個人解放的論述。馬庫斯指出，愛慾與掌管死亡的神祇——Thanatos 兩者相互爭戰，構成人矛盾與自我衝突的原因。死亡也是驅力的一種並且被包含在愛慾之中。

佛氏在其精神分析認為人有3個我：本我（id）、自我（ego）以及超我（super ego）。本我的概念即為本能與原慾，所謂的本能所指的為「生命本能」（life instincts，即為愛慾）以及毀滅性的「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s），以及驅使這兩者的最初「驅力」——原慾。而超我則是道德與社會化下的產物，自我則是負責平衡本我以及超我，而得到一個綜合平衡的我。本我會因為壓抑的關係，隱藏於潛意識之中。生命本能是為了生命延續所進行的一種本能；相對於生命本能的死之本能（death instincts），佛氏認為，所有的生物都會衰弱和死亡，返回他們原始的非生命狀態，佛氏假設，人都會有種希望死亡的潛意識存在。

再向下爬梳，以佛氏的論述而言，人（被壓抑的）潛意識裡所涵蓋的是向著死亡的「驅力」，這樣的驅力被稱之為本能，它鋪天蓋地地存在於潛意識以及反射動作之中。再者，從佛氏對於人會遺忘事物的觀點來說明，遺忘事件中的「被遺忘之物」、與夢境所呈現的「不可解釋之物」，那些未被明朗化呈現之處，也就是「真實」之處，因此向死亡的驅力亦存在此處。回過頭來說，佛氏的說法也再次地與海德格<sup>9</sup>的說法相互輝映，「向死亡的驅力」是被我們日常生活活動所

9 「日常共處的公眾意見把死亡『認識』作不斷擺到眼前的事件，即『死亡事件』。這個或那個親近的人或疏遠的人『死了』。每日每時都有不相識的人們『死著』。『死亡』作為熟知的、世內擺到眼前的事件來照面。……常人對這類事件也已經備好了一種解釋。對此道出的話以及多半是有所保留的『躲躲閃閃』的話都像是在說：人終有一死，但自己當下還沒碰上」（Heidegger, 1927 / 王慶節、陳嘉映譯，2002：340；Heidegger, 1927: 253）。海德格認為，人終有一死在日常生活大眾所皆知的，但是我們並沒有辦法「真的死」，所以他用了「懸臨」（Bevorstand）這個詞，表示死亡與其他現成物「懸欠」的差異。然而，我們並沒有辦法真的死去，但是，死亡這件事情藉由發生在其他常人身上卻是這麼的清晰可見，為了防堵此在的「死」，於是此在面臨常人的死亡時，會利用一些方式，讓此在逃開死亡：「……『最親近的人們』恰恰還經常勸『臨終者』相

掩蓋住的「被遺忘之處」。因此，我們在檢視愛慾一事時，應能更全觀地探究這樣的「生命本能」，筆者在這裡將愛慾的層次推展開來，為的是說明愛慾的流動過程中，人所接收與撒播出的傳播、不會侷限於我們所感知的一切，愛慾的本真性（authenticity）讓傳播的本質更具備其完整性（totality）。

回到馬庫斯，由「性（sexuality）轉化至愛慾、人們的本能發展了他們感官……生活本能的必要性……與此相反，……越是去滿足本能所需的自由理性而更為自覺地努力，就能減少那些壓迫重疊於理性之上的副作用... 為了獲得長久的滿足。不僅逐漸擴大原慾（libido）規模的系譜（社群，community）、同時也為了這個規則進行更高的延續……愛慾（Eros）以他們自身的方式重新地定義（Eros redefines reason in his own terms）」（Marcuse, 1955: 224-225）。

是此，愛慾（Eros）被推展開來之後，它不僅是慾望的、它同時還參雜了嚴肅的死亡與自身存在的可能性，Eros 是人類努力在空氣之中企圖捕捉住的概念，並將其視為那些看不見、在空氣中蔓延的乙太。回到彼德斯在對話與撒播的衝突裡，他看見了愛慾在傳播端與接收端的存在，只是對彼德斯而言，他看到的是對話與撒播兩者融合的不可能性，才會在最後一章以身體、觸覺作為傳播的「真誠的保證」，然後以因觸覺無法撒播（人終其一生時間有限），作為傳播的無奈之因。

## 參、身體，不應只有觸覺

觸覺之所以可貴，是因為能夠與另一個人實質地相擁。彼德斯獨尊觸覺，乃是源自於觸覺與其他感官的不同：「在所有感官之中……觸覺不會被轉換成紀錄或傳輸的工具……」（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253；Peters, 1999: 269）因而搭配時間所構成的唯一當下、肉身在場等，這些先決條件讓觸覺占盡了天時地利（如彼德斯引用奧德修斯所展示身體那些最私密的故事，來向妻子證明自己

---

信他將逃脫死亡，不久將重返他所煩忙的世界的安定的日常生活。這種『煩神』幫著他更充分地掩藏他的最本己的，無所關連的存在可能性，想通過這種辦法把他帶回此在。常人就以這種方式為提供對死亡的持續的安定而煩忙」（Heidegger, 1927 / 王慶節、陳嘉映譯，2002：340-341；Heidegger, 1927: 253-254）。似乎為了避免死亡的通過此在，人們藉由一些方式作為「沈淪逃遁」死亡，我們似乎都知道死亡這件事，但是不想承認死亡它正被我們「踩在腳下」，隨時都有可能發生，而對海德格而言，踩在死亡之上，如履薄冰的前進，那才能將懸臨的部分納回入此在本身，也就是最本己（本真）的死亡狀態：「……死亡隨時隨刻都是可能的……死亡作為此在的終結乃是此在最本己的、無所關連的、確知的、而作為其本身則不確定的、超不過的可能性。死亡作為此在的終結存在存在這一存在者向其終結的存在之中」（Heidegger, 1927 / 王慶節、陳嘉映譯，2002：346-347；Heidegger, 1927: 258-259）。取得自身的死亡，取得此在前往終結（完整）的可能性，這便是海德格所意味著的「將死亡隨時踩在腳下」的狀態。（註：粗體為原文所加）

已經回來了)。猶如在梅洛龐帝所認為的，觸覺就以做為一種「雙重感覺」作為五感中的突顯。在這裡，觸覺不僅是實質的「觸摸」，更進一步昇華至心靈（意識）層面的相互交融<sup>10</sup>。

不過這樣的說法造成了破綻，我們將觸覺從五感獨立出來，樹立了它的尊崇性，反而破壞了身體其他感官應有的感受能力，是否人其他的感官感受都次於觸覺呢？

如果試著以戴爾 (Dyer, 1993)<sup>11</sup> 所說的身體藉由展露（主體的實踐），讓觀者藉由視覺、產生象徵主體性慾的可能，「同時」又召喚了觀者的情慾：

不論男性或女性，在色情以外的性慾，多半是以象徵方式而不是直接地表現出來的。這並不只是因為媒體審查制度的緣故，而是整體而言，當性慾經由象徵手法來表現時，會有較佳的呈現。顏色、質地、物體、光的影響、事物的形狀，都是經由召喚、回響和聯想來傳達出性慾；這些象徵較能夠指涉出性究竟為何的感覺，而不僅是展現性行為。色情也是使用象徵方式的手法，建構它所展示的特定感官。重要的是，性欲如何象徵化、這些手法如何喚起性慾知覺的感官，以及這些手法如何造成特定的性慾 (Dyer, 1993: 90)。

因此借用戴爾的觀點，讀者們可以先將身體實踐的愛慾意義定義為是透過象徵意涵（利用視覺接收）所獲取的。儘管與彼德斯大相逕庭，但在檢視身體實踐的能動之時，身體不應是被拆分為 A 感官、B 感官，它必須是整體的，因此我們應該是如海德格所謂的「綻出」（Ekstase），來取得身體的整體性（totality）：

領會首要地奠基於將來（先行與期備）。現身情態首要地在曾在狀態（重演與遺忘）中到時。沈淪在時間上首要地植根於當前（當前化與眼下）。然而領會也是向來「曾在」的當前；現身情態也作為「當前化的」將來到時；當前也從一種曾在的將來「發源」和「跳開」，並

10 梅洛龐帝 (Merleau-Ponty, 1945)，參考自黃冠閔 (2009) 〈觸覺中的身體主體性——梅洛龐蒂與昂希〉一文。

11 戴爾 (Richard Dyer) 主要針對 60 年代以降的電影、影視（包含廣告）明星進行了研究，並且延伸到閱聽人閱讀影像文本（也可直白地說明星做為一種符號的解讀）後所產生的影響，同時連結了性別與文化的概念，因此建構了一套特殊的影像解構策略。其著名著作《明星》(Stars) 常做為解讀電影時的經典文本。

且由曾在的將來所保持。在這裡就可以看到：時間性在每一種綻出樣式中都整體地到時，即生存、實際性與沈淪的結構整體的整體性——也就是說，煩之結構的統一，奠基於時間性當下完整到時的綻出統一性之中（Heidegger, 1927 / 王慶節、陳嘉映譯，2002：462；Heidegger, 1927: 350）。

在海德格的時間性觀點中，時間性構連了整個此在（Dasein）存在於世的環節，也就是說，時間性不同於傳統哲學獨立於人之外的時間，時間自行由前到後的消逝流動。相反的，海德格對時間性的分析，是認為過去、現在、未來3「點」同時在一點上呈現，海德格用了「綻出」（Ekstase）這個詞彙，作為對時間性的一個相當完美的理解：就像花朵在綻放時一般，不能說哪片花瓣先，哪片花瓣後，是一同「綻出」的。對應了彼德斯的說法並回推到身體實踐的意義上，我們無需獨尊觸覺，而應保留身體所有感官的完整性質。（一如對於身體感官的看法，可以用綻出的概念來理解，身體是同時的、並非片段知覺、觸覺的應用。）

重新彙整目前的理路來掌握一些概念的轉折。由西方古哲人所認為，我們要完整地獲得另一端所傳遞的訊息，必須掌握漫遊在空氣中的愛慾、接著人們創造傳播科技、希冀藉由工具來進行撒播愛慾的動作，而又由於失去了身體（觸覺）的在場，所以傳播沒有辦法完整地傳遞訊息，因而造成一種傳播無奈的現象。在此筆者先確立了愛慾多層次的重要性質。

為了再次強調身體其它感官並不亞於觸覺，學者韓德曼 (Handelman, 2003) 提出了有趣的觀點來補充無須獨尊觸覺的看法。他提出虛擬邂逅 (virtual encounter) 的概念，認為這是具備一種身體實踐能動、且並不專屬於觸覺所有，而是透過視覺來讓整體的感官能共同獲得相同的感知。韓德曼認為在收看電視時，會透過：第一、視覺凝視 (aptic gaze, 將電視螢幕視為一種具體的再現表層 [dimensional surface of representation]。它是淺嘗輒止的。)；第二、觸覺凝視 (haptic gaze, 意指通過觸覺、觀眾得以刺穿節目內的人事物之輪廓、並深入內部)；其三、虛擬凝視 (virtual gaze: 觸覺凝視瀕臨虛擬的邊緣，更接近一種虛擬凝視。如果說觸覺凝視創造了現實的深度、那麼虛擬凝視就意味著想像 [imaginary] 的深度。)（同上引：144），透過三種層次的凝視，讓接收端達到另一種層次的感官感受，意即所謂的虛擬邂逅，乃是透過視覺的凝視進一步地感受到其他感官的知覺，這都補充了彼德斯獨樹觸覺的看法。

## 肆、溝通的焦慮

在《交流的無奈》一書後半，彼德斯為了考證對話與撒播是否能不負眾望、完成傳遞愛慾的重責大任，開始對傳播科技進行考究：書信、靈媒、無線電；再進一步看見人類希冀與外星人（以及其他非人類的動物）進行溝通，甚至在太空中發射了一堆可笑的符號，他這麼說：

賦予一切靈魂令人驚嘆卻又難以理解的內在性……最多也就是一種民主而已。真正的民主應該比人類範圍更廣闊的靈魂，因為人本身就是多種意義上的生物。完全的民主應跨越物種、種族、地區、年齡，應該超越人類……即使死者也該進入應邀之列（Peters, 1999 / 何道寬譯，2003：242；Peters, 1999: 259-263）。

這段看見人類希望跨越界線，能夠將溝通與傳播無止境的延伸、對話與撒播的層次被提高了，一種地球村式的概念潛藏在其中。

在彼德斯這兒，讀者看到的不僅是傳播的無奈，更多的視野是指向多倫多學派那些對傳播科技發展的焦慮（當然殷尼斯 [Innis] 與麥克魯漢 [McLuhan] 讓我們看到的重點不應只是在那些焦慮成分上），導致傳播像走進死胡同般，我們僅能以天使與海豚的傳播做為最佳典範。彼德斯以西方經驗作為脈絡的鋪陳，如同他在譯本的譯序裡，闡釋他原曾想將東方哲人——孔子也一併與柏拉圖、耶穌作為探究的文本，因為三人都曾有對話、都有門徒進行記錄與撒播的工作。筆者認為，即便孔子被其帶入討論，也會因為彼德斯對於傳播與科技間本質上的變項關係，僅能得到同樣的焦慮答案。

因此，難道沒有其他方式能讓人像天使與海豚般地進行傳播？這是筆者的好奇與疑問，而當我們的視野停留在對話與撒播的傳播科技或傳播媒介之時，是不是忽略了甚麼？

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代表學者之一的巴斯卡（Bhaskar, 1998）在《自然主義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一書中開宗明義地說，長久以來，我們都將尋求真理的取徑（方法）視為爭論對象，但我們應該討論的是，哪些問題才是該利用這樣的取徑來找出真理，並讓能動者（agent）能夠真正地理解。因此巴斯卡陳述的其中一個重點為：過去不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詮釋學）都積極地尋求真實（社會真實），但卻誤將認識論（方法）錯當本體論，

airiti

因而造成無法確實尋求背後的真相（機制，mechanism）。只要能找到機制，即能突破實證主義與詮釋學之缺失，因此巴斯卡換了一個面向來進行破解迷思的方式。巴斯卡承襲季登斯（Giddens）之看法，將結構權能（structure power）與能動（agency）置放於其論述之中、在確認事物的真實存在之外，還要結合材質主義（materialism），反證、確認能動性存在，然後找出機制。因此，巴斯卡所看到的機制，是他延伸出關係（relationship）作為一種結構與能動者互相對應的（尤其巴斯卡強調結構不能化約為個人），而重視如此的「關係」、即為了找出現象背後之機制所在。

因此，巴斯卡在此提示了筆者，應跳脫出觸覺與時間的唯一性，因為那仍是沉迷在「交流的無奈」的認識論、並且服膺於彼德斯的焦慮之中。我們必須回到能動（或說此在）的本身重新檢視能動性，才能找出傳播其他的機制、問題或者新發展的空間與機會。因此筆者選擇透過重新檢視愛慾與身體的位置，闡釋傳播的其他可能性以及期待。

## 伍、小結：傳播溝通不無奈——回到主體能動的本體論

在這一篇文章評論裡，筆者的主要工作有兩項：第一，檢視彼德斯在其書所認同「天使與海豚」的完美傳播形式、以及其將觸覺與時間做為人類傳播的一種完美前提之下，去進行另一個層次的討論——將愛慾視為一種傳播動力。即便在西方脈絡下，或許無須將觸覺昇華到如此高的境界、而是當我們從科技的討論轉向身體時，去瞭解完整身體所呈現出的能動性時，就能豐富傳播本身。

第二，重新思考愛慾的運用。當我們試圖去解析愛慾的成分、傳佈型態以及它作為一種傳播動力的可行性時，就有助於我們討論傳播的過程、中介的形式以及對話與撒播的本質。回到以能動者作為主體，事實上我們並不受限於科技的形式、也不為所侷限。

整體說來，本書評希冀能為彼德斯補充一些關於身體實踐的零星思維：能動者的本體本身就蘊藏了不同性格的象徵，這是其它符號中介在傳遞意義時所無法達到的，因此，科技的應用會導致傳播過程的失敗、無奈，那是因為個別的主體（人）、去適應客體（媒介）所造成的，更遑論要複數的主體（社群）去適應單一的客體；而能動者本體的發展乃是讓外在客體適應自身後、再產生不同的變化，這些變化是隨心所欲、是圓融的，一旦確立了人的主體性的存在，我們就不會被困在傳播的無奈之中，更甚者能在人類社群中找出與海豚或天使的撒播機制。

最後，傳播的本質是相當珍貴的，利用愛慾作為人類與人類傳播的一種動力本質雖然有點異想天開，但或許能因此將傳播做一次重新的思考，提供一種閱讀的觀點。

## 參考文獻

- 王慶節、陳嘉映譯（2002）。《存在與時間》。臺北：桂冠。（原書 Heidegger, M. [1927]. *Sein und zeit*. Halle, Germany: Niemeyer.）
- 何道寬譯（2003）。《交流的無奈：傳播思想史》。北京：華夏。（原書 Peters, J. D.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黃冠閔（2009）。〈觸覺中的身體主體性——梅洛龐與昆希〉，《臺大文史哲學報》，71：147-183。
- Bhaskar, R. (1998).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 Casmir, F. L. (1994). The role of theory and theory building. In F. L. Casmir (Ed.), *Building communication theories* (pp. 7-48).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Craig, R. T. (1993). Why are there so “many” communication theor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3), 26-33.
- Dyer, R. (1993). Male sexuality in the media. In R. Dyer (Ed.), *The matter of images: Essays on representation* (pp. 89-99). London: Routledge.
- Freud, S., & Strachey, J. (1961).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J. Riviere, tran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0)
- Handelman, D. (2003). Towards the virtual encounter: Horton’s and Wohl’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 In E. Katz, J. D. Peter, T. Liebes, & A. Orloff (Eds.), *Canonic texts in media research: Are there any? Should there be? How about these?* (pp. 137-151).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Marcuse, H. (1955).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 Press.
- Peters, J. D.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